

插图版

【奥地利】奥古斯特·库比茨克·著
陈川译

青年希特勒

蜕变从这一刻开始！



二战狂人希特勒青年时代唯一密友的回忆录，首次简体中文出版！
讲述青年希特勒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直面希特勒神秘的内心世界！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插图版

青年希特勒

蜕变从这一刻开始！

【奥地利】奥古斯特·库比茨克·著
陈川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錄

[譯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初會](#)

[第二章一段友誼的成長](#)

[第三章青年希特勒的畫像](#)

[第四章希特勒母親的畫像](#)

[第五章希特勒父親的畫像](#)

[第六章逃離學校](#)

[第七章初戀斯蒂芬妮](#)

[第八章痴迷理查德·瓦格納](#)

[第九章年輕的民族主義者](#)

[第十章希特勒重建林茨的夢想](#)

[第十一章蛻變從那一刻開始](#)

[第十二章前往首都維也納](#)

[第十三章希特勒母親的葬禮](#)

[第十四章「跟我走，庫斯特爾！」](#)

[第十五章斯通帕街29號](#)

[第十六章希特勒改革社會的夢想](#)

[第十七章逆流直上](#)

[第十八章歌劇院之夜](#)

[第十九章希特勒創作的歌劇](#)

[第二十章「空中花園」](#)

[第二十一章逃兵役插曲](#)

[第二十二章希特勒對女人的看法](#)

[第二十三章政治覺醒](#)

[第二十四章消失](#)

[第二十五章再見希特勒](#)

譯者序

上世紀30年代，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開始了大規模反猶排猶運動。在這場駭人聽聞、慘無人道的民族滅絕大屠殺中，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犯下了滔天罪行。據戰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納粹黨共屠殺了約570萬猶太人。是怎樣的因素製造了希特勒這樣一個殺人惡魔，我們有必要從他所在的社會環境、家庭生活背景、教育經歷、性格發展以及個人愛好等方面進行研究。本書以回憶錄形式，對希特勒的青年時期進行了詳細記述，是研究希特勒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資料。

本書作者奧古斯特·庫比席克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大概還比較陌生。的確，這位謙遜、溫和，酷愛音樂的奧地利人從未製造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的名字，卻隨著另一個人物的發跡，而變得特殊起來。

從1904年到1908年，作者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唯一夥伴。在那段青澀窘迫的歲月中，他們曾分享過同一個房間、同一塊麵包，以及連對父母也不願傾訴的祕密。在這個世界上，或許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像作者這樣，能如此長時間和近距離地觀察青年希特勒的人。

確實，如庫比席克自己所說的那樣，「阿道夫·希特勒性格的初步形成這段時期鮮為人知，而人們已知的，關於他早年的經歷，卻又虛假不

實。」在國內，關於專門記述希特勒青年時期的書籍資料甚少，而許多較權威的關於希特勒的傳記在描述這段時期的時候，或多或少都引用了本書的內容。

本書作者庫比席克是真實見證希特勒成長的人，這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初戀、輟學、他的藝術夢想、他的家族、維也納歷險以及他性格的發展、政治觀點的形成等。在書中，作者用生動質樸的語言為我們揭開了青年希特勒的神祕面紗，帶我們走進了希特勒隱祕的內心世界。因此本書非常值得國內二戰迷和希特勒研究者細細品讀。

作為20世紀製造戰爭殺戮浩劫的惡魔，希特勒的暴行和他發動的戰爭不僅毀滅了自己和他的「理想帝國」，還使得整個歐洲和半個亞洲在戰火和硝煙中成為了廢墟，超過20多億人口慘遭塗炭。

那麼，阿道夫·希特勒青年時期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極端思想和政治觀點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這本書裡載有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

本書最早用德文印刷出版（1953年），後又被翻譯成幾個英文版本，在歐美國家認知度較高。我本人是一個歷史愛好者，特別是對二戰相關歷史感興趣。在同趣好友的推薦下，這本書進入了我的視野。閱讀後，我感覺有必要讓國內的歷史愛好者涉獵和分享。因此才下決心參照德語（為主）和英語（為輔）兩個版本將其翻譯完稿。而作為一名

譯者，我視自己為一名平凡的搬運工，唯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從倉庫中搬運出這些經年陳舊的「貨物」。書中觀點僅代表希特勒的少時夥伴——庫比席克個人觀點，不代表譯者觀點。

畢竟歷史不是被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還望各位讀者對書中的內容進行嚴肅甄別！

作者序

我的決定和理由

將我對青年阿道夫·希特勒的回憶記錄成書，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決定。因為我承擔了可能被誤解的巨大風險。我57歲時，在美軍拘留營遭受了16個月的牢獄之災，從而我的健康也被摧殘殆盡，所以我必須有效地利用我的剩餘時間。

1904年到1908年期間，我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的朋友，起初在林茨，而後是維也納，我們曾分享過同一個房間。希特勒的性格初步形成的這段時期鮮為人知，而人們已知的，關於他早年的經歷，卻又虛假不實。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將這個階段一筆帶過，目的是掩飾過去。因此我的發現，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深化阿道夫·希特勒的形象，不管人們站在何種立場去解讀。

本書中既未摻雜任何不真實的事件，也沒出於政治原因，省略掉一些東西，為此我一度煞費苦心。我想要說：這些都是實事的原貌。例如用希特勒後期的思想來武斷定義此人，其實是不恰當的。我在記述時，總是小心翼翼地避開這個套路，僅僅把他看作是從1908年以後，或者戰爭爆發後，就一直杳無音信的摯友。

要想精確地回憶起40年前的往事，的確很困難。但我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友誼，從一開始就顯現出了它的不同尋常。我們這段關係中的一些細節，比其他事情更能令我印象深刻。此外，我還要感謝阿道夫·希特勒，因為他讓我父親相信，我有與生俱來的音樂天賦，我屬於維也納音樂學院，而非傢俱裝潢作坊。阿道夫·希特勒為我化解了來自我家庭的阻力，給我的人生帶來了決定性的改變，也給我們的友誼增添了實質性的內容。另外，感謝上帝賜給我優秀的記憶力和聽力。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藉助了我朋友曾經寄給我的信件、明信片、畫作，以及我很久以前的一些簡短筆記。

奧古斯特·庫比席克

埃費丁，1953年8月

第一章初會

我於1888年8月3日出生在林茨。

我父親結婚之前曾在林茨的一個傢俱製造廠當過傢俱商助理。他過去常到一家小餐廳去吃午飯，那兒正是他邂逅我母親的地方，因為我母親是那家餐廳的服務員。很快他們墜入愛河，並於1887年7月結為夫妻。

起初這對年輕的夫婦居住在我外公外婆家。我父親的工作很辛苦，收入卻很微薄，我母親在懷上我的時候又不得不放棄了工作，而我就出生在這麼一個窘迫的家庭環境中。1年後，我的妹妹瑪利亞出生，可她還在很幼小的時候就夭折了。第二年，黛蕾絲出生，她在4歲時也離開了人世。我的第三個妹妹，卡洛琳，患上了絕症，勉強支撐了幾年，8歲時同樣離我們而去。接連失去3個孩子，讓我母親的悲傷無窮無盡，她的生命中處處都承受著再失去我的恐懼，因為眼下我是她四個孩子中唯一的倖存者，所以母親把她全部的愛都注入到了我一個人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庫比席克家和希特勒家的這兩位主婦有著極其相似的命運，兩位母親都遭受過同樣的苦難。希特勒的母親也曾失去過3個孩子，古斯塔夫、艾達和奧托。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阿道夫一直是她母親的獨子。在希特勒5歲的時候，他的弟弟埃德蒙出生，但6年後不幸夭折。其他的倖存者就只剩下他的妹妹——1896年出生的保拉。儘管阿道夫和我平時都很少提及這些死去的兄弟姐妹，但我們總能感覺到作為家族血脈之延續者的一份特殊責任。

阿道夫偶爾稱呼我為「古斯塔夫」而非奧古斯特——給我寫信的時候他甚至還把這個名字搬到了信封上。然而他並沒發現，他給我起的這個別名其實跟他第一個已故兄長的名字是一樣的。可能是他將「古斯塔夫」和我的小名「庫斯特爾」搞混淆了，抑或只是他想給某人，比如說我，起這樣一個名字來取悅他的母親，畢竟他們家一直都把我當兒子一樣對待。

與此同時，我父親也開始自立門戶，他在克萊姆大街9號開辦了自己的傢俱生意，醜陋而老舊的貝恆艾特公寓便成了我童年和青年時的家，至今它都還一成不變地矗立在那裡。昏暗狹窄的克萊姆大街與它的延伸部分——鋪著草坪和種植著樹木的寬闊而大氣的人行道——相比，顯得相當的寒酸。

我們不良的居住環境肯定也是導致我妹妹們幼年早亡的一個因素。在貝恆艾特公寓，情況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公寓的底樓是傢俱作坊，二樓才是我們的住處，包含兩間臥室和一個廚房。直到如今，我父親就一直沒擺脫過來自金錢方面的困擾，店裡的生意十分慘淡，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考慮要關門歇業，回到以前的老闆那裡去謀一份工作，然而每一次他都能夠在最後關頭克服所有的困難。

那時候我也剛開始上學，這段經歷很不愉快。我母親為我在學校的糟糕表現潸然落淚，她的悲傷成了我努力發奮的唯一動力。然而在我父親看來，除了要我在適當的時候接手他的生意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

不算問題——是什麼能讓他這麼奴隸般的沒日沒夜地工作——是我母親想要我上學的願望，無論我成績有多糟糕她都希望我能繼續學習。首先我必須在語法學校學習4年，然後可能要被送到師範學院去念書。但我對此並不同意，可喜的是，我父親早就有了別的打算，在我10歲的時候，他把我送進了公立學校。這樣一來，我父親便想當然地以為，我的未來規劃就此被最終確定。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還有另外一樣事物在支配著我的生命，讓我心甘情願為它出賣自己的靈魂，那就是音樂。9歲那年，我收到一把作為聖誕禮物的小提琴，從那時起，這份愛好便被賦予了充分的表達。我清晰地記得那個聖誕節的每一個細節，在我現在垂垂老矣，追憶往昔之時，我才發現，我有意識的人生好像就是從這把小提琴開始的。我們鄰居的大兒子是個年輕的小學實習老師，他給我上小提琴課，我學得是既快又好。

當我的第一個小提琴老師在鄉下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已進入了林茨音樂學校的初級班，但我很不喜歡那裡的氛圍，也許是我比其他小學生都更優秀的原因吧。假期過後我又去上了一些私人課程，這回是跟著一個匈牙利軍樂團的軍士長學習，他很快就讓我明白，其實我啥都不懂，而後他才開始教我用軍樂方式演奏小提琴的一些基礎原理。那傢伙，真是老科佩斯基實打實的軍營廣場操練。有時候，我真的是受夠了他那套討厭的軍士長規矩，而他每次都會用這種保證來安慰我：

「只要有更大進步，你就一定有機會被軍隊收編為音樂學徒。」在他眼裡，為軍隊服務是一個音樂人榮譽的頂峰。後來我放棄了在科佩斯基那裡的學習，並升到了音樂學校的中級班，那時培養我的人是海因裡希·德紹爾教授，一位兼具天賦與實力並有著細膩感情的老師。同時，我還學習了小號、長號和樂理，併成為了學生管絃樂隊裡的一員。

我已經在天真地考慮著要讓音樂成為我終生的事業，直到冷酷無情的現實讓我的想法落空，我才不得不以一名學徒工匠的身份去幫我父親打點生意。那時我剛剛離開公立學校不久。以前，每當店裡人手不夠的時候，我就得去充個數，搭把手，因此對這活兒還算比較熟悉。

這是一項令人厭惡的工作，拆開舊傢俱的填充物，換上新的又重新裝回去。可憐的學徒們在令人窒息的漫天灰塵中工作，那些被帶到店裡的舊床墊是多麼的破爛啊！不管是有害還是無害的細菌，都在這些舊床鋪上留下了痕跡。怪不得傢俱裝潢商都活不長。但我很快便在我的工作中發現了愉快的方面：個人品位和對藝術的感覺在此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這份工作與室內裝修也並非毫無相通之處，一方面它能夠讓我參觀到一些富有的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長我的見識。到了冬天，就基本上無事可做了。那麼這個空閒時間，我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當中。當我成功地通過了熟練工測試之後，我父親就想去承攬同行的其他生意，我完全理解他的意圖，但就我內心而言，最重要

的事情並不是怎樣提高我的技術水平，而是如何搞好我的音樂學習。這麼一來，我只好選擇待在我父親的工作間裡，因為比起在其他老闆那裡工作，我有更多的自由來支配我的空閒時間。

「通常在一個管絃樂隊裡，小提琴總是氾濫，但中提琴永遠難求。」

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激德紹爾教授為我提供的這句座右銘，並輔導我轉型成了一名中提琴手。當年，林茨的音樂事業的發展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高度，奧古斯特·古勒裡希是音樂社的負責人，作為李斯特的信徒和理查德·瓦格納在拜羅伊特的合作人，古勒裡希是林茨音樂界當之無愧的領導者，這也使之招致了許多誹謗，有的人甚至把音樂社說成是「土包子的集會」。每年音樂社都要舉辦三場交響音樂會和一場特殊音樂會，通常是唱詩班還有管絃樂隊配合表演。我母親雖然有著卑微的出身，但她也熱愛音樂。她幾乎從不錯過任何一場類似的演出。當我還是小孩兒時我就被我母親牽著去看音樂會了，母親會為我現場講解。當我開始精通幾樣樂器的時候，我對這些音樂會的鑑賞力和理解力也自然就提高了。我的最高目標是成為一名管絃樂隊裡的演奏者，演奏中提琴或者小號都行。但是目前，對於忙於改造佈滿灰塵的舊床墊和糊牆這種活的我來說，這仍然是個問題。

那些年，我父親得了許多傢俱裝潢商通常都會染上的職業病。一次慢性肺炎發作讓他在床上躺了將近6個月，我不得不一個人到作坊去工作。如此一來，便有兩件事情並列出現在我年輕的生命中：一樣是工

作，它喚醒了我的力量甚至是我的肺；一樣是音樂，這是我的摯愛。我從不曾想過這兩者會有任何聯絡。然而它們的確有。我父親的一位顧客是省政府裡的官員，他負責管理歌劇院。一天他找上門來，想要我們幫他修理一套洛可可式傢俱的坐墊。這活兒完成以後，我父親吩咐我把坐墊送到歌劇院。舞臺監督指引我來到舞臺，叫我把墊子重新安到傢俱上。當時，臺上有一場排練正在進行，我不清楚他們演的是哪一齣，但想必這是一部歌劇。我仍然記得，當我置身舞臺之上，站在這些歌唱者的中間，我立馬就感受到了一種非凡的魅力。猶如脫胎換骨般，我平生第一次重新認識了自己。

劇院！一個多麼美妙的世界！表演者神采煥發地站在臺上，衣著華麗而整齊。他們在我眼中就像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命。他們演唱得如此輝煌，以至於我都無法想象，這些人竟也能像普通人那樣講話。管絃樂隊對他們強有力的聲音有著迴應，我佇立在這個為人們所熟悉的場所，此時此刻，音樂迄今對我意味的一切似乎已不再重要，只有將舞臺聯絡起來，才能使音樂達到一個更高、更莊重的境界，達到想象的極致。但是身處此地的我，這麼一個可憐的小傢俱裝潢商，卻正忙活著給一套洛可可傢俱裝墊子，多麼可悲的工作！多麼不幸的存在！戲劇，那只是我曾經搜尋過的字眼。演出和現實開始在我的意識裡變得混亂。那個一頭亂髮，套著圍裙，卷著襯衫袖子，顯得其貌不揚的小夥子，正站在舞臺側面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笨拙地倒騰著他的傢俱墊子，好像在為他的存在做著辯護——難道他真的只是一個窮苦的傢俱

裝潢商？一個可憐的、被人鄙視的傻子？一個為了生計四處奔走，被當成活梯一樣擺來擺去的下人？如果那個小傢俱商拿起他的工具走向舞臺前排的腳燈，那他絕對會顯得從容不迫，他會跟從著樂隊指揮的手勢唱出屬於自己的樂章，而這只是為了要向坐在劇院正廳前排的觀眾們證明，他敢於拒絕那個謹小慎微的世界，事實上，他並不真正是那個蒼白消瘦，來自克萊姆大街一個傢俱作坊的店小二，在這個劇院的舞臺上，他也能擁有自己的位置！

從那時以後，我就保持著對劇院如痴如醉地著迷。在顧客家裡刷牆的時候，我胡亂地往牆上抹著糝糊，心不在焉地貼著充當塗底層的報紙，然後又漫不經心地鋪著牆紙，而我無時無刻不在做著美夢，夢想著劇院裡咆哮般的喝彩，幻想著自己成為一名樂團指揮，神氣十足地站在管絃樂隊的面前。然而這些美夢不僅沒有對我的工作起到任何實質性的促進效果，反而有時還會給我帶來一些麻煩，比如，一部分牆紙會因為我的粗糙做工而不幸錯位。但有一次，當我回到店裡的時候，我害病的父親立馬便讓我認識到了我身上肩負的重擔。

因此，我就在夢想與現實之間搖擺不定。家裡無人知曉我的思想狀態，因為與其要我將自己心中的豪情壯志透露隻言片語，不如讓我咬舌自盡。即便是對我母親，我也隱藏了自身的願望和打算，但或許她還是能夠猜到，是什麼在佔據著我的思想。然而我又怎能給她增添更多的擔心和憂慮呢？所以，沒有一個人能讓我吐露自己的心事。我感

到深深的孤獨，像一個被拋棄的人，彷彿也正是這種年輕人特有的孤獨，讓我的生命第一次顯露出它的美麗與危機。

劇院給了我新的勇氣。我幾乎不曾錯過任何一場歌劇演出。無論幹完工作後多麼勞累，我都會毅然決然地向劇院奔去。當然，用我父親發給我的那點兒工資，也就只買得起一張劇院的站票。因此我常常習慣性地來到劇院裡一個所謂「散步走廊」的地方，那裡有著最開闊的視野，此外我還發現，沒有別的地方能比這裡的音響效果更好。就在

「散步走廊」的正上方是貴賓席，它由兩根木頭柱子支撐著。這些柱子對「散步走廊」的那些常客來說是很受歡迎的，因為這裡是唯一一處能夠讓人倚靠著並且毫無阻礙地看到舞臺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斜靠著牆，這兩根柱子就總會在你視線裡出現。我很高興能夠背靠著這些光滑的柱子休息，尤其是當我結束了一整天在活梯頂上的艱辛工作之後！當然，要想佔到這個位置，那就必須趕早！

一些瑣碎的事情總是經常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長久的印象。我仍然能回想起自己那時衝進劇院，不確定是選左邊的柱子，還是右邊的柱子。然而，兩根柱子中的一根，通常是右手方那根，早已屬於了一個比我還更熱心的人。

我一半是惱怒，一半是驚喜，朝著我的競爭對手瞟了幾眼。他是個面色蒼白且身形羸瘦的年輕人，與我年齡相仿，他閃耀的眼睛正貫注於

演出。我推測他來自一個較好階層的家庭，因為他總是顯得穿著講究並且不苟言笑。

我們彼此都注意到了對方，但卻仍然沒有半個字的交流。過了沒多久，我們便開始在演出的幕間休息時相互交流，很明顯，我們兩個都不贊同這部歌劇其中一個部分的角色分派。我們共同探討併為我們一致的批評而深感欣喜。我對他能夠快速準確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而深感驚訝，在這方面他無疑是我的老師。而另一方面，當談及純粹的音樂之時，我又感到了自身的優越性。我已記不得這初次碰面的確切日期了，但我確信那應該是在1904年的萬聖節前後。

這種日子持續了好一段時間——他從沒向我透露過他的任何情況，我想我也沒有必要跟他談論我自己，但是，之後不管劇院上演什麼，我們都更加強烈地驅使自己去觀看，我感到我們兩個都對戲劇有著同樣的熱忱。

在一次演出結束後，我陪同他回家，前往洪堡大街31號。臨別之際，他告訴了我他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第二章一段友誼的成長

從此以後，每逢演出，我們便不約而同地來到劇院門口見面，並且在大多數夜晚，我們都會沿著蘭德大街散步。

林茨，在過去的10年裡，已經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工業城市，並吸引著來自多瑙河地區的各地民眾，然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個鄉村城鎮。在林茨的郊外，仍然儲存著那些堅如堡壘的農舍，經濟型公寓住宅在使用至今的牧場周圍迅速增長。人們坐在小酒館裡喝著當地的葡萄酒，無論置身何處，你都能聽見各地的方言。鎮上的交通運輸仍然依靠馬車，他們特別注意保護林茨所遺留下來的「鄉村氣息」。雖說鎮上的人大多是農民出身，而且有的同一些鄉下人還沾親帶故，可他們卻刻意要跟鄉下人劃清界限。當地大多數有權勢的家族幾乎都彼此相識，商界人士、政府公務員還有部隊官兵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主要階層。

每天晚上，在城裡的主要街道上散步的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主街道與火車站相連，直通橫跨多瑙河的大橋，它被意味深長地稱作「蘭德大街」。由於林茨沒有大學，所以各行各業的年輕人都十分熱衷於效仿大學生的行為舉止。蘭德大街的社會生活，幾乎可以跟維也納戒指路的人文風貌相媲美，至少林茨人是這麼想的。

耐心，彷彿不包含在阿道夫自身那些傑出的品質當中，無論何時，只要我一失約，他就會立馬尋到我店裡，不管我是在翻修著一臺黑色馬毛沙發還是在搗鼓著一臺老式的翼狀靠背椅。我的工作在他眼中，只不過是一種令人生厭且對我們的私人關係構成阻礙的事物，除此之外

便無任何意義。一旦失去耐心，他便會快速地旋轉起他那根隨身攜帶的黑色小手杖。我對他平日裡那種極其休閒的生活狀態感到相當驚訝，於是我就無意識地問起他是否在從事什麼工作。

「當然沒有。」他粗魯地回答道。

針對這個我認為十分異常的回答，他做出了相當詳盡的說明。他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去找工作的必要，因為所有的工作都被他統稱為「餬口的營生」。

這種觀點我簡直是聞所未聞，它駁斥了目前支配著我人生的每一個原則和信條。起初我認為，他的這些言論只不過是年輕人的自吹自擂，因而他的強勢姿態，以及他那種嚴肅而自大的講話方式並沒能將我唬住。但不管怎麼說，我對他的觀點還是感到有些震驚，至少我暫且忍住了沒往下問，因為他看上去好像對不適合他的問題相當敏感，這點我已經明顯地察覺出來了。所以還是跟他談談《羅恩格林》（那是一出令我們無比心醉的歌劇）顯得更恰當一些，總比拉扯我們的私事強。

我想他可能是一個紈袴子弟，剛繼承了一筆財產，能夠負擔得起生活，用不著依靠那種「餬口的營生」——在他嘴裡，這幾個字眼充滿了輕蔑之意。我從沒把他想象成是那種羞於找工作的人，甚至絲毫都沒有把他看作是一個膚淺而無所事事的懶漢。每當我們路過園丁咖啡

廳的時候，阿道夫總會變得情緒失控，因為他見不慣玻璃櫥窗裡面那些倚靠在大理石面桌子旁，用毫無意義的閒侃打發著時間的年輕人。而這群人顯然還沒有意識到，阿道夫對這種與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多麼的憤怒。但說不定坐在「櫥窗裡」的其中一些人已經有了一個好工作和一份有保障的收入。

或許這個阿道夫是一名學生？這曾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他手中那根頂著精美象牙箍兒的黑色檀木手杖分明就是一個學生的特徵。但仔細一琢磨我又感到有點奇怪，他選中的朋友竟然只是一個時刻擔心別人會聞到他身上的糶糊氣味的家居裝潢匠。如果阿道夫真是一名學生，那麼他肯定在某個地方讀書。於是我又突然把話題引向了學校。

「學校？」這是我認識他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火爆脾氣。他不願聽到任何與學校有關的事情。學校再也不屬於他關心的範疇，他說。他痛恨學校的教師，以至於他都沒再跟他們打過招呼。而且他還特別討厭那些被學校變成懶漢的同學。不行，關於學校的話題看來是個禁區。然而我還是將我在學校的失敗經歷告訴了他。「為何沒有取得成功？」他好奇地問道。儘管他對學校的教育充滿了蔑視，但他似乎對我在學校的差勁表現感到相當遺憾。他這種矛盾的思想讓我困惑不解。但從我們的談話中，我多少能夠推斷出這樣的結論：他一定剛離開學校不久，可能是所法語學校，也可能是所實科中學，並且想必他的求學生涯是以徹底失敗告終，否則他絕對不可能對學校產生這種完

全排斥的情緒。除了他的自我矛盾以外，他在我面前還總是顯得反覆無常和令人捉摸不透。有時候他在我看來甚至幾近凶險。一天，在我們散步的時候，他突然停下腳步，從他兜裡掏出一個黑色的小冊子——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形——他為我朗誦了一首他自己創作的詩歌。

詩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得了，確切地講，我是無法將這首詩與阿道夫日後給我朗讀的其他詩作區別開來。但在我清晰的記憶中，我的朋友喜歡創作詩歌，而且老是隨身攜帶他的詩作，就如同我經常揣著我的工具一樣。後來，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他的一些未完成的畫作和設計——這些迷亂而令人費解的設計完全超出了我的欣賞水平。當他告訴我說，他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放在他房間裡，並且已決定將他的畢生奉獻於藝術的時候，我才恍然明白了我朋友的真正為人。他屬於那種特殊型別的人——那種我曾經在天真爛漫的時候夢想過要做的人：一名藝術家。他鄙視那種純粹的「餬口營生」，立志獻身於詩歌創作，繪畫和歌劇欣賞。我對他欽佩之極。我為親眼見證的這份偉大志向而感到激動不已。那時候我對藝術家的看法依舊很懵懂——大概就跟希特勒的思想差不多。但正因如此，藝術家這一身份對我們而言才顯得更加的迷人。

阿道夫很少談及他的家庭。他經常對我說，不跟大人們牽來扯去是個明智的做法。因為這些思想奇怪的人，只會迫使別人偏離自己的計

劃。比如他的監護人，一個叫作邁爾霍費爾的萊翁丁農民，他滿腦子想的就是如何讓阿道夫去學一門正經手藝。當然，阿道夫的姐夫也持這種觀點。

我只能這麼做個概括：阿道夫和他家裡的關係肯定頗為異常。顯然，在這些大人當中，他只接受一個人，那就是他的母親。但當時他只有16歲，比我還小9個月。

然而他的許多想法都與資產階級的觀念格格不入，我其實對此毫不在意——相反，正是基於這樣的事實，他的不同尋常，在我眼中才顯得更具魅力。他決意獻身藝術這件事情，在我看來，是一個年輕人能做的最好決定。我也曾偷偷地遐想過，要把那灰塵滿天，噪聲不斷的傢俱作坊變成純粹而高尚的藝術場所，然後將我的一生，交付給音樂。

對年輕人來說，初次邂逅一段友誼的地方，絕不可能沒有意義。我和阿道夫的友誼就誕生在劇院，誕生在輝煌的場景和壯美的音樂當中，我覺得這似乎是一種象徵。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之間的友誼本身就構建在這種令人愉快的氣氛之上。

此外，我和阿道夫的境遇也無太大差別。學校的教育早已無法滿足我的需求。儘管我把愛和忠誠都獻給了我的父母，可是大人們對我來說也並不是生命的全部。最重要的是，在被諸多問題困擾的情況下，我卻找不到一個人來傾訴。

儘管如此，我們這段友誼在一開始的時候還是面臨著不少的困難，因為我們兩個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我是一個安靜、非常善解人意、適應能力強、有點兒心不在焉的年輕人，所以我總是願意屈服，也可以說我有著一種「音樂人格」。而阿道夫，感情極其強烈並且容易衝動。一些十分瑣碎的事情，比如幾句輕率的言語，都能導致他大發雷霆，使得事件的本身和他那種莫名的惱怒顯得極不相稱。但也可能是我在這方面對阿道夫有所誤解吧。或許我們的不同之處在於，針對同一件事情，我可能會認為它是無關緊要的，而他卻會看得很重，甚至對其相當較真。是啊，這就是他的一個典型性格，任何事物都能激起他的興趣——就沒見過他不感興趣的事兒——但也能使其煩惱。

儘管有這麼多源自我們迥異性格的障礙和困難，但我們之間的友誼從未出現過嚴重的危機。我們也沒有像其他很多年輕人那樣，時間一久，關係就變得冷淡，甚至不相往來。恰恰相反！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總是十分小心地迴避著衝突。說來也奇怪，像他這麼一個固執己見的人，竟然也能偶爾體貼地想到，他的某些言語可能會傷害我的自尊。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彼此之間磨合得越來越融洽。

很快，我便意識到了我們的友誼為何能夠持久的一個重要原因，那是因為，我是一個耐心的傾聽者。而且我對自己扮演的這種被動角色並沒有感到任何不滿，因為這讓我意識到，我的朋友是多麼的需要我。

他，也是個孤獨之人。阿道夫的父親已去世兩年。儘管他深愛著自己的母親，但他母親對於他思索的那些個問題確實也愛莫能助。我仍記得他曾經是如何就那些我完全不感興趣的問題跟我侃侃而談的，比如什麼多瑙河大橋上的義務徵稅，或者是哪條街上舉辦的慈善基金募捐。

其實他要的只是一吐為快和一個願意傾聽他的人。當他對著我一個人發表演講的時候，他會比劃出一些誇張的手勢，經常弄得我一驚一乍的。他並沒有因為我是他唯一的聽眾而感到苦惱。像阿道夫這種年輕人，他對自己看到和體會到的週遭事物都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因而他必須要為自己蓄積在心中的那份洶湧澎湃的情感找到一個宣洩口。通過對這些事物進行長篇大論的評說，他自身的壓力和緊張情緒便得到了釋放。

通常，他發表這些演說的地方都選在戶外，比如弗萊堡的大樹下，或是多瑙河畔的叢林中，其勢如火山爆發。彷彿當真有什麼東西正在努力掙脫他的身體。像這般如痴如醉的模樣，迄今為止，我只在劇院看到過——是一名演員對強烈情緒的表現和詮釋。最初，當我見識到這種情感爆發的時候，我被震撼得瞠目結舌，甚至都忘了鼓掌。但我很快意識到，阿道夫並不是在演戲啊！的確，他沒有演戲，也沒有誇張，他的演講中所流露出的都是真情實感，因為他的表情總是絕對的嚴肅。他是怎樣做到流利地進行自我表達的？怎樣做到生動地傳遞自

己的內心感情的？而當他的情緒完全失控的時候，又是怎樣做到出口成章的？這些事實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讓我驚歎不已。首先打動我的並不是他演講的內容，而是他說話的方式。對我而言，這是種值得稱讚的新鮮感受。我從未想象過，一個人僅用語言就能製造出這樣的一種效果。而他想從我這裡得到的東西只有一樣，那就是贊同，我很快便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不是說，贊同他的觀點對我而言有多麼困難，而是因為我從來就沒有仔細地思考過他提出的任何問題。

但是，如果僅僅將我們的友誼假設成那種侷限的單邊關係，那就錯了。這未免也把阿道夫想得太低階，也把我看得太微不足道了吧。最重要的是我們兩個能夠達成互補。在阿道夫身上，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一種強烈反應，迫使他不得不表明立場，他的情感爆發只是他對所有事物都熱切關注的一個表現。而我，從另一方面來說，則顯現出一種沉思的天性，每次他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發表意見和評論的時候，我總是放棄辯駁，並且無條件地接受他的觀點。除非我們談的是音樂。

當然，我必須承認，阿道夫對我的索取是沒有底限的，他幾乎霸佔了我所有的閒暇時光。由於他自己沒有一個有規律的作息時間，所以我不得不隨時待命。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對我有所要求，但也時刻準備著為我做任何事情。事實上，我並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的友誼沒給我留下任何時間去結識新朋友，然而我也並不需要其他朋友，因為在我看來，阿道夫頂得上十幾個普通朋友。只有一件事情才有可能會導致

我們的關係走向決裂——假如我們兩個人同時愛上一個女孩，我可不是開玩笑。那時候我也不過17歲，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但在情感方面，命運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一個特殊的解決方案。這個獨一無二的方案——我在後面「斯蒂芬妮」那一章當中做了詳細闡述——不僅沒讓我們反目，反而還深化了我們的友誼。

我知道他也一樣，除了我以外便沒有其他朋友。關於這一點，我回憶起一個非常瑣碎的細節。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正在蘭德大街散步。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青年從拐角處走來，他看上去體態微胖卻又顯得相當時髦。他認出了阿道夫是他以前的同學，於是便停下腳步，滿臉堆笑地招呼道：「你好啊，希特勒！」他親密地拉住阿道夫的手臂，詢問他最近過得怎麼樣。我當時以為阿道夫會給予他相應的友好迴應，畢竟他向來都很重視得體而有禮教的行為舉止。但我朋友卻氣得漲紅了臉。根據我以往的經驗，這種表情的變化肯定是個凶兆。「你在搞什麼，冒失鬼。」他反應激烈地朝他同學甩出一句，同時迅速地把他推開。然後他拉著我的手臂，繼續走我們的路，根本沒把那個年輕人放在眼裡，直到今天，我彷彿都還能看見他同學那張困惑而尷尬的紅臉。「都是未來的公務員，」他怒不可遏地說道，「還有許多這樣的人，以前跟我是同學。」過了好一陣子他的情緒才得以平復。

另一段經歷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尊敬的小提琴老師海因裡希·德紹爾去世了。阿道夫陪我一同參加了葬禮，但令我驚訝的是，他根本就

不認識德紹爾教授。當我對他的行為表現出詫異的時候，他這樣解釋道：「我無法忍受你和其他年輕人在一起廝混以及同他們交談。」

這還不算完，即便是我跟一個普通關係的人待在一起，都會讓他感到不高興。但最讓他壓不住火的事情是聽到有人建議他去當公務員。無論何時，只要一聽到「公務員」這幾個字眼，即便和他本身沒有任何關係，他都會感到無比的憤怒。我發現，他這種強烈的不滿情緒，從某種意義上說，仍然是在針對他去世已久的父親，那個曾經很想讓他成為一個公務員的人。這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叛逆性防禦情節」。

我必須跟阿道夫一樣，把公務員看得非常輕賤。像這類觀點，或者說立場上的統一，是我們友誼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瞭解到他對行政工作所抱有的強烈排斥情緒之後，我才明白，他為什麼會更樂意把友情交給一個普通的傢俱裝潢匠，而不是那些被溺愛的寵兒——他們從良好的家庭社會關係中得到庇護的保證，能夠準確地預知未來的人生道路。而阿道夫的情況與之恰恰相反，他的生活中總是充斥著諸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還有一個事實似乎註定要讓我成為阿道夫眼中的理想夥伴：我們彼此都認為，藝術是人間最美好的事物。當然，在那個時候，我們還不能用這麼誇張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感情。但在實踐中，我們都一直遵循這一原則，因為音樂早已成為了我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在作坊工作只是為了謀生。對我朋友而言，藝術更是顯得至關重要。他處事的極端方法，可

怕的嚴肅情緒，還有永不停歇的活躍思維，都需要得到一種平衡，而只有藝術能夠幫他做到這一點。

因此，我滿足他對一個朋友的所有要求：首先，我跟他以前的同學沒有共同點；其次，我與政府機關也沒有任何牽連，我完全為藝術而活；另外，我還很懂音樂。我們精神上的相似點和我們性格上的不同點，都使得我們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

到底人們是應該像阿道夫一樣，不緊不慢地找尋人生出路，根據過渡時期的需要，隨意地選擇一個夥伴？還是應該相信友情的緣分，聽候命運做出的安排？我把這個討論留給大家自己去評判。我所能告訴大家的是，從我們初次在劇院相識，到後來他在維也納陷入窘境，我都一直是那個與阿道夫·希特勒相伴相隨的朋友。

第三章青年希特勒的畫像

我手裡面並沒有阿道夫當年的照片——也許在我們交往的這段時期裡，他根本就沒有留下過任何照片。對此我們大可不必感到奇怪。因為在本世紀之初（20世紀），我們那裡還沒有行動式照相機，即便是有，我們也不可能買得起。那時候，人們想要照相，就只有去照相館，其消費同樣也很昂貴。放縱行事之前，我們須得考慮再三。在我的印象中，我朋友從未表達過想要去照相的意願。他從不愛慕虛榮，

即便在斯蒂芬妮走進了他的生活以後，他都依然如故。我料想阿道夫·希特勒在成名之前最多照過5張照片。

已知的關於他最早的照片是一張嬰兒照，拍攝於1889年，那時候的阿道夫才剛出生幾個月。照片上顯示了他的特徵部分——鼻子、臉蛋、嘴巴、明亮而銳利的雙眼，以及劉海。這個男孩看上去簡直像極了他的母親。我初次見到希特勒夫人的時候便注意到了這一點。而他的妹妹保拉卻長得更像他們的父親。但我從來沒見過他們的父親，這些都是從希特勒夫人那裡瞭解到的。

希特勒學生時代的照片都是班級集體照，沒有肖像照。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張照片上面都出現了同一副格格不入的面孔，彷彿一切都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改變。在我看來，這些照片反映出阿道夫人格當中的本質特徵，即「保持不變」。還有一張他16歲時的側面肖畫素描，那時候他在斯泰爾唸書，藝術家斯托姆萊赫勒為這幅畫起名叫「生命的真諦」。顯然他只是個業餘愛好者，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將其視作一幅上好的肖像畫。

阿道夫大約中等個頭，身形修長，那時候身高已經超過了他母親。他的體格遠遠算不上結實，相對他的身高而言顯得格外消瘦，一點兒都不強壯。事實上他的健康狀況極為糟糕，這也是他的首要遺憾。林茨的冬天潮溼又多霧，因而在此期間，他必須得特別注意保護自己的身體，不然他就會害病或者經常性地咳嗽。總之，他的肺很虛弱。

他的鼻子挺拔而勻稱，但絕不顯得打眼。他的額頭寬闊而略向後傾。令我一直感到惋惜的是，在那時候他就已經養成了把頭髮朝著眉毛梳的習慣。然而，這種傳統的面部特徵描述在我看來卻顯得異常滑稽，因為在阿道夫的面貌中，眼睛是如此的出眾，以致讓人們都注意不到他的其他五官。我一生中從沒見過哪個人的長相里——怎麼說呢——眼睛具有如此鮮明的特色。阿道夫的眼睛隨他母親，明亮而清澈，但他的眼神同他母親相比，則更顯犀利。尤其是在阿道夫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還能詮釋出不同的感情。在我看來，他洪亮的聲音遠不及他傳神的眼睛。實際上，他擁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即便他的嘴脣不動，別人也明白他想要講什麼。阿道夫頭一回到我們家來做客的時候，我把他介紹給了我的母親。那天晚上，我母親對我說：「你朋友那雙眼睛真不得了啊！」我清楚地記得，當我母親道出這句話的時候，她語氣中的恐懼明顯多過讚賞。如果有人問我，從哪些地方能夠看出一個年輕人的獨特品質，那麼我只能回答——「從眼睛裡」。

當然，他的口才也是不同凡響。但由於當時的我涉世未深，因而並沒想到他這個優點會在將來產生怎樣的特殊意義。但有件事情我一直深信不疑，那就是阿道夫終將成為一名偉大的藝術家。一開始我覺得他適合當個詩人，後來我又認為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直到最後，在維也納居住期間，我才確信，他真正的天賦是在建築領域。但對於這類藝術抱負而言，卓越的口才不僅會失去用武之地，而且還將變成一種阻礙。儘管如此，我卻總是喜歡聽他高談闊論。他的語言非常的

精練。他不喜歡地方語言，尤其是維也納方言，那種軟綿綿的口音令他感到極其厭惡。然而，嚴格地說，阿道夫講的並不是奧地利德語。他的發音，尤其是他講話的韻律，明顯帶有巴伐利亞風格。我想也許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在他3~6歲時，這個語言表達能力真正形成的年齡段，他們全家都居住在帕紹——他父親是帕紹的一名海關官員，所以他的口音自然也就受到了當地語言環境的影響。

毋庸置疑，我的朋友阿道夫在早年的時候就已經顯現出了演講的天賦。這點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很健談，話匣子一開啟就沒完沒了。每當他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無法自拔的時候，我就忍不住要懷疑，這樣的演講練習究竟意義何在？但與此同時我又會考慮到另一方面，難道我沒有把他所說的一切奉為真理嗎？有時候，阿道夫甚至會把我或者其他人當作實驗品，來測試他的演講威力。有件事情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在阿道夫快滿18歲那年，他成功地說服了我父親，讓我去維也納音樂學院深造，把我從傢俱作坊中解救了出來。鑑於我父親那種頑固不化的本質，這已經算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成就了。從那時起，我對他這項天賦便有了全新的認識——我從中獲益良多——我認為，只要具備希特勒的超凡口才，就沒有任何達成不了的事情。

他有這樣的習慣：故意用緩慢而有節奏的手勢來渲染自己的說辭。每當他談起自己喜愛的事物時——比如多瑙河上的大橋、博物館的重建工作，或者甚至是他為林茨設計的地鐵站——我就偶爾會把他的話題

打斷，然後問他為什麼會想到要去實現這些計劃，畢竟我們只不過是兩個窮鬼。這時，他會向我投來怪異而不懷好意的一瞥，就好像他根本沒有聽明白我的問題。對此我從沒得到過答覆，他最多也就抬手一揮，示意我閉嘴。後來我便習以為常，不再去尋究此事的荒謬之處——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居然口口聲聲地告訴我說他要興建許多龐大的工程。如果我只用耳朵去聽他的講演，那整件事情所呈現出的無非就是愚蠢的幻想和十足的癡狂，但我的眼睛讓我相信，他絕對沒跟我開玩笑。

阿道夫十分重視禮教和恰當的言行舉止。他謹小慎微地遵循著社會教條，然而卻對社會本身漠不關心。他總愛強調他父親的職位，一名海關官員，相當於軍隊裡的一個上尉。人們絕對想象不到，當他談到自己父親的時候，表現得有多麼暴躁，主要是因為他父親一直打算要把他培養成一名公務員。儘管如此，他在待人接物這方面，還是有很多考慮得比較周全的地方。他從不會忘記問候我的家人，在寄給我的每一張明信片上，他都不厭其煩地寫著「問候你的雙親」。

我們在維也納一起居住的時候，我發現他每天晚上都會把褲子小心翼翼地壓在床墊下面，這樣一來，當他第二天早晨穿上褲子的時候，就能夠欣喜地看見一條完美的摺痕。阿道夫懂得一個美好形象的價值，儘管他並不愛慕虛榮，但他知道怎樣做才能讓自己顯得更加體面。他極好地運用了自身的表演天賦，並十分機靈地將他的演講才能與之相

結合。我過去常常納悶，像阿道夫這樣天資聰慧的人，為什麼沒能在維也納過上如意的生活？直到後來我才明白，職業上的成功根本不是他的志向。在維也納認識他的人無法理解這種矛盾：一方面，他衣冠楚楚，談吐有涵養，時刻彰顯著自信的風采；而另一方面，他卻過著咎由自取，忍飢挨餓的悲慘生活。人們肯定會想，他這不是自視清高就是虛偽做作。但我認為兩樣都不是，他只是顯得與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格格不入罷了。

阿道夫帶著飢餓，投身到一項真正的藝術當中。雖然他偶爾也能碰上打牙祭的機會，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維也納通常都沒錢購買食物。即便有錢，他也更願意空著肚皮，把錢拿去看戲。他缺少常人那種對生活娛樂的理解。他不抽菸也不喝酒，在維也納，他只靠牛奶和麵包度日。

他藐視一切同肢體鍛鍊有關的事物。因此，當年流行的體育運動，在他看來根本不值一提。我以前在某處讀到過一段關於青年希特勒是怎樣壯著膽子，橫渡多瑙河的描述。我並不記得發生過這種事情，要說下水游泳，倒也有過一次，就是那回我們跑到羅德溪去泡澡。他曾一度對自行車俱樂部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主要是因為每逢冬季，運動員們就會到溜冰場去騎車。而這又僅僅是因為他愛慕的女生經常去那裡訓練溜冰。

走路，是阿道夫唯一喜歡的運動，他無時無刻不在走動，即便到了我的工作室，還有我的房間，他都仍會邁著步子踱來踱去。在我印象中，他從來就沒消停過。他能連續走上數小時而不會感到疲憊。我們曾經從各個方向對林茨的周邊環境進行過探索。阿道夫對大自然的熱愛是顯而易見的，只不過他的表現方式比較自我一些。與其他事物不同，大自然對他的吸引並不像學習那麼枯燥，我根本沒見到過他從哪本書上去了解大自然。他的求知慾在此已達到了極限。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他一度對植物學充滿了激情，並且還親手培育出一個小型植物園，但這不過是一名學齡兒童的愛好罷了。細枝末節並不重要，他所感興趣的是大自然的整體，他將其稱作「室外」。這種表達從他嘴巴里講出來似乎有種「家」的感覺，事實上，他確實也把大自然當成他的家。早在我們交往的第一年，我就發現他有種喜歡在夜間漫步，甚至能夠在某個陌生的地方徹夜徘徊的特殊癖好。

置身戶外，將會對他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時的他，同待在城市裡的自己相比，簡直就是另外一個人。他的本性在此顯露無遺。當我們沿著靜謐的小徑漫步在米爾地區的山毛櫸樹林時，或者當我們踏著輕快的步子徜徉在夜幕籠罩的弗萊堡之時，他都會顯得相當的從容與淡定。伴隨著步伐的節拍，他的思緒變得更加暢通，目標也變得更加清晰。長久以來，我一直無法理解他身上特有的這種矛盾。當明媚的陽光灑向街道，清新的風把植物的芬芳帶到城裡的時候，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會把他從狹窄而擁擠的馬路驅趕到田野和樹林。但我

們幾乎沒有去過鄉下，因為他向我保證過，他不可能再到鄉下生活。居住在一個鄉村對他而言是件相當痛苦的事情。儘管他對大自然有著無限的熱愛，但每次我們返回鎮上的時候他都顯得特別高興。

直到我加深了對他的瞭解之後，我才理解了這種顯而易見的矛盾。一方面，他離不開城市，他需要從各種各樣的事件中，獲得大量的感受和體驗，他覺得城裡的一切，都與之息息相關，因而所有的事物都囊括在他的關注範圍之內。他希望人們各自懷有不同的愛好、志向、目標、計劃以及願望。只有處在這種問題叢生的環境當中，他才會感到舒坦自在。從這個角度來看，鄉村總體上就顯得太過單調，太沒意思，太不重要，它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滿足阿道夫那無盡的探索慾望。此外，城市作為一個由許多建築物構成的整體，其本身就是一種令他著迷的事物，所以我們便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只想在城裡居住。

另一方面，由於城市不僅總讓他感到亢奮和煩躁，而且還不斷地榨取他的天賦和激情，所以他又渴望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平衡方法。大自然則為其提供了這種平衡，因為不管他如何嘗試，他都無法「改良」大自然，大自然的永恆法則凌駕於人類意志之上。在此，他能重新找回自我，並且完全不必像在城裡那樣，被迫選擇立場。

我的朋友自有一套獨特的方法讓大自然為他服務。他以前在城外找到了一處幽靜之地，於是便樂此不疲地反覆前往。當地的一草一木在他眼中都顯得如此的熟悉。在那裡，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攪擾他沉思的心

境。處在大自然的環抱之中，就如同待在一間安靜而溫馨的房間裡，使他能夠從容不迫地醞釀出那些富有激情的構想和計劃。

有段時間，每當天氣晴朗的時候，他就會跑到鐘塔路，在一條長椅上開展他的「戶外學習」。比如讀點閒書，畫些素描和水彩。他創作的第一首詩歌便誕生於此。另外還有一處更清靜、更隱祕的地方，後來也成了他的最愛。我們喜歡坐在山頂一塊挑出的岩石上俯瞰多瑙河的美景。那柔動的波濤總是能將阿道夫深深地打動。不知有多少回，我的朋友在這塊大石頭上面向我傾吐心聲，闡述他的所有計劃！當他的感情完全壓倒理性的時候，他就會釋放出天馬行空的想象。記得有一次，阿道夫生動形象地為我描述了克里姆希爾特的匈奴國之旅，當時的我，彷彿夢幻般地看見勃艮第國王的強大艦隊在河中緩緩下沉。

我們的遠途旅行跟其他人大不相同。無須太多準備，有根結實的手杖便足矣。阿道夫會找出一件彩色襯衫來搭配他平日裡穿的衣服，並且，作為著手遠途旅行的一個跡象，他會把普通領帶換成一根墜有兩個流蘇的絲帶。我們不會攜帶任何食物，但我們會想辦法去弄點乾麵包和牛奶。那段無憂無慮的時光是多麼的美妙啊！

我們鄙視火車和汽車，無論到哪裡都靠步行。每回只要一碰上我父母帶我們兩個一起外出度週末，我和阿道夫就得早早地動身出發，以便能在目的地和我父母會合，因為他們偏好乘坐火車。跟我父母一同出遊有個好處就是，我父親會在一家鄉村小客棧請我們飽餐一頓。我們

都特別喜歡去一個叫瓦爾丁的小村莊，因為它的附近就是羅德溪，一到暖和的初夏，我們就喜歡去羅德溪游泳。

我記憶中浮現出一件小事。阿道夫和我從客棧來到羅德溪洗澡。雖說我們兩個都是相當老練的遊手，但我的母親還是對此感到擔心。於是她跟著我們，站在一塊突出的岩石上看護我們。那塊傾斜的岩石上佈滿了苔蘚。我可憐的母親只顧著注意我們，卻沒有留心腳下，她不慎在光滑的苔蘚上滑了一跤，掉進了水裡。當時我離她太遠，無法立時幫到她，但阿道夫當即跟著她跳進水裡，將她拉上了岸。他一直保留著對我父母親的喜愛。直到1944年，在我母親80歲生日之時，他還特意給她寄來一個食物包裹。

阿道夫特別喜歡米爾地區。從珀斯特靈堡到格拉瑪斯特滕，我們可以徒步穿過霍茨珀德和埃蘭德斯瑪，或者漫步在草木叢生的利希滕哈格廢墟。阿道夫測量過廢墟中的城牆（儘管它們所剩無幾），還把測量資料記在了他經常攜帶的寫生簿裡。他先用寥寥數筆勾繪出城堡的原貌，然後畫出護城河和吊橋，最後再在城牆上裝飾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哥特式尖頂塔樓。他曾就此對我高聲講道：「這是我創作的十四行詩的理想背景。」但當我想對其作進一步瞭解的時候，他卻說：「我必須是第一個評價它好壞的人。」而就在我們回家的路上他向我坦白，這是在為一齣戲劇擴充素材。

我們曾踏訪過古仁的聖喬治，本希望能夠在那裡找到一些農民戰爭時期的遺蹟，我們卻未能如願以償，於是阿道夫想到了一個奇怪的點子。他確信當地居民仍然保留著一些關於那場偉大戰爭的模糊記憶。因此，第二天，在徒勞地嘗試了從我父親那裡為我爭取一天的假期之後，他一個人又去了。他在當地逗留了兩天兩夜，但我已經忘了是怎樣的結果。

為了變換視覺角度，從東面去欣賞他所熱愛的林茨，我不得不忍受著乏味，陪他一起登上芬尼山頂。阿道夫之所以這麼做，只是因為他覺得林茨人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興趣。雖然我也喜歡俯瞰城市的風景，但絕不是從這個方向。然而，阿道夫卻花費了大量時間在這個無聊的地點寫生。

另一方面，聖佛洛裡安也變成了我的一塊聖地，因為這裡曾經是安東·布魯克納工作過的地方，在他去世以後，此地便被神聖化，我們幻想著自己見到了「上帝的樂師」，聽到他在巨集偉的教堂裡用大管風琴演奏極富靈感的即興創作。然後我們穿過唱詩班腳下的地板，來到一座簡易的墓碑前，那是大師在十年前被安葬的地點。奇妙的僧院喚起了我朋友高漲的熱情和興趣。他在輝煌的樓梯前駐足停留了一個小時，甚至更久——無論如何，這對我來說簡直太久了。圖書館的壯麗讓他歎服不已！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僧院裡過於花哨的套房與布魯克納居住過的陋室形成的強烈反差。當他看到房間裡那些簡陋傢俱

的同時，他也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在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天才總是要與貧窮相伴的。

這次參觀對我具有啟發作用，然而對阿道夫來說，這是天性使然。他決不允許任何人洞悉他的性格。他的心中藏著令人費解的祕密，對我來說，他在許多方面都一直是個謎。但有一把鑰匙能夠解開他所有的祕密之鎖，那就是他對美的熱愛。當他站在聖弗洛裡安僧院這樣巨集偉的藝術傑作面前時，我們之間的隔閡便會蕩然無存。然後，激情燃燒的阿道夫，會放下心中的所有戒備，讓我感覺自己完全沉浸在我們的友誼當中。

包括魯道夫·赫斯在內的許多人，都曾這樣問過我，後來是誰邀請我到林茨去拜會元首的？在我認識希特勒之初，他是否具有幽默感？因為他的隨從說他缺少幽默感。畢竟作為一名奧地利人，他本該繼承一些奧地利人的幽默感。當然，人們普遍都感覺他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尤其是在跟他接觸不多的情況下。這種絕對的嚴肅，似乎遮蔽了希特勒的其他特點。青年時期的他同樣如此。在處理問題的時候，他總是顯得格外認真，這種表現與他十六七歲的年齡很不相稱。他可以認真地去愛，去讚美，去恨，去鄙視。但有一樣他無法做到，那就是對某件事情一笑了之。哪怕是他不感興趣的事物，比如運動，這樣一種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在他眼裡都顯得同等重要。他的問題總是層出不窮。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新問題，他都絕不會敷衍對待。要是在現實中

沒有找到答案，他就足不出戶，花大量時間翻閱書籍，冥思苦想並對這個問題刨根究底。這種驚人的鑽勁兒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品質。而其他年輕人的一些思想在他身上卻難覓蹤跡：「得過且過」、「活在當下」、「聽其自然」的愉快態度。即便是年輕人正常的「越軌行為」他都無法容忍。說來奇怪，在他的思想中，這並不是一個年輕人該乾的事情。正因如此，他的幽默僅限於最親密的圈子，就如同一種避諱。通常只針對他身邊的人，換而言之，就是那些不會再對他構成任何威脅的人。基於這種原因，他那冷峻而乏味的幽默常常帶著諷刺，但一般都是無惡意的諷刺。比如有一回，他看見我在音樂會上吹奏小號。通過模仿我的動作表情，他獲得了極大的快感，並且還一再調侃，說我的臉鼓得像個魯賓的天使。

我若不提及希特勒的另一個品質，本章便無法結束，但我必須坦率地承認，現在談論這個似乎顯得相當矛盾。希特勒善解人意並且充滿了同情心。他對我傾注了許多關懷。無須言表，他便能準確地理解我的感受。經常在我困惑無助的時候給予我極大的幫助！他總是明白我需要什麼，我想要什麼。無論如何，他都會騰出時間去幫助他關心的人。是他，說服了我父親送我去學音樂，從而決定性地影響了我的人生，這一切並非偶然。當然，這種做法也是出於他的常規態度，即分享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把我的生活也當作自己的生活在過。

這就是我根據回憶所描繪的青年希特勒的肖像。但是，對於懸在我們友誼之上那個不得其解的問題，我至今都沒找到任何答案：上帝創造此人，究竟意圖何在？

第四章希特勒母親的畫像

當我第一次見到45歲的克拉拉·希特勒時，她已經是個守了兩年寡的婦女了。儘管當時的她，臉上寫滿了生活的苦難，頭髮也開始變得斑白，但是，同她那張唯一存世的照片相比，形貌幾乎無異。克拉拉·希特勒直到死去的那天都保持著她的美麗。無論何時，只要我一見到她——不知為何——我就會對她產生一種同情，就總覺得想要為她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十分高興阿道夫能找到一個自己喜歡並且信任的朋友，正因如此，她也很喜歡我。她時常向我傾訴阿道夫給她帶來的擔憂。她非常希望能爭取到我的幫助，去說服她的兒子，遵從他父親為其做出的職業選擇。可我不得不讓她失望，然而她並沒有責怪我，因為她肯定覺察到了這一點：阿道夫的態度之堅決，遠遠超出了我對他的影響程度。

正如阿道夫經常享受我父母家的款待一樣，我也時常去看望他的母親，並且臨走的時候，希特勒夫人總是不斷地叮囑我下次再來。我把自已當成了他們家的一員——平時幾乎沒有人去拜訪他們。

每當店裡提前收工的時候，我就會迅速地洗漱整理，直奔洪堡大街。31號是一棟還算湊合的三層式公寓，希特勒一家就住在第三樓。我會直接衝上樓，按響門鈴，希特勒夫人會為我開啟門，然後熱情地歡迎我。這份貼心的友好似乎抹去了一絲苦難的陰霾，她臉上掠過的每一次微笑都能帶給我愉悅。

我依然能記得那幢簡陋的公寓。狹小的廚房裡配備著一個綠漆傢俱，窗戶只有一扇，向外望去就是院子。起居室裡有兩張床，一張是他母親的，一張是小保拉的，從這裡的窗戶可以俯視整條街道。邊牆上懸掛著一副他父親的畫像，那張典型的公務員臉頗顯莊重且讓人印象深刻，他的鬍鬚照著弗朗茲·約瑟夫皇帝的樣式做過精心梳理，使他嚴肅的表情得以緩和。阿道夫則在臥室外面的壁櫥裡睡覺和學習。

在我頭一回拜訪他們家的時候，阿道夫的妹妹，保拉，只有9歲。她是個相當可愛的小姑娘，安靜且不苟言笑，但長得既不像她母親也不像阿道夫。我從沒見過她開懷大笑。我們之間相處得十分融洽，但阿道夫跟她並不是特別的親近。這大概是因為年齡的差異而造成的——他總是親切地將保拉說成是「小孩兒」。保拉一直沒有結過婚，現在居住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國王湖。

我在希特勒家認識的另一個人是一位大約二十出頭，容貌出眾的年輕女子，她叫安吉拉，雖然和保拉一樣，她管克拉拉·希特勒叫「母親」，但起初，她在這個家庭的身份一直讓我感到困惑，後來我才解

開了這個謎團。安吉拉生於1883年7月28日，也就是說比阿道夫早出生6年，是他父親跟前妻生的孩子。她的母親，弗蘭西斯卡·馬佐爾斯伯格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5個月後她的父親和克拉拉·波爾茲爾結婚。安吉拉自然對她的生母沒有什麼記憶，於是她把克拉拉看作是她的母親。1903年9月，在我與阿道夫相識的一年前，安吉拉嫁給了一個叫拉包爾的稅務局官員。她和丈夫居住在她繼母的附近，並且時常來看望她，但從不帶她的丈夫來，至少我從來沒見到過拉包爾。安吉拉的性格一點兒也不像希特勒夫人，她是個快活的人，一個熱愛生活並且喜歡笑的人，她給這個家庭帶來了一些活力。她的面容俊秀，一頭漂亮的烏髮紮成了一條辮子。

通過阿道夫的描述以及他母親的一些暗示，我瞭解到拉包爾是個酒鬼。阿道夫對他痛恨之極。他將拉包爾視作一個混賬的化身，因為阿道夫鄙視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得以體現。他把時間統統耗費在了酒吧裡，他喝酒，抽菸，還去賭博，把錢輸得精光。除了這些之外，最重要的一點，他還是個公務員。好像這還不夠，拉包爾認為他有責任去捍衛他岳父的觀點，即說服阿道夫，讓他去當一名公務員。單憑這一點，就完全足以跟阿道夫結下樑子。每當阿道夫談及拉包爾的時候，他的臉上便呈現出著實嚇人的表情。也許是阿道夫對他姐夫的明顯憎恨，使得拉包爾遠離了洪堡大街。與安吉拉結婚沒幾年，拉包爾就去世了，與此同時，他與阿道夫之間的恩怨也算是抵消了。後來，安吉拉又和一個德累斯頓的建築師再婚。她於1949年在慕尼黑去世。

我從阿道夫那裡瞭解到，他父親在他的第二段婚姻裡還生下一個兒子，名叫阿洛伊斯，他的童年是在希特勒家度過的，但當他們搬到蘭巴赫居住的時候，他就已經離開了這個家庭。這個希特勒同父異母的兄弟於1882年11月13號在布勞瑙出生，比阿道夫年長7歲。他父親還在世的時候，他還去過幾次萊翁丁，但據我瞭解，他從未在洪堡大街出現過。他從未在阿道夫的生活中扮演過任何重要的角色，他對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也沒有任何興趣。他曾出現在巴黎，然後是維也納，再後來到柏林，到今天，年過70的他居住在漢堡。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和一個荷蘭女人，並且育有一子，叫作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威廉在1939年出版過一個小冊子，名為《我的叔叔阿道夫》。阿洛伊斯和他第二任妻子生的兒子叫海因茨·希特勒，作為二戰時期的一個軍官，在東面戰線陣亡。

希特勒夫人不喜歡談論她自己以及她的擔憂，然而向我訴說她對阿道夫的疑慮卻能使她感到寬慰。顯然，她對阿道夫那麼含糊，且對她來說毫無意義的言論——今後要成為一名藝術家——並不是很滿意。她對這個獨子今後人生幸福的操心讓她日漸憂鬱。經常，我同希特勒夫人坐在一起，而阿道夫自己則悶在小廚房裡，「你可憐的父親若泉下有知，豈能瞑目」，她常對阿道夫這樣說，「因為你完全違背了他的意願。順從，才是一個好兒子的表現，但你並不瞭解這個詞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你在學校表現得這麼差勁，並且至今也沒能夠到任何地方去的原因。」

我漸漸學會了理解這個女人所承受的痛苦。她從來都不抱怨，但她對我講述了她年輕時候吃過的苦。

所以，一部分根據我的經驗，一部分根據我所聽到的故事，我便對希特勒家族的情況有了大致的瞭解。我偶爾會聽到他們提起住在瓦爾德維爾特爾的一些親戚。但我很難搞懂這到底是他父親那邊的親戚，還是他母親那邊的親戚。總之，希特勒一家只在瓦爾德維爾特爾有親戚，這點與其他公務員不同，其他公務員的親戚可能遍佈全國。只是到後來我才瞭解，希特勒父親和他母親方面的血統已經融合到了第二代，以致從他的祖父到阿道夫都同出一系祖先。我記得阿道夫確實曾拜訪過一些他在瓦爾德維爾特爾的親戚。他曾經在魏特拉給我寄過一張彩色明信片——魏特拉隸屬瓦爾德維爾特爾，毗鄰波西米亞。我不知道他去那兒做什麼。他從不情願提及他在那些地方的親戚，但他比較喜歡描述那裡的風景，貧瘠的鄉村，與多瑙河畔富庶的瓦豪村莊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原始而艱苦的農村是他先輩們的家鄉。

克拉拉·希特勒夫人原姓波爾茲爾，她於1860年8月12日出生在希皮塔爾，瓦爾德維爾特爾的一個貧窮鄉村。她的父親約翰·巴普迪斯特·波爾茲爾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她母親婚前的名字叫作約翰娜·勳特勒。希特勒這個名字在各種檔案中的拼寫不同。有的寫作希德勒，也有的寫作勳特勒，然而希特勒這個名字是被阿道夫的父親首先使用的。

據相關檔案記載，阿道夫的外祖母約翰娜·勳特勒，是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一個女兒。如此一來，克拉拉·波爾茲爾就和勳特勒（希德勒）家族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是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的兄弟。而格奧爾格又作為阿道夫父親的父親出現在多勒斯海姆的洗禮名冊上。所以克拉拉·波爾茲爾就是她丈夫的第二代堂兄妹。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們結婚之前總是提到克拉拉，但僅僅是把她當作自己的侄女。

克拉拉·波爾茲爾有著一個悲慘的童年，這段時期的她在一個子女眾多的窮苦家庭中度過。我時常聽她談起自己的妹妹約翰娜，這個姨媽在阿道夫成為孤兒後還經常照料他。後來我還聽說了她的另一個妹妹阿米莉亞。1875年，在克拉拉15歲的時候，她的親戚，布勞瑙的海關官員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貝請她到他家去幫他照顧妻子。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貝當時已經和安娜·格拉斯爾-霍勒結婚，而也就在第二年，他繼承了希德勒這個姓氏（後來被他改為希特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段婚姻——跟一個比他大14歲的女人結婚——沒有留下子嗣，並最終分離。當他的妻子在1883年去世以後，阿洛伊斯·希特勒娶了比他小二十四歲的弗蘭西斯卡·馬佐爾斯伯格。在這段婚姻中，他們生下兩個孩子，一個是阿道夫同父異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另一個是阿道夫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吉拉。在他和第一任妻子分居期間，克拉拉還一直住在他家裡，而當他的第二段婚姻又開始的時

候，克拉拉就去了維也納。他的第二任妻子弗蘭西斯卡在生完第二胎的時候便患上了重病，於是阿洛伊斯·希特勒將他的侄女召回了布勞瑙。1884年8月10日，僅僅在他們結婚兩年之後，弗蘭西斯卡便去世。

（在這段婚姻中出生的第一個孩子，小阿洛伊斯，是在未婚先孕的情況下出世的，並由他的父親撫養。）1885年1月7日，就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六個月之後，阿洛伊斯·希特勒便迎娶了他的侄女克拉拉，而當時克拉拉已經懷上了他的第一個孩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於1885年5月17日，也就是在他們結婚5個月後出生，而1887年的11月9日就夭折了。

因為克拉拉·波爾茲爾是阿洛伊斯的侄女，所以這對夫婦的婚姻仍須得到一份教會的豁免。而那封申請書——由一位奧匈帝國公務員用乾淨工整的字型手書而成——現在仍然儲存在林茨主教區的檔案館裡，編號6.911/II/21884。這份申請如下：

阿洛伊斯·希特勒與其未婚妻克拉拉·波爾茲爾的結婚申請

敬愛的主教：

懷著最謙恭的禮敬在下面簽署姓名的兩位，已決定結為夫妻。依照附上的家譜，他們受到了教會規定的限制，因為他們是第三代與第二代旁系親屬的結合（近親結婚），所以他們謙恭的請求尊敬的主教基於以下理由，仁慈地豁免併成全他們的婚姻：根據附上的死亡證明，新

郎從今年8月10日起就成了單身，並且還是兩個未成年小孩的父親，一個兩歲半的男孩（小阿洛伊斯）和一個一歲零兩個月的女孩（安吉拉），他需要一位女性助手幫助他來照料兩個孩子。作為一名海關官員，他在白天總是遠離自己的家庭，甚至經常是到了晚上也不能回家，所以幾乎無法擔負起孩子們的教育和培養義務。自從孩子的母親去世之後，新娘就一直在照顧他們，並且孩子們也非常地喜歡她，所以我們可以正當的假設：也許這對孩子們的培養會是有益的並且這段婚姻也將是幸福的。此外，新娘也別無他法，她可能再也不會有另外的機會去獲得一段美好的婚姻了。

基於以上理由，簽字人重申他們謙恭的請求，請求教會對他們親密關係構成的阻礙進行仁慈的豁免。

1884年10月27日於布勞瑙

新郎：阿洛伊斯·希特勒——新娘：克拉拉·波爾茲爾

申請中附上的家譜如下：

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約翰娜·希德勒（嫁給波爾茲爾）

克拉拉·波爾茲爾

林茨教會聲稱自己無權發放豁免並將其轉發給了羅馬，因而這封申請是經由羅馬教廷裁定並予以的批准。

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的結合被所有與之相識的人描述成是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這大概是基於妻子順從且隨和的本性。有一次她這樣對我講道：「我年輕時的憧憬和夢想並沒有在我的婚姻中得到實現」，接著又逆來順受地補充道，「但是這種事情當真存在嗎？」

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生產，這對虛弱的婦女而言，無疑會在心理和生理上造成沉重的負擔。1885年兒子古斯塔夫出生；1886年女兒艾達出生，兩年後夭折，1887年另一個兒子奧托出生，奧托只活了3天，然後，在1889年4月20號，又生了一個兒子——阿道夫。在這些赤裸裸的真相背後隱藏著多少的苦難啊！阿道夫出生的時候，其他3個孩子都已夭亡。於是那位備受折磨的母親對她的第四個孩子傾注了大量的關懷。有回她告訴我，阿道夫曾是個體質虛弱的小孩，因此她總是生活在再次喪子的恐懼中。

也許前面三個孩子的夭折是由於他們的父母彼此是近親的緣故吧。我把這個疑問留給專家來作出最終定論。但關於這件事情，我想要強調一點，就我個人觀點而言，此乃重中之重。

我朋友性格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正如我親身體會的——言行一致。他的本性中包含著一些堅定不移的，不可動搖的，一成不變的甚

至是頑固不化的成分。這一切都體現在他極其嚴肅的生活態度之上，並且構成了他其餘性格的基礎。阿道夫根本無法改變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本性。他思想中這片僵化的區域所儲存的東西永遠都保持不變，對此我深有感觸。我尤其記得，1938年，當分別30年後的我們再次聚首之時，他對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你一點沒變，庫比席克，只是老了一些」。如果這是真實的我，那麼他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他從未改變。

我試圖為他性格中這個基本的顯著特徵找到一種合理解釋。環境和教育的影響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但我能想象——儘管我完全是一個遺傳學領域的門外漢——近親結婚的生物效應肯定固定了某些領域，而那些「停滯的觀念」就導致了他這種特殊性格的產生。阿道夫·希特勒性格中的頑固，恰恰是給他母親帶去無數悲傷的主要原因。

母親那顆脆弱的心再次受到命運無情的摧殘。1894年的3月24日，即阿道夫出生5年後，她又生下了第五個孩子，是個兒子，名叫埃德蒙。埃德蒙同樣也難逃厄運，於1900年6月29日在萊翁丁夭亡。雖說阿道夫對前面3個在布勞瑙出生的孩子沒什麼記憶，並且也從來不提起他們，但他卻清晰地記得他的弟弟埃德蒙，因為他弟弟死去那年他已經11歲了。有回他告訴我，埃德蒙死於白喉。他們家最小的孩子是個女孩兒，名叫保拉。保拉生於1896年1月21號，且一直存活了下來。

因此，像這樣的早夭便奪去了克拉拉·希特勒6個孩子中的4個。也許她那顆母親的心已經被這些磨難給傷透了。如今她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好好照顧兩個活下來的孩子，為此，她不得不在她的丈夫過世後，忍受著孤獨與寂寞。令她稍感欣慰的是，保拉是個安靜聽話的孩子，但她的獨子給她帶來了無盡的焦慮，這份焦慮一直持續到她生命結束的那一天。

阿道夫真的很愛他的母親，這點我可以向上帝和所有人保證。我記得在他母親彌留之際，他曾多次展現出他對母親的愛，非常深沉又非常感人。他從不談及自己的母親，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感情。他是一個好兒子，但卻無法滿足他母親的最大心願——從事一項穩定的職業，這超出了他的能力。我們在維也納一起生活的時候，他總是將他母親的相片隨身攜帶。後來在《我的奮鬥》中，他這樣概括他對父母的感情：「我尊敬我的父親，但我愛我的母親。」

第五章希特勒父親的畫像

儘管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近兩年，但在我與阿道夫相識之初，他父親對這個家庭的影響仍舊「無處不在」。這位母親讓他的人格在各個方面都化為不朽，順從的天性導致她幾乎已失去了自我，因而她的思想和言行全都秉承了那位死去的父親的意旨。但她缺乏足夠的精力去執

行她丈夫的遺願。寬巨集大量的性格加上對兒子的溺愛，使她在對阿道夫施行教育的過程中阻礙重重。我能夠想象這個男人對家庭的影響是多麼的透徹和持久。他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他那無法撼動的權威受到了絕對的尊重。如今，他的相片被掛在了房間裡最好的位置。我仍然記得，在他們家的櫥櫃上，精心地陳列著他生前抽過的一些長煙鬥。它們幾乎成為了他在這個家庭中的權威象徵。每當希特勒夫人談到她丈夫的時候，她就會指著這些菸斗反覆強調，彷彿它們見證了她是如何忠實地延續了她丈夫的傳統一樣。

阿道夫談到他父親的時候，總是懷著深深的敬意。除了職業選擇上的分歧以外，我從沒聽見過他對他父親提出過任何異議。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反而越發地尊敬他的父親。針對父親對他未來的職業做出的獨斷規劃，阿道夫並沒有責怪之意，因為他認為這是他父親的一種權利，甚至說是一種義務。然而對他姐夫拉包爾來說，就是另外一碼事兒了，這個不學無術的小稅務官員，竟然也敢奢望這種權利。阿道夫當然不會允許他干涉自己的私事。但即便是在他父親去世之後，他父親的權威依然存在，並且影響著阿道夫的個人奮鬥和發展。他父親的態度激起了他的反叛心理，使他從最初的隱蔽牴觸發展成後來的公開對抗。正如阿道夫自己描述的那樣，父親經常給他一頓痛打。但阿道夫把這種暴力場面的發生歸因於自己的執拗以及對父親的冒犯。

海關官員阿洛伊斯·希特勒，終其一生都彰顯著一種儀式性。因而我們能夠看到許多反映他人生各個階段的完好照片。關於婚禮的照片倒是不多，因為他的婚姻總是籠罩在不幸的陰雲之中，但是當他獲得一些晉升的時候，他就會給自己留影作紀念。大多數照片上所顯示的，就是他板著那張莊重的公務員臉，穿著深色的雙排扣制服和白色的褲子。這個男人的臉給人印象深刻。他長著一個寬大的頭，蓄著一臉絡腮鬍——他最不容忽視的一個特徵，那是在效仿他的最高領袖奧匈帝國皇帝。他的目光顯現出的是敏銳和廉潔奉公。作為一名海關官員，他不得不用懷疑的眼光來審視一切事物。但在大多數照片中，莊重的眼神壓過了這種「好奇的」注視。即便在阿洛伊斯·希特勒退休之後，他照的相片都還反映出這個男人在精神上依然保持著工作狀態。儘管他已年過60，但一點兒也看不出那種典型的歲月痕跡。有一張照片——也許是他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在他萊翁丁的墳墓上也能看到——上面顯示著一位恪盡職守的男人——阿洛伊斯·希特勒。另外還有一張他的早期照片，時間要追溯到他在萊翁丁居住的時候，這張照片更側重於他的私人生活，上面顯示的是一個喜歡安逸生活的富有公民。

阿洛伊斯·希特勒從一個女僕的私生子到一名受人尊敬的公務員，這個過程就是他努力不懈地提高社會地位的一個奮鬥歷程。

在《我的奮鬥》中，阿道夫這樣描述過他的父親：

「作為一個落魄小商販的兒子，他從沒想過要踏上他父親的老路，年僅13歲的他，毅然離開了瓦爾德維爾特爾。他無視鄉親們的‘忠言逆耳’，隻身前往維也納學習手藝，那一年是1850年。想必這是一個孤注一擲的決定，因為當時只有3個嚮導跟他一起踏上了這條未知的征程。17歲那年，他度過了學徒的見習期，但他不僅沒有滿足，反而相當失望。長時間的窮困潦倒給了他追求更高目標的決心。以前在鄉下，牧師是窮人心中最高榮譽的化身，而到了首都，這個角色則一直被公務員扮演。懷著一份‘準成年人’的不屈不撓，這個17歲的老男孩投身到一項新的奮鬥當中——成為一名公務員。我想他花了23年才等到那個迴歸的成熟時機——他曾對自己立下過誓言，若不幹出點兒‘名堂’，絕不還鄉。1895年6月25日，連續為國家服務了將近40個春秋的他，在政令下達的情況下，以58歲的年紀退出了自己的工作崗位。」

他在海關的同僚們形容他是一名一絲不苟、盡職盡責的官員，一個十分嚴厲卻也有「弱點」的人。作為一個長官，阿洛伊斯·希特勒並不是很受歡迎。在辦公室以外，他被人們看作是一個信仰堅定的思想開明者。他對自己取得的地位感到非常自豪。每天上午，他都會抱著一種官員的守時態度光顧一家小酒館，他的幾個老酒友都覺得他很好相處，只是偶爾他也會勃然大怒，並且變得相當粗魯，這既顯示出他先天的暴力因子，又說明他對自己的工作要求甚嚴。

其實從表面上看，這位父親的工作同絕大多數奧匈帝國海關公務員的職責並無多大差別，但是當某些個人因素被考慮在內的時候，另一番情形便暴露出來。《我的奮鬥》是一部政治著作，而並非自傳。阿道夫·希特勒在此書中所談的內容，只是為了迎合他自身的政治目的。也許我們可以理解為，他是想要掩飾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的出生源於他父親的第三段婚姻，他的父親是個私生子，他母親曾是他父親的遠房侄女，他是近親結合的後代，他是父母的第四個孩子，而不是第一個，他是六個兄弟姊妹中，兩名倖存者之一。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私生子身份在多勒斯海姆教區的教堂註冊簿上得到了確鑿的證實。根據資料上的顯示：42歲的女僕安娜·瑪利亞·施克爾格魯貝於1837年7月7日產下一子，取名為阿洛伊斯。孩子的教父就是她的僱主，一個名叫約翰·託梅施拉格爾的施通勒斯農民。據目前所知，這是她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她唯一的一個。他的母親並沒有透露孩子父親的身份。

1842年，當這個私生子年滿5歲的時候，安娜·瑪利亞·施克爾格魯貝嫁給了磨坊工人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多勒斯海姆教會的註冊簿上載有以下明文：

「簽字證人特此證明，經確認，他們熟識的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是安娜·瑪利亞·施克爾格魯貝之子阿洛伊斯公認的父親，故請求將他的名字登記在洗禮簿上。」

這份登記申請由教區的神父和4名見證人共同簽署。

1876年，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在魏特拉當著公證員的面，在一份關於遺產繼承的官方宣告中再次確認了是阿洛伊斯的父親的身份。那時候他84歲，孩子的母親已去世了三十多年。而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貝也已經在布勞瑙擔任了多年的海關官員。

由於這個男孩在他母親婚後並未被正式收養，所以他的姓氏仍然是施克爾格魯貝。如果，阿洛伊斯的生命中沒有出現約翰·格奧爾格的弟弟——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那麼他會一直沿用原來的姓氏。因為奈波穆克曾立下一個遺囑，將一筆錢留給他哥哥的兒子。但是，作為條件，阿洛伊斯必須繼承希德勒這個姓氏，所以後來，在1876年的6月4日，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貝這個名字，在多勒斯海姆教會的註冊簿上，就被改成了阿洛伊斯·希德勒。米斯特爾巴赫當地的政府部門於1877年1月6日正式批准了這項更改。於是從此以後，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貝便管自己叫阿洛伊斯·希德勒，雖說這次姓氏變更的本身意義不大，但卻保證了他獲取遺產的資格。

有一回，當我們談到他親人的時候，阿道夫告訴了我他父親更改名字的故事。這個「老頭子」以前從沒做過一件像這樣令他開心的事情，「施克爾格魯貝」這個名字在他看來似乎過於粗野，甚至有些土裡土氣，此外還頗顯笨拙，一點兒都不實用。然而「希德勒」這個名字他

又覺得太乏味，並且不夠陽剛，還是「希特勒」這個名字好，既中聽又好記。

阿洛伊斯並沒有將「希德勒」這個家族姓氏「照單全收」，在此基礎上，他發明了一種新的拼寫形式——「希特勒」。這是他的一個典型性格，喜歡不停地改變。在他整整40年的公務員生涯中，他只調動過4次，而這跟他的上司並無關聯。他工作過的幾個地方——薩爾費爾登、布勞瑙、帕紹和林茨——都處在得天獨厚的位置上，它們擁有一個海關官員夢寐以求的各種環境。但每次都還沒等他們安定下來，他又開始著手搬家。有記錄顯示，他在布勞瑙工作期間，曾更換過12次住址，可能還不止。在帕紹的兩年裡，他搬遷過兩次。退休之後，他從林茨搬到了哈費爾德，又從哈費爾德搬到蘭巴赫——起先住在萊恩加特勒的小旅館，然後又搬到施威格巴赫的一個鐵匠作坊，也就是說，一年之內更換了兩次住處——最後才是萊翁丁。我剛認識阿道夫的時候，他就已經記得自己搬過7次家，轉了5次學。這種情況也難說不是糟糕的居住環境造成的。當然，阿道夫的降生之所，珀梅爾旅館——阿洛伊斯·希特勒非常喜歡住在旅館裡——是整個布勞瑙最好的，也是最拿得出手的建築。然而，就在阿道夫出生不久之後，這位父親又決定要搬走。事實上，他經常是從一處體面的住所搬到一個相對簡陋的地方。房子的好壞並不重要，關鍵在於不停地搬遷。如何解釋他這種怪異的癖好呢？

也許只是因為阿洛伊斯·希特勒討厭讓自己固定在一個地方，由於他的工作性質迫使他必須具備一種可靠的穩定性，所以他就想在自己的世界中創造一些改變。一旦他熟悉了周圍的某些環境，他就會感到厭惡和乏味。生活的意義在於改變自身的狀況，我從阿道夫身上也感受到了這種品質。

阿洛伊斯組建過3次家庭。也許這樣的狀況真的是受外部環境影響所致。倘若如此，那他的命運的確可謂曲折離奇。我們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飽受了他那些不安定因素的折磨。當安娜還在世的時候，阿洛伊斯·希特勒就已經和他後來的第二任妻子生下了一個孩子，因而對於他們最終的分離以及安娜的突然去世，阿洛伊斯也負有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責任。之後舊戲重演，當他的第二任妻子患上重病，即將去世的時候，他的第三任妻子克拉拉又懷上了他的孩子。正好有足夠的時間讓這個孩子成為婚生子。阿洛伊斯·希特勒這個丈夫當得並不容易。對此，希特勒夫人那張疲倦而緊繃的臉比她偶爾的暗示更具說服力。這個家庭的夫妻之間總是缺少內在的和諧，可能部分原因是因為阿洛伊斯·希特勒從未娶到過一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女人。安娜比他大14歲，弗朗西斯卡比他小24歲，還有克拉拉，比他小23歲。

阿道夫的父親總是在不斷地改變自己所處的環境，他這種異乎尋常的癖好，在那些安寧舒適的日子裡就會變得越發的顯著。我從這位父親的性格中找到了一些關於他兒子的古怪習性的解釋，因為阿道夫經常

性的處於一種躁動不安的狀態，長久以來，我對此一直深感迷惑。當阿道夫和我悠閒地漫步美麗古鎮的街道上時，一切都顯得平靜而祥和，我的朋友在享受這種意境的同時又開始改造他所見到的一切事物，某棟房子的位置不對，必須拆毀；某一小塊空地可以被合理利用；某條街道需要改修，使其給人的印象更為緊湊；夷平某座粗製濫造的房產大樓，使人們能夠盡情地觀望城堡等。就這樣，他總是在重建整座城市。但他的關注範圍並不僅僅侷限於建築。即便是一個乞丐站在教堂門口乞討，都會成為他滔滔不絕的理由，他聲稱國家應該出臺一個針對老人的計劃，使他們免於乞討。一個農村婦女一路走來，手裡牽著一條可憐兮兮、拉著牛奶小貨車的狗——批判社會的時機到來了，他認為在禁止虐待動物這方面人們缺乏自覺性。兩個年輕的中尉在大街上閒逛，他們得意揚揚，軍刀碰得叮噠作響——足以讓他對軍隊制度進行猛烈抨擊，因為制度上的缺陷縱容了這種懶散之風。他對一切事物的現狀感到不滿，並總是想要將它們改變和完善，這種傾向在他的身上已根深蒂固。

他這種怪癖的養成，絕非源自於家庭和學校的教育，而是從他父親那種不安分的性格中繼承過來的先天特質。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就好比一臺能夠帶動千百個輪子的發動機。

然而，這種品質卻從不同的途徑，分別影響著這對父子。父親那難以自控的本性被一種穩定的因素給束縛著，那就是他的職位。單位的紀

律給他反覆無常的性格制定了目標和方向。他一次又一次地從工作上那些艱鉅又緊急的任務中獲得拯救，使其免於陷入精神錯亂。

海關官員的制服作為一種萬能的掩護，使他私生活中暴戾的一面得以繼續發展。尤其是身在其位的便利，使他能夠毫不客氣地將建立在部門之上的權威歸為己有。儘管阿洛伊斯·希特勒傾向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這種傾向在奧地利的公務員中並不罕見——但他絕不會質疑國家乃至皇帝本人的權威。只有恭順地俯首稱臣，阿洛伊斯·希特勒才能夠安全地穿越他人生的險灘和沙漠，如若不然，他可能會一敗塗地。

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顯示出，他為何執意要讓阿道夫成為一名公務員的原因。其目的並不僅僅在於為兒子的將來作出鋪墊，更重要的是指引他找準自己的人生定位，瞭解到服從權威的必要性。很可能這位父親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種態度產生的內因，但從他對自身觀點的絕對堅持來看，想必他也感覺到，兒子的處境已危如累卵。他對阿道夫是如此的瞭解。

懷著同樣的決心，阿道夫拒絕遵照父親的意願行事，但對於自己的未來，他只有一個非常朦朧的構想。在他父親眼中，成為一名畫家可能是個最糟糕的結果，因為這就將意味著漫無目的地徘徊，而他父親對此表示強烈的反感。

由於阿道夫·希特勒拒絕進入政府工作，所以他們父子之間的思想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阿道夫選擇與父親背道而馳，決絕而不可撤銷。這的確是他人生中的一個偉大決定。在往後的歲月中，我都一直站在他這一邊。他認真地嘗試著找尋自己人生中的正確出路，不僅僅是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而是一項能夠施展他才華的真正任務。

在阿洛伊斯去世前不久，他把13歲的阿道夫帶到了他在林茨海關的辦公室，想給兒子展示一下他未來的工作環境，結果枉然。從本質上說，阿道夫之所以斷然拒絕從事他父親的職業，是因為他排斥這個國家的現存政權。另外一條道路雖然通向一片未知的領域，卻最終讓阿道夫·希特勒成為了一個國家所有權力的化身。一方面，他無怨無悔地選擇了一條險惡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他又狂熱地想要改變現行秩序。這看上去好像是兩個相互矛盾的品質。但事實上，它們卻起到了互補的作用。儘管他讓所有的事物都處在一種不斷變化的狀態，但他卻置身於風暴中心，絲毫不受影響。

阿洛伊斯·希特勒去世得很突然。1903年1月3日，上午10點——65歲的他依然健壯，而且精力充沛——他像往常一樣，準時來到酒館喝酒。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他突然昏倒在自己的椅子上。還沒等醫生或牧師趕來，他就已經死亡。

當這個14歲大的兒子看見他死去的父親時，頓時泣不成聲。這證明阿道夫對他父親的感情比人們想得還要深。

第六章逃離學校

當我第一次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時候，他已經放棄了學業。不可否認，他仍然在施泰爾實科中學就讀，並且每逢禮拜天就要回家一趟。按照他的說法，僅僅是出於對他母親的尊重，他才同意做出這種「最後的努力」。之前在林茨實科中學上三年級的時候，他的成績確實很糟糕，因而校方就建議希特勒夫人讓阿道夫轉校。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只有當差生離開以後，學校的優生率才會提高。照此一來，省城裡的學校就把他們不滿意的學生，全都轉到鎮上去讀書。這種狡詐的做法激怒了阿道夫，因為這意味著從他轉到施泰爾實科中學的那一刻開始，他就會被別人看作是一個失敗者。至此，他已經把學校看透，於是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鑑於自身的未來規劃，學校已無多大用處。缺少的知識可以通過自學來彌補。

藝術，早已俘獲了他的心。他懷揣著年輕人的激情投身到藝術當中，他確信這才是自己的使命所在。同藝術相比，學校那種按部就班的生活顯得黯淡而乏味。他的最終目標是要獲得自由，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他鄙視其他與之想法不同的年輕人。學校的氛圍令他深惡痛絕，於是他選擇離開作為一種解脫，而與此同時，我們的友誼也獲得了價值和重要性。他的老同學無法給予他的東西，他只有在新朋友身上去尋找。

對於阿道夫的教育情況，我曾做了個簡單的瞭解，基本內容如下：

1895年5月2日，6歲，蘭巴赫，菲什瀚，學前班。

1895—1896年，哈費爾德，一年級。

1896—1898年，蘭巴赫國民小學，二年級、三年級。

1898—1900年，萊翁丁國民小學，四年級、五年級。

1900—1901年，林茨施泰因街，奧匈帝國州立實科中學，一年級。

1901—1902年，降級，林茨實科中學，復讀一年級。

1902—1903年，林茨實科中學，二年級。

1903—1904年，林茨實科中學，三年級。

1904—1905年，施泰爾實科中學，四年級；1905年秋天申請退學。

上小學的時候，阿道夫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對知識掌握得很快，甚至無須努力就能取得進步。他的第一個老師卡爾·米特邁爾，給他打過一張「每科滿分」的成績單。米特邁爾一直活到了1938年，當人們問起他對以前的學生還有何記憶的時候，他對當年那個蒼白而虛弱的男孩所言甚少。小阿道夫以前很聽話，在學校的時候，他總是把自己的事情弄得井然有序。至於其他，也就沒什麼突出的地方了，不好也

不壞。順便提一句，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年當上帝國元首之後，特意回到了他的母校，並坐在自己以前的課桌上重溫了當年的往事，因為就在此處，他學會了讀和寫。同往常一樣，他利用此次造訪之便利，儘可能地對學校進行了一番改造。他以個人名義，買下學校的舊址老樓，並下令建造一座全新的教學大樓。老米特邁爾的繼任者以及他的學生被一起邀請去參觀了上薩爾茨堡。

但當阿道夫·希特勒於1900年9月進入林茨實科中學學習的時候，事情發生了轉變。在《我的奮鬥》中，他是這樣描述那段往事的：

「我在學校的失敗，從一開始便已註定。我喜歡哪樣就學哪樣，尤其是對我今後的繪畫事業有所幫助的東西。凡是我覺得不重要的或者是對我沒有吸引力的，我就會完全忽視。這段時期，我的成績顯得極不均衡，根據不同的學科以及我對它們的重視程度的差異，大致可分為‘良好’和‘優秀’，但也有‘中等’和‘不及格’。我學得最好的，也是我最喜愛的課程是地理和世界歷史，論及這兩樣，我是班上的佼佼者。」

人們很容易從阿道夫這段回憶校園生活的自我描述中獲得一個假象。阿道夫在對我談起他的校園生活之時，顯得相當勉強，並且總是帶著一種難以理解的憤慨，不得不承認，他這段經歷的確給我們的友誼罩上了一層陰影。所以我當時獲取的印象跟他15年後在書中的描述大相徑庭。

起初，這個11歲的男孩發現自己很難適應新的環境。每天，他必須經過長途跋涉，才能從萊翁丁趕到鎮上唸書。不過他經常對我說，這樣的日常步行給他留下了一段難忘的回憶。至少，這一個小時的上學路途，確保了他的一點兒自由，對此他不勝感激，因為之前他一直居住在郊外。鎮上的一切對他來說，顯得怪異而不友好。他的同班同學，大多數都來自林茨的富有家庭，他們瞧不起這個每天從「農村」趕來的古怪青年。老師們則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了學生的家庭背景上。這裡的一切同他在小學的經歷是如此迥異，小學的老師脾氣隨和，對自己的每個學生都比較瞭解，而且還經常在晚上同他們的父親一起吃酒。這個男生已經習慣了靠吃老本，在小學順利地度過每一學年。

剛到新學校的時候，他也曾嘗試過在他擅長的領域發表一些即興演講，但他這種慣用伎倆在此卻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因為老師們看重的是學生的成績。由於他在學習中找尋不到了一點兒快樂，所以他開始變得暴躁並且放任自流。他在班上幾乎無人關注，他沒有一個朋友，也不想去結交任何朋友。偶爾一些嬌生慣養的同學會暗示阿道夫，實科學校並不適合他這樣的「鄉下孩子」——也許是導致他變得更加畏縮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所有的同學當中，沒有一個曾聲稱和他建立過親密的朋友關係。

教一年級數學的校長，漢斯·康曼達，給希特勒的成績打了個「不及格」，還有學生們懼怕的男教師馬克斯·顏士拿，給他的自然史也打了

個「不及格」。如此一來，實科中學學生阿道夫，在第一學年結束之後，便帶著一張印有兩門「不及格」的成績單回去交給了他父親。這樣的成績表現，決定了這個學生將無法升到下個年級繼續學習。阿道夫從未跟我講過他父親對此事的反應，但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到。

如今，他不得不從頭再來。這回，他的年級主任是愛德華·休謨教授。休謨教授除了教德語外還上法語課，法語是實科中學低年級開設的唯一外語課程，據我瞭解，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學過的唯一外語，或者說是被迫學習過的唯一外語。與此同時，他也漸漸地適應了學校的環境。在一年級復讀的時候，他的學習進展得相當順利。然而，到了二年級，他便舊病復發，許多課程只是剛剛及格。他父親又收到一張，顯示著數學「不及格」的成績通知單。顯然，這樣的結果並非出於老師的刁難。希特勒痛恨數學，因為它太過枯燥，要求複雜的系統運算。為此我們還經常展開討論。後來在維也納，希特勒意識到，若想成為一名建築師，就必須要懂得運用數學。但這絲毫未能緩解他對數學的強烈反感。

三年級讀完，他又有兩科「不及格」，照樣有數學，另外還多了門德語。儘管他後來聲稱，休謨教授是他最尊敬的三位老師之一。就在這一年，他的父親去世。休謨教授向阿道夫的母親闡明道，除非轉校，否則阿道夫不可能升至四年級。因此，不能說阿道夫·希特勒是被趕出了林茨實科中學，只能說是被「外寄」。

如果說以前他留在學校是受制於父命，那麼現在則是母愛在鼓勵他繼續學習。無奈之下，他轉到了施泰爾。在讀完但丁的《神曲》後，他對我說，學校就像是「煉獄」。

在施泰爾讀書期間，希特勒寄宿在綠色市場19號，一個名叫艾德勒·馮·希奇裡的法官家裡，但只要一有空閒，他就會返回林茨。不出所料，他在學校的表現是一如既往的糟糕。1905年9月1日至15日期間，他又參加了補考。這次除了數學常規性的「不及格」以外，還多了一門幾何學。

眾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於1923年11月發動過一次失敗的暴動，在為其叛國罪做鑑定的時候，曾經擔任了希特勒三年年級主任的休謨教授，給出了這樣的證詞：

「希特勒確實在某些學科上頗具天賦。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說得透徹一點，他喜好爭辯，獨斷專行，剛愎自用，脾氣暴躁。因此顯然，他很難將自己融入到學校的框架之中。像他這麼有天賦的人，若不是不肯用功，還會獲得更大的成就。」

在發表完這些極為負面的評價之後，休謨教授又語重心長地補充道：

「然而實踐證明，一個人的在校表現跟他今後的人生沒有多大關聯，那些被標榜的學生也可能會淡出我們的視線，漸漸銷聲匿跡，而一旦那些困難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拓展空間，他們就會壯大起來。我以前

的學生希特勒似乎就屬於後者，我打心底希望他能夠從最近的艱難中恢復過來，並祝願他早日實現心中的理想，給每一個德國人帶來榮耀。」

這些寫於1924年的文字，絕非是針對那次暴動事件的權宜之詞。它們反映出這對曾經的師生之間所達成的一種默契。休謨教授間接地表明，阿道夫·希特勒當時暴動的目的源於他在學校的理想。然而對於教德文的休謨教授來講，希特勒並不是個好學生，從他寄給我的信件和明信片上的語法錯誤便能證明這一點。

另一個受到了希特勒積極評價的老師是接替了顏士拿的自然史老師西奧多·基辛格教授。阿道夫之所以尊敬他，並不是因為他學識淵博，而是因為他的政治觀點跟阿道夫不謀而合。基辛格非常喜歡戶外運動，是一個耐勞的步行和登山愛好者。他是所有信仰民族主義的教師中最狂熱的一個。在那個時期，政治分歧在教師群體中也明視訊記憶體在，跟普通群眾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緊張的政治氛圍對青年希特勒的智力發展而言，要比他在學校接受的教育重要得多。通常情況下，一所學校的價值體現並不取決於它開設的學科，而是它自身的氛圍。

順便提一下，基辛格教授後來也給他以前的學生希特勒做了評價。這份引人注目的證明材料上寫道：

「就我個人而言，希特勒在林茨的時候，既沒有給我留下好印象，也沒有給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在班上他絕對不是什麼領導者。他身形修長且挺直，他的面容蒼白而消瘦，就像是肺結核病人，他的眼睛明亮，目光炯炯有神。」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受到了希特勒積極評價的老師，是教他歷史的利奧波德·波希博士。他是諸多老師當中，唯一一個在當時就已經深受希特勒仰慕的人。希特勒一般不願與我談及他以前的老師，然而波希是個例外。

希特勒最尊敬的老師，利奧波德·波希教授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對這個人的描述是眾所周知的：

「也許我命中註定，要碰上這樣一位歷史老師，他深明教學與考試當中最重要，但又很少人懂得的一個原則，即去蕪存精。在我的歷史老師，林茨實科中學的利奧波德·波希博士先生身上，這一必要條件得到了理想化的滿足。他是一位和藹而又嚴肅的老紳士，他不僅能用出眾的口才捕獲我們的注意力，同時還能點燃我們的熱情。時至今日，當我回想起這個頭髮灰白的男人，我都感動不已，他那激情洋溢的言語有時會讓我們忘掉現在，並如同魔法一樣，將我們帶回過去，他能撩開時間的迷霧，把枯燥的史實轉變成鮮活的現實。我們坐在教室，個個滿懷激情，有時甚至感動得熱淚盈眶。」

利奧波德·波希是唯一一個在《我的奮鬥》中被提及姓名的人，希特勒用了兩頁半的字數來對其進行描寫。然而這樣的描述無疑顯得有些誇大。有事實為證：根據希特勒在林茨最後一張成績單上的顯示，他的歷史只得了個「中等」，也許此事跟轉校有關。但無論如何，波希博士給這個極其敏感的男生帶來的影響卻不容小覷。如果說學習歷史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喚起人們對它的熱情，那麼波希教授無疑是個稱職的老師。

波希是奧地利南部邊區的人，來到林茨之前，他曾在馬裡博爾還有其他一些毗鄰德語區的地方任教。因此在民族主義者當中，他可謂閱歷頗深。我相信，波希對德語區人民的絕對熱愛以及他對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治的反感，讓年輕的希特勒深受啟發。這種熾熱的精神為他的今後的人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阿道夫·希特勒終其一生都對那位昔日的歷史老師心存感激，的確，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學校和老師的懷念之情也在不斷增添。1938年，希特勒造訪克拉根福期間會見了闊別已久的波希。他花了不止1個小時與這位虛弱的老人在房間裡獨處，臨行之時，他對隨行人員講道：

「你們無法想象那位老人給我的恩惠有多麼巨大。」

要想知道希特勒對他老師們後來的評價到底可不可靠，還得從他以前的同學所持的相反觀點中去求證。真實的情況是——正如我親眼所見——阿道夫帶著一種固有的憎恨離開了學校。儘管我總是小心謹慎，

不把話題往這上面引，但有時候他又控制不住要對其進行猛烈抨擊。他從未與任何一個老師保持聯絡，就連波希也沒有。相反，當阿道夫在街上碰到教過他的老師的時候，他就故意迴避，裝作沒認出來。

另一場對他來說更為重要的鬥爭，正在與他和老師之間不斷爆發的小規模衝突同時進行：跟她母親的精神較量。不要誤會了我的表達。事實上，如我親眼所見，阿道夫竭盡所能的想要消除他母親的憂慮，因為母親是他生命的全部。但當他在學校的失敗已成定局，並且偏離了他父親為他設計的人生軌道之時，這種努力的嘗試就變為了一種徒勞。他解釋不清他為何要選擇另一條前途未卜的道路。阿道夫內心的矛盾遠勝於他跟老師們永無止境的游擊戰。我並不知道他對自己的糟糕成績如何看待，但對他母親而言，這就意味著阿道夫不會被大學錄取。他選擇的「另一條路」是個什麼樣子，連他自己都不能確定，即便在他母親去世多年以後，他也仍然無法講清。就這樣，她把自己對兒子未來的擔憂一起帶進了墳墓。

1905年的深秋，阿道夫已處在了危險的邊緣。從表面上看，這個16歲的男生不得不做出一個決定：是在施泰爾賓科中學復讀四年級，還是永遠的離開學校。但此番決定，意義重大：到底是應該為了母親，繼續踏上那條他認為是錯誤並且毫無希望的道路，還是應該不顧母親的擔憂，毅然選擇「另一條道路」，一條他只能說是朝向藝術（可想而知，這樣的字眼怎能讓他母親感到寬慰）的道路？

但鑑於阿道夫的本性，這並不算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決定，因為現實中根本沒有出現讓他左右為難的狀況。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義無反顧地走上第二條路，離開學校。他深知這樣的決定會對他母親造成巨大的傷害，同時也會給自己帶來無盡的痛苦。

在1905年秋天的那幾個月裡，阿道夫挺過了一場十分嚴重的危機，而這次經歷也成了我們友誼中最沉重的一段時光。危機的表現是阿道夫患上了重病。在《我的奮鬥》中，他將其描述為呼吸道疾病。但他的妹妹保拉，卻提到過他的一次咳血癥狀。又有人斷言，這是由某種心理暗示引發的胃病。在他患病期間，我幾乎每天都去看望他，因為我得照常向他彙報斯蒂芬妮的訊息——斯蒂芬妮是阿道夫當時很傾慕的一個姑娘。根據我的回憶，他的病症實際上是肺部感染。我記得很清楚，自那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一直在遭受肺炎和劇烈咳嗽的折磨，尤其是在潮溼多霧的日子裡。

同時，由於害了這場大病，他母親也不再耳提面命地敦促他繼續上學。如此一來，正好符合了他的決定。然而，這種疾病在多大程度上屬於自我暗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內部病變引起的必然結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屬於純粹的先天遺傳？我不得而知。

從阿道夫走下病床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打定了主意。校園生活已經成為他的過去，現在他要揚起風帆，毫無顧忌地朝著他的藝術家生涯駛去。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他沒有任何明確的人生目標。當他在《我的奮鬥》中描述這段空白時期的時候，感到有點彆扭，於是他將其命名為「閒暇生活的空虛」。從表面上看，這種概括是恰當的。他既不用上學，也不需為任何實習而操心，他就待在家裡享受母親的照顧。

但他並沒有因此而變成遊手好閒的懶漢，相反，他把人生的這一章節安排得相當充實。他畫畫，寫詩，閱讀書籍。總之在我的印象中，他從沒遇到過無事可做的情形。如果我們在看戲的時候他突然感到了厭倦，他就會立馬轉身離開，然後重新振作，投入到另一項工作當中。不可否認，他的生活因缺少清晰的目標而顯得雜亂無序。他僅僅是將各種感受，經歷和素材在他身上堆積起來。至於這麼做的目的何在，我完全無解，反正他總是在不斷地四處尋覓。

與此同時，阿道夫用實際行動向他母親證明了一件事情：學校的教育在他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對母親解釋道：「一個人通過自學能夠獲得更多知識。」於是，他開始在俾斯麥大街的成人教育圖書館訂閱書刊，隨後又加入了博物館協會，以便從中借閱書籍。同時他也經常光顧斯托約爾的租書館和L.漢斯林格圖書公司。我記得從那時起，阿道夫就總是紮在書堆裡，其中，《德國英雄傳說》尤其令他愛不釋手。每當我幹完活兒以後，他總是會要求我把他看過的書學習一遍，以便能同他一起討論。現在，忽然之間他就具備了那些在學校所欠缺

的品質——勤奮，有興趣，享受學習。正如他自己吹噓的那樣，「我用學校自己的武器戰勝了學校」。

第七章初戀斯蒂芬妮

說實話，作為我朋友的青春期戀愛的唯一見證人——除了斯蒂芬妮本人——我感覺並不是那麼的愜意，從他16歲開始，這段戀情一直持續了4年。我害怕把真實的情況講出來，會讓那些期待有重大揭祕的人失望。因為阿道夫同這名望族女孩的關係，被當時的道德觀念限制在了一個准許的範圍之內。這樣的情況純屬正常。若不是當今社會的性道德觀如此顛倒，人們肯定也會認為，青年男女「出軌」是不正常的事情，更何況他們之間——簡單地講——「什麼也沒發生」。

在此，我不能提及這位女子婚前和婚後的姓氏，還請諸位見諒。我之所以偶爾將其透露給那些致力希特勒青年時期研究的人，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很誠懇，而且也沒有什麼壞心眼。斯蒂芬妮，這個比阿道夫大一歲，或許大兩歲的女孩，後來嫁給了一個高階軍官。現今居住在維也納的她，已成了一名寡婦。所以，想必讀者能夠理解我的謹慎。

1905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們正如往常一樣，在蘭德大街散步，突然，阿道夫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激動地問我，覺得那個跟她母親手

挽手的金髮美女怎麼樣。「聽我說，我已經愛上她了」，他毅然地補充道。

斯蒂芬妮是個相貌出眾的女生。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一頭濃密的金髮向後盤成一個髮髻。她的穿衣打扮著實講究，單從舉止上就能看出她來自一個十分富裕的家庭。

當時的斯蒂芬妮可能只有17歲，或者最多18歲。她的表情顯得落落大方，濃密的長髮，依然盤著格雷特式的髮髻，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她的整體氣質給人的感覺是清新而健康。

傍晚沿著蘭德大街散步，是林茨人當年最熱衷的一件事。女士們喜歡瀏覽商店櫥窗，然後買點討喜的小物件。青年一代也有他們自己單純的娛樂方式——朋友約會。年輕軍官對其中許多調情的環節尤為擅長。

想必斯蒂芬妮一定居住在烏爾法爾，因為她總是挽著她母親的手，從大橋一路走到主廣場，然後沿著蘭德大街散步。每天下午5點鐘，幾乎是準時，這對母女就會出現——當時我們就站在施密托爾街口守候。若直接衝過去跟她打招呼，勢必顯得十分唐突，因為這位年輕的小姐根本不認識我們兩個。所以阿道夫只能用眼神的一瞥來代替問候。從那時起，阿道夫就一直對斯蒂芬妮保持著密切的關注。然而他變了，變得失去了自我。

通過調查我瞭解到，斯蒂芬妮的母親是一名寡婦，並且母女倆確實住在烏爾法爾，偶爾陪伴在她們身邊的一個男青年，其實是斯蒂芬妮的哥哥——維也納的一名法律學生。這個訊息令阿道夫如釋重負，因為之前他一直對那個身份不明的男青年耿耿於懷。但有時候，我們也會見到這兩位女士跟一些年輕軍官走在一起。像阿道夫這種身體虛弱的窮小夥，自然不能夠跟這些身著華麗制服的年輕中尉相提並論。阿道夫對此也頗有感觸，於是他只好通過雄辯來宣洩自己的感情。而這種憤怒，最終導致了他對整個軍官階層，乃至軍隊總體的仇視。「自負的蠢貨」是阿道夫以前對他們的慣用稱呼。更讓他感到生氣的是，斯蒂芬妮竟然跟這些（他堅持說是）穿著緊身胸衣，搽著香水的懶漢在一起廝混。

當然，斯蒂芬妮並不知曉阿道夫對她的一往情深，她將阿道夫看作是一個有些害羞，卻又異常頑固，並且信心十足的追求者。當斯蒂芬妮對他試探性地一瞥回以莞爾一笑之時，他會感到無比的幸福，他的心情會變得與以往任何時候都截然不同，彷彿世間萬物都是那麼的美麗，那麼井然有序，而他自己又是如此的心滿意得。但當他的目光被斯蒂芬妮冷漠地無視之時——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就會頓時陷入崩潰的境地，那一刻，他就恨不得把整個世界，連同自己，一起摧毀。

這樣的現象，無疑是每一段熾熱初戀的典型特徵，也許有人會把阿道夫對斯蒂芬妮的感情誤解成一種雛戀。如果只考慮斯蒂芬妮的個人想法的話，這種解讀也並不為過，但對於阿道夫而言，他同斯蒂芬妮的關係早已超越了初戀。即便他後來在維也納過著艱苦的生活，這段戀情所散射出的光輝也依舊不減當年。可見阿道夫對她的感情是一份深厚而純潔的真愛。在之後四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夠代替斯蒂芬妮在他心中的地位——這與普通男生的戀愛是多麼的不同，因為他們總是在不斷地變換物件。我不記得阿道夫還有沒有考慮過其他女孩。反正後來在維也納，當露西·維德在歌劇《羅恩格林》中扮演的愛爾莎喚起了他的熱情時，他給出的最高評價只是，她讓自己想起了斯蒂芬妮。從外觀上看，斯蒂芬妮是飾演愛爾莎一角的理想人選，不僅如此，瓦格納歌劇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樣適合她扮演，長久以來，我們一直都很想知道，她是否具備必要的聲音條件和音樂天賦。阿道夫傾向於把這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正是她那如瓦爾基里一般的外表，從未停止過對他的吸引，同時也引燃了他無限的激情。他為斯蒂芬妮創作過無數首情詩。其中有一首詩，題目叫作《獻給愛人的讚美詩》，出自他的黑色小本子：斯蒂芬妮，一位出生高貴的少女，她身著一件飄逸的深藍色絲絨長衣，騎著白馬，佇立在那鮮花盛放的草地，她散開的秀髮宛如一道金色的波浪搭在她的雙肩。春日裡，碧空如洗，萬物純淨，處處都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我彷彿又看見了阿道夫那張神情專注的面孔，聽到他飽含深情地吟誦著這些詩歌。斯蒂芬妮已經徹底地佔據了他的思緒，以至於他所談論的一切，所實踐的一切乃至為將來所計劃的一切，都圍繞著她而進行。儘管阿道夫從未跟她有過隻言片語的交流，但隨著他與家庭的逐漸疏遠，斯蒂芬妮對我朋友的影響也越來越深。

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則較為缺乏想象力。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曾就此事進行過反覆的爭論——我對阿道夫與斯蒂芬妮這段關係的回憶尤為清晰。他以前總是堅稱，一旦他同斯蒂芬妮相遇，任何事情，彼此都能瞭然於心。他說，像他和斯蒂芬妮這樣的特殊人類，根本犯不著用普通人的語言來交流感情，優秀的人類可以憑藉直覺來相互瞭解。阿道夫始終相信，斯蒂芬妮不僅能夠準確地瞭解他的想法，而且在與之分享的過程中還充滿了激情。但他從未跟斯蒂芬妮談過任何事情，即便她知道阿道夫的心中所想，也不見得她就會感興趣。倘若我膽敢像這樣提出質疑，他就會狂怒地衝我吼道：「你根本就不懂，因為你無法理解超凡之愛的真正意義。」為了使其平息，我便委婉地問他，能不能僅通過眼神來向斯蒂芬妮傳遞那些複雜的知識。他回答道，「有可能！但這種事情我跟你解釋不清，反正我心裡有的，斯蒂芬妮心裡也有。」當然，我總是小心謹慎地在觸碰這些敏感話題。但我很高興阿道夫對我如此的信任，因為除我之外，他沒再對任何人談起過斯蒂芬妮，包括他母親。

他希望斯蒂芬妮用拒絕他人的方式來回報他的愛。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對斯蒂芬妮周圍的青年男子給予了相當多的關注，特別是那些軍官，因為他認為斯蒂芬妮這是在轉移視線，目的是為了掩飾她對阿道夫的強烈感情。但她的態度卻又常常引來阿道夫的嫉妒，當斯蒂芬妮無視這個蒼白青年的守候，將注意力轉向護送她的年輕中尉的時候，阿道夫就會感到深深的絕望。不過想來也正常，為什麼一個青春活潑的女生要滿足於一個神祕崇拜者的渴望眼神，更何況其他人對她表達傾慕之情的方式又是如此的優雅與不同？當然，我絕對不敢當著阿道夫的面表達出這些想法。

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我該怎麼辦」，要知道，以前他從來不詢問我的意見，因而我對此感到無比自豪，風水輪流轉，我終於也能在他面前找到一種優越感了。「很簡單，」我解釋道，「你先接近那兩位女士，然後抬起你的帽子，向她母親作自我介紹，再請求允許拜訪她的女兒並護送她們母女回家。」

阿道夫懷疑地望著我，對我的建議考慮了許久。最後，他還是拒絕了。「如果她母親想了解我的職業，我怎麼說？畢竟我必須直接提到我的職業，最好是跟在我名字後頭——‘阿道夫·希特勒，學院畫家’，或者相類似的職業。但我還不是一名學院畫家，我總不能把我將來的狀況拿到現在來說吧。對她媽媽而言，職業要比名字重要得多。」

我思索了很久，覺得阿道夫只是出於害羞而不敢接近斯蒂芬妮。但令他退卻的原因還不止這一個。那時候他對兩性關係的概念非常保守，以至於同一個女生的正常接觸，在他看來都是件有損尊嚴的事情。由於他反對任何形式的調情，所以他堅信斯蒂芬妮除了盼著他來求婚以外，便再無其他渴求。我對此完全不敢苟同，但正如他處理所有疑難問題的慣用方式一樣，阿道夫已經制訂了一個詳細的計劃。這個同他完全陌生，並且從未跟他有過言語交流的女孩，做到了他父親、學校，甚至是他母親都沒能做到的事情，他為自己的將來擬定了一個明確的計劃，目的是為了能在4年後迎娶斯蒂芬妮。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來討論這個複雜的問題，最後，阿道夫委託我去收集更多關於斯蒂芬妮的訊息。

我偶爾看見斯蒂芬妮的哥哥與音樂社裡的一個大提琴手交談。通過這名樂師我瞭解到，斯蒂芬妮的父親曾是一位政府高幹，幾年前便已過世。她的母親現有一套舒適的房子而且還能領取遺孀撫卹金，她把這筆錢用在了對兩個子女儘可能最好的教育上。斯蒂芬妮讀過女子高中，現已被大學錄取。她有許多的追求者——她長這麼漂亮，倒也不足為奇。她喜歡跳舞，去年冬天，她同母親參加過鎮上所有重要的舞會。那個大提琴手還補充道，據他目前所知，斯蒂芬妮尚未訂婚。

阿道夫對我的調查結果相當滿意——「尚未訂婚」這一條在他看來怎麼都是理所當然的。在我的彙報中，只有一點讓他感到有些焦慮，斯

蒂芬妮喜歡跳舞，並且根據那個大提琴手的確切說法，她跳得很好，而且樂在其中。

這完全不符合阿道夫對斯蒂芬妮的想象。一位瓦爾基里般的女子竟被一些「傻瓜」中尉攬在舞池裡跳華爾茲，細想起來簡直糟糕無比。

他排斥一切屬於年輕人的娛樂。這種古怪的，酷似禁慾主義者的性格特徵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畢竟阿道夫的父親也曾是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男人，當年這位相貌堂堂的海關官員，肯定引得無數女生對其頻頻回頭。可阿道夫為何如此與眾不同？再怎麼說他也是個十分中看的年輕人，他體型勻稱而苗條，一雙非比尋常的眼睛給他那張冷峻而嚴肅的面孔增添了幾分生氣，他眼中閃爍的獨特光芒會讓人們忽略他臉上的蒼白與憔悴。然而——同抽菸、喝酒一樣，舞蹈，與他的天性相悖。這些事物根本就不是為他而存在的，但從來都沒有一個人，甚至是他母親，用這種觀點來勸過他。

長久以來我一直是他嘲弄的物件，現在我終於也有機會調侃他一把了。我一本正經地宣告：「你必須上舞蹈課，阿道夫。」跳舞，立時成為了他的一個難題。我清楚地記得，那段時間，我們每天討論的重點已不再是「劇院」或者「多瑙河大橋的重建」，所有的話題都被一件事情給佔據——舞蹈。

只要遇到不能立馬解決的問題，他就會沉溺在自己的歸納總結裡。

「想象一個擁擠的舞池，」他曾對我講，「再假設你是個聾子。你聽不見舞蹈音樂，然後瞧一眼他們漫無目的又毫無進展地移動。難道這些人不像瘋子嗎？」

「阿道夫，這的確不是什麼好事，」我回答道，「可斯蒂芬妮喜歡跳舞。如果你想要征服她，那你就必須跟其他人一樣，漫無目的地，如同白痴一般地去跳舞。」此言一出，他頓時暴怒。「不，不，絕不！」他衝我大叫。「我絕不會去跳舞！懂不懂！斯蒂芬妮跳舞，只是被這個不幸的社會逼迫所致。一旦她成為我的妻子，她斷然不會對跳舞產生一丁點兒渴望！」

與平常相反，這回他講的話連自己都無法相信，因為他三番五次地向我提出關於跳舞的問題。我很懷疑他是不是在家裡祕密地同他妹妹練習過一些舞步。希特勒夫人曾給阿道夫買過一架鋼琴，於是我想，興許過不了多久，他便會找我去彈奏華爾茲舞曲，到時候我就裝成聾子調侃他。他跳的舞根本不需要伴奏。我也刻意提醒過他要注意音樂與舞步之間的協調，因為他對此似乎沒有什麼概念。

但這絕對無法同另一件事情相提並論。阿道夫終日苦思冥想，試圖找到一個解決辦法。萬般無奈之下，他萌生了一個瘋狂的念頭，綁架斯蒂芬妮。他向我描述了整個計劃的所有細節，還給我分派了角色，但不是很有價值的那種，他負責實施綁架，而我只負責上前攀談來轉移

她母親的視線。「那麼你們倆靠什麼生活？」我現實地問道。我的問題讓他漸漸清醒，這個大膽的計劃也隨之擱淺。

更糟糕的是，斯蒂芬妮對阿道夫懷著一種不友好的情緒。每次經過施密托爾街口的時候，她會把臉轉過去，就當阿道夫根本不存在一樣。這種做法將他帶到了絕望的邊緣。「我再也無法忍受了！」他大喊道，「我要做個了結！」

這是阿道夫第一次，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後一次，企圖要自殺，而且是很認真的。他告訴我，他會從橋上跳進多瑙河，然後一切就結束了。但他堅持聲稱，斯蒂芬妮必須跟他一起死。於是一個詳細的計劃再次出爐。這出駭人慘劇的每一小部分都被他詳盡地描述了出來，包括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作為唯一生還者的後續行動。這陰森的一幕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甚至還經常出現在我的夢裡。

很快雨過天晴，阿道夫迎來了他在1906年6月份中最高興的一天，我確信這段經歷在他印象中同我的回憶一樣清晰。夏日到來，花卉節即將在林茨舉辦。同往常一樣，每個星期天我和父母親都要去卡邁爾教堂做禮拜，而阿道夫就站在門外等我，然後我們又一起來到了施密托爾街口守候。我們的位置非常的有利，因為那裡的街道十分狹窄，遊行的馬車必須緊靠人行道才能通過。樂隊牽引著鮮花裝扮的馬車駛過簇擁的人群，車上載著年輕姑娘和夫人們。但阿道夫根本沒正眼瞧過這些女人，因為他在興奮地等待著斯蒂芬妮的出現。阿道夫焦急地抓著我

的手臂，直到把我弄疼的時候她都還沒出現，我已經放棄了見到斯蒂芬妮的希望。忽然，這對母女乘著一架佈滿鮮花的漂亮馬車駛入施密托爾大街。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形。那位母親身穿淺灰色的絲綢禮服，打著一把小紅傘；斯蒂芬妮穿著一件漂亮的絲質長袍，也許是由於光線的原因，她的面容如魔法般地顯現出玫瑰色的光輝。斯蒂芬妮也裝飾了自己的馬車，但跟其他大多數馬車不同，她沒用玫瑰，而是用了一些簡單的野生花卉——紅色的罌粟花，白色的雛菊還有藍色的矢車菊。她的手裡也捧著一大束這類鮮花。馬車漸近，阿道夫變得更加魂不守舍。他從未見過斯蒂芬妮如此迷人的一面。正當馬車經過我們的那一刻，一個聖潔的眼神降臨阿道夫。斯蒂芬妮給了他一個愉悅的微笑，並從花束中取下一支，擲給了他。

從那以後，我再沒見到過阿道夫如此喜悅。馬車駛過之後，他把我拖到一旁，然後深情地注視著那朵鮮花，這個象徵著斯蒂芬妮之愛意的信物。我彷彿依舊能聽見他激動得顫抖的聲音：「她愛我！你看見了吧！她愛我！」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阿道夫輟學的決定引發了他同母親之間的一場爭吵，而後他就害了病，斯蒂芬妮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他一直把斯蒂芬妮送給他的花，裝在盒子裡。我同阿道夫的友誼在他看來必不可少，我是唯一一個分享他祕密的人，只有通過我，他才能得到關於斯蒂芬妮的訊息。每天我都不得不到施密托爾街口去蹲點，以便向他彙

報我的調查發現，尤其是告訴他這對母女跟什麼人講過話。阿道夫覺得，要是我每次都獨自站在同一個角落，容易讓斯蒂芬妮感到很不自在。其實我並沒這麼做，但我也沒有跟他說。幸好，阿道夫從未想過我可能會愛上斯蒂芬妮，若他在這方面有絲毫的懷疑，那都將意味著我們友誼的結束，正因為不存在這樣的因素，所以我才能將全部訊息毫無偏頗地彙報給我那位可憐的朋友。

阿道夫的母親對兒子的變化留意已久。一天傍晚——我記得十分清楚，因為這件事情讓我相當尷尬——她直接問我，「阿道夫這是怎麼了？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見你。」我支吾了半天，然後趕忙溜進了阿道夫的房間。

每當我給他帶去一些關於斯蒂芬妮的新訊息時，他就會顯得格外高興。有一天我告訴他，「斯蒂芬妮有一副美妙的，如同女高音一般的嗓子。」他聽後一躍而起。「你怎麼知道？」「有時我離她特別近，我能聽到她說話的聲音。就我對音樂的瞭解而言，我能斷定，像她這種聲音清澈而純淨的人一定是個很好的女高音。」這番話讓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也很高興能讓憔悴在病床上的他，感受到一時的快樂。

每天晚上我都會抄近路來到洪堡大街。阿道夫時常向我描繪出一幅巨集偉藍圖。「我已經決定了，」在聽完我的彙報後他十分鄭重的宣佈，「我決定為斯蒂芬妮修建一座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房子。」然後他要求我必須對此發表看法，尤其是對音樂室的形狀和大小是否感到

滿意。他說，他在這個房間的音效設計上花費了很多心思，還讓我告訴他，鋼琴該擺在什麼位置，等等。一切看上去就彷彿他的計劃已無懈可擊一般。我膽怯地問了他一個關於建造資金的問題，卻招致了他粗魯的迴應，「噢，讓資金去見鬼！」——這是他的一種慣用表達。

我們曾就這幢別墅的建造地產生過一些爭論，作為一名音樂人，我完全贊成建在義大利。阿道夫卻堅持要建在德國，而且要鄰近一個大城市，這樣就方便他和斯蒂芬妮上劇院或者聽音樂會。

剛能下床，他就跑到施密托爾街口去「蹲點」了，他的病尚未痊癒並且身體仍然十分虛弱。如往常一樣，斯蒂芬妮和她的母親準時出現。看到阿道夫憔悴的面孔和空洞的眼神，斯蒂芬妮衝他微微一笑。「你注意到沒？」他興奮地問我。從那一刻起，他的身體就恢復得更快了。

1906年春，當阿道夫離開林茨，前往維也納的時候，他給我做了一些詳細的交代，主要是告訴我，直面斯蒂芬妮之時我該如何表現，因為他確信，斯蒂芬妮很快就會趁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向我詢問他的情況，看他是不是又生病了。那時我必須這樣回答：「我的朋友沒生病，但他不得不去維也納藝術學院進修。等他畢業之後，他肯定還要花一年的時間到國外旅行。」（我堅持要求說成「去義大利」，他說很好，那就義大利吧。）「4年後他會回來向你求婚。如果你的答覆是肯定的，那麼婚禮的籌備將毫不拖延地展開。」

當然，阿道夫在維也納旅居期間，我還得通過書信向他例行彙報斯蒂芬妮的情況和訊息。由於寄明信片比寄信更便宜，所以阿道夫在臨行之前給斯蒂芬妮起了一個祕密代稱，叫「本基澤」，這是他以前的一個同學的名字。1906年5月8號，他從維也納給我寄來一張彩色明信片，看得出來，儘管他在當地見到許多新鮮有趣的事物，但他仍然無法停止對「本基澤」的思念。上面寫道「我渴望回到我熱愛的林茨和烏爾法爾」，「烏爾法爾」加了下劃線，當然，它代指斯蒂芬妮，因為她住在那兒，「真想再次見到‘本基澤’，不知她近來如何」。

幾個星期後，阿道夫返回林茨，我到車站去接了他。我依然記得，我們輪流拎著他的行李，他急切地想要了解斯蒂芬妮的情況。我們當時顯得有些慌忙，因為再過不到1個小時，就是傍晚散步的時間。阿道夫不會相信他走之後斯蒂芬妮沒問過他，因為他一直想當然地以為，她正盼望著與他相見，正如他渴望見到斯蒂芬妮一樣。但他心裡還是暗自慶幸，我沒有機會向斯蒂芬妮闡述他對未來的美好規劃，因為那時候他的前途尚不明瞭。我們一路匆忙趕往施密托爾街口，都沒來得及在洪堡大街停一下，問候他的母親。阿道夫懷著激動的心情翹首以待。斯蒂芬妮同她的母親再次準時出現。她朝著阿道夫投來驚訝的一瞥，已然足夠——他並沒有更多奢求。但我卻失去了耐心。「你看，她想要你上去跟她講話！」我對阿道夫說。「明天吧。」他回答道。

但這個「明天」，從未到來。日子就這麼一天天地過去，他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這個讓他坐立不安的局面。當然，斯蒂芬妮的反應也僅僅停留在第一階段的眼神交流。在那次氣氛愉快的花卉節上，斯蒂芬妮帶著淘氣的微笑擲給阿道夫一朵鮮花，這件事情尤使他對其充滿了期待。此外，她的一舉一動，只要超出了嚴格的習俗規定，都會毀掉她在阿道夫心中的形象。也許阿道夫並非羞怯，只是害怕同她近距離的接觸，會使自己的幻想破滅。因為在他眼裡，斯蒂芬妮不僅是所有女性優點的化身，而且還是一個對他的巨集偉計劃抱有極大熱忱的女人。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沒再給予任何人如此之多的關注和理解。因此，哪怕現實與他的想象存在一點點出入，都會讓他的內心充滿難以言表的失望。

當然我確信，只要斯蒂芬妮一開口跟他交談，這種失望無比的感覺定會油然而生。因為她本來就跟千千萬萬的普通少女一樣，陽光，年輕，也有著與常人無異的興趣愛好。為了讓斯蒂芬妮更加貼近自己心目中的女性形象，阿道夫總是把她想得很崇高，很神聖，而這無疑是白費苦心。因此，只有嚴格地控制彼此的距離，才能夠保護他心中的偶像。

雖然希特勒極其鄙視資產階級社會，不過在戀愛這件事上，他所遵照的規矩和禮儀比許多資產階級人士都要嚴格得多。這樣的行為準則在他和斯蒂芬妮的關係中建立了一道屏障。「我還沒被正式地介紹給

她。」——我經常聽到他講出這種話，儘管他通常對此不以為然。嚴格遵守社會習俗是他本性中的一部分。很顯然，也正是他的整潔著裝和近乎天性使然的恰當舉止，讓我母親對他喜愛有加。此外，我從未聽過他使用一種模稜兩可的表達或者講述一段不確切的故事。

因此，拋開所有顯而易見的矛盾不談，希特勒對斯蒂芬妮產生這樣的奇特愛情，符合他的性格特徵。在愛情的領域，任何意想不到的狀況都有可能發生，甚至有時候，它還會變成一種危險。曾經有多少個懷揣著偉大夢想的男人都被那反覆無常的愛情截斷了奮進的道路。這很有必要引起人們的警惕啊！

出於本能，青年希特勒在他對斯蒂芬妮的戀情中，找到了唯一正確的生活態度：他擁有一位愛人，但與此同時，他又未能真正將其擁有。他規劃著他的整個人生，彷彿他深愛的人已非他莫屬。但由於他自身迴避任何形式的約會，所以他現實中的愛人也只能停留在他的想象世界裡。他的願望、計劃、構想統統為愛而生。只有這樣，他才不至脫離人生的軌道，的確，這段奇特的關係，通過愛情的力量，強化了他的個人意志。他幻想有一天，斯蒂芬妮成為他的妻子，和他一起生活在他親手設計的花園洋房裡，共同佈置他們的浪漫天地。事實上，正如他後來在上薩爾茨堡的所作所為一樣，只不過那時候，少了一個她。將夢想與現實混合就是青年希特勒的特點。一旦他的愛人有變得徹底虛無縹緲的危險時，他就趕緊跑到施密托爾街口，確信她的真實

存在。希特勒堅定地選擇了他的道路，不是為了原本的斯蒂芬妮，而是為了那個幻想出來的她。因此，斯蒂芬妮對他而言意味著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現實，另一部分是願望和理想。不管怎樣，斯蒂芬妮是他人生中一個最美麗、最豐富、最純真的夢。

第八章痴迷理查德·瓦格納

我故意要將希特勒的初戀同他對理查德·瓦格納的熱情這兩個章節編排在一起，因為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以其作品著稱的理查德·瓦格納，在德國藝術領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若不是斯蒂芬妮的外表和行為舉止與理查德·瓦格納塑造的女性形象如此一致，她絕不可能滿足希特勒心中的理想標準。對希特勒而言，斯蒂芬妮身上集合了所有女性的優點——從而影響了他今後多年的人生道路。在戲劇的世界中，希特勒找到了他的摯愛，像艾爾莎、布倫希爾德，還有《名歌手》裡的愛娃，就某種意義而言，斯蒂芬妮亦如瓦格納的靈感創造，並註定要從這位戲劇大師的夢境降生到紛繁的塵世之中。

希特勒同斯蒂芬妮的關係也能體現出他對瓦格納痴迷的一面。從另一種角度上講，當他見到斯蒂芬妮的一剎那，他對理查德·瓦格納的感覺就變為了一種真正的激情。但直到他的心中萌生了對這個女孩的愛，他對藝術的敏感才提升到了熱愛的程度。事實上，這份愛只是種一廂

情願的暗戀，並且從未得到過真正的回報。因此，在這種單相思的煎熬之下，他只得努力地向這位藝術大師靠攏，希望能夠從瓦格納的作品中找到這份苦戀所給予不了的慰藉。從青年時期一直到死，他都始終追隨著這位來自拜羅伊特的男人。正如這段怪異羅曼史中的斯蒂芬妮變成他的一個想象產物一樣——其實在常人看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也許多年以後，阿道夫·希特勒的心中也創造出了一個「瓦格納」，一個融入了他的自身理解和想象的理查德·瓦格納。

希特勒沒有受過多少系統的音樂教育。除了他母親的培養以外，他在音樂方面受過的最好的教育，源於蘭巴赫本篤會修道院唱詩班的一位名叫萊昂哈德·格魯納的神父，當時的阿道夫作為唱詩班的一員，在他那裡培訓了兩年。這小子加入到唱詩班的年齡是8歲，正是在接收能力很強的一個時期。但凡對當年奧地利的文化水平有所瞭解的人都該清楚，除了比較正規的唱詩班以外，幾乎找不出其他更好的音樂培訓機構。儘管小希特勒那純淨而美妙的嗓音總是能夠給人們帶來愉悅，但不幸的是，這段大有希望的開端並沒有得到繼續發展。想必他的父親對此也毫無興趣。這孩子在上小學的時候，音樂成績一直都是「優秀」，但到了實科中學之後，他就沒再上過音樂輔導課，因為學校里根本沒有開設此類課程。誰要是想進行音樂方面的培訓，就只得自掏腰包上私人課程，或者去讀音樂學校。即便阿道夫的父親同意他去上私人課程，他也騰不出任何時間，因為每天光是從萊翁丁到實科中學的路程就超過了兩個小時。

阿道夫對我受到的音樂教育極感興趣，但他又時常感到不安，因為我在音樂方面的知識比他掌握得多。從我們平常談到的關於音樂的話題中，我驚訝地發現他的表述十分專業並且相當到位。如果說我走的叫正道，那麼他則是獨闢蹊徑。他甚至無須經過任何的系統學習就能夠道出音樂中的所有原理。一談到音樂，他的理解力立馬就能被喚醒。我只能說，他對音樂的感覺十分強烈，以致常常使我為之驚訝，因為實際上他對此一無所知。當你叫他正兒八經地去演奏某種樂器的時候，這份無師自通的天賦便會顯現出它的侷限性。像演奏樂器這種事情需要的是系統的培訓，反覆的練習，堅定的意志和持之以恆的心態，儘管他自己不願意承認，但我不得不說，對於這些必要的品質，我的朋友知之甚少。他的感情用事，他的幻想，以及他那份過了頭的自信都使我剛才談到的那些品質變得毫無意義，他確信自己能行。然而，直到他將我的小提琴抵在下頷，拿起琴弓準備演奏的時候，他那份必勝的信念才變得不那麼肯定。我仍舊記得他當時的尷尬表情，因為這活兒並不像他想得那麼容易，我從他手中接過樂器，給他來了一小段，可他卻不願意聽。在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能夠戰勝他意志的事情，這著實讓他惱怒不已。當然，那個時候他早已超過了樂器啟蒙的年齡。

有一天他衝我吼道：「你總是把音樂吹得跟巫術一樣，現在我倒要看看它有多了不起！」帶著這句開場白，他宣佈了他準備學習鋼琴的決定，並大放厥詞，無須數日他便能熟練地掌握其演奏技巧。於是他報

名參加了約瑟夫·普魯拉斯基開設的音樂課程，但他很快就意識到，不靠勤奮和努力，這種技藝是學不來的。他在普魯拉斯基那裡的經歷與我之前在老中士科佩斯基那裡的感受相似。普魯拉斯基根本就不在乎樂感的培養或是什麼具有親和力的即興創作，他所看重的是熟練的指法和嚴格的紀律。所以阿道夫便陷入了一個窘境。要是叫他放棄這次嘗試他又覺得拉不下臉，畢竟之前自己也信誓旦旦地放了話，但這套愚蠢的指法練習又著實讓他懊惱不已。對於這次分歧，我倒是處之泰然，因為在音樂這方面，阿道夫糊弄不了我，正如我在其他方面也無法撼動他的權威一樣。而後我注意到，普魯拉斯基那種「瘋狂的音樂體訓」給他帶來的強烈不滿正在逐漸消退——每當我跨進洪堡大街19號公寓的門檻時，我就越發明顯地感覺到，他在鋼琴上並沒有取得任何進步，甚至在我面前他都會盡量避免去開啟琴蓋，而普魯拉斯基的名字在我們的談話中也提到得越來越少，因此，「學習彈鋼琴」這碼事兒便被悄然擱置。我不知道阿道夫在這件事情上堅持了多久，反正肯定沒超過一年。但對於被普魯拉斯基隨意支配的希特勒來說，這應該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了。儘管如此，當後來我們在維也納為學生舞臺創作歌劇的時候——很不幸的是這部歌劇一直未完成——阿道夫不僅擔當歌詞創作，而且還負責作曲，還好他至少把主題曲留給了我。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來證明一個事實，儘管先前的所有跡象都與之相反，但是音樂的要義在於靈感，而不是指法練習。

然而，阿道夫對我的音樂天賦還是予以了肯定，他不僅對我沒有絲毫的嫉妒之心，而且還能享我成功之喜悅，哀我失敗之痛苦，有如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一般。漸漸地，我發現他成為了我的精神支柱和前進動力。他的信任是我精湛技藝的練就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這份信任也為我們的友誼架起了一座堅實的橋樑。白天的時候，我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裝潢師助理，在灰塵滿天的作坊裡修補著被耗子啃壞的舊桌椅，但是一到晚上，當我來到希特勒的公寓，我便忘卻了工作，拋開了煩惱，同他一道，踏入一片純淨而崇高的藝術領地。

我猶記得阿道夫與我共同分享過的一次演出：佛朗茲·李斯特的清唱劇，《聖伊麗莎白逸事》。那時候，我有位教小號的老師，名叫維爾特爾邁斯特。在一次課程結束後，老師直接問我是否願意參與《聖伊麗莎白逸事》這部鉅作的演出，我當時別提有多麼激動，膝蓋一下就軟了。「那我們就開始吧！」說完之後老師毫不遲疑地同我開始檢查起小號的樂譜。演出當天，我在音樂大廳練習的時候還認識了樂隊指揮，奧古斯特·古勒裡希。即使今天我回想起那個意義非凡的日子，我都激動不已。剛滿17歲的我自然成為了樂隊裡最年輕的演奏者，而且沒有哪樣樂器比小號更挑人。

在擁擠的大廳內，我看見了我的母親，她就坐在阿道夫的旁邊，臉上泛著鼓勵的微笑。一切都進展得十分順利，我覺得，有一部分來自人

群中的熱烈歡呼應該是屬於我的。無論如何，至少阿道夫的掌聲是給我一個人的。此情此景也讓我的母親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經過這次成功的登臺亮相之後，有一回，阿道夫在同我夜間散步的時候建議我，應該把人生目標放到音樂領域。他那些一針見血的言詞至今都還在我耳畔迴響：「你必須放棄你的裝潢工作，它會害死你。

（不久前我才害了一場大病。）這種工作不管是對你的身體還是心靈都沒有任何好處。在音樂方面，你的確是個饒有天賦的人，你不僅是一名出色的獨奏者——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你還可以成為一名舞臺或是音樂會的樂隊指揮。你在劇院演出的時候，我一直都在關注你，我發現你是如此的胸有成竹，想必整個樂譜你早已爛熟於心。音樂能夠體現你的人生價值，音樂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它才是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害，你，屬於音樂。」如今，阿道夫道出了我深埋已久的心聲。成為一名樂隊指揮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

有此知音，我備感欣慰。儘管冷酷的現實總是事與願違，但我們的注意力卻越來越多地放在了對未來的規劃上。

我父親得了病。作為他唯一的一個兒子，我最終不得不接手他這份白手起家的艱難事業，將所有的重活都攬在了自己肩上。父親的夙願就是想要我在適當的時候接管他的生意，這是他的全部希望，也是他耗盡畢生精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他與阿道夫的父親不同，他不會逼迫我去按照他的意願行事，因為這會讓我在他規劃的道路上行進

得更加艱難。他幾乎從不表現出他對我的關注，但我深知這份事業對他而言有多麼的重要。

當我腦子裡正在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之時，阿道夫·希特勒挺身而出，展示了他作為我朋友那份賴以信任的情誼。他堅定地支援我選擇音樂作為職業的想法，並積極地為我謀劃，試圖將我這個想法變得可行。於是，在同他結識了這麼久以來，我第一次發現了他的一個品質，一個我之前從未意識到，而之後又再沒體會過的品質：耐心。他心裡相當清楚，單憑一味的正面頂撞，絕不可能讓我父親坦然接受這麼一個重大決定——不管我們下了多大的決心，但是他找到了一個可以集中進攻的軟肋，那就是我母親。我母親對音樂有著一種天生的喜好，因此她倒不會反對阿道夫的提議，儘管她也十分清楚，這種音樂教育所耗不菲。有了我母親的支援，才更有可能獲得我父親的同意。阿道夫認為，要想把這件事辦成，就需要同他們進行一次巧妙的接洽。

為了音樂，我和阿道夫不得不努力地克服重重困難，而與此同時，我們之間的友誼也得到了深化和發展。記得那個時候沒有電影院，也沒有收音機，想聽音樂的唯一辦法就是去音樂廳，而現如今對大多數人來說，去音樂廳已經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對當年的我們來說，音樂廳就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平時感興趣的事情或是想要做的事情都圍繞著音樂廳而發生或進行。當我幻想著自己能

夠指揮一支交響樂團的時候，阿道夫則忙著設計他的超大型史詩級劇院。

加之我們初次見面的地方又是在林茨的劇院大廳內，是這次碰面奠定了我們的友誼。這段友誼始於低矮窄小的地方劇院，通過維也納歌劇院和城堡劇院得以延續和發展，並最終在拜羅伊特得到了昇華——我作為帝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客人，應邀參加了在拜羅伊特舉辦的瓦格納音樂節。

希特勒對音樂廳有著一份天生的喜愛與激情。我確信這與他的童年印象有關，尤其是他在蘭巴赫的經歷。我不敢確定他以前是否跟我講過他在本篤會唱詩班的表演經歷，對此我確實也想不起來了，但根據近來的研究，人們會發現，他以前很可能經常參加表演。作為一個唱詩班男童，他處處都有參加演出的門路，或許他還對其他形式的音樂表演產生過興趣。那裡的巴洛克風格的舞臺被業內人士視為精品，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唱詩班裡唱歌，怎會不叫人對音樂產生激情呢？

12歲出頭的他從萊翁丁來到林茨的蘭德斯劇院，正如他在《我的奮鬥》中的描述：

當時，上奧地利州的首府有一座音樂廳，相對而言還算不錯。所有劇目都能在那裡上演。在我12歲那年，我第一次欣賞到了《威廉·退爾》。幾個月後，我又在那裡觀賞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齣歌劇《羅恩格

林》，我頓時便為之著迷。我那年輕的生命對這位來自拜羅伊特的大師燃起了無限的激情。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動，時至今日，我都把當時在地方劇院的這段平庸經歷看作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因為我知道，它們只可能會變得更好。

講得好啊！如果叫我來評價，我絕不會對林茨的蘭德斯劇院那麼客氣。可能是因為我感覺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音樂指揮的緣故吧，所以相比他而言，我更多的是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在看待那裡的一切，包括當時那隻管絃樂隊。然而，也可能是因為我缺少一種強烈的移情心理，使得我不能夠像他那樣忽視場地的缺陷，並對其以後的演出質量抱有幻想。阿道夫經常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不管表演有沒有瑕疵，他只看作品本身的藝術內涵。有一回，由於一個舞臺置景工人的疏忽，導致出演羅恩格林的演員從帆船的大艇上落了下來，掉進了一大堆用來表現海水的鋸末裡，當他浮出「海面」後，又只得靠自己，奮力攀爬回甲板，重新和其他演員站在一起——這一情形不僅搞得臺下的觀眾捧腹大笑，就連愛爾莎都忍俊不禁——即使是這種情況都絲毫不能損毀這齣劇目在阿道夫心中的美感。是啊，這些搞笑的插曲同大師在創作歌劇時的偉大構想又有什麼關聯呢？但是，他那種不同尋常的包容力也僅限於這種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在其他時候，他仍然顯得像個苛刻而強硬的批評家。

蘭德斯劇院是一座十分莊嚴的建築，但它的舞臺對於上演瓦格納的歌劇來說則顯得過於緊湊，並且無論從哪個方面去考量，都不盡如人意。它不具備與表演水準相匹配的硬體設施。其主要缺點並不是在於沒有合適的戲服，而是它根本就沒有設立統一管理服裝的部門。管絃樂隊的人手不夠，導致其無法滿足相應的音響要求。我只需舉一個事例便足以證明，在《名歌手》上演的時候，有一些樂器並未被使用，我可以站在一個「專業人士」的角度將它們列舉出來，比如，低音單簧管、英國管、木管樂器組的低音巴松管，還有所謂的瓦格納銅號，另外，絃樂器組還缺三名演奏者。但就算是有這麼多現成的樂手來補齊整支樂隊，那個窄小的舞臺也不可能為他們騰得出足夠的空間。這才是一名樂隊指揮真正的可悲之處。一支由20人組成的管絃樂隊去嘗試演繹瓦格納的作品，那簡直就是一種冒險。而唱詩班，不用說，更是丟臉，他們穿著毫不相稱的戲服，其存在完全有賴於公眾對他們的包容，比如在《名歌手》演出的時候，他們中的所有男性都掛著英式的假鬍子，直接把阿道夫氣得暴跳如雷。對於一個地方性舞臺而言，蘭德斯劇院的歌手倒還不錯，但他們當中，只有少數幾個人算得上是真正的瓦格納歌手。

舞臺佈景總是在不斷地遭受人們的批評。演員在臺上每走一步，後面的背景布就拍打個不停，當遇到需要表現山體或岩石的背景之時，這種情況就會讓人感到相當不悅。一想起「神殿的火焰」，就是《黎恩濟》結尾時的一幕場景，我就不寒而慄。當時，舞臺的中央矗立著一

座宮殿，宮殿上設有一個伸出的陽臺，黎恩濟和伊蕾娜就要走到這個陽臺前，試圖平息下面暴怒的民眾。在他們左右是一些燃燒的樹枝，代表那場「大火災」的起始。根據舞臺效果的需要，置景工人必須用火焰來燒燬支撐宮殿的一根柱子，從而引發宮殿坍塌這幕劇情。這根柱子由一組支架牢牢地固定住。可那天不知是誰鬆開了支架，那根柱子猛然一下就朝著觀眾倒了下來。對於類似的事件，人們必須加以防範啊！希特勒說這些「樸實」的表演承載著某種美好的希望，此話也對，就像我們後來在維也納的皇家歌劇院所獲得的感受一樣。但令我至今都為之驚歎的是，如此可悲的表演竟能給我們帶來「啟發」或者說使我們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理想主義根植在我們那顆年輕的心中，因而我們對這些表演的批評絕不會帶有任何敵意。

每當劇院上演瓦格納作品的時候，總是一票難求。我們經常要在門口排上一兩個鐘頭的隊，才能在站票區搶到一個位置。幕間休息總是漫長的要命。當我們興奮之餘想來點冷飲的時候，一個迎賓的白鬍子老頭兒會賣給我們一杯水，然後就允許我們繼續佔著自己掙來的地盤。喝完水後，我們會在空瓶子裡放上一枚小硬幣，然後還給那個老頭兒。通常演出會持續到半夜。看完演出後我會陪阿道夫回家，但這段路程實在太短，以至於根本無法平息我們當晚所受到的心靈震撼。因此，他會反過來送我回克萊姆大街。然而在此過程之中，他會陷入到忘我的境地，熱情和興致有增無減，於是我們又會沿著原路返回洪堡大街。我不記得阿道夫什麼時候疲倦過，夜晚總是能夠點燃他的激

情，而白天他的確又無事可做。如此一來，每當我們看完一場演出過後便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兩個在各自的家門之間往返遊蕩，直至我們開始打哈欠或者發現自己已經忍不住要閉眼。

阿道夫從小就對德國古代英雄故事極為著迷。對於青年時期的他來說，這些故事總是百讀不厭。他曾有過一本古斯塔夫·施瓦布寫的書，內容是德國早期的一些歷史事件，只不過作者用了一種通俗的手法將其呈現出來。他對這本書簡直愛不釋手，在洪堡大街住家的時候，他總是將這本書擺在書架的最好位置，以便拿放。當他害病在床之時，這本書就會為他敞開一扇通往神祕世界的大門。我記得我們在維也納合租的時候，阿道夫就有一本珍藏版的《德國英雄傳說》，這是他的精神支柱，因為這本書能解決他當時艱難度日的苦惱。

他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熟知和掌握絕非像有些人那種圖新鮮，或是裝腔作勢。他所著迷的是這些事件的本身，在他的思想中，從來不缺乏對歷史和政治的考慮，因為他覺得自己屬於那個世界。除了活在這些光榮的德國古代英雄中以外，他想不出任何一種方式能夠更好地體現出自身存在的價值。他覺得自身的命運和這些早已不復存在的偉人是緊密相連的。相比他們的人生而言，任何努力與奮鬥都會顯得黯然失色，那是成就了偉業的英勇作為，是最具英雄氣概的崇高人生，從此進入瓦爾哈拉殿堂，同他之前所崇敬的英雄一樣，變為一段不朽的神話。希特勒思想中這些奇特而浪漫的想法不應該被忽視。在一個施行

苛政的世界裡，這種年輕人的沉思將被視為一種幻想，但現實情況是，縱使他活在當下，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也僅僅留在了對德國英雄故事的虔誠信仰中。

狡詐而虛偽的資產階級在他看來已一無是處，在與這個世界鬥爭的過程中，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去探尋，在原始的歷史中，他發現了自己的同類。他將其視作一個最美好的時代，這段僅從不完整的歷史記錄中被瞭解到的失落時代，鮮活地呈現在了年輕氣盛的希特勒面前。他總覺得自己要是能活在1500年前該有多好，而這種強烈的意願卻經常搞得我暈頭轉向，好像我也成了古代人。難道他當真和那些混沌時代的英雄們有著某種精神上的聯絡，不然他怎會把這些人物給我描述得如此真切，彷彿他們就生活在路邊樹林的營帳裡一般？抑或我們發現的這個古老世界只是他產生的一種幻覺？這種時空的轉換經常讓我對他的神志感到擔憂：也許有一天阿道夫會發現，他已無法掙脫自己創造出來的時間黑洞。

德國神話中的英雄人物對阿道夫有著致命地吸引，在他們身上，阿道夫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正因如此，他才會對理查德·瓦格納的作品產生一種特殊的認同感。阿道夫12歲的時候，他第一次欣賞到了《羅恩格林》，這部歌劇將他兒時的夢想轉化成了美妙的詩歌與音樂，使得他年輕的生命對古代德國那個無比壯麗的世界產生了無限的嚮往，從那一刻起，瓦格納，這位已逝的天才便走進了他的人生，並

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希特勒從瓦格納的作品中不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謂「古今德國，精神輪迴」的證據，而且這些作品還鞏固了他這樣的信念：遠古世紀的某些風俗或精神必能為今所用。

在我與阿道夫·希特勒相處的幾年裡，我見證了他從一個男孩變為一個男人的過程。作為一名狂熱的音樂人，我也曾有過偶像，我也曾試圖效仿他們成為一名偉大的人，但是，瓦格納對於我朋友而言，遠不止是一個偶像或者追趕的榜樣那麼簡單。我只能這麼說，他的言行舉止無不「顯現」出瓦格納的性格特徵，簡直猶如被瓦格納靈魂附體一般。

他如飢似渴地尋找一切同瓦格納有關的讀物，不管是寫得好的還是寫得差的，不管作者的立場是讚賞擁護還是厭惡反對，只要是阿道夫能弄到手的，他就一概接收。他對描寫瓦格納的人物傳記相當熱衷，尤其喜歡讀他的筆記、信件和日記，另外還有他的一些自我評價和自我反省。如此日復一日，他便進入了這個男人的生活中心。每個瑣碎的細節乃至一段最無關緊要的時期他都瞭然於心。在我們散步的時候偶爾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本來還在侃侃而談的他會突然打住，然後開始背誦瓦格納的筆記或書信中的一些段落，甚至還可能是他的一篇論文——《未來藝術之性質》或者《藝術改革》，當然這取決於他當時的談話內容——也許是在談論，從一個想象出來的、專門的基金會裡撥出一筆錢，為拙劣的地方音樂廳開出一份硬體更換清單。儘管要攬上

他的思路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我總是神情專注，期盼著希特勒那份恆定不變的概括性結論。他會說，「你看，瓦格納的行事作風與我相同，就連他都不得不去應付身邊那些愚昧之人。」

我個人認為這種對照是相當誇張的。瓦格納活了整整70歲，在他那漫長而多產的一生當中，必定經歷了大起大落，他享受過成功的喜悅，也嚐到過失敗的痛苦，但我的朋友，這個向來喜歡把瓦格納和自己的人生進行對照的年輕人才剛滿17歲。他除了畫過幾幅水彩和幾張建築設計草圖以外，再無任何值得示人的作品，更談不上有什麼成就。那時候，他的重大人生經歷也無外乎就兩件事，一是他父親的去世，二是他在學校遭受的挫敗。然而他卻把自己形容成是一個飽受迫害的殉道者，因反擊敵人失力而遭到放逐。

他極其熱心地收集著瓦格納的每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人生片段，並在適當的時候把這些東西灌輸給我。他對我講述，瓦格納創作《漂泊的荷蘭人》的靈感就源於他當年和他年輕的妻子，在斯卡格拉克海峽面對風大浪急的海洋的切身感受。我認真地聽完了年輕的瓦格納那段充滿危險而又頗具革新精神的航程——數年的漂泊與被放逐。我跟阿道夫都特別喜歡路德維希二世，素有藝術守護者之稱的路德維希二世曾在瓦格納的陪同下造訪過威尼斯，而這也是他的最後一次旅行。其實阿道夫並不是不願意承認理查德·瓦格納人性中的弱點，比如他那種肆

意揮霍的生活作風等，只是他看在瓦格納創作了那麼多不朽鉅作的份上，忽略了那些細枝末節。

在那時候，瓦格納雖說已經逝世了二十餘年，但公眾圍繞他作品而產生的認知上的分歧卻掀起了一陣經久不衰的浪潮。時至今日，我們已很難想象，當時的音樂青年對這種論戰有多麼地熱衷，但在我和阿道夫看來，他們當中無非只有兩種人：瓦格納的朋友和瓦格納的敵人。相比之下，現代社會在音樂方面的論戰則顯得太婉約，太乏味，人們頂多也就相互置之一笑。然而在當時的那個年代，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也沒有電影院或者其他的錄放裝置，只有劇院，瞭解劇院將要上演的節目就是許多老百姓心中的大事。無論何時，只要一碰上演出，我們就變得無比激動，簡直比臺上的演員都更顯得生龍活虎。我們嘗試了許多種方法想要釋放自身那份不受約束的激情，但都徒勞無獲，直到曾為瓦格納工作過的指揮家——奧古斯特·古勒裡希的出現。他不僅是大師作品的有力詮釋者，更是瓦格納留下的這些寶貴遺產的忠實監護人。在我們眼中，他儼然就是一位聖盃守護者。

毋庸置疑，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嶄新的德國藝術形式的誕生。這種新音樂劇的誕生完全讓人們始料不及，它首次將詩歌和音樂進行結合並置於一個虛構的世界中——後來就變成了我們自己的世界。

阿道夫的最大願望就是造訪拜羅伊特，這座德國的聖堂，去瞻仰萬弗雷德莊園，那位天才的故居。他想要在瓦格納的墓前致敬默哀，想在

這位大師建造的劇院裡欣賞他的不朽之作。如果說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仍有諸多的願望和夢想未能實現，那麼至少這一件，他算是如願以償。

對我這麼一個64歲的老頭來說，這的確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回憶，這些回憶讓我感覺自己彷彿又重新燃起了一顆年輕的心，就如當年我在拜羅伊特的感受一樣，跳動得如此火熱！實際上我是不願意錯過這些青年時期的經歷——目睹希特勒在最初階段對瓦格納的痴迷。鑑於我在他和斯蒂芬妮的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個跑腿送信的中間人，我憑著比他過硬的音樂基礎，越發積極地參與到他這段關於瓦格納的經歷之中。當然，他暗戀斯蒂芬妮這個祕密，使得我同阿道夫走得更近，畢竟，沒有什麼比分享祕密更能夯實一段友誼，況且，我們還都對理查德·瓦格納抱有極大的熱情。

第九章年輕的民族主義者

當我回憶起青年希特勒的政治信仰和觀點的時候，我似乎又聽到了他對我講話的聲音，「你不懂」或是「簡直無法跟你溝通」，有時他甚至會對我加以斥責，比如說，當我不經意地對他的錯誤觀點表示認同的時候，他會怒不可遏地衝我吼道：「在政治這方面，庫斯特爾，你就是個白痴。」

實際上，我這輩子就只有一樣愛好：音樂。阿道夫也曾認同，藝術應該擺在人們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但在隨後我們交往的過程中，他對政治的興趣變得逐漸突出，雖說他也從未放棄過在藝術上的抱負。人們可以這麼理解：在林茨居住的時候，藝術是我們永恆的話題，而到了維也納，我們的生活則被政治所佔據。我感覺在他眼裡，我的價值僅僅體現在藝術方面。他越是對政治感興趣，我們的友誼就越顯得無關緊要。但他以前並未對我表達過這種觀點；因為他一向是極其嚴肅地在對待我們的友誼，或許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事實。

政治一直都是我們關係中的一個臨界點。我沒有自己的政治觀點，或者具體地說，我沒有足夠強烈的意識去捍衛我的觀點並且把它們強加於人。對阿道夫而言，我並不是一個令他滿意的討論夥伴。他更願意改變我的信仰，而不僅僅是將我說服。但事實上，我不假思索而又毫不質疑地接收著他的一切言論，甚至有時還背下幾段，以便能使我在討論中達到一個較高的水準。但我可不想發展成他的對立面，這樣正好迎合了他口頭爭論的癖好。就政治而言，我的確不是塊好料。好比一個置身於音樂大廳的聾子，雖然看得見別人演奏，卻不知所奏何曲。老天並沒賦予我駕馭政治的天賦。

阿道夫對此感到相當失望。在他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世上竟有像我這般對政治一竅不通的傢伙。為了培養我的政治興趣，他用盡了所有的手段，當然他的態度一點兒都不客氣。在維也納期間，他多次強迫

我陪他一起去議會旁聽，但我對此相當反感，我寧願把這些時間花在彈鋼琴上。然而阿道夫是不肯善罷甘休的，我必須跟他去，即便他十分清楚，議會裡的事情總是讓我無聊得想哭。但如果我當時這麼講的話，那我就慘了。

人們普遍相信，政治家都成長在一個政治氣氛濃厚的家庭。這樣的信條並未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得以體現——恰好相反！這又是希特勒身上諸多矛盾中的一個。他的父親很喜歡談論政治，並且從不掩飾自己的自由主義觀點。但他聽不慣任何針對君主制的反對之詞。作為奧匈帝國的一名海關官員，他的立場十分明確。每年8月18日，奧匈帝國皇帝誕辰之時，他就會穿上他的節慶制服。他是帝國和皇室的忠實僕人。也許阿道夫小時候沒怎麼聽到過他父親談論政治，因為他父親認為，談論政治的地方應該是酒吧，而不是家庭。無論人們在酒吧裡侃得怎樣熱火朝天，回到家裡總是風平浪靜。我不記得阿道夫曾列舉過他父親的任何一個政治觀點。

在洪堡大街的公寓，仍然少有關乎政治的跡象。阿道夫的母親，克拉拉·希特勒，是一個單純而真誠的女人，她對政治毫無興趣。阿道夫的父親尚在之時，克拉拉可能偶爾會聽到他對政治局勢的一些抱怨，但她並沒有耳濡目染或者把話傳給她的孩子們聽。這位性格易怒的丈夫和父親，並沒把他在酒館裡的情緒帶到他的家庭，這樣的做法興許並無差錯。希特勒家不歡迎客人前來談論政治，我也不記得在他們家聽

到過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情。即使是一些鬧得滿城風雨的政治事件，都無法滲透到這戶平靜的人家，甚至連阿道夫自己也要遵守家裡的潛規則。

我所見到他們家的唯一改變，就是克拉拉夫人（克拉拉·希特勒）在1906年底，從洪堡大街搬到了烏爾法爾。這次搬遷絕不是受到她丈夫那種不安定性格的影響，而是根據實際考慮做出的決定。那時，烏爾法爾（現在是林茨的一部分）仍然是一個具有鄉村氣息的獨立教區，是退休者的理想居所。由於當地不用履行納稅義務，因而許多東西，比如肉，就比鎮上賣得更便宜。克拉拉夫人希望能更好地利用她每月的撫卹金——數目適中，共120克朗。其中90克朗留給她自己，剩下的30克朗，阿道夫和保拉一人一半。不管怎麼說，重歸田園生活令克拉拉夫人倍感親切。布呂騰大街9號的房子至今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裡，每當路過那裡的時候，我彷彿依舊能看見站在小陽臺上的克拉拉夫人。對阿道夫來說，能跟斯蒂芬妮「同處一岸」，令他無比滿足。由於阿道夫搬到了烏爾法爾，因此我們每晚回家的路程也變長了。但同時這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時間去探討一些有深度的話題。多瑙河大橋這點路程，對我們來說顯得微不足道，所以，要是我們特別關注某些問題，就只得在橋上來回漫步，直到我們所有的話題都被聊盡為止。準確地講，阿道夫需要時間傾吐，而我，需要時間聆聽。

每當我想起阿道夫的家庭成長環境，再回憶起他所受的政治壓力之時，我腦海中就總會浮現出一幅龍捲風的畫面，無論外圍的風暴多麼猛烈，其中心依然平靜。在研究像阿道夫·希特勒這種異乎尋常的政治天才的時候，人們要把外部影響和這個人的自身傾向區分開來，因為我認為後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畢竟那時候，許多年輕人也跟阿道夫一樣，接受著相同的教育，經歷著同樣的政治事件，從所見所聞中感受著激情和憤怒，但是這部分人最終只成為了能幹的業務員、技師或廠長，在政治上卻無所作為。

民族主義思想支配著林茨實科中學。學生們在私底下抵制所有的傳統制度，比如愛國主義演講、王朝節日還有王朝宣言，他們反對學校的宗教儀式，卻參加聖體節的遊行。阿道夫·希特勒認為這種氛圍比實際的教育重要得多，在《我的奮鬥》中，他這樣描述：

「資金為南疆協會以及學聯會而募集，矢車菊和黑、紅、黃三色旗，讓人們的立場表露無遺，我們用‘Heil’（萬歲）互致問候，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代替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頌歌，無視一切警告和處罰。」

德國人在奧匈帝國的生存鬥爭讓當時的年輕人大受鼓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在奧匈帝國的斯拉夫人、馬扎爾人和義大利人中間顯得孤立無援。誠然，林茨大體算得上是一座德國城市，它遠離重組後的邊區，但與之毗鄰的波西米亞卻總是動盪不安。在布

拉格，示威遊行接連不斷。就連帝國皇家警察也承認，他們不敢保證德國居民免受捷克暴徒的侵擾，這在林茨引起了極大的公憤。和平時期的布拉格幾乎都處在了城市告急的邊緣。

當時的佈德韋斯仍然由德國人管理，在這個小鎮的議會中，德國人佔據著多數席位。阿道夫有一些同學來自布拉格、佈德韋斯或是帕赫阿提茨，每當被別人戲稱為「吉卜賽人」的時候，他們就會氣得跺腳，因為他們只想跟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名純粹的德國人。很快動盪便波及到了林茨。林茨城裡居住著幾百個捷克人，他們都是一些老實而謙遜的工人或技師，平時沒人對他們過多在意。而如今，一個叫汝拉澤的捷克修道士成立了一個索科爾俱樂部——捷克文化組織，他在捷克的聖馬丁教堂布道，還為一所捷克學校募集校舍修建資金。這在鎮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資深的民族主義者已經從這個狂熱分子的舉動中察覺出，這是在為捷克人的「入侵」做準備。當然，這樣的說法無疑有些誇張，但正是這個捷克人的舉動讓慵懶的林茨人感到了某種威脅，結果，他們幾乎是全體一致地加入到了民族主義者的鬥爭行列當中。

就其個人政治發展的可信程度，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描述道：

「誰懂得年輕人的心理，誰就會了解他們為何在聽到戰鬥號召之時，如此亢奮。他們通過千百種不同的形式進行……雖然他們只是這場偉大鬥爭的一個真實縮影，但他們反映出的狀況通常都更令人信服。」

實科中學裡那些民族主義教師走在了這場「保衛戰」的前沿。歷史老師利奧波德·波希博士，是一個活躍的政客。在鎮議會裡，他是國民黨的權威之一。他痛恨哈布斯堡王朝這個多民族國家（這在今天看來簡直就是一個超民族共同體的楷模），所有滿腔熱血的青年民族主義者都將他的話奉為至理。

「為了自身的優越地位，他們一次又一次卑劣地出賣了德國人民過去和現在的利益，誰還願意為了這樣的王朝繼續賣命？」

帶著這樣的反問，阿道夫明確且義無反顧地背棄了他父親所支援的泛德主義計劃。當阿道夫讓他的思想列車一往無前地行進時，我很難跟上他的大部分講話，於是我只好讓他一個人滔滔不絕地盡情發揮。然而，在他的演說中經常出現一個詞語，「帝國」。他喜歡用這個詞來結束他冗長的傾瀉。一旦他將話題帶入死衚衕並且不知道該怎樣繼續進行的時候，他就會直截了當地說，「帝國會解決這個問題的」；如果我問他，誰來為他畫板上這些龐大的建築工程埋單，他會自信地回答，「帝國」。任何瑣碎的事務都可以交給「帝國」去處理。省劇院的硬體更換將由「帝國舞臺設計師」負責（眾所周知，1933年後，真的有人填補了那個職位。我記得阿道夫·希特勒在十六七歲時便創造了這個名詞）。在他看來，即使是對殘障人士的照顧或者是對動物的保護，都屬於「帝國」的管理範疇！

在奧地利，「帝國」這個詞通常是代指德國的勢力範圍，當地居民被稱作「帝國的德國人」。但是當我朋友使用到這個詞語的時候，它不光是指德國，儘管他總是避開對「帝國」的準確定義，但很明顯，這種混合的表達，包含了一切他看中的政治要素。

懷揣對德國人民和「帝國」的熱愛，他排斥著一切外來事物。其他的國家絲毫不能引起他的興趣。雖然當時的許多年輕人都渴望體驗異國風情，但阿道夫完全沒有這樣的衝動。即便是藝術家對義大利的傳統嚮往在他身上也難覓蹤跡。他所有的計劃與構想，永遠都只在一個國家施展，那就是「帝國」。

他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毫不含糊地指引著他，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並展現出了他性格中的所有特質，尤其是他鋼鐵般的意志——一旦他認定某件事情是正確的，他就不會改變。民族主義思想根植在他腦中，成了他堅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任何失敗與挫折都無法使他妥協。從16歲一直到死，他始終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他與身邊那些無憂無慮的年輕人大不相同。在他心中沒有無關緊要的事物；即便再瑣碎的事，他都會給予關注。對待任何事情他都會表明自己的態度——越是跟自己沒有關係，他就越要加倍關注。通過這種方法，他就能填補自身存在價值的缺失，從而才使得他謀求改變的強烈渴望有了目標和方向。雖然他盡心竭力地試圖解決一切障礙，但卻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有時我真的為他感到遺憾。像他這麼一個頗具

天賦的人，什麼樣的幸福不能獲取；而他卻選擇讓自己的生活充滿了艱辛！他總是為了一些事情跟整個世界爭執不休。也正是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讓他同大多數普通年輕人區別開來。我從未見過他對什麼事情一笑置之，每件事情都必須經過他的徹底研究和驗證，以便能與他的政治目的吻合。傳統的政治觀念在他眼中一文不值。總而言之，整個世界都必須被他從頭到尾地全部重組。

有人會以為，青年希特勒將身體和靈魂都獻給了當時的政治鬥爭，這樣的概括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只是一個蒼白、虛弱、羸瘦的年輕人，不為人知而又涉世未深，性格內向又沒有進取之心，所有的激進行為都是他一個人在執行。只有某些極其重要的想法和解決方案他才會在晚上對我提及，然後同我一起探討，因為首先他需要一個聽眾；其次，我跟他一樣，也是一個卑微、孤獨的人。若允許我做個不恰當的類比——青年希特勒同政治的關係恰似他對愛情的看法。他越是在精神上積極從政，他在實踐中的政治參與就越是受到抑制。他沒有加入任何黨派或組織，也沒有參與過政黨的示威遊行，他總是小心謹慎，不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除我之外的其他人。如我所見，他第一次跟政治「眉目傳情」是在林茨。彷彿他已經預感到，政治將同他結下不解之緣。

而目前，他只是把政治當成了一種思維練習。這種含蓄的做法展示出了他性格中的一個反常特點——耐心。政治對他來說仍然意味著數年

的觀望、批判、學習和積累經驗，由於阿道夫將政治視為私事，因而當時的公共生活在他眼中顯得毫不重要。

有趣的是，阿道夫早年對軍事抱有強烈的反感。這似乎與他在《我的奮鬥》中的描述相悖：

「在瀏覽我父親的藏書室的時候，我發現了許多軍事書籍。其中，有兩冊描寫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流行雜誌是我當年的最愛。不久之後，這場英勇的鬥爭便成了我最寶貴的思想體驗。從此，我對戰爭和軍事的熱情變得日益高漲。」

1924年，他在蘭德斯堡監獄坐牢的時候撰寫了《我的奮鬥》，我猜測他在書中對這段「回憶」的描述只是出於某種權宜之計。因為當年我認識的那個阿道夫·希特勒，對戰爭和軍事沒有絲毫興趣。那些圍著斯蒂芬妮身邊轉的年輕中尉，不僅是他的眼中釘，更是他強烈憎惡的物件，就連強制性服役制度都讓他極為反感。不，他絕不會在別人的強迫下成為一名士兵，就算要當兵，他也要遵從自己的意願，誓不加入奧地利軍隊。

在結束關於阿道夫的政治發展這一章之前，我想先回顧兩個問題，因為在我看來，它們比其他任何關乎政治的事情都重要得多：一是青年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態度，二是他對教堂的看法。

在林茨，阿道夫·希特勒這樣描述他對猶太人問題的看法：

「如果不是事實，今天我就很難講出這樣的話：‘猶太人’這個詞頭一回填充了我的精神食糧。我父親尚在人世的時候，我不記得他何時在家中提到過這個詞。我相信自己瞭解這位老先生的想法，他肯定覺得，給這個詞加以任何的負面強調，都是一種文化衰退的表現。在他一生當中，他多少曾獲得過一些富有見地的想法，這些想法不僅與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諧共存，而且還影響了我，即便是學校也無法改變我從他那裡繼承來的觀念。

在實科中學，我的確認識一個猶太男孩，但大家都不相信他，並且還跟他保持距離，主要是因為他跟我們的經歷不同，每次別人跟他開玩笑他都顯得相當沉默，另外我跟他的接觸也不多。

直到十四五歲以後，我才開始注意到‘猶太人’這個詞，有時是在談論政治的時候，當一些宗教異議人士在我面前誇誇其談的時候，我總會感到一絲厭惡，我無法擺脫這種令人不快的感覺。但這些問題根本提不起我的興趣。林茨的猶太人很少……」

所有這一切聽上去似乎都非常真實，但卻與我的印象不符。

首先，在我看來，當描述到他父親性格中的自由思想時，他進行了著重的修飾。既然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林茨的圈子已經普遍認同了舒納勒的思想，那麼我可以推斷，他父親也是個反猶主義者。

其次，在敘述他的校園生活時，希特勒遺漏了一點，那就是實科中學的一些老師是公開反猶的，並且毫不隱諱地在學生面前承認他們對猶太人的憎惡，而且希特勒在實科中學肯定也意識到了猶太人問題的政治性。實情必定如我所言，當初我剛認識阿道夫·希特勒的時候，他的反猶主義傾向就已經很明顯了。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回我們沿著伯利恆大街散步，途經一座猶太小教堂，當時他就對我說：「這個東西不該出現在林茨。」

據我所知，到了維也納之後，阿道夫·希特勒就徹底變為了一名反猶主義者。儘管他在維也納的經歷可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種思想肯定不是萌生於此時。

在我看來，阿道夫·希特勒的描述其實是要表達以下觀點：「在林茨，這個猶太人口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方，形勢還不至於使我感到焦慮。只不過到了維也納，在見識了不計其數的猶太人之後，我才被迫去面對這些問題。」

他對教堂的態度則截然不同。在《我的奮鬥》中，他幾乎沒有提起過教堂，只有他在蘭巴赫的一段童年經歷的描述：

「由於閒暇之時，我會去蘭巴赫的修道院上聲樂課，因而我總能獲得絕佳的機會，在教堂典禮那節慶般的輝煌中陶醉。如同我父親當年在

鄉村小教堂的感受一樣，我自然也對修道院長的光輝形象崇拜不已。至少在當時，情況是這樣。」

希特勒的祖輩們必定是篤信宗教且常做禮拜之人，這恰恰體現出農民的本性。但希特勒的父母在這方面的表現卻各不相同，他母親對宗教倒是很虔誠，然而他父親卻是個不拘一格，又不怎麼熱心的基督徒。但很顯然，他父親對教會比對猶太人問題重視得多。鑑於君主與教會的密切關係，身為國家公務員的他，決不能容忍別人將其視作一個反教權主義者。

只要小阿道夫還親近他的母親，他就肯定會受到克拉拉夫人的影響，並接受教堂的莊嚴與美麗。這個蒼白年幼的唱詩班男童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儘管希特勒對此所言甚少，但一切情況似乎已昭然若揭。他了解這些巨集偉的建築，在他稚氣未脫之時，教堂一度令他深深著迷，這其中也少不了他母親的鼓勵。但隨著歲數的增長，他逐漸忘卻了自己的童年經歷，變得更像他的父親，他後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就是在他父親的影響下產生的。林茨實科中學的弗朗茲·賽爾斯·施瓦茨，是阿道夫的宗教老師，他沒對這幫年輕人產生過什麼啟發或影響，因為學生們根本就沒拿他當回事。

我的回憶可以被總結為幾句話：我認識阿道夫·希特勒這麼久以來，從沒見他去過教堂。以前他知道我每個星期天都要同父母一起去教堂做禮拜，他也接受這個事實。儘管他偶爾也承認，他對這樣的做法很不

理解，但他從未試圖勸我不去教堂——他母親是個篤信宗教的女人，但無論如何，阿道夫自己是不願牽扯其中的。此外，每當他對這些事物發表評論的時候，他都會帶著某種寬容和耐心，而這種表現與他慣常作風相悖。很明顯，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此事之上。主日禮拜結束後，我們通常會在教堂外碰面，對於這種週日的例行禮拜，他從未發表過任何不敬之詞，也沒有採取過什麼不恰當的行為。令我驚訝的是，他甚至從未把它當成一個辯論的機會。

有一天，他興奮滿懷地找到我，向我展示了一本關於審判女巫的書，還有一次是一本關於宗教法庭的書。不管這些書中記載的事件令他感到多麼激動，他都不會對其下任何政治結論，可能他覺得在這方面我不是個合適的聽眾吧。

每個星期天，他母親都要帶小保拉去做彌撒。我記得阿道夫從沒跟她們一起去過，或者說克拉拉夫人從沒叫他去過。正如她對宗教的虔誠一樣，她已經順從了這樣的事實——他的兒子是個例外。也許在這件事上，她對那位父親的不同觀點持保留態度，因為丈夫的箴言與奮鬥歷程仍然是她為兒子樹立的標準與榜樣。最後，我想用以下語言來描述希特勒當年對教堂的看法：他絕不是對教堂漠不關心，而是教堂給予不了他任何東西。

總而言之，阿道夫·希特勒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甚至早在當年，我就見證了他對德國人民熾熱的奉獻精神。只有依靠人民，他才活得有

意義，離開人民，一切皆為虛無。

第十章希特勒重建林茨的夢想

正當我猶豫著，到底是該把我朋友列為未來的大音樂家，還是大詩人的時候，他突然向我宣佈，他打算成為一名畫家。我立刻回想起他在家裡，以及在遠足的時候畫過的速寫。在我們的友誼不斷髮展的同時，我還見到過他的許多習作。以前，當我還是個家居裝潢匠的時候，我偶爾也會畫點速寫，但我總是發覺相當困難，因而我便更加佩服我朋友的天賦。他習慣將各種紙張隨身攜帶。我總感覺創作的起始部分是最頭疼的，而對他來講卻恰恰相反。他會提起畫筆先在紙上果敢地勾勒出他的主題思想，語言描述無法達到的效果，將由他的畫筆代勞。這些原始的粗線條的確有一些令人著迷之處——目睹一幅創作由模糊的輪廓逐漸變為清晰可辨的畫面，這著實令我興奮不已。但是，他不怎麼喜歡完成草圖。

我初次到他們家去拜訪的時候，他的房間裡凌亂的擺放著許多速寫，素描和設計圖。這兒是一張「新劇院」，那兒又是一張「利希滕伯格山峰酒店」。整個房間就像是一個建築師的辦公室。看著他在畫板上創作——比一般的即興之作畫得更小心，更細緻——我暗自確信，想

必他早就掌握了這項專業的必要技巧和手法。我不相信有人竟能瞬間記下如此複雜的事物，因為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即興創作。

對於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賦，單從這些作品的數量上，便能窺見一斑。我這裡有一張水彩畫——當然，說它是水彩畫並不合適，因為它只是一幅用蛋彩畫顏料來上色的鉛筆畫。水彩畫是通過得當的手法對某些氣氛和意境進行瞬間捕捉，從而將所繪之物賦予新意與活力，這正是水彩畫的典型特徵，但阿道夫卻根本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它體現出來。有些該靠直覺一筆帶過的地方，他卻小心細緻地塗抹。

對於阿道夫的藝術作為，我所談到的內容全都指他的初期嘗試。我目前擁有的唯一一幅他畫的水彩，就出自那段時期。儘管歷史可能賦予了它某種獨特的吸引力，但這幅畫依然顯得十分笨拙，毫無感情而且相當青澀。畫中用鮮明的顏色描繪出了林茨的地標建築，珀斯特靈貝格城堡。阿道夫把它贈送給我時的情景，依舊歷歷在目。

我們不要指望能從這幅水彩，以及往後他的數百幅作品中，獲得什麼藝術啟示。他的意圖並不在於表達個人情感，而只是閒來無事，聊以自娛。所以他選擇了一些比較大眾化的事物，比如他偏愛的建築，或者偶爾一些風景。如果這些明信片 and 圖畫不是出自阿道夫之手，想必它們也無人問津。

他真正的畫作則另當別論，但這些作品至今儲存下來的，已為數不多。儘管他曾給過我幾幅，但後來也只剩下了一幅意義不大的建築畫。畫中描繪的是施托克鮑爾大街7號的一幢別墅。當時這棟建築剛剛修好，它引起了阿道夫的極大興趣。所以他把這幢別墅畫了下來，當作一份禮物送給了我。這幅畫除了顯示出他對建築的熱愛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

回想當年那段歲月，我不得不說：阿道夫從未認真地對待過繪畫，這只是他志向以外的一種興趣愛好。但建築對他而言卻意義重大。他沉浸在自己想象的建築中，忘乎所以。一旦構思出一個想法，他就跟著了魔似地往裡鑽。其他任何事情都變得無關緊要——他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吃飯，忘記了睡覺。儘管我覺得與他為伴是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但那些時光卻令我難以忘懷。我陪他佇立在新落成的總教堂門前，這個蒼白消瘦的年輕人，上嘴唇顯現出固有的深棕色，他穿著一件椒鹽色的舊外套，肘部和衣領都已被磨薄，他的眼睛注視著建築物的每一處細節，分析著建築的風格，他時而批評，時而讚美，還針對建築材料，發出自己的不滿——他的所有見解都顯得如此的全面和專業，就好像他才是教堂的建造者，他願為這幢建築的每一處缺陷埋單。然後他會拿出寫生簿，任其畫筆在紙上奔走。他會聲稱這是解決問題的不二途徑。而我必須把他的構思與現實事物進行比較，從而表達我的贊同或反對，同時我還要裝出一副激情滿懷的樣子，彷彿我們兩個都是吃這行飯的人。

他強烈的改造慾望在此能夠得到酣暢淋漓的發洩，因為每座城市總有那麼多好壞不一的建築。沒有哪回他走在大街上不會受到刺激。他腦子裡經常有一半是裝著不同的建築設計，我甚至偶爾都忍不住要想，是不是整個鎮上的建築都排列在他的大腦中，就像一幅巨型的全景圖，一旦他選取了一個細部，就會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到上面。我記得有一天，當中心廣場的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堡銀行的舊樓被拆毀的時候。他帶著難以抑制的激動心情密切地關注著重建工作。他心中忐忑不安，生怕新建築會與周圍的環境不協調。當重建工作剛好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就去了維也納，於是他便讓我定期向他彙報工程進度。1908年7月21日，他在給我寄來的信上寫道：「銀行一旦建成，就請寄給我一張彩色明信片。」由於當時沒有可用的彩色明信片，所以我只好弄了一張新大樓的照片寄給了他。順便提一句，新建築得到了他的讚許。

像這樣能讓他產生持久興趣的建築還有很多。無論哪裡興修樓房，他都會拖著我一起去看。他對所有即將修建的房子都懷有一種責任感。但相比這些實體樣本，他還是更喜歡自己的原創設計。這樣至少他的改造癖不會受到限制。起初，我疑惑地觀察著他的所有舉動，想弄明白他為何如此頑固地讓自己去鑽營這些計劃——在我看來永遠都無法實現的計劃。越是脫離現實的計劃，就越容易使他沉浸其中，無法自拔。在他看來，這些計劃的每個細節都跟真的一樣，就好像它們已經被付諸實施，並且全鎮的重建工作都是根據他的設計來進行的。我經

常感到混亂，分不清他到底是在談論一個現實中存在的建築，還是在描述一個他自己想象創造出來的建築。但對他而言，這沒有多大區別，現實中的建築物只是相對次要的事物。

接下來是對林茨城的重建！在重建林茨這方面，他有許多的想法和願望，然而他並沒有隨隨便便地對其進行改造，因為一旦他做出決定就不會輕易地改變。他性格中那不可動搖的延續性在此顯露無遺。這個15歲男孩的所有計劃在他50歲時得以實施。比如拿多瑙河上的新橋來說，從計劃到執行，其間就好像只隔了幾個星期，而並非幾十年。計劃已經存在，到後來，威望和權力也有了，於是計劃就變成了現實。這種事情的發生有著異乎尋常的規律性，彷彿這個15歲的男孩，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有朝一日將擁有必要的實力和資金。這在我看來，簡直難以領會。我無法想象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我只好把它看作一個「奇蹟」，因為我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釋。

的確，這個鮮為人知的男孩為家鄉的重建所草擬的計劃，與他在1938年後為林茨所設計的規劃方案如出一轍，甚至連每一個細節都完全相同。我簡直不敢在後文對這些早期的計劃進行記述，唯恐我的誠實受到質疑。但是，我下面陳述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

在1906年8月3日，我18歲生日這一天，我的朋友送給我一幅別墅草圖。這與他為斯蒂芬妮所設計的別墅頗為相似，採用的是他最喜歡的文藝復興時期風格。幸虧我將這副草圖護存了下來。圖中展示了一幢

氣勢巨集偉的府邸式建築，建築的正面被一個嵌入式的塔樓分開。從這幅平面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房間的佈置上確實考慮得很周全，各個房間都圍繞著音樂室而協調構成。像旋轉樓梯這種精巧的建築構造，也被單獨描繪了出來，此外還有門廳，架設大梁的天花板。在另一草圖中，正門入口用幾筆明快的線條勾勒出來。阿道夫和我還一同為這份生日禮物選擇了一處合適的建造地址——鮑威爾伯格。當後來我在拜羅伊特見到希特勒的時候，我極其小心地不使他回憶起這座想象出來的房子。因為他可能真的會在鮑威爾伯格給我修建一座比最初那個設計還要好的別墅，並且會非常具有時代氣息。

我至今還儲存著他為林茨新音樂廳設計的兩幅草圖，在他無數的設計中，這兩幅堪稱上品。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老劇院都脫離了時代的發展。林茨的一些藝術愛好者成立了一個協會，他們籌劃著要興修一所現代劇院。阿道夫聞訊之後立馬就加入了這個協會，並且還參與了一個關於設計構思的角逐。他在自己的計劃和草案上花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他有絕對的把握，建議會被採納。當協會決定放棄新建劇院的想法而改為對老建築進行翻修的時候，阿道夫的全部希望也就此破滅，同時，他的憤怒也達到了極點。

我是指1908年8月17日，他的來信中那些辛辣的言辭，「看來他們打算再次修補這堆老垃圾」。

他義憤填膺地聲稱，他最想要做的就是將他的建造說明書打包，然後寄往這個地址——「負責實施改建工程的劇院重建協會委員會」。這個小惡魔，最擅長用調侃稱謂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憤怒！

在我收藏的兩幅草圖中，其中一張要追溯到那個時期，就是畫有觀眾席的那一張。圓柱將牆壁隔開，包廂則置於其中。欄杆上裝飾著各種雕塑。一個巨大的穹頂覆蓋了整個大廳。除了工程的大膽創意之外，阿道夫還向我介紹了這座建築的音效情況，作為一個音樂人，這點尤使我感興趣。畫面上清晰地展示出，聲波怎樣從管絃樂隊發出，然後通過穹頂天花板的反射，傾降到下面觀眾席上的每個人。阿道夫對音效的問題也很感興趣。我記得有一次，他建議改變人民公園大廳的內部結構，因為那裡的音效一直讓我們很不滿意，他想通過改變其天花板的形狀來解決這個問題。

精美而緊湊的主廣場一直都令阿道夫感到十分愉悅，他唯一的遺憾就是位於多瑙河河畔的兩座房子，它們妨礙了人們欣賞河流與山丘的風景。在他的計劃中，他並沒有對主廣場的原有觀景處進行改造，而是將這兩座阻礙視線的房子放到了更遠的位置，遠到足以讓人們在加寬的新橋上欣賞到多瑙河的壯麗風光。後來，他的確實施了這個解決方案。他覺得位於廣場之上的市政廳已經配不上林茨這個正在冉冉升起的城市。於是他設計了一座更加雄偉和莊嚴的市政廳，這座市政廳必須運用現代風格來修建，必須跟當時流行的新哥特式風格的市政廳

（比如維也納和慕尼黑的市政廳）區別開來。希特勒還著手用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去改造舊城堡——這個曾經管理過舊城市的醜陋盒狀物。他發現了一張城堡的老圖片，由梅里安繪於城堡遭火災之前。他覺得城堡面貌應被複原，然後把它變成一座博物館。

還有一座建築也總是能喚起阿道夫的激情，那就是興建於1892年的博物館。我們經常在博物館裡那塊長達110米的大理石浮雕帶前駐足欣賞，從這些浮雕裡感受這個國家的歷史。對這些事物他總是樂此不疲。在他的計劃中，博物館將被擴大，要超出鄰近的科芬園，並且浮雕帶需被延伸至220米，用他的話講就是，全歐洲最大的浮雕帶。在他眼裡，哥特風格的復興不過是一項毫無希望的事業。他對林茨人不能勇敢地面對維也納人而感到氣憤。因為出於對維也納聖斯蒂芬教堂的尊敬，林茨教堂的頂尖被限制在了134米，比聖斯蒂芬教堂矮4米。阿道夫對新的石匠公司感到非常滿意，因為這個公司的成立，與興建大教堂有關，也正如他希望的那樣，石匠公司將會給林茨培養出一大批能工巧匠。

他認為火車站與城鎮離得太近，鐵路網阻礙了交通，同樣也阻礙了城市的發展。對此，阿道夫想到了一個巧妙的解決辦法，而這個解決辦法已經超越了他那個時代。他將火車站從城裡移到了鄉下，然後在地下架設軌道穿城而過。拆掉老火車站後騰出的空地被他設計成了公園的一個延伸部分。讀到這兒，大家千萬不要忘了那是在1907年，而且

他還只是一個不為人知的18歲青年，他既沒有經過任何的培訓，也沒有獲得過任何的資格認證，儘管如此，他卻提出了這些革命性的城市改造計劃，他對已經存在的構思不屑一顧，他證明了自己有多麼能幹。

希特勒也用同樣的方法去改造林茨周邊的事物。在重建維爾德貝格城堡的計劃中，他採取了一種有趣的思路。他想要恢復城堡的原貌，然後將它發展成一個類似戶外博物館的地方，並且還有常住人口——十分新穎的構想。一些工匠和工人會被吸引到這個地方。他們做的生意既要繼承中世紀的傳統又要服務於現代社會，就好比一種旅遊產業。這些城堡中的居民還要按照古代的樣式來穿著打扮。管理方式就採用以前的舊行規，並且還要在城堡裡建立一所聲樂碩士學院。這片「與世隔絕的島嶼」（這是他的原話），將成為所有中世紀民俗研究者的一塊聖地。在對丁克爾斯比爾和羅藤堡加以對比和改造之後，維爾德貝格就不會光是彰顯其建築特色了，它還要展現出當年真實的生活。參觀者必須在大門口買票進入，這樣就能支援當地居民對城堡的維護工作。阿道夫在選擇合適的工匠上花費了很多心思，我記得當時我們就這個專案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討論。畢竟，那時我正著手我的研究生考試，所以我有資格發言。

利希滕貝格的鐵塔是一項不同尋常的工程，它是純粹的現代設計。登山鐵路一直通向山頂，在那裡會興建一座舒適的酒店。整個工程的核

心是一座高達300米的鐵塔，這個鋼結構的建築讓阿道夫煞費苦心。要是在晴朗的日子，通過鐵塔最高平臺上的望遠鏡還能夠看見維也納聖斯蒂芬教堂頂上那隻鍍金老鷹。我記得我還看過這項工程的草圖。

多瑙河上的一座超大跨度的巨集偉高橋是一個非常膽大的設計，與之相比，其他所有的工程都會顯得黯然失色。為了這項工程，阿道夫還計劃修築一條高速道路。這條道路將始於古格，當時那裡仍然是個醜陋的採沙坑，因此這裡將用來填埋城裡的廢品和垃圾，填埋後的空地會用來建造一座新的公園。而新的道路就將從這片被大規模清理後的地方開始，一直延伸到城市森林。（順便說一句，城市工程師在不知曉希特勒這個計劃的情況下，於不久前才開始實施這項工程，而這條道路的修建方案與希特勒的計劃如出一轍。）

位於雅格邁耶森林的「皇帝弗朗茲·約瑟夫之瞭望塔」——迄今仍然存在——在他計劃中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挺拔的紀念碑。在一座名人堂內集合了所有大人物的半身塑像，這些都是曾為上奧地利州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站在名人堂的制高點，人們將領略到一望無邊的壯美疆土，而在整個巨集大建築的頂端，將放置一座齊格弗裡德的雕像，他手中高舉諾統寶劍。（凱爾海姆的解放紀念堂和條頓堡森林的赫爾曼紀念碑都是其參照物件。）從這個地點，大橋呈單拱之勢飛跨至彼岸的陡坡之上。阿道夫的這個靈感來源於一位驍勇騎士的傳說，相傳他被敵人追擊至此，逼上了絕路，於是他縱身跳入了可怕的

深淵，然後遊過多瑙河，抵達了對岸。一想到這座大橋的規模就讓我感到發怵。橋拱的跨度算起來超過了500米，而兩岸的峰頂離河面有90米高。我非常遺憾這些罕見工程的真實草圖都未能儲存下來……我的朋友曾斷言，這座橫跨深谷的大橋，將會成為林茨所擁有的一座舉世無雙的巨集偉建築。每當我們在河岸佇立之時，阿道夫就會對此計劃為我做出詳盡地描述。

這個大膽而超前的計劃給我留下了一個奇特的印象，使我至今都無法忘懷。儘管整件事情讓我看到的只是一個虛構的假象，但它的獨特魅力卻使我難以抗拒。這些記錄在碎紙片上的東西令我朋友絞盡腦汁，它們不光是朦朧的奇思妙想，這些看似荒謬的構想還包含了一些引人入勝和令人信服的東西——一種優秀的邏輯思維。他的各個想法之間都有著本質的聯絡，將這些想法全部合在一起就是一條清晰而理智的思維鏈。像「還原中世紀風格的維爾德貝格城堡」這種純粹的浪漫主義構想，很明顯地暴露出理查德·瓦格納在他心中如父親般的地位。所有的工程都結合了極其現代化的技術裝置，比如用地下鐵路代替平交道。這並非是不著邊際的幻想，而是一個嚴謹而系統化的過程。這段「以建築譜寫的樂章」將我深深吸引，也許，正是因為它看上去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儘管我們兩個窮鬼不可能實現這些計劃，但這絲毫沒有妨礙我朋友的熱情與信心，總有一天，他會把這些龐大的工程全部付諸實施，這是他堅信不疑的。金錢是無關緊要的——只在於時間的問題，在於能不能活到那麼久。他這種絕對的信心打敗了我理性的

思考方式。我們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最多也就成為一個著名的指揮家，而阿道夫呢？一個頗具天賦的畫家或者製圖師，還可能成為一個有名的建築師。然而獲得重建一整座城市所需要的金錢、權力和名望與達到這些職業目標相比，顯得多麼的遙不可及啊！但是，他本身就具備令人無法理解的奇思怪想以及容易衝動的性格，誰知道我這位朋友會不會就這樣耗在了林茨的「重建」上，因為他對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我曾對此深表懷疑，並且偶爾會忍不住提醒他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把我們兩個全部的身家加到一起也不足幾克朗——連買張畫紙的錢都不夠。通常，阿道夫都會無視我提出的異議，而且還很不耐煩，我依然記得他在這種時候的冷酷表情和輕蔑的姿態。他想當然地認為，有一天這些計劃都會被準確無誤地執行，於是他就為這一刻的到來做著準備。即便是那種最不切實際的打算他都想到了最細微處。怎樣運輸用來修築多瑙河大橋的材料？用石材還是鋼材？末尾橋墩的基礎如何設定？基石能否承受重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問題顯得相當不專業，然而從另一種角度來說，這些問題又一針見血。阿道夫對林茨未來的幻想如此沉迷，以至於成了他的生活習慣，比如，我們經常「暢遊」名人堂，紀念堂或者我們的「中世紀戶外博物館」。

有一天，正當他在「國家紀念館」的巨集偉構想中沉醉之時，我突然把他打斷，然後認真地問道，如何解決這項工程的資金問題，我首先得到的是他的一個粗魯回覆，「噢，讓資金去見鬼！」但很明顯，我

的質疑對他起到了作用。後來他跟其他那些想要快速發家致富的人一樣，做了同一件事情——買了張彩票。然而阿道夫買彩票的想法卻與別人不同。對其他人來說，他們只是希望，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夢想中得頭獎，但阿道夫從彩票買到手的那一刻起，就確信自己已經中了獎，只不過忘了去領錢。他唯一的擔憂可能就是如何將這筆數目可觀的資金花在刀刃上。

他的一個典型之處在於他經常把最冷靜的計算混入到他那些奇異之極的構想當中，同樣的例子就發生在買彩票這件事情上。儘管他已經在自己的想象中花掉了那些獎金，但他還是仔細地去研究了彩票，並且精確地算出了我們的中獎概率。阿道夫邀我同他一起進行這項風險投資。對此他還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每張彩票的售價為10克朗，而我就得分攤一半。可是他與我約定，這5克朗不能用我父母給我的錢，必須靠我自己去掙。那個時候我也掙得一些零用錢，並且偶爾還從顧客那裡得到一點兒小費。阿道夫堅持要搞清楚這5克朗是從哪兒來的，當他瞭解到我貢獻的這部分投資，確實是我自己的勞動報酬之時，他就放心了，然後我們就一起到國家彩票局去買彩票。他花了很長時間來打定主意，我至今都不知道促使他做出選擇的考慮因素是什麼。儘管他對神祕主義完全持懷疑態度，並且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得非常理性，但他的行為對我來說一直都是個謎。最後，他找到了他的制勝法寶。

「就是它！」他說道，然後小心地將彩票放到了他那本用來寫詩的黑色小本子裡。

我覺得開獎之前的那段間隙是我們友情歲月中最愉快的一段時光。愛情與熱情，偉大的思考和崇高的理想，所有的這一切我們都曾擁有。唯一缺少的就是金錢。現在金錢我們也有了，夫復何求？

儘管頭彩意味著一大筆資金，但我的朋友絕對不會將這筆錢草率地揮霍掉。相反，他會對這筆資金的花銷精打細算。要是把全部的資金都耗費在他的其中一項工程上，比如說重建博物館，那將是十分愚蠢的，因為這只是他巨集大的城鎮規劃方案中的一小部分。把這筆錢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倒是更合理一些，這樣能夠提高我們的社會地位，使得我們離終極目標更近一些。

要是為我們自己修建一棟別墅那成本就太高了，這樣會耗費我們所有的財產，等到我們搬進這座富麗堂皇的別墅的時候，我們都已經身無分文了。阿道夫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他說我們可以租一套合意的公寓。在對各種因素和條件進行了長時間的慎重考慮和調查之後，我們選擇了位於烏爾法爾的科爾臣大街2號公寓樓的第二層，因為這座房子處在一個十分優越的位置。這幢建築緊靠多瑙河畔，我們能欣賞到延伸至珀斯特靈堡的蔥綠田地，風景宜人。我們悄悄地溜進房子，開啟樓道內的窗戶，欣賞著風景，阿道夫還為公寓繪製了一張平面草圖。

我們這就算是搬進去了。大一點兒的那間套房應該是我朋友的，而小一點兒的那個則是留給我的。阿道夫對房間做了安排，使得他的書房

離我的書房儘可能得遠，這樣一來，他在作畫的時候就不會被我的樂器練習給打擾了。

我的朋友同時還負責設計室內傢俱，他按照比例將每樣傢俱的每個部分繪製成平面圖。這些傢俱造型優美，品質上乘，由鎮上最好的工匠製作而成，絕非那種工業流水線製造出的廉價物。甚至連每個房間的牆面裝飾設計都出自阿道夫之手。而他只允許我做一些窗簾布置之類的事情，儘管他交给了我幾個房間，但我還是必須就房間的佈置徵得他的意見。在我們「合作佈置」公寓的過程中，他一定很享受那種把控全域性的自信行為。對於中頭獎，我們是志在必得。阿道夫的自信感染了我，讓我像著了魔一般也有了一種勝券在握的感覺。我也期望著能夠趕快入住科爾臣大街2號。

儘管樸實無華是我們這個家的基調，但其中卻蘊含著一種高雅的個人品位。阿道夫想讓我們這個家成為藝術愛好者的天堂。我負責提供一些音樂方面的娛樂活動。他負責背誦或朗讀詩歌，再或者闡述他的一些近期作品。我們會定期到維也納去旅行，參加一些講座和音樂會，然後上劇院。（那時候我意識到維也納在我朋友的思想世界中是個很重要的部分，奇怪的是他卻選擇了烏爾法爾的科爾臣大街。）

中頭獎並不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會保持著單純的本性，身著質地上乘的衣服，但一定簡約而不招搖。出於對我們穿著的重視，阿道夫想出了一個美妙的主意，讓我感到欣喜若狂。他建議我們應該穿

得完全一樣，讓別人以為我們是兩兄弟。對我而言，光是這個想法就已經能夠凸顯中獎的價值和意義了。它顯示出我們在劇院的一次邂逅怎樣發展成了一段深厚而浪漫的友誼。

當然，我將不得不搬出我父母的房子並放棄我的生意。我未來的音樂學習可容不得我花費時間去處理這些事務，因為隨著學習的深入，我們對藝術的感悟會與日俱增，使得我們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阿道夫幾乎考慮到了所有的事情，甚至連這個家的日常運轉他都想到了，當然，隨著開獎日期的臨近，這種考慮還是有必要的。我們應該請一位文雅的女士來操持這個家，使其正常運轉。她必須是位中年以上的婦女，而且她還得沒有任何干涉我們風雅生活的期望或企圖。我們還一致同意為這個大家庭請幾個必要的僱工。這樣一來就萬事齊備了。這幅願景在我的腦海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位中年女士，她的頭髮漸白，但顯得極其有尊嚴，她站在明亮的大廳前，迎接著兩個年輕人，一個17歲和一個18歲的才華橫溢的紳士，他們的客人都是從他們圈子裡精挑出來的高尚之人。

我們準備在夏天出去旅遊。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地就是拜羅伊特，我們可以去欣賞大師們的音樂作品。遊罷拜羅伊特，我們要去造訪一些著名的城市，巨集偉的大教堂、宮殿、城堡，還有工業中心，船塢和港口。「這就是德國的全部。」阿道夫講道。這是他比較愛說的一句話。

開獎的日子到了。

阿道夫拿著開獎結果發狂一般地衝到我的工作間，我很少見到他像這樣被氣得發瘋的樣子。首先他遷怒於國家彩票局，說這是由官方組織的，對善男信女們的剝削利用，說這種公開的詐騙建立在順民的犧牲之上。然後他又將鋒利的矛頭指向了國家本身，說它就是由11個或者12個或者鬼才知道有多少個的國家組成的拼湊物，這個怪胎就是哈布斯堡王朝聯姻的產物。除了活該，人們還能對這兩個被騙走了最後幾克朗的窮鬼說點什麼呢？

阿道夫理所當然地認為頭等獎是屬於他的，對這種想法他從未感到過自責或內疚，儘管事實上，他也對彩票的狀況進行過多時的研究，他精確地推算出，在彩券發行量甚多而獎項提供甚少的情況下，我們中獎的概率是多麼的渺小。對於他性格中的這種矛盾，我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但它的確存在。

這是他第一次喪失了他的意志力，而這種意志力過去總是推動他關注的事情朝著他想要的方向發展。這是他所不能夠忍受的，因為這比失去金錢，比放棄公寓和以尊容待客的女管家還要糟糕。

在阿道夫看來，把自己的未來放在自己手上，比去相信彩票局這種政府機構要靠譜得多。這樣至少能夠讓他免於遭受打擊。於是，在經歷

了一小段徹底的消沉之後，他又將注意力轉到了他先前的工程計劃上。

他最喜歡的一個計劃是對林茨到烏爾法爾那座大橋進行更新。我們過去每天都要經過這座大橋，而且阿道夫還特別喜歡這段路程。當1868年5月的那場洪水毀掉了這座木質老橋的5根支柱時，人們決定要將它修建成一座鐵橋，鐵橋於1872年竣工。這座醜陋至極的鐵橋，路面狹窄，儘管那時候還沒有汽車，可大橋總是擁擠到一種可怕的程度。

阿道夫喜歡傾聽那些為了搶道而相互咒罵的車伕，他們粗魯地詛咒著，手裡的鞭子打得噼啪作響。儘管他通常對眼下的事物不怎麼感興趣，而是更傾向於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問題，但他還是為這種現存的狀況想到了一個補救的辦法。即在不改變橋身的情況下，給橋的兩側加上一個兩米寬的人行道，使其分擔人流量，從而緩解道路交通的擁堵狀況。

當然，在林茨，沒有人會聽從這個年輕夢想家的建議，因為他甚至拿不出一份像樣的在校成績單。而如今，阿道夫對大橋的重建變得更加的執著與熱衷。

這座醜陋的鋼鐵建築必須被拆除。新大橋一定要讓從主廣場一路而來的觀光客有一種十分協調的視覺印象，這不是一座橋，而是一條路，

一條令人印象深刻的街道，而氣勢非凡的雕塑將突顯整體的藝術氛圍。

據我所知，希特勒當時為新橋所做的大量設計，一幅也沒被儲存下來，這的確是一大遺憾，因為要是將這些草圖同阿道夫·希特勒在30年後設計並下令興建的這座大橋相比，會顯得非常有趣。雖然1939年戰爭爆發，但多虧了他對新林茨建設的迫切渴望，使得這個在林茨規劃建設中的主要工程竟然得以竣工。

第十一章蛻變從那一刻開始

那是和我朋友一起度過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時刻。這段經歷如此的令我難以忘懷，以至連當時的一些瑣碎細節——當晚阿道夫的穿著打扮以及天氣情況等等——都還讓我感覺歷歷在目，彷彿這份感受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面對遠處燈火通明的城市，我站在弗萊堡山的孤頂，目睹蒼穹的神祕與煥然一新，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永恆氣息。當我回首我和阿道夫·希特勒這段友誼，我記得最清楚的既不是他的演講，也不是他的政治思想，而是在弗萊堡山上的一個小時。就在那時，他的未來人生被最終確定。當然，出於對他母親的尊敬，他會假裝維持自己既定的藝術生涯。因為即使是當一名畫家，都比他聲稱自己想成為一名政治家現實得多。他在林茨城的山頂上做出了要成為政

治家的決定。也許用「決定」這個詞並不是那麼的準確，因為這不是他的自願行為，只是出於長遠考慮，他不得不踏上這條道路，雖說也超出了他的意志。

阿道夫身穿一件黑色大衣站在我家門外，他的黑色禮帽遮住了他的臉龐。那是十一月一個寒冷而令人不快地傍晚，他招手示意我立刻出來。我當時正在對樓下店裡的工作做一些最後的處理，之後就準備同他一起上劇院。那晚，劇院將會上演《黎恩濟》，我們還從沒看過瓦格納的這出歌劇，因此我們都激動地期待著一飽眼福。為了將「散步走廊」上靠柱子的有利位置弄到手，我們不得不趕早。阿道夫又向我吹口哨，提醒我抓緊時間。

隨後我們熱情滿懷地來到劇院，我們屏息凝神，共同見證了羅馬護民官黎恩濟從最初的崛起到後來的垮臺。當這出歌劇謝幕的時候，時間已經過了午夜。我朋友將手插在衣兜裡，一路沉默寡言地邁著大步向城外走去。通常，在經歷了一些令他有所觸動的藝術體驗之後，他會立即開始滔滔不絕地評論，尖銳地批判某場表演，但看完《黎恩濟》之後，他保持了很久的沉默。這讓我感到驚訝不已，於是我就主動問他，看過這出歌劇後有什麼感想。然而他卻朝我投來一種幾乎是帶有敵意的眼光，「閉嘴！」他粗魯地說道。

狹窄的街道上瀰漫著潮溼陰冷的薄霧，空氣中透著幾分沉重。人行道上只有我們兩個的步子聲。阿道夫朝著通往弗萊堡的道路走去。他只

管大步向前，而一言不發。他看上去幾近凶險，面容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蒼白。他豎起的衣領更是加深了我這一印象。

我本想問他，「你打算往哪兒走？」但他那蒼白的臉龐是如此的令人畏，以至於讓我又把問題嚥了回去。

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推動他前行，阿道夫登上了弗萊堡的山頂。我突然發現我們已不再身處於偏僻和黑暗之中，因為此時在我們頭頂，繁星閃耀。

阿道夫站在我面前，他抓起我的兩隻手並緊緊地握住，他以前從未有過這種舉動。當他緊握我的雙手時，我感到他已被深深地打動。他炯炯的目光，透露出極度興奮的神情。他的言語並不像平常那樣從他嘴裡連貫而有條理地道出，他的聲音顯得相當嘶啞、粗糙，甚至有些失控。從他的聲音中我能夠感覺到，這次經歷給他帶來的震撼是多麼的巨大。

他的言談漸漸地放開了，措辭也變得更加地隨心所欲。阿道夫·希特勒在那一刻講的話我以前從未聽過，後來我也再沒有聽到過。我們佇立在星空之下，彷彿我們是這個世界上僅存的生物。

我無法將我朋友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複述出來。有種奇怪的感覺向我襲來，以前即便在他講得最來勁的時候，我都不曾注意。我覺得他身體裡面好像有另外一個人在說話，讓他自己亦如同我一樣被打動。雖說

有時候演講者也會被自己講的話感染，但當時他的狀況絕非如此，相反，我倒感覺他彷彿是帶著驚訝和強烈的感情在傾聽來自他本身的元力爆發。我並不想嘗試著去解釋這種現象，但是在這種完全陶醉和痴迷的狀態下，他用不切實際的幻想，將黎恩濟這個人物的性格特徵轉化成了他自己在某種層面上的雄心壯志，儘管他根本沒有承認黎恩濟是他的榜樣或楷模。然而這並不只是一種低劣的改編，事實上，我不得不說，這出歌劇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和衝擊。用他的誇張措辭來講，就是如洪水決堤一般。他用幻想為他的未來以及他的人民描繪出了一幅壯麗而振奮人心的畫卷。

之前我還一直確信我的朋友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一名畫家，或是一名建築師。現在看來，情況已不再如此。這個時候的他已有了更高的追求，只是我還不能完全領會而已。這讓我感到相當驚訝，因為我曾一度認為藝術家的職業生涯才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標。然而現在他卻侃侃而談：有一天，人民將會授予他權力，他將帶領人民擺脫奴役，爭取最大的自由。

在那個奇特的時刻，跟我說話的人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夥子。他談到了在未來的某一天，他將被委以一項特殊的任務，而當時的我，作為他的唯一聽眾，卻幾乎無法理解他的意思。直到許多年過去之後，我才意識到，那個令我朋友陶醉的時刻，對他來說，意義重大。

話一講完，他便陷入了沉默。

我們下山來到鎮上，鐘聲敲響了三下。在我家門前，我們相互握手道別。但我驚訝地發現，阿道夫並沒有往他家的方向走去，而是又朝著山上折返了回去。

「你現在去哪兒？」我驚訝地問他。他簡單地答道：「我想一個人待會兒。」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甚至後來的幾個月裡，他再也沒有提及弗萊堡山上的那1個小時。起初我還感到很奇怪，我無法解釋他的怪異行為，因為我並不相信他將這些都統統忘掉了。事實上，我在33年後才發現他根本沒有忘記。但他對此絕口不提，因為他想讓那一刻完全屬於自己。我能夠理解，也尊重他在這件事情上的沉默。畢竟，那是屬於他的時刻，而不是我的。我只是扮演了一個具有同情心的朋友，這種謙恭的角色。

1939年戰爭爆發前不久，當我作為帝國元首的客人，第一次到訪拜羅伊特的時候，我以為提起那晚在弗萊堡山頂的事情會讓主人家高興，所以我告訴阿道夫·希特勒，說我還記得那件事。可以想象，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他見到過無數的人又經歷了無數的事件，這種閱歷的提升將會給一個17歲青年帶來怎樣的改變。但幾番交談之後，我感到他已清楚地回憶起了那個時刻，在他的記憶中，仍然保留著所有的細節。他感到十分高興，因為我的敘述證實了他自己的回憶。後來還有一次，阿道夫·希特勒欣賞完《黎恩濟》之後拜訪了瓦格納夫人，當時，

作為應邀客人的我也在場。如此，我自己的記憶也得到了加倍證實。希特勒就這段故事給瓦格納夫人做出了簡短概括，令我一直難以忘懷。他鄭重地講道：「蛻變就從那一刻開始。」

第十二章前往首都維也納

我對阿道夫留意了很久，我發現無論是談論藝術、政治，還是他的將來，他都不再滿足於那個親切、熟悉但又庸俗的林茨了。他將目光越來越頻繁地投向了維也納。維也納仍然是一座光輝燦爛的皇城，它是一個擁有四千五百多萬人口的國家的一座主要城市，它承載著阿道夫對未來的所有憧憬。我說的時間是1907年的夏天，就在頭一年，阿道夫通過一次旅行，瞭解了維也納。到1906年的四五月，他已經在那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足以讓他對當地所有事物的興趣上升到熱愛的高度——霍夫博物館、皇家歌劇院、城堡劇院、環城大道上的巨集偉建築——但如果想要了解隱藏在這座城市華麗外表下的憂傷和苦難，那麼這段時間還不夠長。通過藝術想象製造出的大量假象對他來說具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他人在林茨，而心早已飛向了維也納，他無視眼前現實，把幻想當成真實情況來對待，如今，這種驚人的能力已經被他發揮到了極致。

我必須要更正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犯下的一個小錯誤，他在書中錯誤的聲稱自己初到維也納之時還不滿16歲，而事實上，他那時剛過完自己的17歲生日，其他的描述則與我的完全相符。

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朋友在談到對維也納的印象時的高漲熱情。然而，他描述的具體細節我已記不清了。但幸運的是，他第一次造訪維也納時寄給我的明信片，我還儲存至今。一共是4張明信片，它們除了對寫傳記有用以外，還是重要的筆跡學文獻資料，因為它們是現存最早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真跡。他的字型顯得異常成熟並且相當流暢，使人們難以想象，這竟是出自一個還不到18歲的年輕人之手。然而其中的錯誤拼寫卻顯現出他受到的不完整教育，同時也說明他當年對此毫不在意。他寄給我的所有彩色明信片大都是些關於一些頗有意義的建築。但像他這個年齡段的其他年輕人，肯定會選點兒別的明信片寄給他的朋友。

這些卡片中的第一張——日期為1906年5月7號——是當年的明信片中的一張傑作，肯定讓他破費不少，這張明信片伸展開來是一幅卡爾斯廣場的全景三聯圖，圖中間印的是卡爾斯大教堂。明信片上的原文如下：

「在寄給你的這張明信片上我得先說聲抱歉，因為我沒能及時跟你聯絡。是的，我已經安全抵達維也納，並且準備暢遊一番。明天我要去歌劇院，看《特里斯坦》，後天看《漂泊的荷蘭人》，等等。儘管我發現這裡的一切都是那麼美好，但我依然思念著林茨。今晚去市立劇院。祝好運！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在明信片的圖畫中，維也納音樂學院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他之所以選擇這種特定視覺的圖片，可能是因為他早就想到了某一天，我們會一起在維也納學習，所以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用這種頗具誘惑的方式來提醒我這樣的可能性。在圖片下面一點的空白處，他補充道：「問候令尊令堂。」

我想解釋一下他的這句話：「儘管我發現這裡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美好，但我還是思念著林茨。」此處的「林茨」，代指斯蒂芬妮，一個讓他離得越遠就愛得越深的姑娘。試想一個孤獨的異鄉人，身在一座無情的大都市，寫著一些只有他的密友才能看懂的話，這必定有助於緩解他對斯蒂芬妮的衝動與渴望。

就在同一天，阿道夫給我寄來了第二張明信片，上面描繪的是皇家歌劇院的舞臺。這幅出色的圖片展示了舞臺的部分裝飾和設定，大概他對此比較感興趣。他在上面寫道：「歌劇院的內部並不是那麼的令人振奮。雖然這幢雄偉建築的外觀具有藝術紀念碑一般的莊重感，內部結構也令人讚歎，但卻並未給人留下高貴的印象。只有當氣勢磅礴的聲浪湧遍整個大廳，還有當風中的低語讓位於聲浪的可怕咆哮之時，人們才會感受到那份莊嚴，才能忘卻劇院內的金碧輝煌與天鵝絨之滿溢。阿道夫·希特勒。」

皇家歌劇院（現名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卡片的上方再次補充道：「問候令尊令堂。」

阿道夫到了維也納，簡直是如魚得水。他把我和斯蒂芬妮忘得一乾二淨，沒有祝福，也沒有問候，甚至連一點暗示都沒有，明信片上通篇覆蓋的全是他最近的親身經歷。他那拙劣的文筆清楚地顯露出，他的表達能力還不足以妥當地詮釋出他內心的深切感受。這種糟糕的語氣聽上去就像一個因入迷而變得口吃的狂熱者，但同時又揭示出這段經歷對他的重要性。畢竟，這是我們少年時代在林茨的一個最大夢想，就是某一天能在維也納的歌劇院觀賞一場完美的演出，而不是我們省劇院裡的那種表演，為此我們期盼良久。當然，阿道夫這種熱情洋溢的描述，意在打動我對藝術的拳拳之心。因為沒有什麼能比藝術共鳴更能喚起我對維也納的興趣。

第二天，也就是1906年5月8日，我又收到他的一封來信，兩天之內，他在同一個地方，寄給了我三張明信片，這讓我感到相當驚訝。這一回，明信片上展示的是維也納歌劇院的外觀，從文字內容上看，他的動機昭然若揭。

他寫道：「我非常思念我親愛的林茨和烏爾法爾。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見到‘本基澤’。不知她過得如何。我將於星期四下午3點55分抵達林茨。如果你有空並且願意的話，來見我。問候令尊令堂！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烏爾法爾」這個詞加上了下劃線，可能是由於行文匆忙而導致的拼寫錯誤，但當時阿道夫的母親仍然居住在洪堡大街，而不是烏爾法爾。所以，這個詞代指的是斯蒂芬妮，它和「本基澤」這個商定好的代稱，意思相同。「迫不及待地想再見到本基澤」這句話反映出阿道夫的典型性格。「如果你有空並且願意的話，來見我」這句話也是有特殊意義的。儘管這對他來說是件緊迫的事情，但他尊重我對父母的孝順之情，因而也沒忘記在卡片上問候他們。

很不幸的是，我已無法證實，阿道夫是否真的在這之後的星期四返回了林茨，或許這種暗示僅僅意在滿足他對斯蒂芬妮那份難以抑制的思念。他在《我的奮鬥》中聲稱自己在維也納只待了兩個星期，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他在那裡住了將近4個星期，有一張日期為1906年6月6日的明信片可以為證。這張卡片展示了弗朗岑斯大道和國會大廈，上面一如既往地寫道：「向你及你的父母，致以我最良好的節日祝願和問候。阿道夫·希特勒敬上。」

阿道夫對斯蒂芬妮的思慕之情，讓他的首次維也納之旅變得既美妙又理想，帶著這段回憶，阿道夫進入了1907年那個具有轉折意義的夏天。這一次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兩年前經歷的重大危機相似。那時，在認真地反省之後，他最終決定跟學校劃清界限，做個了結，不管他母親為此感到有多麼痛苦。一場大病加速了他的轉變，但這樣的轉變只給他換來了「閒暇生活的空虛」。不上學，也沒有職業規

劃，他跟母親一起生活了兩年，而且還沒掙得一分錢。不過這兩年他也沒有虛度。那時候，我同阿道夫朝夕相處，我可以證明他對學習的熱情有多麼的高漲，但這種自學與他的藝術行為一樣，沒有明確的目標。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放任自流。一場意義深遠的改變將給他一成不變而漫無目的的人生指出一個明確的方向。

從表面上看，這種獨闢蹊徑的做法顯現出的是一種嚴重的消沉情緒，我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我知道這與他狂熱的獻身精神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是我幫不了他。在那段時期，只要我們一兩天不見面，他就會變得難以接近，沉默寡言，甚至是態度冷淡。如果我上門找他，他的母親會顯得非常驚訝。「阿道夫已經出去啦，」她會說，「他肯定是去找你了。」實際上，阿道夫會獨自漫無目的地徘徊在城鎮附近的田地或森林，一待就是一整天。當我最終找到他的時候，他會因我的到來而表現出一絲喜悅。但當我向他詢問原因的時候，他的唯一答案就是，「讓我一個人待著」，或者是一個粗暴的回答，「我不知道」。如果我堅持要知道答案，他也會理解我這份同情，然後用一種溫和的口吻對我說：「不打緊，庫斯特爾，但即便是你也幫不了我。」

這種狀況一連持續了幾個星期。然而，就在一個宜人的夏日傍晚，正當我們沿著多瑙河畔散步的時候，緊張的氣氛得到了緩和。阿道夫又恢復了以前的情緒。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個時刻。和往常一樣，我們看

著斯蒂芬妮同她母親手挽手地走過。阿道夫依然被迷得神魂顛倒。雖然他每天都會在這個時候見到她，但對阿道夫而言，這種碰面，永遠都是那麼的意義非凡。然而斯蒂芬妮大概早就厭倦了這個沉默不語，蒼白消瘦的年輕崇拜者。見到她的次數越多，我的朋友就越發地迷醉在自己編織的夢境中。他已不再抱有那些浪漫的想法，比如私奔或者自殺。他用饒有說服力的言詞向我闡明瞭他的思想狀況，他對那位心愛之人的幻想，日日夜夜在他腦海中縈繞不去，他無法工作，甚至無法專心地思考，他害怕這樣的狀況持續下去他會瘋掉，可是他又沒有想出打破局面的辦法，況且責任也不在斯蒂芬妮。「只有這麼做了，」他的眼淚奪眶而出，「我必須離開——遠離斯蒂芬妮。」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他就這個決定為我做出了詳盡的解釋。一旦他搬到一個遠離斯蒂芬妮的地方之後，他們就無法每天相見，那麼他就更能承受這段關係。可是他根本沒有想到，這麼一來，他可能會完全地失去斯蒂芬妮——他是深信自己已經贏得了她的芳心。而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或許阿道夫已經意識到，如果想贏得斯蒂芬妮的芳心，他就必須開口跟她講話，或者採取一些果斷的措施——他甚至可能也開始發覺，在蘭德大街的眼神交流似乎顯得有點幼稚。可是，他本能地覺察到，倘若當真與斯蒂芬妮相識，那將猛然毀掉他的人生夢想。的確，正如他所言：「如果我向斯蒂芬妮和她母親自我引薦，我就不得不立馬告訴她我是誰，我有什麼，我想幹什麼。我的自身條件會使我們的關係頓時終止。」他內心明白，他們的關係只有建立在一種堅實

的基礎上，才能避免被嘲笑，他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他能想到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奮鬥。於是他立馬開始陳述自己的詳細計劃。比如她要是充滿驚訝地問起我朋友的近況，我該怎樣回答。對此我接到了清楚的說明。（她從沒問過！）阿道夫自己也意識到，想娶斯蒂芬妮，就得為她提供一個無憂無慮的生活。

雖然他跟斯蒂芬妮的感情糾葛是導致他離開林茨的決定性主觀因素，但對我朋友這種性格的人來講，原因不盡然如此。另外一個原因是他渴望逃避家裡的壓抑氣氛。對於一個年滿18歲的青年男子來說，他已不再好意思繼續承受母親的照顧。這是一種痛苦的窘境，如我親眼所見，這種狀況差點把他憋出病來。一方面，他愛自己的母親勝過世間的一切，克拉拉夫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與阿道夫真正親近的人，她對阿道夫也有著同樣深切的愛，儘管她被兒子的迥異天性深深困擾，但有時她也為他感到無比驕傲。「他是個與眾不同的孩子，」她過去常說。另一方面，克拉拉夫人感到自己有義務去實現她已故丈夫的心願，說服阿道夫從事一項穩妥的職業。但在她那個性格獨特的兒子看來，何謂「穩妥」？他的學習一塌糊塗，並且無視他母親的願望和建議。一個畫家——這就是他自己聲稱想要成為的人。這似乎並不能讓他母親感到釋懷。因為她是一個心靈單純的人，任何與藝術或是與藝術家有關的東西，在她眼中都顯得輕浮而毫無保障。阿道夫試圖將自己打算去學院深造的想法告訴他的母親，從而改變他母親的觀點。聽上去倒不錯，畢竟，阿道夫提到的學院是一所真正的學校，在他母親

看來，這或許能夠彌補他在實科中學的缺失。他們的家庭討論總是令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阿道夫在為自己的藝術事業作辯解的時候，表現得如此的善解人意而又極富耐心。這同他平時的作風完全相反，在這種事情上，我從沒見他發過脾氣或是變得狂暴。通常，克拉拉夫人也會向我吐露心聲，因為在她看來，我也是一個志向遠大並且頗具藝術天賦的年輕人，我在音樂方面的造詣，勝過她兒子在繪畫方面的隨意涉獵，她經常覺得我的觀點比她兒子的想法更具說服力，且阿道夫對我的支援也十分感激。但是，在克拉拉夫人的眼中，阿道夫跟我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我已經學會了一門正當手藝，並且已經通過了熟練工考試，結束了我的學徒生涯。我將永遠有個避風的港灣，而阿道夫才剛剛踏入一片未知的領域。這種景象讓他的母親倍感焦慮。儘管如此，阿道夫還是成功地讓克拉拉夫人相信，送他去藝術學院深造，勢在必行。我依然清楚地記得，當時他有多麼的高興。「現在母親不會再有任何反對之詞了，」他有一天告訴我，「九月初，我必去維也納。」為了這項計劃，阿道夫還同她母親算了一筆細賬。他的生活費和學費將用他父親留下的一小筆遺產來支付，如今這筆錢由他的監護人暫行保管。阿道夫指望這筆來之不易的資金能夠讓他在維也納生活一年。他說，過後再想其他辦法，也許他能靠賣畫來掙點錢。

這項計劃的主要阻力來自他的姐夫拉包爾。作為一個見識狹隘的稅吏，拉包爾自然不能理解阿道夫的想法。他聲稱這是荒謬之舉，是時候讓阿道夫明白一些事理了。儘管拉包爾同阿道夫發生了一些激烈的

爭吵，但他總是屢佔下風，所以他就乾脆避免與阿道夫進行過多的爭論，而是試圖從克拉拉夫人那裡下手。阿道夫掌握的這些情報，大多來自「小孩兒」——他過去常常這麼稱呼他11歲的妹妹。當保拉告訴他，拉包爾來見過他母親的時候，阿道夫會勃然大怒。「這個偽君子正在破壞我的家庭，」有一回他暴怒地對我講道。拉包爾顯然還與阿道夫的監護人取得了聯絡，因為有一天，那個富農邁爾霍費爾從萊翁丁前來拜訪了克拉拉夫人。這個人最想讓阿道夫成為一個麵包師，並且已經給他找了個學徒工作。阿道夫擔心他的監護人會勸說他的母親扣留這份遺產。這將導致他的維也納之行泡湯。儘管這個決定有好一陣子都處在懸而未決之中，但計劃還不至於發展到這種地步。到了最後的緊要關頭，所有人都在反對阿道夫——甚至連公寓裡的其他住戶都看不下去了。克拉拉夫人或多或少地聽取了這些善意的勸言，被這些嘮叨弄得困惑不已。通常，當阿道夫意志消沉地在林間徘徊之時，我就同他的母親坐在他們家的小廚房裡，感同身受地傾聽著她的悲嘆，儘量地安慰這個可憐的女人，同時客觀地替我朋友作出辯解，並盡我所能地幫助他。我很能夠設身處地為阿道夫著想，如果不是顧及到他母親的話，就憑他那旺盛的精力，早就捲起行李走人了。他已經開始厭倦了這個庸俗的生活空間。他幾乎無法在野外獨處數小時後又回到這個狹隘的世界，他總是處在一種憤怒、艱難和倔強的紛擾之中。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忍受很多東西，但我們一起分享的，關於斯蒂芬妮的祕密，卻將我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她所散發出的那種不可

企及的動人魅力，平息了一場風浪。儘管阿道夫老早就打定了主意，但由於他母親是如此的容易受影響，因而這件事情便被暫時擱置。

而與此同時，維也納又在向他發出召喚。對阿道夫這樣的熱血青年來說，這座城市充滿了無數的機遇。這些機遇也許能讓人升至高峰，也會使人墜入谷底。這是一座巨集偉壯麗同時又冷酷無情的城市，她向人們允諾一切而又背棄著一切——這就是維也納。她要求向她投懷送抱的人們壓上最高的賭注。而這，就是阿道夫的意願。

毋庸置疑，阿道夫將他父親以前的經歷視為榜樣。如果阿洛伊斯·希特勒沒有去過維也納，那麼他會成為怎樣的人？也許是一個貧窮落魄的鞋匠，苟活在瓦爾德維爾特的某個貧民窟。看吧，維也納把這個由鞋匠撫養大的孤兒練就成了什麼樣！

自從1906年春，他初次造訪維也納以來，這些極其模糊的想法就已經在他的思想中漸漸地具體化。像他這種獻身藝術的人，只有到了維也納才能發揮出他的天賦，因為這座城市集合了所有領域的最高成就。在維也納短暫停留的那段時間，他已經去過了皇家歌劇院，並欣賞了《漂泊的荷蘭人》、《特里斯坦》和《羅恩格林》。用這種標準來看，林茨劇院的表演則顯得粗俗與欠缺。在維也納，城堡劇院的經典劇目在等待著這個年輕人。還有世界上最好的樂團——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然後是藏有無數奇珍和精彩的博物館，例如霍夫圖書館，能為他提供無數的學習和自我提高的機會。

林茨，已經無法滿足阿道夫的需求。這座城市需要著手改建的地方已由他完成，只不過是在腦海裡，再沒有任何具有吸引力的問題等待他去解決了。而且我一直都在林茨向他彙報鎮上所有變化，比如上奧地利州銀行的新大樓，薩爾茨堡的中心廣場，或者正在計劃興建當中的新劇院。但他想看到的是更為壯觀的事物——維也納市中心的巨集偉建築，廣闊而堂皇的環城大道——而不是林茨那窄小而粗陋的蘭德大街。此外，他日漸增長的政治興趣在保守的林茨城得不到滿足，因為那裡的政治生活一直是按部就班地運轉。風平浪靜的生活怎可能激發一個年輕人的政治興趣，這裡沒有緊張的局勢，沒有鬥爭，也沒有動亂。從一處微瀾不興的地方轉移到風暴的中心，這的確是一種刺激的冒險。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精華都集中在維也納。30個民族為了他們的生存和獨立而產生的鬥爭，製造出了一種如同火山爆發般的氣氛。投身到這種無拘無束的鬥爭中，那顆年輕的心該有多麼的欣喜！

偉大的時刻最終來臨。阿道夫滿心喜悅地來到我的工作間，那時我正忙著幹活。「明天我要走了，」他簡單地說道。他叫我到時候陪他去火車站，他不想讓他母親去送他。我知道在其他人面前與自己的母親告別會讓他感到多麼的痛苦。他最不喜歡在公眾場合流露自己的感情。我答應他到時會去幫他提行李。

第二天我騰出時間到布呂騰大街去接我的朋友。阿道夫已經收拾好了所有東西。我幫他提行李箱，箱子又沉又重，裡面裝的全都是他捨不

得擱下的書，我行色匆匆，避免撞見他們一家子告別，但是我也沒能完全避免。他母親在哭泣，而一向與阿道夫感情不是很深的小保拉也傷心地嗚咽著。阿道夫下樓趕上我，幫我拎起箱子，這時我看見他的眼眶也溼了。我們坐電車來到火車站，談著一些無足輕重的瑣事，就像那些想要隱藏自己真實感情的人一樣。與阿道夫告別讓我感到很傷感，而且一個人回家更加重了我這種情緒。好在店裡還有很多活兒等著我去做。

不幸的是，那段時間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只記得一連好幾個星期，我都沒有他的任何訊息。那時候我才深深地感到，他對我來說有多麼的重要。在我這個年齡段的其他年輕人是不會對我感興趣的，我料想他們只會對我感到失望，因為我的興趣愛好不同於他們那些無知而膚淺的行為。阿道夫顯得比大多數的同齡人都要成熟得多。他的視野寬闊，並且他對一切事物的由衷熱情時常能夠感染我。如今我感到非常的孤獨和難過，於是我就來到布呂騰大街，去克拉拉夫人那裡尋求一點安慰。也許跟喜愛阿道夫的人交談，會讓我感到好過一些。

我以為阿道夫已經給他母親寄過信了，因為他畢竟已離開了兩個星期，我想我可以要到他的地址，然後給他寫信，同時，根據他事先的指示，我要向他彙報這裡發生的一切。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但對阿道夫來說，每一件細小的事情都十分重要。我在施密托爾街口見到了斯蒂芬妮，當她發現我獨自一人的時候，確實有些意外，因為

她知道，這麼久以來，我僅僅是在這個「事件」中扮演一個次要角色，而主角卻不見了。在她看來，這似乎有點奇怪。這表示什麼？儘管阿道夫只是一個沉默的崇拜者，但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堅定，更頑強。她並不想失去這個忠實的崇拜者。當她詢問的眼光掃過我的時候，她的表情顯得如此的意外，弄得我差點上前去跟她攀談。但斯蒂芬妮不是一個人，陪伴她的還有那個無時不在的母親，況且我的朋友已經給我下了嚴格的指示，要等斯蒂芬妮自己來問我。是的，一旦她感到阿道夫已經奔向了遠大的前程，她會在第一時間找個機會，獨自跑到橋上，急切地懇求我告訴她，我的朋友怎麼了。也許他遇到了一場意外，或者像兩年前一樣害了病，又或者死了。不可思議！儘管那樣的對話並沒有發生，但我無論如何也可以寫滿一封4頁紙的信了。可阿道夫究竟怎麼了？我無從知曉。克拉拉夫人替我把門開啟，熱情地歡迎了我，我能感覺到她正盼望著我的到來。「有阿道夫的訊息嗎？」她站在門口問我。看來阿道夫也沒有給他母親寫信，這就讓我有些擔憂了。肯定發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也許在維也納，事情並沒有按照他的計劃發展。

克拉拉夫人給我搬出一把椅子。我看見她卸下這個擔子後顯得多麼的輕鬆。唉，可是以前那種悲嘆又來了！我從心裡能夠感受到。但我還是耐心地傾聽。「如果當初他在實科中學學習得當，他都可能被大學錄取了，但他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她又接著說道，「他和他父親一樣固執。為什麼就非要到維也納去啊？還不如留住他那點遺產。這點

錢馬上就會被他花光。之後怎麼辦？他靠畫畫，什麼錢都賺不了。寫詩寫故事一樣賺不了錢。我幫不了他——我還要照顧那個小的。你也知道她是個體弱多病的孩子，但她還是要參加一些像樣的培訓。阿道夫什麼也不考慮，他只管走自己的路，好像這個世界上就只有他一個人。我等不到他出息的時候了……」

克拉拉夫人看上去顯得比以前更加憂心忡忡。她的臉上佈滿了深深的皺紋。她的眼神毫無生氣，她的聲音聽起來顯得疲倦而又逆來順受。我有這樣的感覺，現在阿道夫不在了，她如釋重負，然而她看上去顯得更蒼老，身體狀況更糟。為了讓她的兒子放心地離去，她肯定隱瞞了自身的狀況，抑或是阿道夫衝動的本性曾維持著她的活力。而現如今，她孤身一人，在我看來她只是一個衰老而體弱多病的女人。

很不幸，接下來幾周發生的事情，我已經忘記。阿道夫把地址簡短地告訴了我。他住在維也納第六區，斯通帕街29號，II單元，二樓17號，套房的女主人有個奇怪的名字叫查克雷斯。他就寫了這麼多。但我猜測在這種固執的緘默背後還有更多的情節，因為我知道，阿道夫這種沉默通常表示他礙於面子而不願意講出來。

因此，談到他的第二次維也納之行，我要引用他在《我的奮鬥》中的描述，這段描述被普遍認為是真實可靠的：

「……我曾經到維也納去參加了藝術學院的入學考試。那時我帶著我的一大沓畫作便踏上了征程，我堅信，入學考試對我而言就是小菜一碟。在實科中學的時候，我是班上繪畫最好的一個，而自那以後，我的繪畫技巧更是突飛猛進，所以我對自己特別的滿意，我自信能夠做到最好……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這座美麗的城市，我迫不及待而又滿懷希望地等待著入學考試的結果。我對通過這次考試是如此的自信，以至於當拒絕的訊息傳來之時，我感到猶如被晴天霹靂擊中一般。是的，就是這樣的結果。我跑去見院長，向他了解我為什麼會被學院的美術系拒絕，這位先生告訴我，從我出示的這些作品來看，我在繪畫方面沒有天賦，我的才華似乎更多地體現在建築領域，他說我不該讀美術系，而應該去讀學院的建築系。我從未上過建築學校，也沒有受過任何建築方面的培訓，這點讓他感到難以置信。

「失敗，我離開了席勒廣場，這座雄偉建築，在我年輕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對自己產生了懷疑。我在突然間被告知的能力似乎與我自身的認識產生了分歧，對於這個長久以來困擾著我的問題，我至今都無法認清原因。

「幾天後，我自知我會成為一名建築師。但是這條道路何其艱難。由於固執，我已經在實科中學錯過了機會，而現在我嚐到了苦果。在藝術學院建築系的學習是基於實科中學的建築課程的，而想要接觸後

者，要求學生在二年級的時候必須通過錄取考試。這些條件我一個都不滿足。因此我所能預見到的就是，我已經不可能實現當藝術家這個夢想了。」

他被藝術學院拒絕了，他在維也納甚至還沒站穩腳跟就已經失敗了。對他而言，沒有什麼比這更糟糕了。但他覺得講出來有礙於他的面子，所以這些事情他都瞞著我，也瞞著他的母親。當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他多少已經對這個艱辛的決定做出了反省，但他絕口不提。我尊重他的沉默，而且我什麼都沒問，我猜想肯定是他的計劃出了差錯。直到第二年，我們一同在維也納居住的時候，所有這些情況才漸漸變得清晰。

阿道夫的建築天賦是如此地顯而易見，他應該被視作一個例外——學院裡還能找到許多沒有天賦的學生。那個含有偏見且官僚化的判定結果是不公正的。然而阿道夫對這個羞辱性待遇的反應卻是典型的。他並沒有嘗試著去獲取那種特殊待遇，或者在那些不瞭解他的人面前盡失風度和顏面。當時他既沒有不服也沒有進行抗爭，而是選擇了一種理性的退卻，用頑固的意志來對付這場災難，「現在我過得比任何時候都要好！」這是他對席勒廣場那位先生放出的憤怒之詞，就像兩年前他同學校的老師做出的了斷一樣。無論生活給他帶來怎樣的失望，他都會勇敢地面對所有的困難，並且繼續堅持走完自己選擇的道路。

在《我的奮鬥》中他這樣寫道：「當苦難女神將我拽入懷中，並威脅要把我擊垮時，我反抗的意志不斷增長，最後，意志勝利了。」

第十三章希特勒母親的葬禮

我記得阿道夫的母親在1907年初做過一次大手術。當時她就住在赫倫大街的修女會慈善醫院，阿道夫每天都去探望她。我忘了她得了什麼病，但很有可能是乳腺癌。儘管克拉拉夫人後來恢復得又能持家了，但她身體仍然非常的虛弱，經常都得上床休息。然而在阿道夫抵達維也納的幾個星期後，她的狀況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轉，因為我偶爾會在散步廣場碰見她，在那時候的散步廣場還是個集市，從鄉下來的農村婦女到這裡賣雞蛋、黃油和蔬菜。「阿道夫還平安，」她心滿意足地告訴我，「要是我能知道他學的是什麼就好了！可惜他隻字未提。也罷，我想他肯定很忙。」

這是個好訊息，我聽了也很高興，因為阿道夫並沒有寫信告訴我他在維也納的活動。我們的通訊主要關乎「本基澤」，也就是斯蒂芬妮。但這件事情肯定不能讓他母親知道。我詢問克拉拉夫人近來身體可好，她搖頭輕嘆，頑疾纏身的她，夜晚經常無法入眠。但她提醒我不要告訴阿道夫，因為她覺得自己會很快好轉。在我們分別的時候，她叫我有空常來看她。

那時我和父親正忙於店裡的工作，確實，生意還從沒像那年一樣好過，收到的訂單源源不斷。然而，除了這項粗活以外，我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花在了我的音樂訓練上，我在音樂社和交響樂團兩處地方演奏中提琴。時間就這麼慢慢過去，等我抽出空去拜訪克拉拉夫人的時候，已經到了11月下旬。而當我見到她的模樣，我一下震驚了。她那副和善的面容顯得多麼的枯槁和憔悴啊！她躺在床上，向我伸出了她蒼白而枯瘦的手。小保拉將一把椅子推到了她旁邊。她馬上開始談起阿道夫，對他信上滿載希望的語氣感到無比欣慰。我問她，有沒有將她的病情告知阿道夫，並告訴她，萬一她自己寫不了信，我可以代筆，但她趕忙拒絕了。她說，要是她的狀況還不見好轉，她會請人把阿道夫從維也納叫回來。她很自責，因為這樣不得不打斷阿道夫的工作——難道她還有別的選擇嗎？小的那個每天都要去上學，安吉拉自己操心的事都已經夠多了（她懷上了第二胎），而她的女婿拉包爾又完全靠不住。自從她站到了阿道夫這一邊，袒護了他去維也納的決定之後，拉包爾就開始跟她置氣，現在再也沒有在他們家露過面，甚至還不讓他的妻子去看望她。所以她講，除了上醫院，別無他法——醫生也是這麼建議的。希特勒家的家庭醫生非常有名，叫布洛赫醫生，是鎮上盡人皆知的「窮人的醫生」，他是一位十分優秀的醫生，也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他的病人。如果說布洛赫醫生都建議希特勒夫人到醫院去的話，那說明她的處境肯定是很危險了。我不知道我究竟該不該通知阿道夫。克拉拉夫人說，阿道夫的

遠行對她來講是件可怕的事情。在那次拜訪中，我從未如此清晰地意識到，她對兒子的愛是那麼的深切。她不遺餘力地為阿道夫的幸福設計著想。最終，她答應我會把自身情況告訴阿道夫。

當晚離她而去的時候，我對自己感到非常失望。難道就沒有辦法來幫助這個可憐的女人嗎？我知道阿道夫的母親是那麼的愛他，我必須幫她做點什麼。要是他母親真有個三長兩短，笨拙的小保拉恐怕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回到家裡，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我的母親。儘管她們兩個素不相識，但她立馬就提出了去看望希特勒夫人的想法。可是我父親不同意，在禮數這方面，他考慮過多。他認為人家都沒開口，而我們自己就去幫助別人，這是不禮貌的。幾天後我又去看望了克拉拉夫人。我發現她已經能下床，而且還在廚房裡忙活。她感覺自己稍有起色，但又後悔將自己的病情告訴了阿道夫。那晚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很久，她顯得比平常更健談，她一反常態地給我回顧起她的一生。有些我已經瞭解，但更多的只能靠猜測，因為許多話她都沒講出來，不過後來，一個滿懷希望的19歲青年，向我透露了她這段悲劇人生。

但我的工作很緊張，我父親是個嚴厲的老闆。即便對於我的藝術抱負，他都經常性的告誡我：工作第一位——之後才是音樂。隨著一場特演會的臨近，交響樂隊的排演是一出接著一出。有時候我簡直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所有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早上，當我正懷著飽滿的工作熱情，填充一張床墊的時候，阿道夫突然出現在我店裡。他看上去十

分憔悴，臉色蒼白，見不到半點血色，他的目光呆滯，聲音沙啞。我感到在他冰冷的外表下肯定隱藏著一個災難性的事實。當時他給我的印象就是，彷彿他在同一段無情的命運做著抗爭。

沒有一聲問候，也沒有詢問斯蒂芬妮的訊息，更沒有向我講述他在維也納的經歷。

「醫生說，無法治癒。」——他就衝我拋下這麼一句。我被這一確切的診斷給驚住了。也許布洛赫醫生已經告訴過他克拉拉夫人的狀況，可能他還請了另外的醫生前來診斷，但是他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他眼中的憤怒熊熊燃燒，脾氣驟然大發。「無法治癒——他們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咆哮道，「不是疾病無法治癒，而是那些醫生根本沒有能力去治癒。我母親還沒老。四十七歲並不是一個絕望的年齡。可是一旦這些醫生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就稱其無法治癒。」

我瞭解我朋友的習性，他把所有事物都轉化成問題來對待。但他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悲傷而又如此憤怒地陳述一件事情。阿道夫面容蒼白，激動得全身顫抖，在我看來他就像是在和死神討價還價一般，他毫無悔意地在為自己的受害人爭取著生存的權利。

我問阿道夫，我能不能幫上什麼忙。他沒有聽見——他太專注於自己的據理力爭了。突然他停了下來，用一種理性而務實的口吻宣稱道：

「我應該留在林茨替我母親操持家務。」「你行嗎？」我問道。「必要時，一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的話到此戛然而止。

我同他一路走到街上。我以為此時他會向我打聽一下斯蒂芬妮的情況，也許他剛才只是不願意在我店裡提到她。如果他問起斯蒂芬妮，我會很樂意地告訴他，因為我已經嚴格地遵照了他的指示去行事，而且我還有好多事情要講給他聽，但是我期待的對話並未發生。我也希望阿道夫能從精神上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在斯蒂芬妮身上找到一絲安慰。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那段灰暗的日子裡，斯蒂芬妮對他而言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他壓抑著自己不去想她，他對母親的牽掛和焦慮佔據了他的整個思緒。

我已記不清阿道夫是什麼時候從維也納回來的。也許是在11月底，甚至可能是12月份。然而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是我記憶中一段無法抹去的時光，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是我們友誼歲月中最美好、最親密的一段時光。這些日子給我印象極為深刻，僅用一個事實就可以證明：在我們交往的歲月中，沒有哪段時光能像這樣在我的記憶中浮現出如此多的細節。他如改頭換面一般，到目前為止，我確信我在各個方面都對他有了徹底的瞭解。畢竟，我們一起生活了三年多，而且我們的友誼具有排他性，我們坦誠相見，彼此之間毫無保留。然而在那幾個星期，我的朋友看上去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他放下了那些曾經讓他感到相當焦慮的想法和問題，放下了對政治的一切思考，他甚至都顧不上他的藝術愛好。現在他什麼事情都不想做，只想當好一個孝順的兒子。

當阿道夫聲稱他要操持起布呂騰公寓的家務之時，我根本就沒當真，因為我知道阿道夫一向把這些瑣碎的家務事看得很輕，儘管它們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對他的良好意圖表示懷疑，在我的想象中，這不過是一些善意的姿態罷了。

但我完全想錯了。在這方面，我對阿道夫還不夠了解，我沒想到，在親情與孝心的驅使下，他竟能如此高效地料理這些令他難以忍受的家務活，這讓他母親倍感欣慰。有一天，我剛到他們家，就發現阿道夫跪在地板上，繫著一條藍色的圍裙，正在清理廚房，看樣子都打掃得差不多了。我驚訝之極，這其中一定有些向我炫耀的成分，因為克拉拉夫人忍著病痛，微笑著對我說道：「你瞧，阿道夫什麼都能幹。」另外我注意到，阿道夫改變了傢俱的佈置。他母親的床現在位於廚房，因為那段時間此處是暖和的。而櫥櫃則被擺到了起居室，起居室裡還有一張長椅，那是阿道夫睡覺的地方，如此一來他離母親的床鋪就很近了，夜間也好有個照應。小保拉睡在臥室。我忍不住問他是怎麼做飯的。「等我把地擦完，我就讓你見識一下」阿道夫講。在我見識他的廚藝之前，克拉拉夫人告訴我，她每天早上都要跟阿道夫討論正餐吃些什麼。他總挑她最愛吃的菜買，然後精心地烹製，以至於比

她自己做的菜都還可口。她非常享受這些食物，她堅持說，在阿道夫回家之前，她從未有過那麼好的食慾。

我望著起身坐在床上的克拉拉夫人，言辭中飽含的熱情讓她一貫蒼白的面頰有了幾分血色。兒子歸來的喜悅加上阿道夫對她的孝敬，使得她那張憂愁而憔悴的臉龐顯得容光煥發。但在這位母親的喜悅背後，是清晰可見的苦難與痛楚。那深深的皺紋，緊繃的嘴脣和深陷的眼眶都顯示出醫生的診斷是多麼的正確。

誠然，我本該清楚我的朋友最終會失敗，但無論做什麼事情，即使是這種「超常規的」任務，他都要徹頭徹尾地做完。看到他在操持家務時的認真勁兒，讓我不忍心對他進行調侃，阿道夫平日裡總是穿戴整潔，一絲不苟，因而見他穿身舊衣服，繫條圍裙就覺得很好笑。而對此我也沒做任何評價，他態度的轉變讓我十分感動，要知道為了完成這項工作，他做到了怎樣的自我約束。

克拉拉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轉，可能是因為兒子的出現改善了她以往的狀況，使她振作起來。有時候她甚至會在下午起身下床，到椅子上去坐著。阿道夫對她的每樣需求都做好了預先的準備，他對她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我還從未見過他這般柔情款款。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所見所聞。他沒有說過一句氣話，沒有任何抱怨之詞，更沒有粗暴地對待自己所堅持的選擇。在那些日子，他完全忘掉了自我，只為他母親一人而活。雖然根據克拉拉夫人的描述，阿道夫繼承了他父親的許多

特點，但我意識到，他的本性還是與他母親的更加貼近。當然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他陪著母親度過了她生命中的最後四年。除此之外，還因為這對母子在精神上，保持著一種特殊的一致性，我以前一直都沒有發覺這一點。而他們之間的所有分歧則是次要之事。阿道夫從沒提及他在維也納所遭受的挫敗。眼下，對未來的擔憂似乎已不存在。一種輕鬆與安樂的氣氛環繞著這個即將離世的女人。

阿道夫也一樣，好像已經忘卻了所有那些曾令他牽腸掛肚的事情。只有一回，在我同克拉拉夫人告別後，他追到門口，問我最近見沒見到過斯蒂芬妮。但這個問題此時聽來，語氣有所不同。不再有以前那個衝動的戀人所表現出的性急，而是一個年輕人發自內心的焦慮，此時此刻，他害怕命運會奪去他最後一點兒生存的意義。我從他倉促的問題中推測出，在那段慘淡的日子裡，這個女孩對他而言，意義重大，他遠遠不止是奢望跟她建立一種親密關係。我讓他放心，我經常碰見斯蒂芬妮和她母親路過大橋，一切似乎都未曾改變。

12月的天氣寒冷刺骨。一連好幾天，多瑙河上都籠罩著潮溼而厚重的霧氣，陽光更是難得一見，即便有陽光，也是相當微弱的那種，彷彿根本沒有釋放出一點點溫度。他母親的病情出現了明顯的惡化，於是阿道夫叫我每隔一天過去一次。每當我走進廚房，克拉拉夫人會略微衝我抬起手，以示問候。一個無力的微笑掠過她的臉龐，如今卻因病痛而變得扭曲。我記得一個有意思的小插曲。在檢查了保拉的練習冊

之後，阿道夫發現她在學校的表現並未達到母親的期望值。他拉著保拉的手，把她領到母親的床前，讓她承諾今後刻苦學習，成為一名好學生。也許阿道夫想用這種小場景來向他母親表明，他也意識到了自身的錯誤。如果當初他繼續留在實科中學，直到被大學錄取，他就會避免在維也納所遭受的不幸。正如他後來所講到的，那個決定性的事件讓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種落差感，毫無疑問，在那段苦澀的歲月裡，這件事情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使他變得更加的消沉。

兩天後我再次來到布呂騰大街，輕叩他們家門，阿道夫立馬替我開啟了門，我走進屋裡，他合上了身後的門。他告訴我他母親的狀況很不好，現正遭受著病痛的折磨。就連他的情緒都比他的話更能讓我意識到勢態的嚴重性。我想我最好還是離開，阿道夫也表示同意。我們握手告別卻相對無言。

聖誕節鄰近，終於下起了雪，整個鎮子都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但我並沒有要過聖誕節的感覺。我走過多瑙河大橋來到烏爾法爾。我從人們口中得知，克拉拉夫人已經受了終傳。我想將拜訪時間儘可能地縮短一些。我敲開了門，迎接我的是保拉。我遲疑地走了進去。克拉拉夫人坐立在床上。阿道夫用手抱著她的肩膀支撐著她。因為她坐起來的話，劇烈的疼痛會減輕一些。

我仍舊站在門口，阿道夫示意叫我走。正當我開啟門要走的時候，克拉拉夫人伸手招我留下。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將要去世的女人當時對

我的低聲囑咐。「庫斯特爾，」她說道——通常她叫我庫比席克先生，但在那個時刻，她用阿道夫對我的慣用叫法來稱呼我——「我走以後，和我兒子繼續做好朋友，除了你他沒有別的朋友了。」

我含著眼淚答應了，然後離開了房間。那是在12月20日的傍晚。

次日阿道夫來到我們家。他看上去疲憊不堪，從他神志恍惚的表情上，我們已經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他說他的母親，已於凌晨時分去世了。她的臨終遺願是葬在萊翁丁，阿道夫父親的墳墓旁。阿道夫言語哽咽，母親的去世讓他深感悲痛。

我父母也向阿道夫表達了他們的同情，但我母親意識到，最好是把這份同情立刻轉化成實際行動。葬禮必須儘快做出安排。阿道夫已經找了殯儀承辦人，葬禮舉行時間被定在了12月23日上午9點。但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進行：遺體送往萊翁丁的準備，必要檔案的獲取和訃告的印製。所有這些都需要阿道夫克服自己感情上的打擊，平靜地做出安排。

1907年12月23號，我和我母親來到那棟將要舉辦喪事的房子。天氣已經變了，冰雪開始融化，街道上覆蓋著雪泥。這一天，空氣潮溼，薄霧籠罩，人們幾乎看不清河面。我們帶著鮮花走進公寓，按照習俗同死者遺體告別。克拉拉夫人被平放在床上，她的臉龐用蠟做過美化處理。我覺得死亡降臨這個女人猶如讓她從病痛中解脫一般。小保拉啜

泣著，而阿道夫卻剋制著自己。但一看他的臉就能明白，他當時有多麼的悲痛。不僅是因為他現在已經失去了雙親，還因為他失去了這個世界上，唯一深愛著他而又讓他深愛著的人。

我母親和我下樓來到街上，正好神父也到來。遺體被放置在棺材中，抬到了樓下大廳。在神父為死者做完禱告後，一支小小的送葬隊伍便開始出發了。阿道夫緊隨棺柩，他穿著一件黑色風衣，戴著一雙黑色手套，按照慣例，手託一頂黑色禮帽。深色的衣著讓他本無血色的面頰更顯蒼白，他看上去嚴肅而鎮定。在他左邊，同樣一身黑色著裝的是他的姐夫，拉包爾，在他們兩個中間是11歲的保拉。已身懷六甲的安吉拉坐在一架封閉式的馬車上，跟在送葬隊伍的後面。整個葬禮讓我產生了一種悲涼感。除了我和我母親以外，只有少數布呂騰大街9號的住戶和幾個以前他們在洪堡大街的鄰居、熟人蔘加了葬禮。我母親也覺得這個送葬隊伍顯得過於淒涼，但出於內心的善良，她馬上又為那些避開葬禮的人找到了藉口。她說，明天是聖誕節，許多女人再想參加葬禮也絕不可能在這時候離開家。

到了教堂門口，棺材被抬下靈車，送進了教堂，做完彌撒之後又是第二輪禱告。由於遺體要被送往萊翁丁，因而送葬隊伍經過了烏爾法爾的豪普特大街。隊伍臨近之時，教堂的鐘聲已經撞響。我本能的朝著斯蒂芬妮家的窗戶抬眼望去。她不該在這個時候拋棄我的朋友，也許是我強烈的願望起到了作用，在阿道夫最悲痛的時刻她受到了感召。

我依然記得就在那時，一位年輕的姑娘開啟了窗戶，斯蒂芬妮好奇地望向正下方這支路過的小隊伍。我朝阿道夫瞟了一眼，他依舊面不改色，但我確信他也看見了斯蒂芬妮。後來他告訴我確實如此，他承認，在那個痛苦的時刻，他愛人的注視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安慰。斯蒂芬妮當時來到窗戶邊究竟是有意為之還是一個巧合？也許她只是驚訝於教堂的鐘聲，想知道為何一大早就響起了。當然，阿道夫則確信斯蒂芬妮是想對他表達自己的同情。

在豪普特大街上，另一駕封閉式馬車正在等候，當送葬隊伍解散以後，阿道夫和保拉坐上了這輛馬車。拉包爾則坐上了他妻子那輛馬車。然後，靈車和兩輛馬車駛向萊翁丁，安葬克拉拉夫人的遺體。

次日清晨，即12月24日，阿道夫來到我家。他看上去顯得十分疲憊，彷彿時間多走一分鐘，都有可能讓他徹底崩潰。他似乎已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他眼神空洞，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點點活力。當他察覺到我母親對他很是擔憂的時候，他解釋道，這是因為他整夜未睡的緣故。我母親問他打算在哪兒過平安夜。他說拉包爾夫婦已經邀請了他和他的妹妹，保拉已經過去了，然而他還沒打定主意，不知道是去還是不去。我母親勸他同家人和和氣氣地度過這個聖誕節，如今這個家庭的所有成員已經遭受了失去親人的沉痛打擊，阿道夫默默地聆聽著我母親的勸告。可當我們兩個私下在一起的時候，他卻直率地對我說，「我不會去拉包爾家。」

「那你要去哪兒？」我失去耐心地問道，「畢竟是平安夜啊。」

我想邀請他和我們一起過節，但他甚至都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就主動回絕了，全然不顧自己的悲傷情緒。

突然他精神一振，雙目放光。

「也許我該去拜訪斯蒂芬妮。」他說。

我朋友這個回答具有雙重特徵：首先是因為，在他和斯蒂芬妮這段關係中，除了他的一廂情願和美好幻想之外沒有任何實質內容，而他卻能在這種時候，將其拋之腦後；其次是因為，即便他在經過理性反省後意識到了這一點，他也寧可堅持自己的一廂情願，而不是去向真人表白。

後來他向我承認，要想見到斯蒂芬妮，的確存在太多的限制因素，雖然他心裡十分清楚，在沒有預約，彼此不認識而且又是平安夜的情況下，這種突然造訪是不符合禮儀和社會習俗的，而且還可能意味著他們之間關係的終結。但他告訴我說，在來的路上，他碰到了斯蒂芬妮的弟弟理查德，他回林茨過聖誕節。這樣一個不期而遇打消了他的念頭，因為有理查德在場會讓他感到很棘手。我也沒再多問，阿道夫是否在用這種託詞來欺騙自己，或者說是否只是在為自己的行為找一個藉口，這些都不重要。我當然也親眼看見了斯蒂芬妮出現在窗前，而且當時她臉上所表現出的同情也是相當誠懇的。然而我很懷疑，在阿

道夫的特殊裝扮以及當時的特殊情況下，她到底有沒有把他認出來。但我沒有當面對他表達過這種懷疑，因為我知道，那樣做只會撲滅我朋友的最後一個希望。

我能想象1907年的那個平安夜，阿道夫是怎樣度過的。他不願去拉包爾家，這我能夠理解，儘管我邀請過他，但他不願打擾我們這個溫馨小家庭的節日慶祝，這我也能夠理解。我們家的和睦氣氛只會讓他感到更加的孤獨。與阿道夫相比，我感覺我就是命運的寵兒，因為他失去的一切我都仍然擁有：一個供養我的父親，一個愛我的母親和一個隨時為我敞開大門的安定家庭。

但他呢？那個平安夜他該何去何從？他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沒有任何人會敞開懷抱迎接他的到來。對他而言，這個世界充滿了敵意，充滿了空虛。

於是他去了——衝著斯蒂芬妮去了。也就是說——衝著他的夢去了。

後來他告訴我，那個平安夜他在外面閒逛了很久，直至早晨他才回到家裡睡覺。至於他想了些什麼，感受到什麼，遇到了什麼，我無從知曉。

第十四章 「跟我走，庫斯特爾！」

每當阿道夫談起準備去維也納的打算時，他就常常像這樣跟我說著玩兒。但後來，當他意識到自己的話已讓我有所動容的時候，這種想法便在他頭腦中日益加深，他確信我們將一同前往維也納，他讀藝術學院，我讀音樂學院。帶著天馬行空的想象，他為我們今後的生活描繪出了一幅絢麗多彩的圖景，如此清晰而又如此詳盡，以至於讓我都分不清這到底是他一廂情願的幻想，還是真真切切的現實。我覺得從表面上看，這些幻想無不具體可行。當然，在生意上我已駕輕就熟，我的付出和努力不僅讓我的父親感到欣慰，也讓我的顧客們感到滿意。然而每天數小時待在灰塵漫天的工作間，也使我的健康受到了損害，我們的家庭醫生——我的「祕密盟友」——強烈建議我別再繼續從事室內裝潢行業。這意味著我將嘗試選擇音樂作為我的職業。儘管障礙重重，但我這份夙願正在逐步轉變為現實。在林茨，所有要學習的東西我都已經掌握。我的老師也對我投身音樂藝術的決定表示讚許和鼓勵，但這意味著今後我就必須住在維也納。如此一來，我朋友起初那句戲謔之詞「跟我走，庫斯特爾！」就演變成了一種堅決的邀請和一個明確的目標。不過我感覺要是沒有阿道夫的毅然介入，我的保守天性是不會允許我改變職業並前往維也納生活的。

當然，我的朋友主要還是在為自己考慮。因為他對隻身前往維也納抱有一絲恐懼。然而他的第三次維也納之行卻與前兩次大不相同。畢竟以前，他的母親尚在人世，因此儘管他身處異鄉，但那個家，仍然存在。當初他也並不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征程，因為他

知道，無論到了什麼時候，無論遇上何種情況，他的母親都會張開雙臂迎接他的歸來，為他毫無保障的生活提供一個堅實而可靠的物質基礎。如果將他的生活比作一場風暴，那麼他的家就是風暴中心的寧靜之地。而如今，他已無家可歸。前往維也納將是他的最終決定，他毫無迴旋餘地地走上了一條難見天日的道路。去年秋天在維也納度過的幾個月裡，他沒交到任何朋友，也許是他自己不願意吧。他母親的家族裡，有幾個親戚住在維也納，以前阿道夫和他們也曾有過一些聯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初次造訪維也納期間，阿道夫就曾在他的親戚那裡住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就再沒同這些親戚有過來往，甚至也從不提他們。我完全能理解他為什麼迴避這些親戚，因為阿道夫擔心他們會問起他的工作和生活。那時他們肯定就會發現藝術學院已經拒絕了他，而他会忍飢挨餓，飽受苦難，便不再僅僅是需要幫助那麼簡單了。所以，捎上我同他一塊去維也納再合適不過了，因為我不僅是他的朋友，而且還是唯一一個分享了他戀情祕密的人。自從他母親去世以後，阿道夫這句「跟我走，庫斯特爾！」聽上去就變得更像是一個友好的請求。

1908年元旦過後，我和阿道夫一起去祭奠了他的父母。那是寒冬裡一個晴朗的好日子。這一天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白雪覆蓋了所有常見的地標。阿道夫對每一條路線都瞭如指掌，因為這曾是他數年求學的必經之路。

他非常的鎮靜，這種轉變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知道他母親的去世一度讓他情緒失控，甚至在生理上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損耗，致使他接近崩潰。在聖誕節期間，我母親曾邀請他到我們家來吃飯，以便能讓他恢復體力，同時也能讓他暫時避開那所空蕩而冷清的房子，因為裡面的每樣東西都會讓他回憶起他的母親。他確實也來了，但只是嚴肅而安靜地坐在桌前。這可不是個談論他未來打算的好時候。

如今，當他面無表情地走在我旁邊的時候，他看上去比我更顯老成，也比我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他一如往常地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然而令我驚訝的是，在談及這些事情的時候，他表現得如此的超然，就好像是在討論另外一個人一樣。安吉拉告訴他保拉可以跟他們一起生活。她丈夫對此已經表示同意，但拒不接受阿道夫上他們家去，因為阿道夫的失禮行為曾得罪了他。這樣一來，阿道夫便解除了一個最大的擔憂，因為他們家的保拉最終有了一個安定的家庭。而他自己從未想過要尋求拉包爾的救濟。他向安吉拉表達了感激，並且通知她，將父母的所有傢俱留給保拉。葬禮的費用靠她母親的遺產支付。順便提一下，在這之前安吉拉產下一名女嬰，也取名叫安吉拉。阿道夫補充道，他的監護人，萊翁丁鎮長，已經答應為他處理遺產的事情，而且還要幫助他申請一筆孤兒撫卹金。

所有這些聽上去都顯得十分通情達理。而後他開始談到斯蒂芬妮。阿道夫說他已經決定要終止現在這種局面。等到下個時機一出現，他就

會向斯蒂芬妮和她母親進行自我引見，因為在聖誕節期間，這種可能性顯得十分渺茫。他說，是時候將這事兒挑明瞭。

我們走過被白雪覆蓋的村莊。那兒有一座小平房，61號，這裡曾經屬於阿道夫的父親；曾讓他父親引以為豪的一個大蜂箱仍舊擺放在那裡，但現在它已屬於別人。它的旁邊是一塊墓地。他父親的墳墓就靠著東牆，如今他的母親也安葬於此，那塊小小的新冢上蓋滿了雪。阿道夫神情肅穆地站在墳前；他看上去顯得十分沉痛，而眼中卻不含一滴眼淚。他深愛的母親活在了他的心中。我站在他身旁，默默祈禱。

在我們回來的路上，阿道夫跟我講，他可能會在林茨待到1月底，直到房子和遺產得到最終的妥善處理。阿道夫說，他預見到了他和監護人的激烈爭吵。他的監護人當然是想為阿道夫做最好的打算，可如果這種「最好的打算」就是讓他去萊翁丁給一個麵包師當學徒，那對於阿道夫來說，又有何用？

老約瑟夫·邁爾霍費爾是希特勒的監護人，現今年事已高的他仍住在萊翁丁。當然，他曾經常被問起與青年希特勒相處的經歷，以及對他的印象。他總是用一種簡潔而漠不關心的方式來回答所有的問題——起初是敵人，然後是朋友，而後又成了監護他的敵人——不管提問者有何看法，他的回答總是相同。

約瑟夫會說，1908年1月的某一天，希特勒已經長得老高了，深棕色的上嘴唇，聲音低沉，儼然已是個成年人了，他來見他，討論遺產的問題。可希特勒劈頭一句就是：「我又要去維也納了。」所有勸誡他的嘗試都失敗了——一個倔強的小夥子，就像他父親，老希特勒。

約瑟夫·邁爾霍費爾保留著一些重要的相關檔案。阿道夫在監護人的要求下，為自己和他妹妹寫的孤兒撫卹金申請書如下：

尊敬的帝國皇家財政部。以下籤署姓名的兩位在此恭敬地懇請對他們發放孤兒慈善撫卹金。如今，在他們的母親，帝國皇家海關官員的遺孀，於1907年12月21日去世以後，兩個申請人便失去了雙親，而且均系未成年人，他們自己無法獨立生存。兩個申請人分別是：阿道夫·希特勒，生於1889年4月20日，布勞瑙客棧；保拉·希特勒，生於1898年1月21日，菲什瀚，鄰近上奧地利州蘭巴赫，兩名申請人的監護人是約瑟夫·邁爾霍費爾先生，住在萊翁丁，靠近林茨。兩個申請人都定居在林茨。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順便說一下，很明顯，阿道夫幫他妹妹保拉簽署了申請，因為署名處的「希特勒」字樣都向下傾斜，這是他後來典型的簽名方式。除此之外，他還把他妹妹的生日給搞錯了；保拉不是生於1898年，而是生於1896年。

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凡無收入來源的24週歲以下的孤兒，將有資格索要孤兒撫卹金，其金額相當於其母親獲得的遺孀撫卹金的一半，而這條法規只針對國家公務員的子女有效。自從克拉拉夫人的丈夫死後，她每月可獲得100克朗的撫卹金；因此，阿道夫和保拉一共爭取到的撫卹金為每月50克朗，那麼攤下來阿道夫每月就能得到25克朗。當然，這筆錢是不夠他過日子的——他每月都要支付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的房租。

申請得到了批准，第一筆支付款於1908年2月12日發放，那時候阿道夫已經到了維也納。順便提一下，三年後，他為了妹妹保拉，放棄了自己那部分撫卹金，儘管他本可以繼續領取撫卹金，直到他年滿24歲，也就是領到1913年的4月。這份自動棄權宣告日期為1911年5月4日，至今仍儲存在他的監護人約瑟夫·邁爾霍費爾手中。

阿道夫去維也納之前，他還在監護人面前簽署了一份關於財產繼承的檔案，檔案中也提到了他父親留下的共計約700克朗的遺產，以及他應得的部分。很可能他在前兩次的維也納之行中已經花掉了他的一部分遺產，但由於他節儉的生活方式——他預算中唯一的大專案就是書籍——他剩下的錢，至少能幫他在維也納渡過開頭的難關。一想到我們兩個即將前往維也納，我就覺得阿道夫比我幸運，不僅是因為他已有了一些資金和一份固定的月收入，儘管是個小數目——這樣的小數目我仍舊必須和我父母商量——還因為，在戰勝了他的監護人之後，他

能夠隨心所欲地自作決定，不像我，什麼事情都得徵求我父母的同意。再者，移居維也納對我而言意味著我必須放下我的生意，不像阿道夫，或多或少還能夠繼續過他以前的生活。所有這些情況讓我越來越難以下定決心；阿道夫曾一度無法理解這些原因，但在困難的開頭，他還是奮勇當先地挑起了大梁。早在我們的友誼剛開始的時候，當我還只敢想象自己的未來屬於灰塵滿天的傢俱裝潢作坊之時，比我將近小一歲的阿道夫，就已經讓我清晰地意識到，我應該成為一名音樂家。自打將這份信念植入我腦中以後，他就從未放棄過說服我的努力。在我心灰意冷的時候，他安慰我；在我自信將盡的時候，他支撐著我，他讚揚過我，也批評過我，他不時對我蠻橫無理，對我大發雷霆，對我粗暴批評，但他從未放棄他給我規定的目標；如果有時候我們發生激烈爭吵，以至於接近不可挽回的時候，我們會懷著熱忱到劇院觀賞一出表演，以此重敘舊誼。

上帝呀，在這個世界上沒人任何人，甚至連我的母親都不如這般的愛我，瞭解我，沒有人能夠像我朋友這樣讓我心中的祕密願望變得公開，並得以實現，儘管他從未接受過任何系統的音樂培訓。

1907年的冬天，這時候我們店裡的生意比較蕭條，於是我就騰出了更多的時間。我跟一個林茨劇院的作曲家學習和聲學課程。我的學習進展得非常順利，我對此也抱有很高的熱情。不幸的是，在林茨，我學不到關於樂理的其他專業課程，比如旋律配合法，管絃樂作曲法，還

有音樂歷史。這兒連一所教授指揮和作曲的學校的都沒有，更談不上有什麼自由創作的靈感了。只有維也納音樂學院才開設有這種課程；此外，在維也納，我還有機會欣賞到一流的表演和音樂會。

儘管我已打定主意要去維也納，但不像我的朋友，我缺少執行這個計劃的必要決心和一種義無反顧的精神。可阿道夫已經打好了底子。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他已經成功地說服了我的母親讓我開始我的音樂生涯；畢竟，有哪個母親不喜歡聽到自己的兒子能成為一個傑出的指揮家這種預言，尤其當她也是個酷愛音樂之人的時候？如此一來，她很快便成了我們的同盟。另外她對我健康狀況的擔憂也是無可非議的，因為我的肺已經再也經受不住作坊裡的漫天灰塵了。我母親對阿道夫的喜愛猶如克拉拉夫人對我的喜愛一樣，所以，她被爭取了過來，現在，剩下的一切就要看我父親的表態了。倒不是因為他曾公開的反對過我的願望。我的父親與阿道夫的父親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這點我是根據阿道夫對他父親的描述來判定的。我父親向來是沉默寡言，不問世事。他成天就只知道鑽營他的生意，他以前白手起家，成功地熬過了大蕭條，如今他建立起一家口碑頗好且生意興隆的小企業。他評價我的音樂品味叫「毫無用處的淺薄涉獵」，因為他不相信靠這些無用的吹拉彈奏就能換來一個有保障的生活。最後一點，他無法理解，既然我瞭解貧窮困苦的定義，可為什麼甘願為了一個茫然的未來而放棄安定和保障。我經常聽到他說，「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或者苦嘆道，「我這般含辛茹苦是為了啥」。

我開始加倍努力的工作，因為我不想被看作是為了學音樂而懈怠了生意。我父親把我的辛勤工作看成是我想要留下，並且準備在某一天接管他生意的跡象。我母親深知我父親為事業付出的血汗，因此她保持沉默，以免讓我父親生氣。所以在那個時期，當我的音樂人生完全需要仰仗進入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而展開的時候，我們家的勢態便陷入了僵局：我在店裡瘋狂地工作，一句話都不多說。我母親也沒什麼話可說，而我的父親以為我最終還是放棄了計劃，照舊工作。

在此關頭，阿道夫來到了我們家。他一眼便瞧出了其中的玄機，隨後馬上介入了進來。從一開始，他就把我帶回了「狀態」。之前在維也納，他對音樂進修做了詳細的諮詢，現在他將這些資訊準確無誤地傳達給我，他用那種引人入勝的方式告訴我，去歌劇院和音樂會有多麼享受。我母親的想象都被這些生動的描述給激發了出來，所以這樣的決定，就顯得更有必要。然而，阿道夫還必須說服我的父親。

這是一項艱難工作！要是這個老傢俱商無視一切與藝術有關的事物，那他口才再好，又有何用？我父親非常喜歡阿道夫，但畢竟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個輟學的年輕人，自視清高，又不務正業。

我父親曾容忍了我們之間的友誼，但實際上他更希望我找到一個更可靠的夥伴。因此阿道夫就註定處在了一個不怎麼討喜的位置。不料儘管如此，他還是設法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去爭取我父親的同意。如果他們雙方在觀點上發生激烈爭執，我表示完全理解；若當真那樣，阿

道夫簡直就如魚得水了，他會使出渾身解數，打出手中所有的王牌。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的。我根本不記得當時發生過任何的，哪怕是最普通的爭論。阿道夫對待整件事情的表現就好像是無足輕重，無關緊要一樣，他還特別暗示，這個決定完全取決於我父親。他接受了我父親模稜兩可的事實，並給出了一個臨時的解決方法：由於音樂學院的新學年已於去年秋天開始，因此我應該先到維也納四處逛逛，等待選拔。如果培訓機構如期舉辦培訓，那到時候再做最後決定也不遲，但要是沒考上，我可以回家，繼續幫父親做生意。阿道夫，他這樣一個痛恨折中辦法的人，這樣一個總是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的人，竟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如此親和，如此周到，實在出乎我意料。我以前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歡欣喜悅，因為現在我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而且並沒有讓我父親生氣，我母親也為我感到高興。

阿道夫在2月初便返回了維也納。在走之前他告訴我，他的地址仍然沒變，他必須回去繼續支付查克雷斯夫人的房租，叫我來維也納之前及時給他寫信。我幫他提著行李，將他送到了火車站，要是我沒記錯，他一共帶了4個箱子，每一個都相當的沉重。我問他裡面都裝了些什麼，他回答道：「我的全部家當。」幾乎都是書。

到了火車站，阿道夫再次提起了斯蒂芬妮。他說，很不幸，他沒機會跟她說話了，因為他從沒見過她一個人出行。有些話他只能對斯蒂芬妮一人說。「也許我應該給她寫信。」他概括的補充道。但我認為，

這個被首次提出的想法，僅僅是他緩解尷尬的一種表現，或者頂多算是一種拙劣的自我安慰。我的朋友踏上了火車，他站在車窗前向我揮手。當火車啟動時，他朝我喊了一句，「儘快過來，庫斯特爾！」

我的好媽媽已經開始在幫我打點行裝，為我前往偉大而未知的維也納做著積極準備。到最後，就連我父親也想為我幫上點忙；他給我做了一支用鐵箍加固的大木箱，我把我的音樂碟裝在了裡面，我母親用衣服和鞋子填滿了剩餘的空間。

與此同時，阿道夫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日期為1908年2月18日，上面展示的是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的鎧甲收藏；以「親愛的朋友」開頭，這種稱呼形式說明，在他母親去世後，我們之間的友誼產生了質的飛躍。

「親愛的朋友，我焦急地期盼著你到來的訊息。儘快寫信給我，以便我能為你做好一切款待的準備。整個維也納都在等著你，因此你趕快過來。我一定會來迎接你。」在明信片的背面，他寫道：「現在這裡的氣候有所改善，我希望你來的時候也能遇上好天氣。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先住在我這兒。之後我們再作打算。在所謂的‘拍賣大樓’裡，人們只需要花50~60弗羅令就可以買到一架鋼琴。好吧就這樣，衷心地祝福你和你的父母，來自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然後是一句附言「再次請求你，趕快過來。」

在卡片上阿道夫像往常一樣稱我為「古斯塔夫（Gustav）•庫比席克」。有時候他寫成「古斯塔夫」，或者「古斯塔弗（Gustaph）」，他非常不喜歡我的名字，奧古斯特，所以總是叫我「庫斯特爾」，聽上去就更像古斯塔夫而不是奧古斯特。也許他更希望看到我正式把名字給改了。在我的聖徒紀念日那天，他甚至稱呼我為古斯塔夫（8月28日，聖•奧古斯汀節）。我的名字下面是縮寫，「斯塔德（Stud）」。

我記得他喜歡將我稱作「斯塔德瑪斯」。

這張明信片與之前的幾張不同，它顯得更振奮人心。阿道夫的典型情緒反映在貫穿其中的幽默上。他說「整個維也納都在等著你」，而且他意欲為我「做好一切款待的準備」。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儘管他現在前途未卜，但在林茨經歷了他母親去世，那段黑暗而壓抑的日子後，他在維也納感受到了輕鬆和自由。不過，想必他也過得十分孤獨。在卡片上，第一句話裡的「焦急」無疑是認真的。在重申「趕快過來」的邀請時，他甚至用到了「再次請求你，趕快過來」這樣的形式，由此事實可見，他期盼我到來的願望是多麼的強烈。他甚至想用「便宜的鋼琴」這樣的訊息來引誘我，讓我趕快過去。也許他曾暗自擔心，我那優柔寡斷的父親會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

啟程的日子到來。早上我同母親一起去了教堂；儘管我母親毅然地堅持著自己的決定，但我感到我的離去讓她非常痛苦。我猶記得當我父親看見我母親哭泣的時候說過的話，「孩子他媽，我搞不懂你為何如

此沮喪，」他說。「又不是我們逼庫斯特爾離開家，是他自己要走。」我的母親帶著悲傷，在離別之際，一心要給我物質上的享受，她拿給我一塊美味的烤豬肉；還有用來塗在麵包上的黃油，被她裝在了一個特殊容器裡。她給我烤制了一些麵包，塞給我一大塊乳酪，一瓶果醬，還有一罐咖啡。我的棕色帆布袋裡裝滿了食物。

在家裡吃過了告別午餐後，我來到火車站，所有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我父母目送我離去；我父親握住我的手說，「永遠保持一顆正直的心」。我的母親兩眼含淚，親吻了我，當火車啟動時，她在我額頭上做了個畫十字的動作。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總能感覺到母親溫柔的手指在我額頭上畫下十字。

第十五章斯通帕街29號

維也納最初給我的印象是一種熙熙攘攘的感覺。我站在原地，提著沉重的箱子，顯得如此得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往哪兒走。處處人潮湧動！紛亂嘈雜！這簡直太糟了。我差點就轉身上車，打道回府。但冷漠而抱怨的人群卻將我推搡到了檢查口，檢查員和警察就守在那裡，我又輾轉來到候車大廳，四處張望我的朋友。我永遠都會記得阿道夫在維也納對我的初次歡迎。當我站在那兒，依舊被人群的呼喊和擁擠弄得不知所措的時候，我感覺從1英里開外就能辨識出我是個鄉巴佬，

而阿道夫表現得就像是一個已經司空見慣的城市居民。他身穿一件質地上乘的黑色風衣，戴著黑色的圓頂禮帽，手持一根象牙柄手杖，他的現身，幾近優雅。看得出來，他見到我非常的高興，他熱情款款地問候我，並按照當時的習俗，輕吻了我的面頰。

首先是要解決我行李搬運的問題，還得感謝我母親的禮物，這些包簡直太沉了。我正準備尋找一個搬運工，阿道夫一下抓起一個把手就開走，剩下的包袱就交給了我。我們穿過了瑪利亞希爾夫大街——處處車水馬龍，行人穿梭往來，各自奔波忙碌，那可怕的喧鬧聲幾乎讓人們聽不見自己的話音；但弧光燈是如此的令人震撼，以至於把整個廣場都照得跟白天一樣。

很快，阿道夫帶我轉進一條分支路，斯通帕街。我猶記得當時我有多麼高興，這條街既安靜又黑暗。右邊有一座看上去相當漂亮的新房子，阿道夫在它跟前停下了腳步——29號。當時在我眼中，那是一座很氣派的房子，外觀華麗而不同凡響，我甚至覺得，對於我們這樣的年輕人來說，有點好過了。然而阿道夫徑直走了進去，然後穿過了一個小庭院。在庭院的盡頭有一座粗陋的房子。我們爬上昏暗的樓梯來到二樓。這層樓上有幾個房門敞開著——我們的是17號。

阿道夫開啟房門。一股噁心的煤油味衝我迎面招呼了過來，直到現在，這種氣味都還能讓我聯想起那座公寓。我們彷彿走進了一個廚

房，但此事與房東太太無關。阿道夫開啟了第二扇門。在這個小小的棲身之所，一盞煤油燈還亮著。我開始環顧四周。

第一件讓我感到吃驚的事情就是在他桌子上，床上，到處都擺滿了他的繪畫草稿。阿道夫清理了桌子，在上面鋪上了一層報紙，再從窗邊拿來一瓶牛奶。然後又拿出了香腸和麵包。但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我把這些東西推到一旁，開啟了我的揹包時，他的臉色立馬就嚴肅得煞白了。我包裡有冷烤肉、填餡麵包，還有各種美味的食物。他看後只說了一句：「瞧，有媽的孩子像塊寶啊！」我們大快朵頤，簡直堪比皇帝。每樣東西吃起來都有一種家的感覺。

待所有的興奮都散去，我開始整理自己的行李。接下來我將要面對那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斯蒂芬妮。我向他坦白，我已經很久沒去蘭德大街散步了，阿道夫則表示，就算為了他我也應該去。還沒來得及回答，我就聽見有人敲門。一個外表看上去相當滑稽的乾癟小老太溜進了屋。

阿道夫起身，鄭重地介紹了我：「我林茨的朋友，古斯塔夫·庫比席克，他是個學音樂的學生。」「幸會啊，幸會啊，」這個老婦人重複了幾遍，然後告知了她自己的名字：瑪利亞·查克雷斯。從她單一的聲調和特殊的口音中我意識到，查克雷斯夫人不算是真正的維也納人。確切地說，她是維也納人，甚至可能是土生土長的維也納人，但她也許並非出生在赫洛斯或者萊興費爾德，而是出生在斯坦尼斯勞或者諾

維伊欽。我從沒問過，也從不瞭解，畢竟這些都無關緊要。不管怎麼說，查克雷斯夫人是在這個數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唯一同阿道夫和我有過交情的人。

這第一個晚上就弄得我疲憊不堪，我記得阿道夫帶我在城裡四處觀光，一個剛來維也納的人，豈有不參觀歌劇院就上床睡覺之理？於是我就被拽到了歌劇院。那裡的表演尚未結束。我崇拜那巨集偉的門廳，那莊嚴的臺階以及那大理石欄杆，那柔軟而厚實的地毯還有那鍍金裝飾的穹頂天花板。一旦離開了斯通帕街的粗陋住宅，我就感覺好像被傳送到了另一個星球，而這種感覺是如此的令人難以抗拒。

而後我又堅持要去參觀聖•斯蒂芬大教堂的尖塔。我們轉而來到卡特納大街。但傍晚的霧氣如此厚重，以至於讓人們都難以看到教堂的尖塔。我只能看見大部分黑壓壓的教堂正殿，在灰濛濛的霧氣中死氣沉沉地延伸開來，幾乎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彷彿這座建築並非出自人類之手。為了向我展示一些其他不同尋常的事物，阿道夫帶我來到河畔瑪利亞教堂，與體積龐大的聖•斯蒂芬大教堂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精緻的哥特式小教堂。

當我們到家的時候，我們每人還必須支付1便士給那個看門的怪老頭，因為我們叫醒了牠來開啟大門。查克雷斯夫人已經在阿道夫的房間為我打好了地鋪。儘管午夜已過多時，但阿道夫仍舊興奮地說個不停。然而我已經停止了傾聽——這一天的經歷對我來說實在太多了。與家

人分別，母親悲傷的面孔，旅途，抵達目的地，喧鬧聲，熙來攘往的街頭，維也納的斯通帕街，維也納歌劇院——我睏意已濃，閤眼入睡。

當然，我不可能搬進查克雷斯夫人家。因為她那裡的房間太小，無論如何也放不下一架鋼琴。所以第二天早上，等阿道夫終於一覺睡醒的時候，我們便一起出門，為我尋找住處。由於我想住在離我朋友儘可能近的地方，因此起初我們沿著附近的街道四處閒逛。我再次從「另一個角度」瞭解了維也納，這座迷人的城市。陰暗的庭院，窄小的房屋，昏暗的樓道，還有沒完沒了的樓梯。阿道夫付給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我本來也是打算在這兒租一間房，但我發現，10克朗一月的房間簡直太小了，裡面根本放不下一架大鋼琴。而當我們找到一個足夠大的房間時，那女房東又不願意接受彈鋼琴的住戶。

我相當鬱悶，情緒也很低落，而且充滿了思鄉之情。這個維也納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大城市啊？處處皆是冷漠無情之人——在這兒過日子一定特別可怕。我憂心忡忡地同阿道夫漫步在措勒大街。我們又看到一則告示，「房間出租」。我們前去摠響了門鈴，一位衣著整潔的女傭開啟了門，她向我們展示了一間精心佈置過的房間，裡面擺著兩張華麗的單人床。「夫人馬上就來，」女傭說完，行了屈膝禮便轉身離去，我們兩個立刻明白，這對我們來說太奢華了。隨後，「夫人」出

現在了門口，她一個非常講究的女士，不是很年輕，但顯得十分優雅。

她穿著一件絲綢睡袍和一雙毛皮拖鞋。她微笑著向我們打了招呼，然後審視了阿道夫，之後是我，接著她叫我們坐下。我朋友問她哪間房出租。「這間，」她指著那兩張床回答道。阿道夫搖了搖頭，然後簡略地說道：「那麼其中一張床得搬出去，因為我朋友得有地方放置鋼琴。」那位女士明顯有些失望，因為是我租房，而不是阿道夫要租房，於是她問阿道夫是否已經有了住處。當他給予了肯定回答的時候，她建議我把鋼琴搬到阿道夫那兒去，然後我們兩個一起住進這個房間。正當她繪聲繪色地向阿道夫提出建議的時候，突然的一個動作扯掉了她睡袍上的束帶。「噢，不好意思先生們。」那女士大聲呼喊道。接著立刻合攏了睡袍。但那短短的一秒，足以向我們展示出，在她的絲綢外衣下，除了一條簡單的短褲外，她什麼也沒穿。

阿道夫的臉，紅得像朵芍藥，他抓住我的手臂對我說：「過來，庫斯特爾！」

我不記得我們是怎樣走出的房子。我所記得就是，當我們返回到街上的時候，阿道夫猛然大叫道：「好一個波提乏夫人！」顯然，這種經歷也是維也納的一部分。

想必阿道夫也意識到，在這座令人眼花繚亂的城市裡，要找到我的一處棲身之所，談何容易，在我們回去的路上，他建議我們合租一個房間。他會向查克雷斯夫人闡明情況；也許她會在房子裡為我做些安排。

最後他成功地說服了查克雷斯夫人搬到她的小屋，讓我們住進她那個稍大點的屋子。我們同意每月支付她20克朗的房租。她對我彈鋼琴這事兒也毫無異議，因此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個最好的解決辦法了。

次日清晨，當阿道夫還在酣睡的時候，我就隻身前往音樂學院的登記處。我出示了林茨音樂學校給我開出的介紹信，很快就進入了考試。首先是一項發聲測試，然後是一段即興演唱，最後是一項諧調測試。一切進展順利，而後我被叫到行政辦公室，面見了愷撒院長——我感覺自己彷彿當真在受到皇帝的接見一樣，他跟我談了一些關於課程的問題。他建議我去註冊大學校外生，上音樂歷史課。然後他向我介紹了樂隊指揮，古斯塔夫·古特海爾，除了要跟他學習其他東西外，還要學習指揮法的實踐運用。正因如此，我被招進了音樂學院的交響樂隊，擔任中提琴手。所有這一切都來得太快，太直接，拋開最初的慌張，我感覺已是勝券在握。我平時常常從音樂中汲取能量，獲得慰藉；如今，它甚至已經佔據了我的全部生活。我終於逃離了灰塵漫天的傢俱裝潢店，我也終於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藝術當中。

我在附近的利尼恩大街上發現了一家鋼琴店，名叫「菲戈爾」。我察看了一下那裡是否提供樂器租賃；當然，出租的鋼琴談不上品質優秀，但最後我還是找到了一架相對較好的三角鋼琴，我租下了它，每月需支付10克朗租金。阿道夫晚上歸來——我不知道他白天是怎麼過的——他看到大鋼琴後相當驚訝。因為對於我們那樣的小房間而言，放一架豎式鋼琴就比較合適了。但是沒有一架三角鋼琴我怎能成為樂隊指揮呢？誠然，事情並不像我以前想象得那麼簡單。

阿道夫馬上幫我想辦法，將它擺到了一個最好的位置。為了獲得充足的光線，他不得不同意把鋼琴擺在窗戶旁。經過多次嘗試後，房間裡的所有傢俱——兩張床，一口箱子，一個衣櫥，一個臉盆架，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都各自被放到了最佳位置。除了這些，樂器佔據了右窗旁的整片空間。桌子被放到了其他窗戶旁邊。床鋪與鋼琴的距離，以及床鋪與桌子的距離，幾乎一樣，都不到一步寬。對阿道夫來說，能在房間裡來回踱步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彈奏鋼琴對我的意義。他馬上試了一下。從房門走到鋼琴的邊緣——三步！那就夠了，因為三步一個折回，而且他的三步可以當別人六步。阿道夫不停地來回走動，頻繁掉頭，幾乎是在沿著他自己的中心線移動。

從我們房間裡向外望去，只能看見被煤煙燻黑的後牆。只有當你緊靠窗戶，伸直脖子向上望去的時候，你才會看到一小片天空，但即使是這麼微不足道的一片天空，都經常被煙塵或霧氣所籠罩。碰上運氣特

別好的時候，陽光會穿透下來。當然，陽光根本就照不到我們的房子，更別說我們的房間了。但仍有少許陽光，能夠持續幾小時的照在對樓的背部，這也算是對我們的一種補償吧。

我告訴阿道夫，我已經出色地通過了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現在我很高興我可以潛心修學了。阿道夫直言不諱地說道，「我還不知道我有個這麼聰明的朋友。」這話聽上去並不那麼的討喜，但我已經習慣了他這種評說。很明顯他正處在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很容易被激怒，當我開始談論我的學習時，他粗暴地喝止了我。他最終藉助鋼琴穩定了自己的情緒，他聲稱他也懂一點鋼琴。我說我願意教他——但這下我又觸及到了他脆弱的神經。他火冒三丈地衝我咆哮道：「收起你這套垃圾，我自己知道該怎麼做。」之後他又冷靜下來，用一種安撫的口吻對我說道：「我為什麼要當一個音樂家呢，庫斯特爾？畢竟我還有你啊！」

我們的生活近乎拮据，當然，靠我父親每月給我的那點錢是幹不了什麼事兒的。通常在每月月初，阿道夫的監護人就會寄給他一筆錢。我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也許只有25克朗的孤兒撫卹金，而且他還必須立即拿出其中的10克朗付給查克雷斯夫人；如果他的監護人再把他父母的遺產分期拿給他的話，那麼可能還不止。也許他還有親戚的資助，比如，駝背的約翰娜姨媽；但我也不瞭解。我只知道那時，他經常是忍飢挨餓，儘管他不願意向我承認。

阿道夫每日三餐都吃些什麼呢？一瓶牛奶，一個麵包，一些黃油。他常常會買一塊兒罌粟籽蛋糕或者油煎圈餅加在午餐裡。他就是那樣勉強撐過去的。每隔兩個星期我母親會寄給我一個食物包裹，那時我們就可以飽餐一頓。但在錢這方面，阿道夫的確是精打細算。我從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對此他多半是羞於言說吧。有時候，憤怒會讓他釋然許多，他會生氣地叫喊道：「這難道不是狗過的日子嗎？」雖說如此，可當我們又可以上歌劇院看演出，或者去聽音樂會，或者讀一本有趣的書的時候，他就會感到很高興，很滿足。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他是在哪裡吃的午餐。任何有關此事的詢問都會被他故意駁回——這些有什麼好討論的。由於我每天下午都有些空閒時間，所以我時常在吃過午餐後就徑直回家；但我從未看見過阿道夫待在家裡。也許那時他正坐在尼利恩大街的施捨處，因為我在那裡吃過幾頓午飯。不，他不在那兒，我又來到「上帝之眼」（政府辦的廉價食堂），他也不在那兒。晚上當我問他為何從不去施捨處的時候，他對這些象徵著社會階層劃分的可鄙制度發表了鴻篇大論。

作為大學裡的一名通校生，學校允許我在食堂吃飯——當時還是老食堂，因為當時由德國校園協會建立的新食堂還不存在——我就給阿道夫拿了一些便宜的餐券，他最終同意和我一起來吃飯。我深知他喜歡吃甜食，所以，除了主餐外，我還拿了一些糕點。我想他肯定會覺得很享受，因為飢餓就寫在他的臉上，可當他悻悻地狼吞虎嚥過後，卻

惡毒地朝我說道：「我搞不懂，處在這些人當中你怎麼還能如此盡興！」確實，這裡曾聚集了來自整個王國，各個地區的學生，其中還有少數猶太學生。這個因素足以讓他望而止步。但說實話，儘管他很有毅力和決心，可他還是熬不過飢餓。他擠到我旁邊，背朝其他人，餓狼似地吞下了他最愛的油煎圈餅。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我，多次心懷竊喜地看著他，在反猶主義和對油煎圈餅的熱情之間搖擺不定。

接下來好些天，他只能靠牛奶、麵包和黃油過日子。我當然也不是那種被嬌生慣養的孩子，但這樣的生活，我確實吃不消。

我們沒有結交任何朋友。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不允許我將任何時間花在別人身上。我們友誼中的排他性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更明顯。在這方面，他曾直言不諱地斥責過我。

平易近人是我的性格特點，在林茨尚且如此，到了維也納，我更是遊刃有餘。有一天，波斯切蒂教授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問我是否願意在我的專業領域擔當一些教練工作。然後他向我推薦了一些學生。她們分別是克羅米爾的一個啤酒商的兩個女兒，勒德烏齊的一個地主的女兒，還有斯巴拉多的一個商人的女兒。

這些年輕小姐所居住的豪華寓所，與我們那個總是散發著煤油惡臭的貧民窟形成了驚人的反差，這讓我感到沮喪之極。通常在課程結束後，她們會邀請我吃些茶點，內容之豐富，對我來說頂得上一頓正

餐。後來西里西亞獵人村(列支敦斯登)的一個服裝製造商的女兒和阿格拉姆(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的舊名)一個治安官的女兒也加入了進來,組成了一個樂隊,我的六個學生散佈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每個角落。

而後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她們中來自西里西亞的那個女生,發覺自己跟不上功課,完成不了我佈置的那點家庭作業,於是自己找到斯通帕街來尋求我的幫助。當看到這個漂亮的年輕姑娘時,我們可愛的房東老太太調侃似地揚起了眉毛。她想多了,我所關心的確實只是她還不懂的音樂知識,我向老太太解釋道。正當那位姑娘迅速地做著筆記之時,阿道夫進來了。我向我的學生介紹道:「我林茨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一言不發。但在他粗暴地衝我發火之前,那女孩已經出去了——因為自從有了和斯蒂芬妮那段不幸的經歷之後,他開始變得仇視女人。「本來這架大鋼琴,這個怪物,就已經把我們搞得苦不堪言了,難道你還想把我們的房間變成和這幫音樂女子約會的地方嗎?」他火冒三丈地質問道。

我有責任使他相信,那個可憐的女生並不是在享受愛的喜悅,而是在遭受考試的痛苦。結果,他開始發表長篇大論,向我闡述,女人求學,純屬胡扯。他的言語讓我感覺像是遭到了一頓猛擊,彷彿我就是那個把自己的女兒送進音樂學院的服裝製造商,或者那個啤酒生產商。阿道夫對社會的批判越發猛烈。我安靜地畏縮在鋼琴凳上,他憤

怒地踱著三大步來回走動，將無盡的憤怒轉嫁到其他事物上，先是對著門，然後又是對著鋼琴發脾氣。

總的來說，初到維也納這段日子，阿道夫的心理開始變得不平衡了。他會為了一點兒小事就大發雷霆。很多時候，不管我做什麼事情，他都覺得我是錯的，他把我們的生活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但如今，我認識阿道夫已經有三年多了，不管是他學業上的挫敗，還是他母親的去世，總之所有艱難的日子我都陪著他一起熬了過來。我不知道他產生這種極度消沉的情緒是出於什麼原因，但我覺得這種狀況遲早會得到改善。

他同這個世界是對立的。無論他將目光投向何處，他看到的始終是不公平，仇恨和敵意。沒有什麼能倖免於他的批判；沒有什麼能讓他看得過眼。只有音樂還能讓他稍微振作，比如在每個週末，我們到城堡小教堂去聽宗教音樂的時候。在城堡小教堂，人們能夠免費欣賞到來自維也納歌劇院的獨唱表演，以及維也納童聲合唱團的表演。阿道夫特別的喜歡這支童聲合唱團，他無數次地告訴我，以前他在蘭巴赫接受的此類訓練是多麼地令他難忘。但要知道，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的其他童年經歷令他尤為痛苦。

他成天都在忙個不停。我不知道一個藝術學院的學生應該做些什麼。但不管怎麼講，學校開設的課程應該還是多種多樣的；有時候他就坐著看書，一看就是數小時，然後又坐著寫作，直至凌晨；或者有的時

候可以看見，在鋼琴上，桌子上，在他的床上，我的床上，甚至在門上，到處都佈滿了他的設計。而他會站在那裡，神情焦灼地凝視著他的作品，躡手躡腳地在他的畫作之間移動，這兒改動一點，那兒又校正一下，並且總是喃喃自語，用誇張的手勢表達著他內心的激動。如果此時我打擾了他，那我就要倒黴。我對這項複雜而具體的工作感到十分敬重，不管我看見什麼，我都會說喜歡。

當我失去耐心的時候，我會開啟鋼琴，而他會迅速地將這些紙張亂疊到一起，堆進一個壁櫥裡，然後抓起一本書，匆匆前往美泉宮。他在草坪與樹木之間的一處寧靜之地發現了一張長椅，在那兒不會有任何人來打擾他。他在戶外學習中取得的所有進步大都是在這個座位上完成的。我也喜歡這個安靜的地方，置身此地，會讓人們完全忘記自己是處在一個大城市的中心。在之後的一些歲月裡，我經常都來看望這張孤獨的長椅。

看來一個學建築的學生能比一個學音樂的學生，花在戶外的時間更多，工作的獨立性也更強。有一回，當他再次寫作至凌晨之時——醜陋而多煙的小煤油燈幾乎快燃盡，而我依然醒著——我直截了當地問他，工作了這麼久，到底弄出個啥樣的作品。他倉促地遞給我兩張寫有許多潦草文字的紙，作為他對我的回答。我震驚了，上面寫道：

「後景為神山，神山之前，是被參天橡樹所環繞著的獻祭巨石；兩個強壯的戰士擒著一頭將要拿去獻祭的黑色公牛，他們牢牢地拽住牛

角，將這頭野獸那強有力的頭按在獻祭之石的凹槽上。在他們身後，佇立著一位身穿淺色法袍的牧師。他手持一把用來屠宰公牛的長劍。周圍全是神情莊重，留著鬍鬚的男人，他們靠在盾牌上，手執長矛待命，專注的觀看著整個儀式。」

我看不出這種奇怪的描述與建築學之間有什麼關聯，於是我就問他，這究竟是何物。

「一齣戲劇。」阿道夫回答道。

然後，他開始饒有興致地向我描述起各種情節。很不幸，我早已忘記。我只記得那部分故事發生在巴伐利亞山脈，在基督教剛剛興起的時候。山裡的人不願意接受新的信仰。相反，他們被自己的誓言所束縛，屠殺基督教傳教士。這是整個劇本中戲劇衝突的基礎。

我真想問問阿道夫，是不是藝術學院的課餘時間太多，讓他有空去搞戲劇創作，但我知道他對任何與他專業有關的問題都十分敏感。我欣賞他的態度，因為他為了爭取自己的學習機會，肯定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我猜想這就是為何他在這方面顯得特別敏感的原因。雖說如此，但我還是感覺整件事情有點蹊蹺。

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他的情緒也變得越來越讓我擔心。我以前從沒見過他用這種方式折騰自己。相反，在我看來，他是太過瘋狂，而非缺乏自信。但現在看來，事情似乎發生了轉變。他在自我批評中越

陷越深。然而，這一切只需要輕微的一觸碰——就好比當人們開啟電燈開關的時候，所有的一切都變得明亮清晰了——因為他的自責演變成了對時間的譴責，對整個世界的譴責；帶著阻塞在他心中的無限憎恨，他會遷怒於所有的事物，他與那些不理解他，不欣賞他，甚至遭受迫害的普通大眾相對立。我看著他在我面前踱來踱去，在這個狹小的空間內，宣洩著他的無盡怒氣，然後沉浸其中，難以自拔。我坐在鋼琴旁，手指停放在鍵盤上，默默傾聽，被他憎恨的頌歌搞得心煩意亂，然而更多的是為他感到擔憂，因為他面朝空牆的吼叫，只有我這麼一個聽眾，或許還要加上在廚房裡忙活的查克雷斯夫人，但她可能是在擔心，這個已經瘋掉的年輕人是否能夠交出下個月的房租。但他狂熱的言語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人們根本聽不進去。所以，這些偉大展示又有何用？

當這番被憎恨所駕馭的高談闊論，上升到與整個世界相對抗的時候，他猛然的一句話才向我揭示出，他的身軀已在萬丈深淵旁搖搖欲墜。

「我應該放棄斯蒂芬妮。」這是他能講出的最糟糕的話，因為只有斯蒂芬妮是與普天之下，所有的醜惡人類都有所區別的生物——她，讓阿道夫熾熱的愛戀得以寄託，給了他飽受折磨的人生以意義和目的。他的父親死了，母親也死了，他唯一的妹妹還是個小孩兒，他還剩下什麼呢？他沒有家庭，沒有房子；他只有愛，只有斯蒂芬妮在他遭受所有苦難的時候，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雖然只是他的想象。直到

現在，這種想象還在發揮著足夠強大的作用。但很明顯，在目前這樣的精神抽搖中，即使是這份堅定的信念也支離破碎了。

「我還以為你準備給她寫信呢？」我插了一句，意在用這種建議來幫助他。

他用一個極不耐煩的手勢表達了對我的漠視（直到40年後我才瞭解到，他當時真的給她寫過信），然後對我說了一席我從未聽他講過的話：

「只有瘋子才會等她。那個媽媽肯定已經為斯蒂芬妮挑好了她要嫁的人。愛情？她們才不會管有沒有愛情。找個條件好的，就這麼簡單。而我是個條件差的，至少在那個媽媽的眼中是這樣。」

接著他就對那位「媽媽」進行了一陣猛烈地嘲諷，外帶那些上流圈子裡的每一個人，還有那些為了繼續享受不當的社會權利，而對婚姻做出精明安排的人。

這鋼琴簡直彈不下去了，於是我躺到了床上，不一會兒，阿道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他的書上。我猶記得當時我多麼的驚愕。要是阿道夫已不再對斯蒂芬妮有一絲眷戀，那麼他會變成什麼樣。

我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我很高興能看到他從這段毫無希望的戀情中解脫出來，而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斯蒂芬妮是他唯一的理想人選，

也是唯一能給他帶來前進動力和生活目標的人。

第二天，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們之間發生了一場尖銳的爭吵。我得練習鋼琴，而阿道夫卻想要朗讀。因為外面下著雨，他無法到美泉宮去。

「這種無休止的彈奏，」他衝我吼道，「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很簡單，」我回答道，然後起身從我的音樂箱裡拿出一張時間表，用圖釘將其固定在了壁櫥的門上。這種做法對我們彼此都有利。我清楚地知道我什麼時候該外出，什麼時候不外出，而眼下正好是我練習鋼琴的時間。「那麼現在，把你的時間表掛在下面。」我補充道。時間表！他才用不著這些東西呢。他的時間表裝在他的腦子裡。他涉獵的領域繁多，但都很系統化。平常他幾乎只在晚上工作，到了白天就睡覺。

我很快就適應了音樂學院的生活，我的老師們對我的工作也感到滿意——他們為我提供了全職教學，從這點就能看得出來，還不是一般的滿意。當然，我對此引以為豪，甚至有點驕傲自滿。音樂這門藝術看起來似乎與以前的教育關係不大。所以我既愉快又滿足，每天早上我都高高興興地起身前往音樂學院。但正是這份成竹在胸的感覺，這種志在必得的自信，讓阿道夫在苦惱的對比中難以入眠，儘管他從不提及。

所以現在，貼在牆上的那張時間表，想必在他眼中就變成了一張我未來保障的官方認定書，而這，引發了一場大爆炸。

「這座學校，」他叫喊道，「有太多思想僵化的老公務員、老官僚，有太多愚昧無知的弱智官員。整個學校就應該被炸掉！」他的臉色烏青，嘴巴緊合，嘴脣幾近慘白，但他的眼睛裡閃爍著光芒。眼神裡透露著凶煞之氣，彷彿所有的憎恨都貯藏在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裡！

我正準備指出，那些在他盛怒之下，被草率定性的人，畢竟都是他的老師和教授，他們多少都給他傳授過一些知識。可是他先發制人。

「他們拒絕了我，他們排斥了我，他們拋棄了我！」

我被震驚了。原來這就是真相。阿道夫根本沒有被藝術學院錄取。此時，關於阿道夫那些令我困惑的問題得到了充分的解答。

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他的不幸，我問他是否把這件事情告訴過他母親。

「你腦子裡在想啥？」他反詰道，「我怎能讓處在彌留之際的母親承受這份擔憂呢？」

沒辦法，我只好認同。

我們彼此沉默了很久。也許那時候，阿道夫想起了自己的母親。然後，我試圖將對話拉回到現實中。

「那現在怎麼辦？」我問他。

「現在怎麼辦，怎麼辦？」他暴躁地重複著，「你又來了是不是——還怎麼辦？」

對於這種問題，想必他已經無數次地問過自己，因為他肯定沒跟任何人談論過這件事情。

「現在怎麼辦？」他再次嘲弄著我焦慮的疑問，而不是正面回答。他坐在桌旁，周圍全是書。「現在怎麼辦？」

他挑了挑油燈，抽出一本書，開始閱讀。我只好去摘下貼在壁櫥上的時間表。他抬起頭，看見了我的舉動，平靜地說了一句，「沒關係」。

第十六章希特勒改革社會的夢想

當我們乘坐馬車，從美泉宮穿過瑪利亞希勒夫大街駛向霍夫堡的時候，我們經常看見身著節慶制服的老皇帝。碰上這種情況，阿道夫並不會耽擱許久，而且事後他也不會提及。因為皇帝僅僅是奧匈帝國的一個象徵，所以阿道夫對他不感興趣。

反差和對比鞏固了我對維也納生活的記憶，使我一直銘刻於心。在動盪的1908年期間，有兩個政治事件激起了民眾的不安情緒。

一件是皇帝的鑽石婚紀念。弗朗茨·約瑟夫於1848年登基，他在位期間，整個國家長期處於和平狀態。從1866年開始，奧地利42年都沒有捲入過任何一場戰爭。只有很少一部分老兵才知曉柯尼格拉茨會戰，或者庫斯圖薩戰役。因而老百姓將皇帝視作和平的捍衛者，他們熱情高漲，著手準備著慶典。

另一件是併吞波斯尼亞，這項裁定同鑽石婚紀念有關，它激起了民眾的憤怒。對外擴張只能表明這個國家內部的虛弱，很快，處處都瀰漫著火藥味。事實上，1914年的薩拉熱窩事件早在6年前就很有可能發生。所以說那場戰爭（1914—1918）的爆發也絕非偶然。

那時候，生活在我們兩個無名小卒周圍的維也納人，在對老皇帝的忠誠與對戰爭的恐懼之間左右為難。

我們注意到，每個地方的階級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社會底層人口數量龐大，他們經常是食不果腹，住在沒有陽光的低劣公寓裡。鑑於我們自己的居住環境，毋庸置疑，我們也屬於這一類人。對我們來說，根本就沒有必要跑到外面去體驗這座城市諸多的苦難與悲慘——這種不幸就發生在我們自己家裡。那潮溼而成塊剝落的牆壁，蟲洞滿布的傢俱，還有臭氣熏天的煤油味，都是生活在我們周圍，數以萬計老百

姓的典型寫照。當我們空著肚子來到市中心的時候，我們看見衣著講究的公務員出入於富麗堂皇的高階公寓，以及維也納上流社會的奢華酒店——舊貴族、工商界領袖、地主、富豪——極其鋪張地舉辦著各式宴會；一面是飢餓與窮困潦倒，另一面卻是不計成本的享樂、縱慾和無度的揮霍。

我是因為太過想家，而無暇對這些社會反差發表政見。但阿道夫呢，無家可歸，又被學校拒收，社會地位卑微，又根本沒有任何逆轉的機會，在這一時期，他的反叛情緒達到了頂點。這個社會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讓他飽受其苦，同時也激起了他對我們周圍，那些大肆斂取不義之財的驕橫之人的極端憎恨。只有通過對國家事務的猛烈抨擊，他才能夠容忍自己那「狗一樣的生活」。不可否認，導致他現狀的原因，大部分應該歸結於他自身的錯誤；但這一點，他永遠不會承認。比飢餓更讓他難以忍受的是缺乏個人衛生，因為他的身體對一切事物的敏感幾近病態。無論怎樣，他都會讓自己的床單和衣服保持整潔。要是在街上看見這個穿著講究的年輕人，你斷然不會想到，他每天都忍饑受餓，還住在第六區一處令人絕望而且蟲滿為患的偏室裡。周圍的環境衛生極度惡劣，雖然他是被迫居住於此，但這才是激起他反對社會普遍現狀的真正原因，而非缺少食物。這座古老的皇城，成了社會輿論和政治觀點生長的沃土，那種虛假的城市魅力以及浪漫情調正顯示出它內部的腐朽與衰敗。希特勒後來所擁有的一切，均得益於這座行將就木的帝國之都——維也納。儘管他後來這樣寫道：「以‘吃忘

憂樹的人’來命名的這座城市，對我而言意味著5年的苦難與窘迫。」此番言論只顯示出他這段經歷的消極面。而積極的一面是，他在不斷反抗現行社會秩序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而這些觀點在後來的歲月裡，幾乎沒怎麼發展。

儘管他對勞苦大眾極富同情心，但他從未直接接觸過帝國首都的本地居民。他很不喜歡土生土長的維也納人。從一開始，他就無法忍受他們那種悅耳卻又綿纏的口音，相比而言，他倒更喜歡查克雷斯夫人操的一口笨拙的德語。除此之外，他還討厭維也納人的唯唯諾諾和冷言少語，他們似乎永遠都是得過且過，放任自流，並且做事不計後果，目光短淺。而阿道夫的性格正好與之相反。我至今還記得，阿道夫總是不苟言笑，僅是因為他不喜歡和人們發生肢體接觸；但所有的事情又使他的內心躁動不安，並驅策著他想出一些徹底而全面的解決辦法。對於維也納人嗜酒這一特點，他是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而且對此相當鄙視！我們只去過一次普拉特的「開心花園」，而且還是出於好奇。他不明白人們為何要把自己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無聊的事情上。當他從觀看雜耍表演的人堆裡，聽到嬉笑吵鬧聲之時，他會搖頭嘆息，心中充滿了對這些愚蠢行為的憤慨，而且還問我能否理解他們在幹什麼。他覺得這些人肯定是在嘲笑他們自己，對此他深表理解。另外，他還十分厭惡維也納人中的混雜人群，捷克人、馬扎爾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義大利人，鬼知道還有其他什麼人混雜在普拉特。對他來說，普拉特簡直就是一座維也納的巴別

塔。他有一個奇特的矛盾點一直讓我著迷：他所有的想法和抱負都圍繞著這個問題而展開，即怎樣幫助眾多普通而無辜的社會底層人民——這也是他對自身狀況的定義——他們無時無刻不浮現在他的腦海中。但事實上，他又總是避免和這些人接觸。普拉特人群混雜，讓他深感厭惡。

另一方面，他同樣對統治階級的傲慢和自負相當牴觸，他也明白，在那時候，人們更指望不上那些，因被排擠而變得冷漠和消極的先進知識分子。人們開始意識到，哈布斯堡王朝已是窮途末路，氣數將盡。但在那些對傳統君主制極力擁護的人群中，他們一度信奉著一種宿命論，對身邊發生的所有事情總是逆來順受，就像維也納人通常說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又何必強求」。這種苦樂參半而又聽天由命式的語氣同樣也在維也納的詩歌中盛行。比如詩人里爾克、霍夫曼斯塔爾、瓦爾德甘斯——這些我們聞所未聞的名字，不是因為我們缺少對詩歌的鑑賞力，而是因為這些詩作的表達手法對我們來說很陌生；我們來自鄉下，比鎮民還要樸實。此外，我們是與那些逆來順受之人不同的一代人。當這種令人絕望的社會狀況在老一代人中間產生的時候，他們竟然無動於衷，這就迫使年輕的一代陷入到種族批判的狂熱之中。同樣，阿道夫也意識到了批判與反擊的迫切性。他從不知道什麼叫作順從。他認為順從只能讓他喪失生存的權利。但他似乎又讓自己脫離了同時期的人群，這些人在當時顯得既傲慢又無序，阿道夫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絕加入當時存立的任何政黨。儘管他總是對周圍

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抱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但他卻總是獨來獨往，堅定地依靠自己去實現他的目標。

還有件事情我應該提一下——阿道夫拜訪過梅德林區的工人階級。儘管他從沒跟我講過，他為什麼要到那裡去，但我知道他是想獨自去研究工人家庭的住房與生活狀況。他對任何單獨的個體都不感興趣；他只是想了解一個階級的整體情況。因此他在梅德林並沒有熟人，他的目的是客觀地從一個橫面去研究整個社會。

儘管他儘量避免與別人進行私下接觸，但他卻越發地喜歡上了維也納這座城市；即便其他人都不存在，他照樣可以活得高高興興，但前提是絕不能離開這座城市。怪不得後來他在維也納認識的幾個人都覺得他是一隻孤狼，一個怪癖之人，他們把阿道夫精美的演講、高貴的舉止還有優雅的談吐，看成是一種為了掩飾自己窮迫狀況的矯揉造作或者傲慢自負的表現。實際上，年輕的希特勒在維也納並沒有朋友。

他越發的熱愛維也納的建築，就拿環城大道來講！當阿道夫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那聳立的高大建築，讓他彷彿覺得自己那些膽大的藝術夢想竟成為了現實，他花了好長的時間才從這種揮之不去的幻覺中清醒過來。漸漸地，他才從這些摩登建築展覽中找到了自我。我經常陪他去戒指路散步。那時候他會詳盡地為我描述這樣或那樣的建築，指出確切的細節，或者給我解釋它的構造原理。他當真會花上數小時，站在一幢建築物面前。他忘卻了時間，更忘卻了周圍的一切。我對他

這種長時間的駐留和複雜的審視簡直無法理解；畢竟，這些東西他之前都看過，而且已經比大多數的本地人都還更瞭解。當我偶爾失去耐心的時候，他便粗魯地對我咆哮，還問我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是，我就應該分享他的興趣。然後他又繼續沉浸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回到家裡，他會給我繪製平面圖、剖面圖，或者進一步詳述某些有趣的細節。他借來許多關於各種建築興建始末的書籍，例如皇家歌劇院、國會大廈、城堡劇院、卡爾斯大教堂、霍夫博物館、市政大廳；他帶回家的書是越來越多，其中還有一本大眾建築手冊。他向我展示了不同的建築風格，而且還特別為我指出，環城大道那些建築中的某些細節部分，顯示出了當地工匠十分高超的技術水平。

他對建築的研究並不止於它們的外觀。他對某些建築的偏門、樓梯，甚至是後門和一些鮮為人知的通道都瞭如指掌，這一度令我感到相當驚訝。他從任何方向都能進入一棟建築；他最討厭那種為了掩飾某些佈局的缺陷而把外觀修建得金碧輝煌的建築。美麗的外觀永遠都靠不住。他認為石膏是一種下等材料，任何一個建築師都不應該使用這種材料。所有的一切都瞞不過他的法眼，他時常會為我指出一些旨在營造視覺效果，卻華而不實的建築。這樣一來，戒指路便成為了他論證自己觀點和考量自己建築學識的一個參照實體。

與此同時，他的大型廣場重建計劃也已經初步成形。我清晰地記得他的闡述，比如，他把霍夫堡皇宮與大眾公園之間的英雄廣場視為一處

群眾集會的理想之地，不僅是因為與之毗連的環形建築包圍著集會的群眾，形成得天獨厚之勢，還因為人群中的一個人無論從哪個方向望去，都會感受到一種如史詩般的震撼效果。我覺得這些言論屬於閒著沒事兒的異想天開，可儘管如此，我總是不得不參與到此類體驗中。施瓦曾伯格廣場也深受阿道夫的青睞。有時在皇家歌劇院的演出間隙，我們會來到施瓦曾伯格廣場，於暮色之中欣賞那如夢如幻的燈光噴泉。那樣的壯觀場面，令我們無比滿意。佈滿泡沫的水花不斷升起，在各種聚光燈的照射下交替呈現出紅、黃、藍三色。色彩與水體的運動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效果。為整個廣場增添了一分超凡脫俗的感覺。

誠然,受到戒指路建築風格感染的阿道夫，也對維也納的大型工程頗感興趣，如音樂大廳、劇院、博物館、宮殿、展覽館。可是漸漸的，他的規劃設計風格也在改變。首先，這些雄偉的建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顯得如此完美，以至連思維廣闊的阿道夫都找不出任何改善的理由。其次，在這方面，林茨與之大不相同。他曾對自己在林茨見過的每樣建築都感到很不滿意，比如像老城堡，還有其他一大堆建築。所以，難怪他要為林茨設計一座更莊嚴的新市政大廳，因為老市政廳夾在主廣場的樓群中間，顯得相當狹小，也不那麼雄偉；而到最後，當我們的散步結束時，他已經把整個城鎮翻修了個遍。維也納則不同，不僅因為給這麼大一個城市構想一個合乎比例的單位對他來說具有難度，而且還因為隨著他政治認識的增長，他開始越發地意識到，維護公眾

健康與建造適宜居所的必要性。在林茨，他從來就沒有考慮過，人們會對這些工程有怎樣的反應，也沒考慮過他的大型工程是否會對民眾造成影響。然而到了維也納，他開始為了人民而建造。他在深夜長談中為我解釋的一切、描繪的一切、計劃的一切，都不再像以前那樣，為了建造而建造，而是把居住者的需求和願望放在首位，做出認真而負責的計劃。在林茨，那些都是純粹的理想建築，而到了維也納，它們成了社會建築；這就是他的進步所在。這樣的事實基於一個外部因素，那就是阿道夫以前在林茨過得相當安逸，尤其是在烏爾法爾的農舍。而現在恰恰相反，住在維也納斯通帕街一間晦暗的偏室，直到現在，當他每天早上醒來，一看到那空白的牆壁和這慘淡的景象，他就會感到，建築的意義並不在於賣弄和炫耀，而是一個關乎大眾健康的問題，或者更進一步說，是一個怎樣讓貧困人群脫離苦海的問題。

「戒指路的宮殿旁，徘徊著成千上萬的無業遊民，舊奧地利的凱旋大道下，無家可歸之人蜷縮在泥濘的管道中。」希特勒用這些文字在《我的奮鬥》中宣稱自己態度的改變。從對皇家建築的崇拜，到對社會悲劇的沉思。「至今一想到這些悲慘的鐵皮棚，擁擠的膳宿公寓，密集的人群，想到這個絕望、汙穢、充滿憤怒的陰暗畫面，我不由得全身顫抖。」

阿道夫告訴我，去年冬天，當他還是獨自一人在維也納生活的時候，為了節省燃料，他就經常跑到公共休息室去取暖，因為他那個不爭氣

的火爐總是消耗甚多，散熱甚少。而在公共休息室，人們可以免費取暖，還有大量報紙可供閱讀。我猜測阿道夫在同那些常客的交談中，對這座大都市那令人憤慨的住房條件，有了初步的直觀瞭解。

在我們找尋住處，也就是我即將入住維也納的時候，我曾有過一種預感，我感到在前方不遠處，等待我們的將是苦難，窘迫與汙濁。穿過陰暗而臭氣難擋的庭院，上上下下的樓梯，汙穢骯髒的走廊；經過一家老小擠在一堆且昏黑無光的狹小房間，當地的人們如同周遭的環境一般，顯得腐朽而糜爛——此情此景仍然使我無法忘記，同樣，還有另外一個極端，在一所看似合乎我們居住標準的房子裡，我們見識到了邪惡的極點，妖媚的「波提乏夫人」，在我們看來她遠不如那些窮苦大眾。從那以後，阿道夫每日每夜都會在房門與鋼琴之間沒完沒了地來回踱步，用強有力的說辭，為我闡釋著這種邋遢的居住環境的成因。

他從我們兩個的住處開始說起。在一塊巴掌大的地方，竟然堆起三座建築，每個人都不同程度的侵佔了別人的電力、空氣，還有生活空間。

「這是為何？因為買下這塊土地的人想要儘可能的獲取最大利益。所以他必須將房子修得儘量的緊湊，儘量的高。整座公寓就像是一個被隔開的大盒子，把人們一個一個地向上堆疊，壘得越高，他獲利就越大。承租人從他們那裡得到房子後，必須使之物有所值，因此會轉租

一些房間出去，通常都是把最好的房間租給別人；就比如像我們善良的查克雷斯夫人。而為了將可用房間提供給其他租客，承租人又只好擠在一塊住。所以每個人都想從他人身上獲取利益，結果是，除了房東以外，所有的人都沒有足夠的生活空間。把地下室當房子出租，同樣是個醜陋的現象，那裡沒有照明設施，沒有陽光，空氣也不流通。如果對成年人而言算是難以忍受的話，那麼對兒童來講，將是致命的。」

在對房地產投機者和開發商的猛烈聲討中，阿道夫結束了他的演講。他有句話至今還在我耳畔縈繞，其中有個詞我當時還是頭一回聽到：這些依靠人們糟糕的居住狀況為生的「職業房東」。那些可憐的租客在一般情況下是絕對見不到房東的，因為房東不會住在這些公寓中——但願不要發生這種事——他們住在希青或者格林津郊區的某個奢華別墅裡，享受著從別人身上榨取來的財富。

有時候阿道夫會站在承租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對這些可憐的窮鬼來說，一個像樣住所的最低要求是什麼？光線——每個房屋必須有獨立的窗戶。必須有為兒童修建的花園和運動場。空氣——必須要看得見天空；還要有一些綠化，一小片自然景色。可是，看看我們住的這棟樓，他說道。陽光只能夠照在房頂上。通風——簡直可以不用說了。水源——一個簡單的水龍頭支在外面，8戶人家只能提著桶拿著罐子到

這兒接水。整個一層樓共用一個極其骯髒的廁所，連大小便都要排隊。最要命的是，臭蟲滿天飛！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這時候我已經知曉阿道夫被學校拒絕了——我不時會問他白天去了哪裡，因為他會回答道：「我正致力解決維也納的住房問題，為此我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所以我常常得四處走訪。」

那些日子，他經常整夜地凝視著他的設計和畫作，但從不對此發表任何言論，而我也沒有過多追問。可是，大概到了3月底的時候，他突然宣佈：「我要離開3天。」

第四天，他疲憊不堪地回來了。至於他去了哪裡，在哪兒睡的，餓到了啥程度，恐怕只有老天爺知道！從他輕描淡寫的敘述中，我推斷他去了維也納幾個較偏遠的地方，也許他到過施托克勞或者馬希費爾德，去考察當地是否有可用的土地來幫助緩解城市的人口擁擠。接著他又挑燈夜戰，直至天明。最終，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成果。首先，是一些簡易的平面圖——帶有最低設施配備的工人公寓：廚房、客廳、父母和小孩的單獨臥室、廚房的自來水、衛生間，並且還有一樣在當時聞所未聞的新設施——浴室。然後阿道夫又向我展示了他用印度墨水工筆繪製的各種房屋戶型的草圖。這些草圖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為一連好幾個星期它們都掛在我們家的牆上，而且阿道夫還樂此不疲地為我反覆講解這些工程。從我們吹不著風，見不到光的生

存現狀中，我意識到我們周邊的環境與阿道夫想象中，那種光照通風條件極好的房子形成了越發強烈的反差。因為，只要我的眼神從這些漂亮的草圖上稍微一遊離，我就會看見那堵胡亂刷成，並已開始剝落的牆壁，而且上面還殘留著我們在夜間撲殺臭蟲後留下的痕跡。這種鮮明的反差使我朋友的巨集偉計劃，不可磨滅地刻在了我的記憶中。

「廉租公寓將被摧毀。」帶著簡單的宣告，阿道夫開始了他的工作。要是他用別的辦法我反倒會感到驚訝，因為他在擬定每個計劃的時候都會傾盡全力，把事情做到極致，他最憎惡的就是那種權宜之計或者折中的辦法——生活導致了這種無奈。但他的任務是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去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個人投機倒把行為將被禁止。隨著工人區的拆除，多瑙河沿岸一帶將增加一片開放式的休閒區域，寬闊的道路將貫穿其中。大型建築區域將由鐵道網路連線。分散在城區內的各個與之匹配的站點，將取代大型的火車站，與城鎮中心相連線的是一些當地的小型車站，這些小型車站為固定的區域服務，為人們上下班提供舒適而迅捷的交通。汽車在當時還難以被設想成一種重要的交通工具。維也納的街道仍然是出租馬車的天下。而騎自行車只是慢慢成為了一種廉價而實用的旅行方式。在那時候，唯有火車才能夠提供大批量的運輸。

在阿道夫的設計中，他的關注點絕非片面而單一。但像今天修建的那種家庭型住宅，或者業主私有型住宅，也並不是他中意的「解決辦

法」。他的構想仍然基於老式的經濟公寓住宅，一棟多戶型。這樣就衍生出了他那種最小容納四戶人家的房子，兩層樓，結構均勻，底樓和二樓各兩套住房。這種基本單位是比較普遍的型別。要是情況需要，還可以將4~8個這種基本單元，結合成一座能容納8戶或者16戶家庭的公寓大樓，但是這種公寓大樓也得保持「與地面接近」，也就是說，它們仍然是兩層樓，只不過橫向組成。周圍佈置的是花園，操場，還有成片的樹木。16戶人家的樓房就是極限了。

設計完用來緩解城鎮人口擁擠的必要住宅之後，現在我的朋友就能夠將注意力轉向問題的本身了。阿道夫拿出了一幅大型城市地圖，這幅地圖大得在桌上都鋪陳不開，因此只得將它在鋼琴上展開，他在地圖上設定了鐵路網和公路。工業中心被標註了出來，住宅區也被合理地劃分了出來。在他專注於這些浩大工程的時候，我都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的確，為了這項任務，他將房間內的每一平米都利用了起來。若不是見阿道夫在此事上下了這麼大的決心，我會把整件事情看成是一種有趣而又愚蠢的消遣。事實上，我是對我們糟糕的居住條件太過失望，以至於幾乎變得和我朋友一樣的狂熱，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細節仍然保留在我記憶中的確切原因。

阿道夫以他自己的方式思考著一切。我仍舊記得一度糾結於這樣一個問題：在他的新維也納裡，還有沒有必要讓酒館存在？如同對尼古丁的看法一樣，阿道夫對酒精也持堅決地反對態度。如果人們既不抽菸

也不喝酒，那為何還要到酒館去呢？總之，他為這個新維也納找了一種解決辦法，這個徹底而大膽的辦法就是：用一種新式飲料代替酒！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到林茨弗蘭克公司的辦公大樓去翻修幾個房間，那家公司專門生產一種咖啡替代飲料。阿道夫到那裡來看我。公司為每個工人提供一種極為可口的冰鎮飲料，一杯只要1赫勒（奧地利青銅幣）。阿道夫對這種飲料非常滿意，以至於數次反覆提及。他說，如果能向每個家庭供應這種廉價而有益健康的飲料，或者類似的不含酒精的飲料，那麼人們就能告別酒館。當我告誡他道，據我對維也納人的瞭解，他們是不大可能戒酒的，這時候他便粗魯地回答道，「沒人會要你參與！」似乎言下之意就是，維也納人也不會讓我參與。

阿道夫尤其反對那些建立了菸草壟斷的國家，而奧地利便是其中之一。他義正詞嚴地講道，照此下去，這個國家的生命與健康將葬送在自己手上；因此必須要關閉菸草製造廠，並且禁止進口菸草、雪茄以及香菸。但是，與他的「人民的飲料」情況不同，他並沒有找到一種菸草的替代品。

總而言之，阿道夫越是將自己的想象摻入到對這項工程的認識中，他的整個事業就越發地接近烏托邦。只要不違背他計劃的基本原則，一切事務都合乎情理；可是，當他想出了計劃實施的細節之後，阿道夫又隱瞞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因而弄得我完全是一頭霧水。在我父親掙來的血汗錢，為這個臭蟲滿天的屋子付清了我應承擔的10克朗房租

之後，我變得越來越同情阿道夫的想法——在他的新維也納裡，將不再有地主、房東和租客的存在。土地將收歸國有。房屋住宅將不再成為私有財產，而是由某種房屋合作社管理。人們將不再繳納房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房屋土建成本的供款，或者是一種房屋稅。到目前為止我姑且還能與之為伍。可當我膽怯地問道，「是不錯，但照這樣做的話，你是無法承擔如此昂貴的建築成本的。誰來為這些工程埋單呢？」此語一出，立即招致了他最猛烈的反擊。已陷入狂怒的阿道夫粗暴地迴應著我，而我也只好似懂非懂地招架著。但他的解釋我幾乎已不記得，反正大多都是些十分抽象的概念。倒是他慣用的感情表達方式還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它們越無實際意義就越讓我印象深刻。

整個工程的核心問題尚待解決，正如阿道夫自己的形容「處在革命風暴之中」。這種呆板的措辭，首次出現的場合是在我們破舊不堪的住所中。我不知道阿道夫這些語句是不是從他大量的閱讀中撿取的。儘管他從未刻意地停下來解釋，可不管怎樣，每當他奔逸的思維將要陷入停滯的時候，這句豪邁的「革命風暴」總會給他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我發現這句話要麼「囊括一切」，要麼就「毫無意義」。對阿道夫而言，它的意義「囊括一切」，而對我來說，它就是「毫無意義」。直到阿道夫用他那具有催眠效果的口才，對我進行了一番引導和勸誡之後，我才最終相信，僅僅需要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便可打破那個陳腐的舊世界，而後，在他心中醞釀已久的巨集偉計劃便得以實現。就好比一場夏末的和風細雨讓遍地的蘑菇破土而出。

另外一個總是反覆出現的表達是「德意志理想國」，這與「帝國」一詞均出自一個概念，同為他思想的主旨。這個「理想國」從基本原則上說是國家與社會的統一，而社會主要是就工人階層的勞苦大眾而言。阿道夫越發認真地想要在我們這個時代打造一個按需分配的國度。但是，這仍然是個十分朦朧的構想，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讀之書的影響和約束。如此一來，他便選擇了這樣的措辭，「理想國」——好像是從他諸多書籍中的一本上讀到的——理想國的細部將留給後世去發展和建立，而他只是暫且勾勒出一個大概的輪廓，當然，「帝國」才是他的終極目標。

阿道夫首次採用的第三種措辭也與他大膽的建築工程有關，並且已經成了當時的一種不成文的準則：「社會改革」。這種措辭也包含了他頭腦中許多尚未成形的思想和認識。但通過對政治文獻的殷切學習以及對國會大廈的數次造訪（我也被拽了去），他漸漸為「社會改革」這個詞增添了一種具體而切實的意義。

有朝一日，當革命風暴襲來，理想之國誕生，被遲遲延誤的社會改革就將成為現實。這一刻的到來，意味著「職業房東」們的廉租公寓將被拆毀，而全新的現代住宅將在努斯多夫後面那片美麗的草地上拔地而起。

我一直以來老想著我朋友的計劃，因為我把它們看成是阿道夫在維也納旅居期間，性格與思想發展的典型寫照。誠然，我從一開始就意識

到，我的朋友是不會對勞苦大眾坐視不理的，因為我知道他斷然不會對任何事情置若罔聞，況且，無視重要現象的做法也有悖於他的天性。然而我從不曾想到，在維也納郊區的經歷會如此強烈地喚起他的整個人格。因為我一直認為，我的朋友從本質上說是一名藝術家，在面對絕望無助的勞苦大眾時，如果他感到憤怒，那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他卻依舊對此擺出一副冷漠之態，就好像自己還沒被這座城市給拖下深淵。我思忖著他的敏感，他的唯美主義，還有他一直以來，對跟陌生人發生肢體接觸的恐懼——那時他很少跟別人握手，次數屈指可數——我認為這種做法足以使他與民眾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僅限於他在個人交際上的態度。然而在他情感豐富的內心深處，他永遠的與下層人民站在了一道。這並不是同情，而是出於直觀判斷，他感到自己被剝奪了人身權利。這些還不止。他不僅與民眾一起承受著苦難的折磨，而且他還殫精竭慮地想要把這些人民從貧困和不幸中解救出來，他正是為了這些勞苦大眾而活。毫無疑問，這種想要重塑新生活的強烈願望，是他肩負的責任和使命，而這也導致了他一步一步地陷入困窘之境。只有通過「為民著想，造福於民」的崇高事業，他才能重新找回心理平衡。持續數週的慘淡景象和極度的消沉已經過去；他再次充滿了希望與勇氣。

但是眼下，只有善良的老嫗，瑪利亞·查克雷斯委身於這些計劃。確切地說，她並未真正的參與其中，因為她已經不再幫阿道夫整理這些雜

亂堆放的设计草圖了，只要這兩個從林茨來的學生能夠按時交租，她就謝天謝地了。

就林茨而言，阿道夫無非是想把它變成一座精緻而極具魅力的城鎮，用卓越的建築來抬升它低微的省城地位。但對於維也納來說，阿道夫則想將其打造成一座適宜人居的現代城市，而其名聲與威望則次之——這是他對皇家維也納的冀望：最為重要的是那些居無定所的老百姓，他們已經與自己的熱土和同胞變得疏遠，定要讓他們重新在這片堅實的土地上站穩腳跟，安居樂業。

一個住在瑪利亞希勒夫城郊，一處陰暗偏室裡的19歲青年，將這座古老的皇城在他的畫板上變成了一個由4戶、8戶、16戶住宅組成的寬闊、陽光且充滿活力的都市。

第十七章 逆流直上

毋庸置疑，阿道夫在那時候確信自己命中註定會成為一名建築師。他究竟如何才能開啟通往實踐的大門呢，即便是通過徹底的自學，他也無法獲得任何推薦信和學歷證書——這從未讓他感到過絲毫擔憂。而對此我們幾乎閉口不談，因為我的朋友十分確信，待他學成之日，社會狀況將會發生改變（既非平靜，也非動盪不安，這是由於他的革命

風暴所導致的結果），到那時，傳統意義上的學歷將顯得不再重要，而真才實學才是人們唯一的衡量標準。

「那時，建築為我所愛，我對它的狂熱也在情理之中。除開音樂，建築在我眼中可以位列藝術之首。在這樣的情形下忙碌，我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的壓力，而是莫大的滿足。直至深夜，我還能夠閱讀或者繪圖。我從不知疲倦。這加深了我對未來的信念。儘管要實現我的美夢，尚需經年累月地磨鍊，但我幾乎敢肯定，有一天，我會在建築圈內享有盛名。」

以上文字引自他的《我的奮鬥》。

就這樣，阿道夫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回想在林茨的歲月，他曾將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全部貫注在了自己選擇的學習上，通過這種方式，他成功地戰勝了學校對他所謂的偏見、不公平，以及愚蠢的待遇，因此，當他在維也納的住處想起相同問題的時候，便顯得得心應手。他詛咒藝術學院保守而僵化的官僚主義作風，稱他們完全不懂，何謂真正的藝術。我還記得他言辭極端地講道，學校狡猾的設定這些障礙，唯一目的就是要毀掉他的前程。但他會向這些無能的「老棺材」證明，沒有他們，他照樣能夠一往無前，逆流直上！從他對學院猛烈的抨擊中，我獲得了這樣的印象：將這個年輕人拒之門外的老師們，無意間激發了阿道夫更多的熱情和能量，這是他們的教學所無法達到的效果。

但我的朋友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在學習期間，他靠什麼維持生計？要想成為一名建築師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究竟是出於何種目的而自學。但不可否認，他確實是帶著勤奮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在學習，人們斷難想象，從他那虛弱的身軀裡，竟能爆發出如此強大的能量。但他的工作並沒有圍繞著任何實際目標而展開。相反，他不時還會迷失在大量的計劃和思索當中。相較我的音樂學習而言，我的進度完全是按照計劃來進行的，我只能說阿道夫的網撒得太寬，涉及的知識面太廣，對於任何事情，即便是與建築學聯絡甚微的事情，他都一併囊括；而且對待每一件事他都務必做到仔細、精確。照此一來，如何確保所有事情都能善始善終——更不要說他層出不窮的奇思怪想會擾亂他的專業訓練。

他那種遍地撒網式的辛勤付出，與我在音樂學院的系統學習形成了一種反差，這絲毫無益於我們的友誼，但願我們之間那不可避免的衝突只是因為各自的工作而造成的。除此之外，還有在波斯切蒂教授分配給我一些私人學生之後，我們的分歧變得越發的明顯。他說，如今是個人都能看出他黴運纏身；他最大的一個難言之隱就是他目前還掙不了一分錢。

一天晚上——我記得是在我給一個學生上完課之後——我找準時機，試圖勸說他去尋找一些有報酬的工作。他說，當然，要是一個人走運，他就能夠給這些年輕的小姐們上課。我告訴他說，這並不是我主

動要求的，而是波斯切蒂教授自己將這些學生分配給我的——很遺憾，她們要學習的是和聲學而不是建築學。順便說一句，我這人性格過於保守，要是我像阿道夫這麼有天賦的話，我早就去尋找一些兼職工作了。

他饒有興致地聆聽著，就好像整件事情與他毫無關聯一樣。我讓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比如說繪畫，這是他真正能做的事情，就連他的老師們都是這麼認為的。在報社或者出版社找一份工作怎麼樣？也許他可以給書籍繪製插圖，或者給報紙畫漫畫。他推脫道，他很高興我對他的繪畫技藝如此的信任，但不管怎麼說，最好還是將這類書報插圖繪製的工作留給攝影師，因為就算是最好的畫家，他的創作速度也沒有攝影師快。

那麼我接著說道，從事戲劇評論工作如何？

這項工作他完全能夠勝任，因為每次在劇院看罷演出之後，他都會向我發表一番嚴謹，具體卻又不失趣味的綜合性評述。偌大個維也納，憑什麼每次都是我一個人在傾聽他的觀點，他應該試著去聯絡一家有影響力的報社。但又必須要求他小心謹慎，不要過分地暴露出他的偏見。他問我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回答道，無論是義大利歌劇，俄國歌劇還是法國歌劇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人們同樣也應該接受外國的作曲家，正所謂藝術沒有國界。為此我們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然而無論何時，只要一討論起音樂，我總會堅守自己的立場；因為我覺得我

並不是在替自己作辯解，而是作為一個音樂學院的學生，在代表學院說話。雖然我十分樂意分享阿道夫對理查德·瓦格納的巨大熱忱，但我也不能夠排斥其餘的作曲家。然而阿道夫卻固執己見，毫不妥協。我依舊清晰地記得，在我對阿道夫飽含激情的說辭中，我引用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最後一段唱詞，「億萬生靈，信仰吧！全世界的愛正把你包圍！」藝術家的作品必定是屬於全世界的。因此，在他還未接受戲劇評論這份工作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不可化解的矛盾，阿道夫如是說。於是乎，這個計劃也同樣泡湯了。

阿道夫在這個時期裡搞了大量的文字創作。實際上，我發現其中主要是劇本和戲劇。這些創作大都取材於德國神話，或者德國歷史中的故事情節。但這些作品，幾乎沒有一部是真正完成了的。可不管怎麼說，要靠這門手藝掙些錢，倒沒什麼大問題。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一些草稿，那壯觀的舞臺設計讓我為之驚訝。然而除了關於基督教誕生的那個劇本以外，其餘的我都記不清了，但它們共有的特點就是製作成本不菲。我們已經習慣了瓦格納那些自命不凡的製作構想，但是阿道夫的設計構思，會讓所有大師的作品都相形見绌。我對歌劇製作還算精通，因此不假思索地便道出了我的疑惑。我對他解釋道，像他這樣的舞臺佈景，不是寒冰就是烈火，不是天堂就是地獄，任何一個製作人都不會接受。他應該選擇那種比較適中，比較柔和的舞臺佈景。總而言之，他最好別去碰歌劇，就去搞純粹的戲劇創作，或者喜劇——這在老百姓當中是很受歡迎的。最有利可圖的事情莫過於撰寫幾部平

庸的喜劇。平庸？單是這個詞就足以將他激怒。因而這次嘗試也以失敗告終。

我漸漸意識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即便我說服了阿道夫，讓他將自己的畫作或者文學作品遞交給了某個報社編輯或者某個出版商，那樣還是不行，他很快就會跟老闆吵起來，因為他決不能容忍別人對他的工作指手畫腳，給不給他錢都一樣。他只是不甘忍受別人對他發號施令，因為阿道夫只聽命於他自己。

所以我只好採取另一種辦法。有了我父母的慷慨資助，加上我教授私人課程掙得的報酬，使得我在經濟上優於阿道夫，因此，我總是盡我所能地去幫助他，並且最好要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因為在這些事情上他顯得極其敏感，只有在我們去散步或者遠足的時候他才會同意讓我請客。

後來，在我們彼此分別以後，阿道夫想到了一個獨特的解決辦法，使他既能夠維持基本生計，又能夠繼續主宰自己的命運。由於他的繪畫天賦更多地體現在建築上而非人物肖像上，因此他就以最工整最細膩的畫筆將維也納的著名建築（比如卡爾斯大教堂，國會大廈以及類似建築）勾畫出來，並加以著色，繪製成圖，然後等他一有空，就拿出去賣掉。

在《我的奮鬥》中，他這樣描述：「當時（他指1909年到1910年）我靠創作素描和水彩畫為生。日子雖然過得艱難，但這樣做符合我的職業選擇。」換句話說，他寧可忍受飢餓，也不願放棄自主。

由於我並不具備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所以當時，我也無法對阿道夫開展的特殊學習給出任何建議。再說我都自顧不暇，哪還有閒情去為他操心。然而我所留意到的是，他泡在書堆裡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我尤其記得他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建築史》，因為他最喜歡任意從書中選出一幅圖片，矇住標題，然後告訴我圖上所示為何建築，比如沙特爾大教堂，或者佛羅倫薩的碧提宮。他記憶力驚人，總是過目不忘，這當然也是他工作中的一大優勢。

他不知疲倦地從事著他的繪畫工作。我記得他在林茨的時候就已經掌握了製圖術的基本要領，儘管這些知識僅僅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我不知道阿道夫究竟有沒有將他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上，我也記不得他到底上沒上過建築製圖課。

他從不願意跟那些有相同專業興趣的人混在一起，或者與他們就一些共同話題展開討論。他寧可獨自一人坐在美泉宮花園的長椅上，就書上的事物與一個虛構的自己展開對話，而不是去會見一些專業人士。他那種令人稱奇的學習方式能夠敏銳地洞悉事物的本質，但與此同時，他又焦急地避免著同任何的實際應用發生聯絡，這種怪異的精神自足讓我想起了阿道夫和斯蒂芬妮之間的關係。他對建築學的無窮熱

愛以及對建築物的強烈興趣，在我看來基本上只能算作一種精神上的消遣。就如同以前的慣例一樣，當他需要為自己的感覺找些實際依據的時候，他就會跑到蘭德大街去看看斯蒂芬妮。所以他會不時地從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論學習中逃離出來，轉而前往環城大道，好讓他內心的平衡在那片光輝景象的感召下得以恢復。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漸漸明白了阿道夫為何如此偏愛環城大道，在我看來，像聖·斯蒂芬大教堂或者美泉宮這類建築的樣式雖然更古舊，但它們卻更具影響力和說服力。可阿道夫就是不喜歡巴洛克風格的建築，因為他覺得這類建築在裝飾上過於華麗，不符合他的口味。環城大道的建築是在城市防禦工事被拆毀後才興建而成的；如此說來，它們的建造時間應為上世紀下半葉，並且建築風格都是統一的。然而恰恰相反，幾乎每種建築風格都呈現於其中。像古典風格的國會大廈（準確地說是偽希臘風格），新哥特式風格的市政大廳，還有文藝復興晚期風格的城堡劇院——這是一項令阿道夫尤為讚賞的工程。然而它們都有個共同點，讓我朋友特別著迷——它們的排場。但是他之所以全神貫注於那些建築物，並且把環城大道當作自己的專業訓練平臺，其真正原因是因為他能從上輩人留下的這些建築中，輕鬆地瞭解到它們的建造歷史，複製他們的設計，通過他自身的努力，讓每個建築重新豎立起來；緬懷那個時代成就非凡的建築大師們——西奧菲爾·漢森、森珀、哈斯瑙爾，還有馮·德·努爾。

我憂心忡忡地發現，那些新構思、新體驗和新計劃總是一再將我朋友的專業學習的步驟和安排給打亂。只要這些新鮮事物與建築有一點關係，他就會將其納入他的普及教育中，但在他的職業規劃中，存在著許多客觀的矛盾因素，此外，他對政治動向把握得越來越緊。我不時會問起阿道夫，拜訪國會大廈與他的職業準備這兩個相去甚遠的事情之間有什麼聯絡。他會回答：「只有在政治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你才能夠建造。」而有的時候他的回答是相當粗魯的。我記得有一次，在回答我如何去解決某個問題的時候，他講道：「即便我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也不會告訴你，因為你根本就不懂。」儘管他總是粗魯莽撞，喜怒無常，不可信賴並且死不悔改，但我從來都不會生他的氣。

我就此打住了對其職業的追問。我最好還是安靜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後用我的行動告訴他，一個人要怎樣去達到自己的目標。畢竟，我連實科中學的門檻都沒跨進過，我只讀過一所公立學校，但如今我照樣成為了一名音樂學院的學生，不比任何一個大學生差。然而我朋友的學習程序與我正好相反。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專業訓練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深入和具體，而阿道夫的學習卻變得越發的籠統，越發的冗雜，越發的抽象，並且還脫離了實踐。「我想成為一名建築師。」他越是頑強地重複這句口號，他離目標的實現就越是變得遙遙無期。這是一個年輕人的典型傾向：在找到一份真正屬於自己的職業

之前，他們總是被自己的一些豪言壯語所累。而我的朋友一直都處在這種情況。

在《我的奮鬥》中他寫道：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曾試圖利用我的記憶和理解力，找到一種正確的閱讀方法。回首當年，我在維也納獲益良多，這是一段寶貴的歲月……我不斷地閱讀，為我的知識打下基礎。工作之餘的時間我全部用在了學習上。我至今相信，我的創造力大致始於我的青年時期……」

我的朋友腦子裡全是書，我無法想象，要是阿道夫離開了書籍他該怎麼活。每當他工作的時候，他就會把書一疊一疊地堆放在旁邊。任何時候他的身邊都不能沒有書，即便不讀，也必須把它們擺在周圍。無論何時出門，他胳膊下總要夾本書。雖說這是個麻煩，但他寧可拋棄戶外的天空也不願落下自己的書。

書籍就是他的一切。在林茨，他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書，分別在三個圖書館申請了會員。在維也納，他去霍夫圖書館的次數相當頻繁，有一次我十分鄭重地問他，是不是打算把圖書館內的所有書籍全部看完，結果我卻得到了一些粗魯的回覆。有一天他帶我來到圖書館，向我展示了龐大的閱覽室。我簡直被這些數不清的書籍給震撼住了，我

問阿道夫他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書。於是他便開始向我解釋怎樣使用圖書館裡的目錄和分類表，這讓我感到更加困惑。

在他專心閱讀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干擾他。但有時候是他自己干擾自己，因為他一翻書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講，並且不管我對他講的事物感不感興趣，我都必須耐著性子聽完。有時候他會將一本書塞到我手上，然後要求道，作為他的朋友，我應該看看這本書。在林茨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得更為頻繁。他倒不是為了讓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他的目的是想找一個能和他一塊兒討論這本書的人，即便這人只是個聽眾。

針對人們的讀書方式，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

「我知道有些人不停地讀書，一本接一本，但我並不會讚美他們學識淵博。誠然，他們從書中獲取了大量的‘知識’，但他們的大腦根本沒有將各種素材歸類、區分。」

在這方面，我的朋友無疑心得頗多，他走在了多數讀者的前面。從選定書籍的那一刻起，他的閱讀就已開始。阿道夫很會抓住作者向他傳遞的一些有價值的資訊，而且他對詩歌也很有感覺。他不把讀書當成一件打發時間的事情；他在讀書的時候，始終全神貫注。如果我不把他的閱讀當回事，而且還在他學習的時候彈鋼琴，他定會暴怒。

阿道夫選書的方式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目錄，然後才開始通讀全文，他不是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而是挑重點讀。一旦讀完，他就自己的記憶中整理歸類。我經常好奇，他的腦袋如何裝得下這麼多東西，但他吸收得越多，他就記得越清楚。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他書中所記載的多是德國英雄的傳奇故事。不管他的情緒如何，抑或外部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總會一頭扎進書堆，把這些書再讀一遍，儘管書中的所有故事情節，他早已諳熟於心。我記得他在維也納讀過一本書，名字叫《眾神與英雄之傳說》（日耳曼神話之珍藏本）。

早在林茨的時候，阿道夫就已經開始接觸古典文學。他曾評說道，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蘊含了太多常人無法理解的哲理。有一回，他有幸在城堡劇院裡欣賞到了由約瑟夫·凱恩茨擔當主角的歌劇，《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阿道夫看過之後頗受感動，而且還在我面前反覆提過好多次。誠然，談及席勒的作品，《威廉·退爾》對他影響最深。但說來也奇怪，他非常不喜歡《強盜》。他對但丁的《神曲》極為欽佩，儘管我覺得他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還過於年輕。我知道他對赫爾德感興趣，我們還一起欣賞了萊辛的《明娜·馮·巴爾赫姆》。他喜歡施蒂夫特爾，也許是因為阿道夫在他的書中，見到了幾幅與他家鄉風景相似的圖片，然而羅塞格爾卻將他深深地打動，正如他以前的形容，「太受歡迎了」。

有時候他會挑選一些時下流行的書籍來看，但他只是為了把握一下當前讀者的心理，讓自己對他們形成一種看法，而並不是衝著那些書本身去的。岡霍弗爾在他眼中不值一文，但阿道夫對他所熟悉的奧托·恩斯特的作品卻是讚賞有加。在現代戲劇方面，我們看過弗蘭克·韋德金德的《青春的覺醒》，還有維爾布蘭特的《巴爾米拉的工匠》。阿道夫在維也納還讀過易卜生的劇本，但感觸不是很大。

至於哲學方面，他一直都推崇叔本華的著作，後來還加上尼采。然而我對此瞭解甚少，因為他將這些哲學家，可以這麼說，據為己有——這是不願與任何人分享的私有財產。這種形式的保留也許還有另一層意思，畢竟音樂是我們共同的愛好，它給我們帶來的共同話題要遠勝於哲學，因為哲學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遙遠的事物。

最後，我要強調一下之前提到的，關於我對阿道夫的專業學習的看法和觀點：他的閱讀量驚人，憑藉著超凡的記憶力，他獲取了大量的知識，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一個20歲年輕人的標準。但是，他迴避任何實質性的討論。

在敦促我閱讀某本書的時候，他大概已經預感到，不管討論任何問題，我都絕對不是他的對手，甚至可能在為我選書的時候，他就已經萌生了這種想法。實際上他對「其他觀點」毫無興趣，對閱後討論亦是如此。

他對書籍的態度基本上等同於他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他激情滿懷地對他能夠發現的一切事物照單全收，但他極其小心地同任何可能使其經受考驗的事物，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他是一個探索者，當然，即便是在他的書裡，他也只去尋找適合他的東西。有一天，我問他是不是打算光靠這些書籍來完成他的學業，他驚訝地看著我，然後衝我吼道：「你依靠老師，這我完全能夠理解，但對我來說，老師簡直就是多餘的。」在這次對話之後，他便給我安了一個「知識乞討者」和一個「智力寄生蟲」的名號。我們一起在維也納生活的這些日子裡，我從沒發現他從那一大堆書中找出個什麼明確的東西，比如他行為的準則和意圖；相反，他只是在為自己已有的原則和意圖尋找證據。照此推斷，他讀書的作用（也許除了德國神話）並不是一種思想薰陶，而是一種自我校驗。

我記得在維也納的時候，他經常引用一些書上的話來解決他的諸多疑惑，「你看，這人闡述的觀點同我完全一樣」。

第十八章歌劇院之夜

我們曾經一起去過皇家歌劇院，這段往事是我們友誼中的一個亮點，我朋友的記憶也同這些美妙的經歷緊密相連。林茨的劇院見證了我們青年友誼的開始，無論何時，只要我們一踏入這座全歐洲最負盛名的

歌劇院，那份昔日的感覺又會被我們重新拾起。隨著我們不斷地成長，我們彼此形成的反差也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志向，以及對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態度，都使我們之間的隔閡變得越來越大。然而，我們對於一切美麗和高尚的事物都抱有強烈的熱忱，所以作為這種美好品質的最高藝術表達形式，維也納歌劇院的演出，將我們更加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在林茨，我們的關係既穩定又和諧。可是到了維也納，衝突和緊張日益加劇，我想這主要歸因於我們狹小的生活空間。幸好我們共同的藝術體驗鞏固了我們的友誼。

作為兩個身份卑微的窮學生，要想獲得觀賞演出的機會，我們不得不煞費苦心，這是不爭的事實。按道理說，維也納的劇院也應該有那種「人行道」上的廉價站票，就像過去在林茨的情況一樣；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買到過這種票，即便是通過音樂學院也買不到。所以我們只好買全票——2克朗——可以想象，每個月，當阿道夫繳清房租後，他可能總共就只剩下15克朗的生活費，因此2克朗對他而言已經是筆很大的數目了。並且，即使是買全票，我們都不得不下大力去爭取，因為門票只在演出前一小時開售。

在演出門票最終到手後，我們就要準備開始搶佔「人行道」的空位了，好在「人行道」離售票處還比較近。它就位於皇家包廂的正下方，而且此處的音質效果極佳。女人是不準來「人行道」的，這無疑

讓阿道夫感到莫大的喜悅，但另一方面，這個位置也有它的缺點，因為它被一道銅欄杆分隔成了兩個區域，一半是公務員區，一半是軍人區。正如我朋友所言，這些年輕的軍官到歌劇院來更多是出於社交目的，而不是來欣賞音樂的，他們買一張票只需要支付10赫勒，但我們這些窮學生卻要花上他們20倍的數目才能獲得相同的資格。這種現象總是讓阿道夫憤怒不已。瞧瞧這些優雅的中尉，他們不停地打著哈欠，急不可耐地等待著演出間隙的到來，以便能夠讓他們去大廳顯擺，就如同自己剛從包廂裡走出來一般。他說在「人行道」上，觀眾們的藝術理解力和他們的票價是成反比的。此外，「人行道」的軍人區從來就沒佔滿過，但在公務員那一邊，半數的學生、年輕職員和技工們幾乎都是腳踩腳的並肩而立。

「人行道」的另一個缺點就是，那裡通常都會被用來安插個別僱來的喝彩者，而這種情況的發生又常常會攪擾我們的興致。其操作手法非常簡單：一個想在演出的某段時間獲得掌聲的演唱者，會在當晚僱傭幾名喝彩者，僱主會給他們購買當場演出的門票，另外還會給他們一筆報酬。這些專業的喝彩者被按照一定比例，安插在觀眾中間，因此，經常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某個最不恰當的時刻，一陣響亮的掌聲從我們身邊爆發出來。搞得我們相當惱怒。我記得有一回，在《湯豪舍》上演之時，我們還用噓聲示意那群喝彩者安靜。那時候連管絃樂隊都停下了，但其中一個仍舊不斷地大聲叫好，於是阿道夫一拳就招呼了過去，打在了他的身上。散場的時候，我們發現那個喝彩者的

頭兒帶了個警察在外面守人，阿道夫被當場盤問，由於阿道夫做出了聰明的自我辯護，因此警察就放過了他，但後來他立馬在街上追到了那個告狀的喝彩者，然後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由於在「人行道」上不允許穿戴外衣和帽子，所以當我們準備去歌劇院的時候，就把它們放在屋裡，這樣就省去了衣帽間的費用。誠然，晚上從過熱的劇院裡出來常常使我們感到寒冷刺骨。但是在欣賞完《羅恩格林》或者《崔斯坦》後，再冷的天氣又算得了什麼呢？

最令我們討厭的是，如果想省掉開鎖費（給看門人的小費），那麼在10點鐘前我們就不得不趕回家。根據阿道夫的精確計算，從歌劇院走到我們家至少要花15分鐘，因此到了9點45的時候，我們就必須離開。結果，阿道夫從沒能完完整整地聽罷一出歌劇，然而他錯過的最後一段就只好叫我用鋼琴彈給他聽。

理查德·瓦格納，那夢幻般的音樂依然是我們最為鍾愛的事物。對阿道夫而言，沒有任何事物能夠與這位大師給我們營造出的音樂世界相提並論。比如說，當我想去皇家歌劇院欣賞一些威爾第的鉅著之時，他會威逼我，直到我放棄我的威爾第，陪他來到韋靈的人民劇院觀賞瓦格納的歌劇。他覺得就算是瓦格納的一部平庸之作也要比威爾第的一部上乘作品優秀百倍。我雖然不是這麼想的，但又有何用？同往常一樣，我只得屈服。因為阿道夫絕不會允許任何人對瓦格納的作品提出反對之詞。毫無疑問，他已經在皇家歌劇院觀賞過了一場更好的演出

——我已不記得是《羅恩格林》還是《崔斯坦》。但這並不是重點。聆聽瓦格納對他而言，並不僅僅意味著上趟歌劇院那麼簡單，重要的是，他將有機會被傳送到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中，而這就是瓦格納的音樂對他產生的效果。他需要那種入迷的狀態和感覺，他需要逃離現實，在音樂的夢幻世界中徜徉，如此一來，他才能忍受自己天性中那難以控制的緊張情緒。

無論是人民劇院的演員還是管絃樂隊，其演出水準都相當高超，遠遠領先於我們以前在林茨所習慣的任何表演。在林茨的劇院觀看演出的一個好處是，人們無須在售票處排隊就能買到一個便宜的座位。然而那冷冰冰的現代建築風格以及劇院內部毫無新意的壓抑氛圍卻總是讓我們感到有一些不愉快，而這種不愉快的感覺倒是與它那裡缺少魅力的演出比較匹配。以前阿道夫經常戲稱這些劇院為「佈施處」。

我們在維也納欣賞這位大師的不朽之作的時候，獲得了絕對的享受，不可否認，正是林茨的劇院為此做了奠基。我們對他的歌劇早已諳熟於心，因此在我們看來，上至皇家歌劇院，下到韋靈最小的劇院，全都好像是為我們新建而成的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世界。

當然，我深知《羅恩格林》（我相信我們在維也納居住的這段時間裡，他看了不下十遍）還有《紐倫堡的名歌手》都是阿道夫的最愛。正如其他那些喜歡言引歌德或席勒的人一樣，我們也會引用瓦格納的名言，尤其是《名歌手》裡的語句。眾所周知，瓦格納試圖在劇中用

漢斯·薩克斯這個人物將他朋友佛朗茲·李斯特給高大化，然後用醜化劇中人物貝希梅森這種方式來攻擊他的宿敵漢斯利克。阿道夫經常引用劇中第二幕的第三個場景：

「成功，至今與我無緣。

雖然我感覺得到，但是我理解不了。

我不能將它留住，也無法將它忘掉。

即便我將它抓住，又無法將它衡量。」

就這樣，我朋友參透了這條永恆不變的準則，而理查德·瓦格納還曾嚴責他的同代人缺少這樣的理解力，可以說，這條準則也適用於阿道夫自己；儘管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父親、家庭以及他的老師們肯定也曾「感覺」到他有一些過人之處，但他們對此卻無法理解。就算人們最終了解了他的目的也仍然無法「衡量」他的意志。這幾句話是他的一種日常自勉，也是總能在他情緒低落時，起到幫助作用的一份慰藉。

我們參照著劇本和樂譜，去學習那些我們在林茨未曾見過的瓦格納的作品。所以我們絲毫不遜色於維也納的瓦格納迷，自然，我們很快就加入到了瓦格納崇拜者的行列中，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見到這位拜羅伊特的大師的作品，我們都會毫不吝惜地發出讚美和感嘆。

當我們在維也納的皇家歌劇院，欣賞了由古斯塔夫·馬勒指揮的經典瓦格納歌劇之後，我們就把以前在林茨的最高藝術體驗歸納成了用心良苦卻又水平低劣的地方性表演。然而阿道夫不會滿足於以前那段遺憾的回憶，如果真是那樣，他就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了。他熱愛林茨，他把林茨當作自己的故鄉，雖說他的雙親已經去世，但那裡還留著一個令他朝思暮想的人，斯蒂芬妮。有誰知道她對這個面色蒼白的年輕人有多麼的重要，而又是什麼讓他日復一日地站在施密托爾街口為她守候。林茨的文化生活必須要達到與維也納旗鼓相當的水平：帶著這份野心，阿道夫開始了認真地工作。

在即將離開林茨的時候，他曾對劇院建設協會寄予了厚望，並且還成為了他們當中的一個積極分子。為林茨修建一座更好的新劇院本是個很不錯的想法，但這件事情卻沒有任何明顯的進展。於是當此事石沉大海的同時，阿道夫也漸漸失去了耐心。因此他開始獨立工作。他努力要為自己的家鄉設計一座不朽的建築，就像他在皇家維也納所熟悉的那些建築一樣，而在此過程當中，他也獲得了快樂和滿足。

他已經把城裡的火車站從市中心遷到了郊區，這其中包括醜陋的車間，被煤煙燻黑的廠棚，還有老舊而笨重的火車。這使得他能夠將公園的面積擴大，並且還可以添建一座動物園，一個溫室，當然，還有一處燈光噴泉。在這座精心設計的公園中心，將會矗立起一座全新的林茨歌劇院，其規模略小於維也納的皇家歌劇院，但在藝術水平和硬

體設施上與其不相上下。老劇院將被改造成一座表演大廳，其標準均參照歌劇院的建造規格。

就這樣，我的朋友改變了家鄉的可悲環境，最重要的是，他的這些靈感都源於維也納的藝術吸引力。

我們幾乎看過理查德·瓦格納的所有作品。像《漂泊的荷蘭人》、《羅恩格林》、《湯豪舍》、《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名歌手》，甚至還有《尼伯龍根的指環》和《帕西法爾》，這些經典都讓我們難以忘懷。

當然，阿道夫偶爾也會觀賞一下其他歌劇，但它們絕非像瓦格納的歌劇那樣，對他意義重大。我們曾在林茨看過一場難得出色的《費加羅》，這讓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依舊記得在我們回家的路上他講到，將來林茨劇院應該致力於歌劇表演，像這出《費加羅》就是他們實力的體現。而另一方面，《魔笛》這出歌劇則是個完全失敗的例子。韋伯的《自由射手》也相當的糟糕，以至於讓阿道夫都不想再看第二遍。但到了維也納，一切都有所不同。在我們觀看過的完美演出中，不僅有莫扎特的歌劇，還有貝多芬的《費德里奧》。阿道夫從不喜歡義大利歌劇，雖說像多尼采蒂、羅西尼、貝里尼，尤其還有威爾第和普契尼這些義大利作曲家在當時都非常的時髦，並且在維也納極具知名度，其作品的上座率也極高。

我們一起看過的威爾第的歌劇有《假面舞會》、《遊吟詩人》、《弄臣》和《茶花女》，但他唯一喜愛的是《阿依達》。在他看來，義大利歌劇的故事情節太過戲劇化。他反對用騙局、詭計和無賴行為作為一幕戲劇性場景的基本元素。有一次他對我說：「要是沒有匕首，這些義大利人該怎麼辦？」他又覺得威爾第的音樂過於樸素，太過依賴於旋律。相比之下，瓦格納的音樂顯得多麼的大氣磅礴而富於變化！有一天當我們聽到有個手風琴手在彈奏《善變的女人》時，阿道夫對我說道：「那兒，你的威爾第！」正當我回答道，沒有哪位作曲家的作品能夠倖免於這樣的褻瀆之時，他生氣地衝我吼道：「你可以用手風琴來演奏《羅恩格林》的旁白嗎？」

阿道夫評價古諾的《浮士德》太過庸俗，甚至連柴可夫斯基、斯美塔那都難入他的法眼。毫無疑問，他對德國神話的痴迷，勢必在此對他構成了阻礙。我認為音樂應該是屬於全世界的，它不受到地域和種族的限制，而阿道夫駁回了我的觀點。在他腦子裡滿是德國人的行事作風，德國人的情感表達，德國人的思考方式，其餘的一概無視。除了德國的大師以外，他不接受任何的外國音樂家。他經常告訴我，能與這些大師們同屬一國之公民，讓他深感榮幸。

當聽到瓦格納的音樂時，他就如同變成了另一個人；暴戾之氣離他而去，他變得安靜，溫順而又易於相處。他的目光中不再透露出那種坐立不安的神情；他生命中那份難以承受之重已變得無關緊要。他不再

感到孤單，他不再繼續反叛，也不會再抱怨社會對他的誤解。他陶醉而入迷。他情願讓自己沉浸在那音樂的廣闊天地裡，因為這對他而言要比枯燥乏味的現實世界更為真實。瓦格納的音樂將他從我們的偏室，這處腐朽的禁錮之所，傳送到了古代德國的極樂之地，而那個理想世界就是阿道夫所有付出和努力的終極目標。

30年後，當他在林茨與我重逢之時，他大概還以為我已經成為了一名頗具影響力的樂隊指揮，因為他最後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我還是維也納音樂學院的一名學生。但是當我以一個卑微的政府僱員的身份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希特勒，當時的帝國元首，對我講道：「這麼說你成了一名文書？但是你是個藝術家啊。看來我們得好好談談。」他這番話是在暗示我想不想去指揮一支交響樂隊。

我心存感激地婉言拒絕了。因為我感到自己已經不能夠勝任這項工作了。當他意識到我無法接受他這份慷慨的幫助之後，他便轉而回憶起我們在林茨劇院和維也納皇家歌劇院的共同經歷，這些經歷將我們普通的友誼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而後他還邀請我去拜羅伊特。

我從不曾想到會有其他事物能夠超越我學生時代在維也納的完美藝術體驗。然而在拜羅伊特，這種事情就發生了。作為我老朋友的客人，我應邀來到拜羅伊特，在那裡，我對理查德·瓦格納的體驗，達到了我人生中的最高點。

第十九章希特勒創作的歌劇

因為我和阿道夫在維也納所學的專業不同，所以很快我們這段友誼就顯現出了它的脆弱之處。每天早上，當我準備去音樂學院上課的時候，我的朋友還在床上酣睡；而到了下午，當他想工作的時候，我的樂器練習又打擾了他。這種情況經常引發我們之間的衝突。

「什麼音樂學院，簡直是胡說八道！他們有什麼可教的東西？」他想要向我證明，即便是像他這種沒有上過音樂學院的人，也同樣能夠達到我在音樂方面的成就。他說這依靠的並不是那些教授的智慧，而是個人的天賦。

抱著這份野心他開始了一項令人驚奇的實驗。我至今也說不清，他這項實驗到底價值何在。阿道夫回想起了他以前接觸過的一些基本樂理知識。語言似乎很難達到他的目的，於是他摸索著看能否將單獨的聲音與音符聯絡在一起；也就是說他想讓這種音樂語言被賦予情感。對於一部最終將要呈現在舞臺上的歌劇來說，聲音與感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然而我，一直對自己在音樂學院所瞭解到的真諦表示深信不疑，並且還或多或少地帶著些藐視情緒在看待他的實驗，因此這讓阿道夫感到非常的生氣。他獨自在這些抽象的實驗上忙活了好長一段時間，或許是因為他想從根本上顛覆我的學院派知識吧。當幾年過

後，一名俄國作曲家在維也納以相似的實驗引起了一陣轟動之時，我才回想起我朋友的那次創作嘗試。

那段時間，阿道夫搞了大量的創作，其中有一些原創故事，但主要的還是戲劇。他在屋子裡通宵達旦地伏案工作，至於具體做了些什麼，他卻對我言之甚少。他只是偶爾朝我床上扔來幾張他的近作，或者自鳴得意地從他風格古怪的作品中挑選幾頁讀給我聽。

我知道，他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植根於理查德·瓦格納的世界，也就是說，故事背景通常都是古代德國。有一天我無意間對他說道，據我在音樂歷史課上學到的知識，世人在瓦格納死後出版的作品中發現了一部名為《鐵匠維蘭德》的音樂戲劇的創作提綱。事實上，這只是篇簡短而倉促的文字，連一個上演本的草稿都算不上，並且也沒有對任何素材進行過音樂處理。

阿道夫聽罷便立馬從他那本《眾神與英雄》中翻到了維蘭德傳奇。說來也奇怪，雖然在維蘭德傳奇中，尼杜爾國王的行為動機完全是出於自身的野心和貪婪，但我的朋友對此卻並不是特別反感。對黃金的渴求，是德國神話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而這既沒有給阿道夫帶來一點消極影響也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積極影響。儘管故事中還描述說，維蘭德為了復仇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強暴了自己的女兒，並用他兒子的顱骨做成了飲酒用的高腳杯，但這些似乎都未能讓阿道夫有所觸動。

當晚他便開始了創作。我確信他在第二天早上就會得意地向我展示出他的戲劇新作——《鐵匠維蘭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什麼也沒發生。但是當我中午回來吃午飯的時候，我十分驚訝地發現阿道夫正端坐在鋼琴前。接下來發生的一幕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沒有過多的解釋，他直接對我招呼道：「聽好了，庫斯特爾！我將要把維蘭德寫進一出歌劇。」

我當時被震驚得啞口無言。

阿道夫一邊享受著我的驚詫反應給他帶來的快感，一邊繼續彈奏著鋼琴，或者對他而言，應該叫作繼續「玩」著鋼琴。老普魯拉斯基在世的時候，曾經教過他幾手，但毫無疑問，他這樣的水平離我所理解的「彈奏鋼琴」尚有一段距離。

當我回過神之後，我便問阿道夫，他是怎麼想出來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很簡單——我來創作音樂，你，把它記下來。」

阿道夫的計劃或構思幾乎總是超出常人的理解範圍，而我對此也早已習以為常。但如今就連論及音樂——這片我的特殊領域——我都實在無法跟上他的步伐。對他在音樂方面的天賦，我毫不質疑，但恕我直

言，他畢竟不是個音樂家；他甚至連一樣樂器都不會。他一點兒音樂方面的理論知識都不具備。他怎麼能夠憑空想象出一部歌劇？

我只記得當時我作為一個音樂人的自尊被傷害了。於是我一言不發地出了門，走到附近的一個小咖啡館坐下寫作業。

然而，我的朋友對我的行為一點兒也不感到生氣，當我晚上回到家裡以後，他卻顯得越發的平靜，「好了，序幕完成了，聽著！」

於是他便憑著記憶為我彈奏了他自己創作的歌劇序幕。

當然，對於這段音樂，我一個音符都想不起來了。但有一樣東西還保留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段由自然音樂元素構成的詠歎調，他打算用傳統的樂器來進行表演，可是由於這種演奏聽上去還不是很優美，所以我的朋友決定採用一種現代交響樂器，那便是瓦格納大號。至少這樣的音樂能夠讓人們接受。他的每一個獨立的音樂主題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說整段序幕讓人們感覺水平低下的話，那可能只是因為阿道夫還演奏得不夠好，也就是說，他無法更清楚地表達出自己的思想。

當然，他的作品完全是受到了理查德·瓦格納的影響。整個序幕由一系列單個的主題構成，儘管他選擇的每個主題路線都有著很好的發展空間，但不得不承認這已經超出了阿道夫的能力範圍。畢竟，他也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專業培訓，他又能夠從哪兒獲取這些必要的專業知識呢？

在他演奏結束後，阿道夫想聽聽我對他作品的評價。我知道他對自己這份作品的期望很高，而且我也知道，在音樂這方面，我的讚賞對他來說有多麼的重要。但是，這事兒可沒那麼簡單。

我對他講道，基本主題還是不錯的，但他必須得知道，單靠這些主題是不可能構成一部歌劇的，並且我還聲稱自己十分樂意教給他一些必要的理論知識。

此話一出，便立馬激起了他的憤怒。

「你以為我瘋啦？」他衝我吼道，「你有什麼資格教我？廢話少說，把我剛才在鋼琴上彈的東西絲毫不差地記下來。」

當我的朋友用這種方式跟我講話的時候，他的心情我是非常瞭解的，並且我也意識到，與他針鋒相對是落不到好下場的。所以我只好老老實實地把他彈奏的東西記錄了下來。但沒過一會兒，查克雷斯夫人就敲響了門，示意我們時間已晚，於是阿道夫只好打住。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學校，當我中午回來吃飯的時候，阿道夫就責備我居然「在他歌劇創作的關鍵時刻」一走了之。他已經為我備好了樂譜紙，準備馬上開工。由於阿道夫的演奏總是隨心所欲，不同我保持一致，並且也沒有統一的音調，所以我很難跟上他的節奏。我試圖讓他明白，為了更有效地配合，他在彈奏鋼琴的時候必須得保持一種統一的音調。

他大言不慚道：「誰是作曲人，是你還是我？」

我所能夠做的就是記錄下他的音樂思想和理念。

我只好叫他重彈一次，以便能讓我記下，他也照做了，這麼一來我們才有了點進展；然而對於阿道夫來說，這種進度實在太慢。我告訴他我想親自把剛才記下的通彈一遍。他表示同意，於是我便坐上了鋼琴，而他則變成了我的聽眾。

說來也奇怪，我倒是更喜歡我自己彈奏出來的效果，也許是因為這部作品本身在他的頭腦中就有著一個精確的構思，所以無論是他的拙劣技藝還是我的記譜法和演奏，都無法與之相符。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歌劇的序幕上耗費了幾天，或者更準確地說，幾夜的心血。阿道夫要求我將整個作品用一種合適的公制形式表達出來，但不管我怎麼做，阿道夫都覺得不滿意。因此很多時間我們就耗在了這件事情上面。最後我成功地使他相信，這麼做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可一旦我試圖一次性演奏完整個章節的時候，他又開始極力反對。

時至今日我才明白，在那些費心勞神的夜晚，是什麼讓我朋友陷入到了絕望的邊緣，又是什麼讓我們的友誼經受著嚴峻的考驗。這段歌劇序幕就像是一部已經完成好的作品一樣儲存在他的大腦中，正如他從前那樣，在還未動筆之前，心裡就已經有了一座大橋或者是一座音樂

廳的設計方案。然而，雖說他是鉛筆素描方面的專家，並且他能夠通過繪畫，勾勒出他的想法，但是這樣的手法運用到音樂領域可就不那麼靈驗了。而他想利用我來助他完成歌劇的企圖，卻讓整件事情變得更加的複雜，因為我的理論知識只會對他的直覺構成阻礙。他腦海中這個大膽而重要的構想，在還未付諸行動之時，就已經將他帶到了徹底絕望的邊緣。儘管他看上去依然顯得不可一世，但有那麼一瞬間，他卻對自己的使命感產生了懷疑。

很快，在滿懷激情的壯志與實力不濟的現實之間進行了一番痛苦的掙扎後，他找到了一個擺脫這種窘境的办法。這是個獨特而又新穎的办法：他堅定地宣稱，他將使用一種與那個時期（也就是說古代德國）相符合的音樂表達形式來為他的歌劇譜曲。我本欲反駁道，照他這麼想，是不是觀眾也該換成古代條頓人，方能顯得盡善盡美。可還沒等我把這話講出口，他就已經開始滿懷熱忱地著手研究他的新方案了。在我看來，這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可不管我怎樣苦口婆心地對其進行勸說，他都不肯善罷甘休。非但如此，他反而還要讓我相信他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因為他堅持聲稱，本世紀的人必須要學會欣賞歌劇的內涵。

他想知道在古代德國的音樂中有哪些東西被保留了下來。

「幾乎沒有」，我簡短地回答道，「除了一些樂器以外。」

「那有些什麼呢？」

我告訴他，這其中有些鼓類樂器，比如撥浪鼓；另外在瑞典和丹麥的一些地方還出土了一種骨制長笛。考古專家們成功地復原了這種長笛，但它發出的聲音並不那麼悅耳。但最有價值的當屬「盧埃」

（Luren），一種將近兩米長的銅管樂器，其狀彎曲如獸角。這種樂器可能只是在農莊被當作喇叭來吹奏，它們發出的聲響根本算不上是音樂。

他專心致志地聆聽著我的講解，而我也以為這麼一來便足以讓他打消自己的念頭，因為他總不可能用撥浪鼓、手敲鼓、骨制長笛，還有「盧埃」來演繹一出歌劇吧。但是我錯了。他開始談起那些用絃樂器來伴奏的吟唱詩人，我怎麼把這茬兒給忘了。

他繼續道，從這些曾被諸多日耳曼部落使用過的樂器中，我們可以推測出，他們的音樂是什麼樣。

這時我的書本知識終於派上了用場。「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向他陳述道，「研究表明，條頓人有一套自己的音樂縱向體系，並且他們已經掌握了一些類似於和聲的技法；有跡象顯示，他們的音樂中甚至還有大調和小調的區別。但不可否認，這都只是些科學假設，也就是所謂的臆測……」

這足以催生我朋友那夜以繼日的創作動力。他那層出不窮的新構思著實讓我為之驚訝，但我很難記錄下他這些超出了提綱的突發奇想。根據阿道夫武斷的理解延伸，維蘭德傳奇中存在著許多戲劇化的場景，因此必須將其中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寫轉化成音樂語言。為了使整個作品能夠被人們的耳朵所「忍受」，我最終還是說服了阿道夫，讓他放棄使用那些從日耳曼古墳裡挖出來的原始樂器的想法，用一些型別相似的現代樂器來代替它們。經過幾夜的努力，在歌劇的各個主旋律被最終確立之後，我感到了一陣滿足。

後來我們一致認為，目前在這部歌劇中，除了英雄維蘭德以外，其他的角色都還缺少一些必要的實質內容。於是阿道夫將整個演出劃分為兩個部分：表演和背景介紹。與此同時，他還用炭筆在紙上為這個長著翅膀的英雄設計了舞臺佈景和服裝。

由於我的朋友在本該用詩文創作的劇本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因此我建議他先完成歌劇的序幕，他同意了，不過是在經過了幾場激烈的爭吵以後。基於我為這項工作提供的大量幫助，最後的結果還是比較令人滿意的。我還建議他把這些曲子編成管絃樂，在機會來臨的時候，就可以請一支交響樂隊來演奏，但這項建議立馬遭到了他的否決。因為他既不想讓這段序幕被歸為標題音樂，也不願意去迎合任何一個「觀眾」，畢竟，眾口難調。他近乎狂熱地投入到了這項工作上，就彷彿

有一位急不可耐的歌劇製作人，正期盼著能在第一時間從他手中奪取底稿一般。

他馬不停蹄地寫呀寫，而我則忙於音樂創作。當我體力不支，閉眼睡去的時候，阿道夫卻將我粗暴地喚醒。我的眼睛幾乎都快睜不開了，而他還在我跟前念著他的底稿，在激動之下，他的言語顯得磕磕絆絆。此時已過午夜，所以他不得不輕聲講話。而這種舉動與他用韻文所描述的火爆場面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致使他那飽含激情的聲音聽上去顯得有些奇怪和失真。我對他這種行為舉止早已瞭如指掌，當他全身心地貫注於一件自願接受的任務之時，他就會強迫自己毫不停歇地活動下去，就好像有個魔鬼在控制著他的身軀。在那種忘我的情形下，他從不會感到疲倦，也不會想要睡覺，他甚至可以連飯都不吃，最多也就是偶爾抓起牛奶瓶倉促地朝嘴裡猛倒一口，他對這些事情必定是毫無察覺的，因為他已經完全地沉浸在了自己的工作中。但我以前從未如此直接地被他這種令人欽佩的專注態度給打動過。這種精神將牽引他走向何處？他將精力和天賦都花在了有一些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的事物上。他那虛弱的身軀到底還能支撐多久？

我強迫自己保持清醒，繼續傾聽。我也不再去追問那些會令我感到鬱憤滿懷的問題。其實我完全能夠輕鬆地在我們當時任何的一場爭吵中，找到退出的藉口。而且我在音樂學院的熟人也會很樂意幫我另尋住處。可為什麼我沒有這樣做？畢竟我也時常告誡自己，這段奇怪的

友誼將會對我的學業造成不良影響。而且又有誰知道我在我朋友這些夜間活動上耗費了多少的時間和精力？可為何，當時我沒有選擇離開？是的，我承認我想家，而阿道夫在某種程度上又有點讓我聯想起家鄉。但畢竟思鄉之情是一個20歲的年輕人能夠克服的東西啊。那除此之外又是什麼原因呢？究竟是什麼在支撐著我呢？

說實話，其原因正是我們一同度過的這些時光，這些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愈發緊密的時光。我知道我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通常都有著怎樣的興趣愛好：調情，膚淺的肉體享受，閒逛，還有思考許多無關緊要並且毫無意義的問題。而阿道夫則與他們完全相反。在他身上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認真勁，一種追求完美的態度，一種對周遭所有事物產生強烈興趣的天性，最重要的是，他還有一種對藝術乃至對一切美好事物的無窮的奉獻精神。正是他這些特殊的品質將我深深吸引，讓我的身心在數小時的疲勞工作後，恢復了平衡。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去付出那幾個無眠之夜，值得去承受我們之間發生的那些近乎激烈的爭吵——我已經習慣了用一種平靜而理智的方式來處理。

我仍然記得，這部歌劇中的一些戲劇化情景連續在我夢裡浮現了好幾個星期。但如今我只記住阿道夫設計的某些圖片。阿道夫覺得用鋼筆和鉛筆並不能夠很快地表達出他的思想，因此他常常用木炭來作畫。他會以寥寥數筆迅速地勾畫出劇中的場景，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表演

部分：首先，維蘭德從舞臺的右邊出場，然後他的兄弟埃吉爾從舞臺的左邊出場，最後，他的第二個兄弟斯拉格希德從舞臺的後面出場。

我回想到歌劇的第一幕場景——狼湖，依舊歷歷在目。《古冰島詩集》是一本在阿道夫眼裡顯得十分神聖的書籍，通過這本書，他了解了冰島，這座崎嶇不平的北方島嶼，以及在創造天地之時組成當今世界的幾種重要元素：猛烈的暴風、裸露的黑色岩石、灰白的冰川、火山的烈焰。這就是他為自己的歌劇所做的背景設定，在那天地混沌初開之時，在眾神與人類的靈性被激發的伊始。一天上午，維蘭德和他的兄弟們正在狼湖岸邊釣魚，三片薄雲隨風而至，飄到了他們的眼前。那是三位披著閃亮盔甲的瓦爾基里。她們穿著白色的長袍和魔法衣，以便能讓她們在天空中飛翔。我記得當時由於阿道夫明確表示劇中不能刪掉她們，所以這些飛翔的瓦爾基里曾一度搞得我們頭痛不已。總之在我們歌劇中要「飛」的場面還有很多。在最後一幕，維蘭德還得為自己鍛造一雙翅膀，他照樣要用一雙金屬翅膀飛行，而且在視覺效果上還必須營造出一種輕鬆自然的感覺，以免讓觀眾對他的手工技藝產生質疑。這對我們兩個創作者來說又是一個技術難題。但阿道夫對此卻特別的著迷，也許是因為之前正趕上利連索爾、萊特兄弟、法曼和布萊里奧第一次將「重於空氣」的東西送上天空的緣故吧。「飛翔的瓦爾基里們」最後分別嫁給了維蘭德、埃吉爾、斯拉格希德這三兄弟。周圍的居民在號角聲的召喚下紛紛來到狼湖，參加他們的盛大婚禮。

要想聽我把這些老套故事的各個情節講完，那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了；再說我也不可能將我們的作品一字一句地記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些用飽含激情的韻文表述出的戲劇事件，以及那些用過於樸實的旋律組成的基本音樂都鮮活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我不知道我們的歌劇最後變成了什麼樣。我只記得有一天，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降臨到了我朋友頭上，而且要求他必須馬上想出解決辦法；儘管阿道夫有著出眾的能力，但他也沒有三頭六臂，因此他只好將那部歌劇半成品放置一邊。後來他對這件事情談論得越來越少，到了最後他甚至對此絕口不提。也許，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這種創作歌劇的努力嘗試是絕對不會成功的。我儘量小心翼翼地不去提起這件事情。

現在，《鐵匠維蘭德》這部阿道夫的歌劇，只剩下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段。

第二十章 「空中花園」

令人可喜的是，我朋友的音樂興趣在維也納得到了拓展。先前他僅僅是對歌劇感興趣，而現在他還越發地喜歡上了音樂會。雖然以前在林茨的時候，他經常去聽林茨音樂社組織的交響音樂會，那幾年他聽過的音樂會少說也有六七場。但那時候他並不是衝著音樂會本身，而是

衝著我來的。因為當時我在樂隊裡表演，這是他前來捧場的一個重要原因。他並不認為像我這種性格溫和而內向的人能夠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演，所以每一回他都熱切地期盼著我的演出結果。至少我記得在每場表演結束後，他對我的評論，要遠多於音樂會本身。

而維也納改變了這一切，顯然，音樂學院每星期發給我的兩三張音樂會門票對此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每次我總會拿一張門票給阿道夫，有時候甚至全部都給他（當我礙於聲樂練習去不了的時候）。由於這些贈票通常都對應著較好的座位，因此我們並不用像去皇家歌劇院那麼緊張。

在同他討論到這些音樂會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阿道夫對交響樂的品位正在逐步提升。這讓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它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共同愛好。

古斯塔夫·古特海爾是音樂學院指揮學院的院長，同時他還是維也納音樂會協會的樂隊指揮。但令我們尤為喜愛的還是音樂學院的院長——費迪南德·洛伊，他偶爾在維也納愛樂樂團擔任樂隊指揮，他還是一個布魯克納的忠實崇拜者。儘管勃拉姆斯與布魯克納這兩位大師都已經去世了十多年，但在當時的維也納音樂界，仍然充斥著關於他們兩位的高下之爭。令人敬畏的音樂評論家愛多爾德·漢斯利克（我們總是稱他為「書記官貝克梅瑟」）也已去世，但他造成的惡性影響依然存在。漢斯利克曾堅定地支援勃拉姆斯而對安東·布魯克納展開猛烈地攻

擊。他是我們倆公開的敵人，就因為他也曾有失客觀地抨擊過理查德·瓦格納。另一方面，費迪南德·洛伊是布魯克納的鐵桿擁護者；還有維也納歌劇院後來的負責人弗朗茲·沙爾克，他也是布魯克納的支持者。

對我們來說，要想在這場爭論中選擇一個立場並不困難。我和阿道夫都喜歡布魯克納，他創作的交響樂能夠將我們打動，能夠使我們為之振奮。此外，布魯克納還是從我們那兒走出的名人，稱頌他的作品就等於是稱頌我們的家鄉。然而，我們並不能把這些當作排斥勃拉姆斯的理由。在這場爭論中，我們把自己視為年輕人的代表，將讚美送給兩位大師，對老一代人的狂熱置之一笑，因為這在我們看來，完全是多餘的。至於阿道夫，他想得更遠。他說，林茨應該成為安東·布魯克納的聖地，就像拜羅伊特成為理查德·瓦格納經典作品的彙集地一樣。還要讓林茨音樂大廳（他剛完成不久的設計）成為人們緬懷布魯克納的聖堂。

除了這些古典音樂大師們的偉大交響作品之外，阿道夫還尤其喜歡浪漫主義作曲家的音樂，像卡爾·瑪利亞·馮·韋伯、弗朗茲·舒伯特、費利克斯·門德爾鬆·巴托爾迪，還有羅伯特·舒曼。他很遺憾理查德·瓦格納的創作事業僅致力舞臺而非音樂廳，因而在音樂方面，人們只能從他的一些序曲創作和一些歌劇橋段中去領略他的風采。

另外我還必須提一下愛德華·格爾格，他是阿道夫非常喜歡的音樂家，他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總能給阿道夫帶來欣喜和愉悅。

總的來說，阿道夫對名家作品的獨奏演繹並不是特別地鍾愛。但某些演出他也絕對不會錯過，比如莫扎特或貝多芬的鋼琴和小提琴協奏曲，門德爾鬆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尤其還有舒曼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

但在頻繁地接觸這些音樂會的同時，阿道夫還產生了一種焦慮不安的情緒。長久以來，我一直不明其因。要是換做其他年輕人能有機會欣賞這些演出，他們必定會滿意得無可挑剔，然而這並不是阿道夫的表現。

他分文沒出地坐在音樂大廳的好位子上，幸福地享受著貝多芬那輝煌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多麼愉快，多麼滿足。然而，環顧整個大廳，他只能夠數出四五百人的聽眾。與千千萬萬無緣到場的音樂愛好者相比，這個數字顯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毫無疑問，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不光是學生，還有那些工匠和普通工人，他們本來也應該像阿道夫一樣，不用出錢或者支付一筆他們能夠承受得起的費用就可以高高興興地前來聆聽這些不朽的音樂作品。對於這種狀況，維也納還不算典型，因為在維也納，音樂愛好者們要想搞到音樂會的門票還算相對容易。但在維也納之外的一些小地方，比如一個鎮上，哦對，阿道夫也在林茨親眼目睹過，在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上，這些小地方做得多麼的欠缺！這種狀況必須得到改變，享受音樂會不該再繼續成為少

數人的特權。免費門票的制度尚不健全（儘管阿道夫自己已從中獲益良多），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進措施。

這是阿道夫典型的思考方式。他對身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進行一番概括總結。即便是聽音樂會，這樣純粹的藝術體驗，其他人往往都是被動地接受，事過便作罷，而到了他那兒，整件事情就變成了一個全球性問題，因為在他夢中的「理想國度」裡，沒有任何事情是無關緊要的。想必他的「革命的風暴」已經刮開了藝術的大門，甚至鎖定在了許多藝術娛樂領域的「改革」上。

毫無疑問，當年的許多年輕人都曾有過同他一樣的想法。他們都極力反對某些階層在藝術領域繼續享有特權，因此阿道夫的抗議並非孤立無援。但事實上已經有無數的社團、組織和機構為這個目標做出了努力的嘗試，而到最後都是無果而終，更不要說這些狂熱的青年先鋒了。然而我朋友對這個悲傷之地的挽救方式可謂獨一無二。雖然其他人總是滿足於用適度的方式來逐步達到他們的目標，但阿道夫鄙視折中的辦法，他一向是致力那種一勞永逸的總體性解決方案，不管它何時才能夠實現。對他而言，當一個基本構思從他腦海中浮現出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經成為了現實。

他的另外一個特點是：絕不僅僅滿足於簡單的闡釋，而是立刻著手將解決辦法的所有細節詳盡地制訂出來，就如同接到了「上級單位」的命令一樣。可以說他這些細緻的計劃幾乎都好得同現實沒有什麼區

別。一旦他腦子裡有了一個具體化的構思，那麼將其變為現實就只待一聲令下。然而，在我們交往的歲月中，這個命令卻從未被下達過，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內心深處，我總把阿道夫看成是一個空想家的緣故，儘管，我一直都對他那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言語深信不疑。而當時的他，更是絕對相信，有一天，他將以個人的名義，下達這個指令，到那時，成千上萬個由他經手的計劃和工程便會被付諸實現。當然，這些罕見的言語他也只能跟我講，因為他知道，我相信他。我時常傾聽他的構想，但想必任何一個人，在瞭解了他的專案發展規模後都會忍不住要問：「誰會為此埋單呢？」以前在林茨的時候，我的確經常小心翼翼地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在我看來，這是再明顯，再重要不過的事情了。而到了維也納，我學會了剋制自己，學會了在表達投資質疑的時候不要那麼直接。阿道夫一直認為這種問題是多餘的，而且他的回答也在發生改變。在林茨，他的標準回答是「帝國」，我覺得這就跟沒回答一樣。到了維也納，他的回答又變得稍微清晰了一點：

「這是財政專家考慮的事。」但用態度粗魯的回答來封住我嘴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你將成為最後一個問我這種問題的人，看在你對此一無所知的分上」，或者是更簡短的回答，「請你留給我來操心好不好」。

他總是在他的謾罵與抨擊中，抑或在我們的激烈討論中，突然使用一些措辭（他以前從未用過的特殊表達）來表明他正在著手構建的某一項方案。只要他的構想還不具備明確的目標，他的措辭就會不斷地改

變。如此一來，在連續數星期頻繁地出入於音樂廳之後，他首先提出了「在各省展開巡演的管絃樂隊」。我當時以為在維也納真的有這樣的管絃樂隊，我以為阿道夫是在陳述一件事實。然而後來我才發現，他提到的這支「可移動的管絃樂隊」（因為「巡演」這個詞讓他聯想起了太多的二流演出團體）實際上只存在於他的想象之中。由於他從不滿足於折中的辦法，因此很快他就將其名稱改為了「帝國移動交響樂團」。我仍然記得阿道夫為自己的發明感到十分歡喜，在我們為這個機構制定好計劃之後，他決定要建立10支這種樂隊，並且要將他們派往我國的各個地區，這樣一來，即便是身在這個帝國最遠角落的人們，也能夠享受到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一天晚上，正當他對這種管絃樂隊表發鴻篇大論之時，我問道，在這世上，他為何只對音樂方面的事物傾注如此之多的關注。我心想，難道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名藝術家？而他的回答卻簡明扼要，「因為目前有你在我身邊」。這句話的意思是，他把我看作是一個未來的樂隊指揮，只要有我在他身邊，他就一直能夠利用我的建議和我的專業知識來完善他的事業。當然，我聽著這些話心裡還是相當舒服的。但是，當我鼓起勇氣，滿懷希望地問他會把樂隊交由誰來負責的時候，他卻立馬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嘲笑著宣稱道，「肯定輪不到你呀！」不過之後他又一臉嚴肅地補充道，也許他會考慮讓我擔當帝國移動交響樂團的指揮。然而我卻有意冒犯地回答道，我可承受不起這項殊榮，因為我只想指揮一支現實中存在的管絃樂隊，而對於那種幻

想出來的樂隊我並無興趣。此話已足以使他勃然大怒，因為他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計劃產生質疑。「要是我把這樣的重任委託給你，只怕你會笑得合不攏嘴！」他衝我叫嚷道。

對於帝國移動交響樂團的一些細節，我記得比阿道夫的許多其他計劃都還要清楚，因為首先它涉及我的專業領域；其次，在這件事情上，他給了我比平時更多的發言權，其程度甚至超過了之前——我在參與他的歌劇創作《鐵匠維蘭德》之時的情形。我們當時對待這項任務的態度是極其認真的，有天晚上，就為了一個雙踏板豎琴的問題，我們吵了一架。當然，堂堂「帝國移動交響樂團」，雙踏板豎琴肯定是要用的。但是，阿道夫卻堅持聲稱需要給樂隊配備3臺這種極其昂貴的樂器，昂貴且不說，關鍵它們還很難運輸。於是我對他說道，「你這麼搞目的何在？即使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指揮家也只能駕馭一臺雙踏板豎琴。」阿道夫聽後憤怒地衝我吼道：「荒唐，只用一臺雙踏板豎琴，那樂隊如何演奏‘魔火’？」「到時候‘魔火’這段是不會包含在演出節目裡的。」我回答道。「一定會。」阿道夫堅持道。於是我做了最後的努力，「不要忘了，一臺雙踏板豎琴要花費18000弗羅令。」我以為這樣一講會讓他改變主意。「噢，讓該死的錢去見鬼！」他叫喊道。問題就是這麼被解決的。帝國移動交響樂團將配備3臺雙踏板豎琴。

時至今日，每當我想起以前我們為了那些僅存於想象中的事情而爭論不休的時候，我都忍不住莞爾一笑，但那些時光的確是相當美好的，

尤其是當我們發現那朦朧的夢境比現實的生活更加令人激動的時候。我對我朋友那超乎尋常的想象力感到十分驚訝，通過這種想象力，阿道夫就能找到通往他夢想世界的道路。然而，那些在我看來毫無意義的幻想，對阿道夫而言卻顯得至關重要。

帝國移動交響樂團的基本構思還是頗具說服力的，我自己也曾時常考慮這個問題。而阿道夫的解決辦法是既聰明又簡單：樂隊將由一位才華橫溢的指揮組建起來，能夠勝任古典、浪漫和現代交響音樂的演出，而且根據之前確立的計劃，這支樂隊將被派往鄉下。阿道夫問我，在我看來，組建一支什麼樣規模的樂隊比較合適。單憑他這句詢問，而不是自己去翻書，就足以使我感到自豪。直到現在，我們當初一起「構建」樂隊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諸如什麼絃樂器、木管樂器，還有什麼銅管樂器、打擊樂器等，並且我還記得阿道夫是如何將他的佈置做得細緻入微，又是如何針對樂曲的編排問題向我質疑發難的。這樣他便不會忽略掉任何一個小細節，而且能夠把樂隊的各個方面都考慮得十分周全。這就是他性格中，一個令人難以琢磨的特點，也是連我自己都無法解釋的一個悖論：他想要建造的可能是一座「空中花園」，但與此同時，他又會將這些工程設計得無可挑剔。越是顯得天馬行空的構想，他就越要將其做到盡善盡美。

午夜已至，而我們的工作仍在繼續。這支由上百名演奏者以及一支數目可觀的合唱團組成的管弦樂團，能夠與任何一支大型管弦樂團相媲

美。接下來就是硬體裝置問題。當我把那些苛刻的要求列舉出來之後，阿道夫感到相當的震驚。不僅僅是那些一流樂器的運輸安全需要得到保證，還有數量龐大的音樂資料，唱片、桌子、椅子等，這些都需要得到細緻妥善的處理。總不能讓一個一流的大提琴手每天都坐在不同的椅子上吧，這些他還是清楚的。後來，他讓我去和管絃樂協會的幹事接觸一下，以便了解更多的關於樂器購買的問題，然後又讓我到音樂傢俱樂部去打聽了聘請音樂人的相關事宜，最後，他叫我做了個預算。阿道夫對我的調查結果感到非常滿意。他用一個輕蔑的手勢駁回了我的高額預算；但我們在樂隊的服裝制訂上產生了分歧，而且為此我們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因為整個樂隊首先要讓觀眾看上去順眼，這是件基本而又重要的事情。我向阿道夫建議了一套很合適的制服，但他卻不認可。所以到最後我們綜合了一下意見，決定採用一套看上去顯得既高貴又低調的黑色禮服。

對於我們的樂隊來說，最致命的莫過於交通運輸問題，因為這個國家有些地區還沒有覆蓋鐵路。而這些地區恰恰又是關乎整個計劃的重要之處。但當時還很時髦的汽車可以在街道上行駛。在那個年代，人們還會駐足停留，盯著這些發出噪聲和臭氣的交通工具以每小時10英里的「危險」速度，在戒指路上來來往往。那用這種交通工具來運載我們的帝國管弦樂團如何？這將毫無疑問地提高樂隊的機動性，因此也就能夠擴大演出範圍。我忘記了我們把這個想法擴充套件到了什麼程度，因為我個人對此是比較反感的；我無法想象，當我們的樂隊在伴

隨著這種「鬼叫聲」到達目的地後，人們還有何心情去接受其他的悅耳之音。

好吧，先拋開惱人的運輸問題。樂團抵達目的地之後將會受到當地市長的隆重接見，樂團所到之處皆盛裝彩扮，載歌載舞。第一個問題來了：樂團該在哪裡演出？只有很少一部分城鎮才擁有那種能夠容納得下上百名演奏者和數百名觀眾的音樂大廳。「那我們就在戶外演出。」阿道夫說。「在繁星閃爍的天空之下舉辦音樂會肯定會使人們永生難忘，」我補充道，「但只有在天氣情況允許的條件下，這種美好的氣氛才能貫穿始終。」此外，這類音樂會能夠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就只有天上的星星，因為那種音響環境實在不敢恭維。整個計劃幾乎就是建立在如此艱難的事實基礎上。阿道夫沉思了片刻，然後說道：「不是到處都有教堂嗎，我們為何不在教堂裡演出？」從純音樂的角度來看，我對這種想法找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阿道夫建議我去詢問一下教會的權威們，看他們對於帝國移動管弦樂團在教堂裡辦音樂會持什麼態度。就我的觀點而言，這件事情似乎已經漸行漸遠。但我對此保持了沉默，後來阿道夫也忘了追問我的調查結果。

我們在專案規劃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阿道夫想了解一支樂隊排練一出交響樂需要多少時間，並且他也為樂隊缺少固定的規章制度而感到苦惱不已。我曾對阿道夫說，沒有比巴赫，格盧克，漢德爾還有海因裡希·許茨更早的作曲家，而他直接拒絕接受我這種觀點（其實也沒有

哪一位德國作曲家是他堅決擁護的)。「在那之前呢？」他詢問道。

「之前的就不適合用來樂隊演奏了。」我回答道。「你聽誰講的。」他衝我吼道。我平心靜氣地告訴他，就此事而言，我的回答絕對是可信的，如果不信他可以自己去學習音樂歷史。「我正有此意。」他氣憤地說道。如此一爭，我們的討論便陷入了僵局。

其實我當時根本沒有拿他的話當真，因為我明白，要學習音樂歷史並不容易，況且這種事情還在他的專業興趣範圍之外。再者，他也瞭解，這是我比較在行的領域，我在大學裡專門學習過這些課程。然而第二天，當我發現他正抱著一本厚厚的《音樂發展史》苦心鑽研的時候，我簡直大吃一驚。接下來有好幾天他都一心苦讀，無暇旁顧，但這並不能讓他感到滿足。他又向我詢問有關音樂歷史的其他著作，然後把我介紹給他的書一一通讀。

「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創造出了許多優美的音樂。」他評論道，「我們為什麼沒有做出同樣的成就呢？畢竟有一樣樂器在哪兒都是現成的——人的聲音。因為那些睿智的先輩們還在音樂起源的一片黑暗中摸索前行。所以說，對一件事情無知並不意味著這件事情就不存在。」

我對阿道夫那種做事情認真徹底的精神一直都很敬重。但有時候他對每件事情都要刨根問底的做法又搞得我相當的絕望。對於任何事情，只要沒有陷入那種無可挽回的僵局，他就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即便已

經證明了他是錯的，他也不會當場承認，而是會將其歸為有爭議的話題。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出，他這種性格和態度會讓藝術學院的老教授們抓狂到什麼程度。

不管怎麼說，現在樂團就算是建立起來了吧，帝國移動交響樂團將開始執行它的演出計劃，先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接著是格盧克和漢德爾，再到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然後才是浪漫派的代表，安東·布魯克納，他的交響作品將把整臺演出推向高潮。另外，考慮到年輕觀眾的需求，阿道夫自己將作為現代派的代表獨領風騷。他並不打算去迎合維也納音樂界的評論人士，而且平常一有機會他便會對他們展開攻擊，稱他們為「純專家」或者「業內行家」。

從我們建立帝國移動交響樂團的一開始，阿道夫就為自己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筆記本，這件事情我記得相當清楚。那是個簡單便攜的小冊子，在參加完每一場音樂會後，他就會把作品名稱、作曲家和樂隊指揮的姓名全部記在那個小冊子上，有如他對這些事物的個人評價。如果他說，「這個將囊括在我們的演出計劃中。」那麼這就算是對一部作品最高的讚譽了。

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歲月裡，我都在思考著這支「帝國移動交響樂團」。的確，留聲機已經問世多年，雖說它的樣子看上去像個發出嗶嗶聲響的可憐怪物，但是它的問世，卻開啟了「機電化音樂」的大門。無線電報尚處於初級階段。與此同時，雖說唱片和無線廣播已經

發展到了佔有絕對優勢的程度，以至於「表演性音樂」的存在彷彿都成了「機電化音樂」的補充。但我朋友試圖通過帝國移動交響樂團來解決的基本問題，仍舊在所有的天才藝術愛好者中保持著共鳴：怎樣將完美的表演直接呈現給那些熱愛音樂的人們——即不用任何機械輔助裝置——無論他們身在何方。

第二十一章逃兵役插曲

這一天是個天氣晴朗的日子——應該是在3月初的時候——我收到一封信。由於阿道夫從來就沒有收到過任何信件，所以我過去一直都很謹慎，生怕在這方面傷害到他的感情，但他當時立馬就察覺到，此信必定非同尋常。「庫斯特爾，出了什麼事兒？」他饒有同情心地問道。

我只是簡單地回答道：「這兒，拿去看吧。」

讀罷此信，阿道夫臉色驟變，他的眼神中閃爍著一種不祥的光芒，根據我以往的經驗，這種光芒必定預示著他將要大發雷霆。果不其然，他發飆了。

「庫斯特爾，你無論如何也不準去註冊，」他咆哮道，「你要是去了，那你就是個蠢貨。最好的做法就是把這張混賬玩意兒撕成粉碎。」

趁他還未在盛怒之下將我的徵召令撕成碎片之前，我縱身躍起，將其一把奪了過來。

當時我被這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弄得簡直是心煩意亂，而阿道夫很快便穩住了情緒。他頗為鬱悶地在鋼琴與房門之間的狹窄空地上踱來踱去，隨後他馬上擬定了一個計劃，試圖幫我擺脫這種窘境。

「還不確定你能否通過體檢。」他越發鎮定地說道，「畢竟從你上回肺炎發作被治好到現在，才剛過一年，要是你的體檢不合格，那就等於是白激動一場。」

阿道夫建議我應該趕在醫療機構抵達之前先回到林茨等待體檢。如果體檢結果為健康，那我就一刻也不能耽誤，直接祕密地穿過奧地利邊境，逃到德國的帕紹。絕不要為奧匈軍隊效力。他聲稱道，這個氣數已盡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值得讓任何一個士兵為它去賣命。由於我的朋友比我小9個月，所以他根本沒指望能收到他的徵召令，除非等來年，也就是1909年。但很顯然，他目前已經打定主意，堅決不加入奧地利軍隊。抑或，他是頗為得意地把我當作他的實驗品，想用我來檢驗他的辦法在實踐中是否真的能夠奏效。

第二天，我就此事專門諮詢了音樂學院的院長，在看完了我的徵召令後，他向我解釋道，作為音樂學院的一名學員，我可以只服役1年，但他又建議我可以去註冊預備役，理由是，我父親是一名商人，而我是

家中的獨子。在預備役裡我只需要進行8周的訓練，然後再待上幾個月就算完事。我問他，跑到德國逃避兵役這個辦法如何。他聽了這一非同尋常的建議之後感到相當震驚，並極力地奉勸我不要採取這種做法。

對於阿道夫而言，即使是在預備役服役都算是一種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極大妥協，他不厭其煩地對我展開遊說，試圖讓我贊成他的計劃，並收拾行李，趕緊動身。

回到林茨後，我把阿道夫的建議告訴了我父親，說實話，我對這個想法地著迷程度還真不是一星半點。對於服兵役這種事情，我真的是沒有一點點激情，即使是8個星期的預備役生活，在我看來都是一種煎熬。

我父親聽了我的想法後簡直比我院長都還要驚慌。「我的天，你腦子裡究竟在想些啥？」他搖著頭衝我大聲地質問道。如果我祕密的越過邊境，或者直言不諱地說，進入無人區，那麼依照法律我就會受到起訴，他聲稱道。最要命的是，如果事實成立，我將再無機會踏進家門半步，而含辛茹苦把我養大的父母親也將永遠地失去他們唯一的兒子。

我父親的這番話，再加上我母親的淚水，喚醒了我的理智。就在當天，我父親去拜訪了一位和他關係不錯的政府官員，看能不能將我列

為預備役人員，他即刻草擬了一份申請表，並建議我在通過服役體檢之後上交給他。

我寫信告訴阿道夫我已經採納了音樂學院院長的建議，並準備於幾天之後進行體檢。在那之後我會和我父親一同前往維也納。這個時候，阿道夫大概也想通了，他可能已經意識到，他的計劃並不適用於我，因為在他的回信中，他壓根就沒有提及此事。當然，也有可能是表示他還不願放棄這個計劃，因為我們畢竟只能從理論上去討論這個計劃的危險性。而另一方面，在得知我父親將同我一起來維也納之後，他感到非常的高興（事實上我父親後來並沒有去成）。我還寫信告訴阿道夫，說我來的時候會帶上我的中提琴，萬一碰上樂隊招人，我還能掙點外快。在維也納學習期間，我染上了結膜炎，是林茨的一位眼科醫生治好了我的病，所以我提醒阿道夫，要是在火車站看見我戴著眼鏡可別感到意外。

幸運的是，我至今還保留著他當時的回信，收信人為「斯塔德·穆斯·古斯塔夫·庫比席克」：

親愛的庫斯特爾：

感謝你的來信，你可知道，當得知你父親當真要來維也納的時候，我有多麼的高興，我恨不得馬上向你表達我心中的喜悅。要是你和你父親不介意的話，我將在星期二上午的11點鐘到火車站來接你們。你在

信中提到，林茨那邊的天氣很好，這幾乎讓我有點嫉妒，要是不下雨，我們這邊照樣也是好天氣。聽說到時候你還要把你的中提琴帶來，我很樂意，到了星期二，我就會去買兩克朗的棉花和糲糊來堵住我的耳朵。還有，我知道你快要瞎了，這讓我頗為傷感；因為你會比平時彈錯更多的音符。等你完全瞎了之後，我也就被你逼瘋了。噢，天啊！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要祝你們全家復活節快樂，並請你向令尊令堂轉達我最誠摯的祝願。

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信上的日期為4月20號，也就是說，這封信是阿道夫在他生日那天寫給我的。就阿道夫當時的生活狀況來看，他沒提及自己的生日，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他可能甚至根本沒有想起那天是他的生日。

信中但凡是提到我父親的地方，都顯得畢恭畢敬。甚至連線站這種事情他都要向我詢問。但一說到天氣，他又開始調侃諷刺了，「要是不下雨，我們這邊照樣也是好天氣」。後面當他把矛頭指向我的中提琴時，他的冷幽默也發揮到了極致。他甚至還拿我的眼疾來調侃，直到他大呼過癮似地講出了那句「噢，我的天」，整篇書信才以一種非常老套的形式收尾。阿道夫的拼寫還是一如既往地糟糕，從信中的一些初級德文的拼寫上就能夠看出這一點。若是叫他以前的德語老師休謨教授來給這封信做個評價，那他肯定連個「中等」都不會給阿道夫，還有像標點符號的使用這些，就更不要提了。

在約定的時間到來那天，我去參加了體檢。體檢結果上顯示我身體健康，符合規定要求，於是後來，我便提交了參加預備役的申請。

當我回到維也納的時候——沒戴眼鏡——阿道夫熱情地迎接了我，因為儘管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但我現在還是能夠繼續和他一起生活，這讓他感到非常的高興。當然，他對我這個「預備役軍人」也是極盡調侃之能事。他說，他想象不出軍隊裡那些人究竟能用什麼手段來把我變成一個士兵。是啊，就連我自己也無法想象。但好在我還能夠繼續完成我的學業。到家後，阿道夫為我畫了一張肖畫素描，還在頭上給我畫了頂豎起的帽子，帽子上還插著根羽毛。「瞧，這就是你，庫斯特爾，」他開玩笑道，「你還沒入伍，看起來就已經像個老兵了。」

在度過了這個漫長而蕭條的寒冬之後，我們又迎來了一個春天。自從之前我重溫了一遍家鄉林茨那片親切的熱土以後，我頓時感到我們在斯通帕街居住的這間偏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暗淡。想起以前我們在林茨無數次的鄉間漫步，我不由得想說服阿道夫和我到維也納的鄉下做幾次徒步旅行。因為如今我有了更多的空閒時間，我的學生們在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後，都各自回了家，而且她們在臨日之前還贈給我一個精緻的小禮物，讓我驚喜不已；所以在我們的共同資金中又多了一筆小錢（總之，我當時是這麼考慮的）。當戒指路上的花壇開滿鮮花，當我們為春日裡那和煦的陽光所誘惑，我便再也無法忍受這座

城市那令人窒息的高牆了。而阿道夫也和我一樣，期盼著前往郊外，逃離這座城市的喧囂。

我知道他很喜歡鄉下的自然風光，他喜歡那些蔥鬱的樹林，還有遠處連綿起伏的淡藍色山峰。早在查克雷斯夫人那散發著煤油惡臭的房間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之前，阿道夫就已經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跑去美泉宮公園，但這僅僅是他自己的處理方式，對我來說還不夠，此時的我想看到更多維也納的鄉間景色。阿道夫又何嘗不想，但他解釋道，首先，他無法承擔「如此高昂」的費用，這個不要緊，因為我已經決定，這次旅行費用由我一人支付，為表誠意，我已於頭一天把我們兩個人旅行所需的物品都準備齊全了。其次——這事兒更難處理一點——如果說我們想要做個全天旅行，那他就必須得早起。早起對他而言是件最痛苦的事，他寧願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叫他早起。

要知道在早上把他叫醒是件相當危險的任務——他完全有可能會變得六親不認。「你一大清早把我弄醒幹什麼？」他會衝我吼道。即使我告訴他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他也絕不會相信我。我會斜身探出窗外，仰著腦袋望向上方的一小片天空。「晴空萬里啊，陽光明媚啊」，我會自嘆道，但不會轉過身去看他，而很快阿道夫又死死地睡去。

如果我還算順利地將他叫醒並且踏上了旅途，那我必須對前幾個小時的尷尬行程要有心理準備。因為一旦被我「這麼早」叫醒之後，他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言不發，而且悶悶不樂，你問他什麼問題，他

也只是勉強地哼幾聲。只有當我們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郊外的開闊綠地之時，他才會變得豁然開朗。當然，那個時候他就會顯得很高興，很滿足，甚至還會感謝我當時堅持把他叫醒。

我們的第一站是維也納森林的黑曼斯科格爾山，當日的天氣簡直好極了。我們佇立在山頂，發誓要遊遍這裡的山山水水。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又去了趟維也納森林。儘管我們穿的衣服和便鞋看上去不怎麼提勁兒，但其他的事情我們還是準備得很充分。那天我們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根據我們的標準，從圖爾納費爾德開始，途經裡德和普克斯多夫，最後再返回到市區。那鄉間的景色讓阿道夫醉心不已，他說這讓他聯想起了米爾地區的某個美麗之處。毫無疑問，他內心的思鄉之情此時正在蔓延，儘管那裡已再無任何一人值得他留戀，但那片土地卻承載著他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美好回憶。

為了到瓦豪去旅行，我特意向音樂學院請了一天的假。我們必須很早就乘火車到梅爾克，直到親眼目睹了那不可思議的修道院之後，阿道夫才充分地感受到了早起的價值。可他一旦沉迷其中，那誰也拉不走。他不會遵從旅遊指示牌的引導，而是東竄西遊，到處尋找祕密通道和通往地下室的樓梯；他想考察這些建築到底是怎樣用石頭建造而成的。的確，很難想象這些龐大的建築居然是用石頭堆砌而成的。過後，我們又花了很多時間去參觀圖書館。

然後我們坐上大汽船，在河中游覽了美麗的瓦豪。雖然這次遊歷只是與他心愛的多瑙河的一次重逢，但阿道夫就如同變了一個人。因為維也納這座城市離多瑙河並不算很近，不像在林茨，他可以站在橫跨多瑙河的大橋上，等候一位與眾不同的金髮美女從烏爾法爾一路走來。他對多瑙河的思念幾乎能趕上對斯蒂芬妮的痴迷。此時，那些城堡、村莊，還有山坡上的葡萄園都分別緩緩地移入我們的視線，然後又緩緩地離我們而去。我們感覺自己好像並不是在前行，倒像這美麗的風景伴隨著平靜的節奏在我們的眼前浮動。這是一個多麼浪漫的世界，如此景緻，就像魔法一般的神奇。阿道夫置身船頭，全身心地貫注到了這片景色當中。直到汽船駛過克雷姆斯，沿著樹木成行，單調乏味的河岸繼續前行，阿道夫仍是不發一言。誰也不知道他的思緒飄到了哪裡。

就好像是上天執意要為我們的奇幻旅程做些平衡，所以我們下一站來到了菲施門德。我相當失望。難道這還是剛才那條令我們滿心愉悅的河流嗎？難道這還是為我們所熟悉的那條親愛的多瑙河嗎？碼頭、倉庫、煉油廠，還有坐落於其間的漁棚、貧民窟，甚至還有真正的吉卜賽營地。我們究竟是到了哪兒？這簡直就是另外一條「多瑙河」，它不再屬於我們祖國那幅美麗的畫卷，而是屬於一個奇怪的東方國度。回到家後，阿道夫顯得憂心忡忡，而我也感到大失所望。

然而在我腦海中最鮮活的一段記憶，要屬之前那個夏天，我們做的一次登山旅行。前往塞默靈這段旅途比較遙遠，遠到足以讓阿道夫從早起的恍惚中回過神來。火車駛過維也納新城之後，立馬就是一片多山地帶。鐵路只得修成弧線才能繞上塞默靈的最高點，為了攀升至980米的高度，許多彎道，隧道還有高架橋都是必不可少的。阿道夫對這些軌道的大膽設計感到相當興奮，驚喜也是接連而至。要是能夠對其進行細緻考察，他甚至願意下車，順著鐵軌走完全程。我已經做好準備，在下個機會到來的時候，聽他對高山鐵軌的修建發表一通重要演講。因為他肯定已經想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設計，比如更高的架橋和更長的隧道。

塞默靈到了！我們下了車。多麼美好的一天，那裡的空氣是多麼的純淨，天空如此湛藍！在陽光的照耀下，綠草上的水珠晶瑩透亮，茂密的樹林挺拔有力，放眼望去一片墨綠，在高山的頂峰，依然覆蓋著皚皚白雪，有如白塔，直入雲霄。

返回維也納的火車要到傍晚才離開；我們擁有充裕的時間，這一整天都是我們的。

阿道夫很快想出了我們的目標。哪座是這裡最高的山呢？據我們所知是拉克斯山。於是，我們就去攀登拉克斯山。

阿道夫和我對登山這項運動都毫無概念。我們平生征服過的最高「山峰」不過就是米爾地區的一座緩和的山丘。以前我們也僅僅是在遠處望著阿爾卑斯山。但是現在，我們置身於阿爾卑斯山的環抱之中，併為其兩千多米的海拔感到震撼不已。

對於阿道夫來說，他的意志力總是可以彌補任何缺失。我們根本沒有帶口糧，因為我們原本就只是打算從塞默靈高地下來，一路走到格洛格尼茨。我們甚至連個包都沒背，而且身上的衣服都是我們在城裡散步時穿的那種。我們的鞋子過於輕便，鞋底單薄，而且不帶鞋釘。我們穿了長褲和外套，但一點兒的都不保暖。然而，陽光明媚，我們又是年輕體壯，所以——出發吧！

登頂前的豪情壯志已經完全被下山時的狼狽不堪給掩蓋，以至於我都記不清我們是選的哪條路線了。如今我只記得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才登上山頂的一處平臺。當時我們好像是登上了頂峰，但可能並不是拉克斯山的頂峰。我還從來沒有登上過一座大山的頂峰；我有種無拘無束的感覺，彷彿我已不再屬於地球，而是來到了天庭的門口。

阿道夫顯得頗為感動，他站在山頂的平臺上，一言不發。

我們極目遠眺，寬廣的大陸盡收眼底。草地與森林猶如一張巨型彩色地毯，教堂或村莊點綴其間。人類的事業顯得如此的微不足道。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刻，或許也是我和阿道夫一起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

情緒高漲的我們早將疲憊拋到了腦後。我們在兜裡找到點乾麵包，於是就靠它充飢。沉浸在快樂氣氛中的我們根本沒有去留意天氣的變化。剛才不是還晴空萬里嗎？轉瞬之間，烏雲就已浮現，霧氣也籠罩而來；其變化之迅速，就像是舞臺劇的場景切換一樣。

大風驟起，將雲霧吹至我們眼前，宛如一張搖擺不定的長罩子。一聲悶雷從遠處傳來，閃電不時地在我們頭頂上交織，其狀神聖而令人敬畏。

穿著「戒指路散步裝」的我們開始感到有點發冷了。於是我們便匆忙地往山下的村莊趕去，單薄的褲子貼在我們腿上被吹得嘩嘩作響。但山路崎嶇，佈滿了堅石，我們穿的鞋子根本就不適宜爬山，此外，由於當時風暴正在向我們逼近，所以我們只得全速前行。起初只是能聽見雨點打落在樹葉上的聲音，而後來，雨越下越大，與其說是雨，倒不如說是掛在樹梢上的水柱，直愣愣地澆打在我們身上。我們只顧拼命地跑呀跑，能有多快就跑多快，根本不指望能夠採取點什麼有效地保護措施。不多時，我們全身上下就找不到一處乾地兒了，簡直被淋成了落湯雞。

不管我們繞到什麼地方，始終都找不到一處避雨之所。阿道夫並沒被這場暴風驟雨給嚇到。令我驚訝的是，雖然雨水已經浸透了他的全身，但他的心情卻顯得十分愉悅，雨下得越大，他就越顯得從容。

我們沿著石塊路蹦跳著跑步前行，就在這時，我發現了一個小棚屋。我想，繼續像這樣在大雨裡奔跑也不是個辦法，再說，天色已漸晚，於是我建議阿道夫到那個小屋裡去過一夜。他立馬就答應了——在他看來，這段探險之旅的確是沒法再繼續了。

我檢視了一下那所小木屋，屋子裡的左側堆放了一些乾草，容我們兩個休息一晚上是不成問題的。阿道夫脫下鞋子、外套和褲子，然後開始擰衣服。「你也餓壞了是吧？」他問道。當我告訴他我的確是餓了的時候，他反倒感覺好受了一些。一份痛苦，兩個人分擔，便成了半份痛苦；明顯這句話也適用於飢餓。

與此同時，我在小木屋的右內側發現了幾大匹粗帆布，那是農民們下山時用來包裹乾草的。阿道夫穿著已經溼透的內衣站在門口，一邊擰著衣服袖子，一邊瑟瑟發抖，看著這一幕我心裡真的感到相當愧疚。因為他的體質相當虛弱，稍微受點冷就要得肺炎。所以我拿起一匹帆布鋪在了乾草上，我叫他把打溼的襯衣和內褲脫掉，然後用布裹住身體。他也照做了。

他光著身子躺在鋪好的布料上，我扯起布料的一端嚴嚴實實地將他裹了起來，然後我又抓過第二塊布料給他蓋上。給他蓋好之後，我又擰乾了我們所有的衣物，然後將它們全部晾了起來，最後我也找了塊布將自己裹住，躺下休息。如此一來，我們晚上便不會受冷了。我又額外抓起幾塊布分別搭在了阿道夫和我的身上。

我們兩個都沒戴錶，所以不知道時間。我們只知道外面一片漆黑，而且雨水還在不停地敲打著木屋的屋頂。遠處傳來陣陣犬吠聲；可想當時我們離住戶還不算很遠，這點讓我感到很欣慰。然而，當我給阿道夫講明這個情況的時候，他卻顯得漠不關心。他似乎覺得，就當前環境而言，其他的人都是多餘的。他盡情地享受著這次冒險之旅，尤其是這種浪漫的結局對他最具有吸引力。漸漸地我們就暖和了起來，要不是我們還忍受著飢餓，這間小屋子就能稱得上是舒適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母，而後我就睡著了。

當我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稀疏的陽光已經透過木板照射了進來。我們的衣服都差不多全晾乾了。

我依然記得，叫阿道夫起床是件多麼費神的差事。當他最終醒來之後，只見他雙腳蹬出鋪蓋，把帆布往身上一纏就走到門口觀望天氣。他那苗條的身材配上搭在身上的白色帆布，看上去就像個印度苦行僧。

這是我們兩個最後一次愉快的遠足旅行。

正是因為我去醫療隊體檢這件事情中斷了我們在維也納的生活，所以這些旅行和冒險才變得如此的美妙，同時也為我們在斯通帕街，那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增添了幾分慰藉。

第二十二章希特勒對女人的看法

每場歌劇演出的間歇時間，我們都會到休息大廳去活動一下筋骨，在那裡，女生們對我們的關注讓我感到受寵若驚。起初，我常常好奇的想知道，我們倆到底誰才是她們關注的物件，私下我一直以為是自己，想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後來，通過近距離的觀察，我才發現，這種直白的好感並不是投給我的，而是衝著我朋友來的。阿道夫對每一位擦身而過的女士都有著一種吸引力，雖然他穿著樸素，舉止矜持，但偶爾還是有一兩位女士朝他回望，要知道，根據嚴格的歌劇院禮儀，這種舉止是相當不得體的。

令我更加不解的是，阿道夫竟然對她們的舉止無動於衷；相反，他很少理會那些女子向他傳送的秋波，或者頂多是氣憤地在我面前對她們評說幾句。雖然這些評論確實顯示出我朋友對異性的強烈興趣，但他從來沒有利用這種好感去佔別人的便宜，這點讓我感到相當詫異。他究竟是不解風情還是對這種事情完全不屑一顧？我推斷是後一種因

素，因為阿道夫是個敏銳而挑剔的觀察者，以至於他時常忽略掉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尤其是跟他自己相關的事情。可是他為何又不抓住這些機會呢？

試想一下，一位美麗聰慧的姑娘將會給我們在瑪利亞希爾夫那處偏室的無聊生活（阿道夫將其稱作「狗過的日子」）帶來怎樣的樂趣！維也納不是一座公認的美女之都嗎？這話著實不假，我們也用不著去懷疑。那當時又是什麼原因讓他望而卻步呢？對於其他的年輕人來說，這都是些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他從來沒有考慮過一個事實：我是在他的建議下和他住到一塊兒的。當時他根本沒有想過我對這種生活的感受。就他的行事作風而言，他總是想當然的認為，凡是覺得是正確的事，我就應該照做。說到同女生交往這個話題，他無疑對我表現出的羞怯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使得我只能把更多的空閒時間消磨在他身上。

有這麼一段小插曲至今還保留在我的記憶中。有天晚上，我們從歌劇院的休息大廳返回到「散步走廊」，一個身穿制服的服務生朝我們走來，他拽了一下阿道夫的袖子，遞給他一張便條。阿道夫一點兒也沒感到驚訝，如同司空見慣一般，他接過條子，對服務生道了聲謝，然後匆忙地開啟便條過目。當時我還以為自己捲入了一個巨大的祕密之中，或者至少說見證了一段風流軼事的開始。但阿道夫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句「又是一個」，然後就把條子遞給了我，他用近乎嘲弄的眼

神瞟了我一眼，還問我想不想去赴這個約。「這是你的事情，與我無關。」我略顯惱羞成怒地回答道，「我可不想讓這位女士失望。」

每次只要是和女性有關的事情，不管是哪個層次的女性，都「與我無關」。即便是在大街上，我的朋友也是受人傾慕的物件。每當夜晚我們從皇家歌劇院或者城堡歌劇院看完演出回家的時候，偶爾就會遇到個別路人走過來跟我們搭訕，她們不僅不在乎我們寒酸的外表，而且還邀請我們到她們家去過夜。但是，同之前一樣，只有阿道夫受到了邀請。

我十分清楚地記得，那時候我常常不解自問，這些女孩兒到底看上了阿道夫哪一點。雖說他的身材在年輕人當中還算不錯，但是他相貌平平，根本談不上人們通常所形容的那種「帥氣」。要說帥哥，我在舞臺上見得多了，我瞭解女人心中的帥哥是啥樣的。也許她們是被阿道夫那雙明亮有神的眼睛給迷住了，或者難道是他那禁慾主義者一般的冷峻面孔？再不然就是他對異性明顯的不屑，招致她們禁不住想去測試他的定力。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反正女人們好像總是能夠嗅到我朋友的與眾不同之處——男性則相反，比如他的老師們。

那時候，對哈布斯堡王朝衰敗的預見，使得整個維也納沉浸在一片浮華與逍遙的氣氛當中，在維也納人聞名的魅力之下，掩蓋著淪喪殆盡的道德。當時有這麼一段流行的口號，「砸鍋賣鐵，奔赴天堂」。這句口號漸漸地讓中產階級陷入到了「上流社會圈子」那種膚淺而病態

的精神狀態之中。那種對肉慾享受的熾熱追求，大量的反映在了亞瑟·施尼茨勒的戲劇作品中，為整個社會的風氣定下了基調。當時有句很有名的話是這樣講的，「奧地利將毀在女人的手上」，從維也納人的社會看來，這還真不是句假話。在這種脆弱的環境中，處處都縈繞著人們纏綿而情色的低吟，而我的朋友卻心甘情願地過著他的禁慾生活，在對那些年輕的姑娘、小姐們示以憐憫的同時，他還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絕對算不上是人身攻擊，而對於那些和他年齡相仿的男青年，阿道夫則將他們的個人體驗當成爭議之談擱置起來。他會在我們夜間談話的時候，將這些想法表露出來，而且語氣總是顯得格外的冷漠和客觀，就好像這種事情離他十分遙遠一樣。

這個部分與本書其他章節的敘事手法相同，若要了解在我們的友誼歲月中，阿道夫對女人持何態度，我就必須將我的個人經歷完整的與之相結合。從1904年的秋天到190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將近四年的時間裡，我都與阿道夫形影不離。他從一個15歲的男孩變成了一個成熟的男子漢，在此期間，他向我吐露過許多不為人知的心聲，其中有些事情甚至連他母親都不知道。回想在林茨的時候，我們的關係特別要好，如果說當時他和某個女生有了交往，那我自然也會知曉。要真是那樣，他每天就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和我處在一起，而且他的興趣愛好也會產生變化，反正總會顯現出許多類似的跡象。所以說，除了他的夢女郎斯蒂芬妮之外，他心裡就再也沒裝過其他的女生。然而，1906年的五六月份還有1907年的秋天，這兩段時間，我給不出他的任何資

訊，因為當時阿道夫是獨自一人在維也納生活。但試想一下，若阿道夫真是邂逅了一段愛情，難道在我們重逢之後這段關係就終止了嗎？難道就不會留下任何一點兒蛛絲馬跡嗎？所以我敢肯定地講，無論是在林茨還是在維也納，阿道夫都從沒和任何一個女子發生過關係。

自從跟他生活在一起之後，我和阿道夫就時常針對兩性關係展開深入地討論，而我在這方面的個人經驗也幾乎全都基於那些明顯無意義的道聽途說。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知道阿道夫的確是做到了言行一致。支配著他道德品行的並不是他的慾望或情感，而是他的知識和判斷力。在這方面，他表現出了極端的自制力。他無法忍受維也納某些圈子的膚淺氛圍，而且我也沒見過他在對異性的態度上做出過任何的自我妥協。但我必須要宣告的是，阿道夫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在性取向上，都絕對正常。只不過他的非凡之處體現在別的地方，而非聲色領域。

他過去經常繪聲繪色地向我闡述早婚的必要性，他說這種做法能夠為人類的延續提供有效的保障；他認為國家應該鼓勵每個家庭多生育子女（後來這一想法得到了實施）；他還給我詳細地闡述了良好的居住環境，同健康的家庭生活之間的關係，並向我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國中，愛情和兩性關係的問題、婚姻問題、家庭問題以及子女問題將會得到怎樣的解決。每當他談論起這些話題，我就會聯想到斯蒂芬妮，因為這些頗具說服力的設想，畢竟大都源自於阿道夫心中所憧憬的那

種，同斯蒂芬妮廝守一世的理想生活方式，只不過他將這些想法轉而上升到了政治和社會層面。他曾想過要讓斯蒂芬妮成為他的妻子，在阿道夫眼中，斯蒂芬妮就是他理想中的典型德國女性。因為她，阿道夫有了結婚生子的衝動，也是為了她，阿道夫才設計了那座漂亮的鄉村別墅，從而為他理想中的家庭公寓確立了標準。

但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些美好的願景。他已經有好幾個月沒再見到斯蒂芬妮，而且提及她的次數也越來越少。即便是在我回林茨去處理服兵役的相關事宜的時候，他也沒有叫我去打聽過斯蒂芬妮的訊息。難道斯蒂芬妮對阿道夫而言已經不再重要？還是因為這被逼無奈的分離讓阿道夫強烈地意識到，最現實可行的做法就是將她徹底的忘掉？而每當我幾乎要被自己的推論給說服的時候，就總會突然冒出一些明顯的跡象，強力地向我證明著，他依然全心全意地愛著斯蒂芬妮。

其實我很清楚，阿道夫心中的斯蒂芬妮已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失真，她甚至已經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理想。他也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衝到蘭德大街去證實他摯愛的客觀存在。他再也沒收到過她的任何訊息。顯然，他對斯蒂芬妮的感情已經脫離了事實基礎。難道說當初那段充滿希望的戀情就這麼草草收場了嗎？

我的回答是，既對又不對！事情到了這個份上，也該有個了結。阿道夫再也不像從前那個多愁善感的少年，帶著青春期的放縱，有恃無恐地追逐著自己那份渺小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我卻無法理解，如今的

阿道夫，雖然已是一個懷揣有具體理想和目標的成熟青年，但他為何又要如此頑固地去堅守一段毫無希望的愛情；這等境界的確能夠讓他對這座大城市的各種誘惑產生免疫。

我很瞭解我的朋友在男女關係上持有的嚴格觀念，並且我時常對阿道夫所恪守的道德觀感到驚訝。他的愛情觀和婚姻觀肯定不是受到了他父親的影響，而他的母親總是將他視如珍寶，所以她也肯定沒有給阿道夫帶來這方面的影響；再說他母親也用不著給他這種的影響，因為她會認為阿道夫在女生面前的行為舉止相當得體。阿道夫出生於一箇中產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奧地利公務員，這便是他的背景。所以說，針對他這方面的許多保守觀點（我以前也曾或多或少地跟他談起過），我只能果斷地給出這樣一個解釋，那就是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激情導致了他這種態度和觀點的產生。他對道德的理解並不基於他的個人經驗，而是抽象的邏輯推論。

另外，他依然很尊敬斯蒂芬妮，儘管對阿道夫而言她已變得遙不可及，但作為德國女性的一個理想標準，她超越了阿道夫在維也納見過的任何一樣事物。我時常注意到，當一個女人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後，他立馬就會談到斯蒂芬妮，然後開始拿她們作比較，但比來比去總是斯蒂芬妮更好。

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那位「遙遠的她」根本不知道這個男青年的名字，她甚至都沒有對阿道夫的深情愛意做出絲毫的迴應。然而她

帶來的強烈影響，不僅使得阿道夫萌生了個人的道德觀，而且還極力地驅使著他去奉行這些道德準則，就如同一個將畢生都奉獻給上帝的修道士。在維也納，這座連賣淫都值得讓藝術家去稱頌的罪惡之巢，他這種作風無疑是個例外。

事實上，阿道夫曾在那段時期給斯蒂芬妮寫過一次信。我已無法確定他寄出這封信的時間究竟是在我來到維也納之前還是之後。如今此信已不復存在，我也是通過一種特殊途徑瞭解了此事。我曾將阿道夫對斯蒂芬妮的愛戀告訴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給阿道夫·希特勒寫過傳記，是一位尊重科學而又客觀公正的學者。他查到了一個老婦人的住址，這個老婦人是一位上校的遺孀，現今居住在維也納。我的學者朋友前去拜訪了她，並當面對她提出了一個奇怪的請求，就是告訴我朋友一些關於她年輕時候的事情，他讓這個老婦人回憶以前是否認識一個住在洪堡大街，後來搬到烏爾法爾布呂滕大街的年輕學生。他還提示性地補充道，每天傍晚，這個學生都會在他一個朋友的陪伴下，到施密托爾街口去等她。這時候，那個老婦人便開始講述她以前跟那些年輕軍官們的娛樂，比如什麼打球、遠足、火車旅行等。儘管她很願意配合，但她就是怎麼也記不起還有這麼個奇怪的男青年；在獲悉了他的名字之後，除了無比驚訝以外，她仍然回憶不起任何線索。但突然之間，一段回憶在她腦海中浮現出來，多年以前她收到過一封來信，信的內容含混不清，大意是乞求她要保持信念，等他學成歸來，有了社

會地位再跟她聯絡。信上並未署名，從此信的風格上看大致可推斷是阿道夫寫的。那位老婦人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麼多了。

當阿道夫心中的思念開始蔓延的時候，他再也沒有直接地提起過斯蒂芬妮，而是一味地將自己的感情傾注到他的專題研究上，比如由國家提倡的早婚，以及女性工作者通過貸款購置嫁妝的可能性，還有為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輕家庭提供帶有花園的住房。我記得當時我們還針對其中一項特殊的提議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阿道夫提議創辦一座國家傢俱生產廠，以便能夠減少年輕夫婦的家庭裝修成本。而我對這種傢俱工業化生產的想法表示強烈反對。畢竟在這件事情上，我還是有資格發表意見的。質地上乘的傢俱必定為手工製造，而不是機器生產。只要我們用其他辦法削減成本，那這些年輕的新婚夫婦就可以把上好的傢俱帶回家，柔軟的羽毛床墊，布藝的椅子，有品位的長椅，如此一來，人們就會領略到裝潢大師的精湛技藝。

在無數次的深夜長談中，阿道夫跟我談論過許許多多的事情，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濃縮成了一句特殊的短語留在了我的記憶當中，這句經常穿插在我們激烈討論中的陳詞濫調叫作「生命之火」。一旦碰上愛情、婚姻或者兩性方面的問題，這個神奇的公式就會立馬呈現。維持「生命之火」的純潔性是構建理想之國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也是我朋友在孤獨時刻的精神支柱。出於我思想上固有的嚴謹，我並不太理解阿道夫這句「生命之火」，因為這個短語的意思還會偶爾產生變

化。但到了後來，我自認為我還是能夠正確地理解它的意思。所謂生命之火就是神聖愛情的一種象徵，它的激發或產生必須要求男女雙方在肉體和精神上保持高度的純潔，這樣一來，就能使每段婚姻變得更具有價值，從而也能為國家培育出健康的後代。

像這種短語或者說措辭，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現在他的言論中——阿道夫還有一大堆類似的表述——對我產生了一種古怪而又深刻的影響。頭一回聽到這些莊重的措辭之時，我還感到相當可悲，我暗自嘲笑著這些誇誇其談的公式法則，因為我覺得它們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現實意義。儘管我對此嗤之以鼻，但這些話還是留在了我的腦子裡，就如同長著無數倒刺的薊花粘住了人們的衣袖，總是揮之不去。因此，如果我碰上這類情況，哪怕是最不著調的情況——假設有一天傍晚，我在瑪利亞希勒夫大街獨自散步的時候遇到一個女孩，一個長得十分標緻的女孩，或許她還有點輕浮，因為她公然地轉過身來看著我。至少這一回我敢肯定她感興趣的人是我！事實上她必定相當輕浮，因為她竟挑逗般地向我揮手！但突然之間，「生命之火」這幾個字就會出現在我的腦子裡——稍微考慮欠妥，我那團神聖的火焰就將永遠的熄滅。雖然我很討厭這種教化方式，但在那種時刻，它們還真的挺管用。這些短語之間都存在著聯絡。起初是「革命的風暴」，接著是為「德意志神聖帝國」設立的無數個政治口號。也許有一些短語是阿道夫在書上翻到的，但其餘的都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

漸漸地，這些簡單的語句演變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由於阿道夫喜歡關注周圍發生的所有事情，因而每個新的現象都能用來檢驗他的政治哲學是否完備。

有時候一些回憶會奇怪的並列出現在我腦海中，所以在講述了神聖而無與倫比的「生命之火」後，我馬上又要談到罪惡之巢，在我朋友的理想世界中，「罪惡之巢」這幾個字是種低階的表達。當然，在他的理想國度中是絕對沒有罪惡之巢的。阿道夫用這幾個字來描述維也納當時諸多的賣淫場所。由於道德的淪喪在那些年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各種形式的聲色場所隨處可見，既可以是在市中心的優雅街道上，也可以是在郊區的貧民窟中。阿道夫對這一切感到無比的憤怒。但針對這股淫亂之風，他所譴責的不僅是大多數「身體力行」，參與其中的市民，還有那些理應為當前的社會、經濟狀況承擔責任的人。阿道夫把這種性交易稱作「我們這個時代的恥辱紀念」。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出問題的癥結，然後想出解決的辦法，以便能使這種「愛情交易」在今後不復存在。

有天晚上的經歷讓我永生難忘。我們當時去劇院觀看演出，劇目是韋德金德的《青春覺醒》，按照慣例，直到落幕我們才離開。然後我們穿過戒指路，朝著回家的方向，往錫本施滕大街走去。這時候，阿道夫出人意料地抓住我的手臂對我說：「庫斯特爾，跟我來！我們必須

親眼見識一下罪惡之巢。」我沒明白他怎麼會突然產生這種想法，可還沒等我緩過神，他已經拐進了昏暗狹小的施皮特爾貝格街。

於是我也就這麼跟著去了。我們緩緩走過一排低矮的房屋，燈光照亮了落地櫥窗，從外面一看，裡面的房間一覽無餘。房間裡坐著一些女子，有的靠在玻璃窗後，有的倚在敞開的玻璃窗前。她們中有幾個還相當年輕，而其餘的則提早上了年紀，顯得面容憔悴。她們衣衫不整地坐在那裡，或是化妝，或是梳頭，或是照鏡子，然而卻無時無刻不在注視著從街上走過的男人。偶爾會見到一名男子停下腳步，斜靠在玻璃窗旁，打量著被他相中的小姐；緊接著一段倉促的討價還價就將悄無聲息地展開。而後，作為交易達成的一種跡象，玻璃櫥窗裡的燈將被關掉。這種行業慣例讓我倍感驚訝，因為人們竟能通過櫥窗的明暗變化來了解交易的進展情況。作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慣例，嫖客們從不會在那些未亮的櫥窗前逗留。

而我們甚至都沒敢靠近那種亮著燈的玻璃櫥窗，只是在對面的伯格街若無其事地邁著步子。就在我們走到了街道的盡頭之時，阿道夫突然來了個大轉身，然後我們把這個罪惡之巢又逛了一遍。我本來覺得有這麼一次體驗就已經足夠，可沒想到阿道夫竟然還把我拽到了對街，我只好硬著頭皮跟他沿著那排明晃晃的櫥窗一路往下走。

或許這些小姐們也看出了阿道夫的「特別之處」，抑或她們已經意識到，她們將要應付的是個具有道德約束的人，比如說，一個偶爾光顧

這座不潔之城的鄉村宗教信徒；無論如何，她們大概已經想好，定要加倍施展自己的魅力。當我們經過其中一個小姐的櫥窗時，她趁機脫掉了內衣，假裝是在更換，而與此同時，另一個小姐也趕忙脫下絲襪，展示出她那裸露的長腿。當這段刺激的體驗結束後，我感覺自己心潮澎湃。我們最終到達了韋斯特班大街，一路上我什麼也沒說，然而阿道夫卻對這些妓女們使出的勾引花招感到相當的憤怒。

回到家後，阿道夫便根據自己的體會發表了一通演說，其態度之冷漠，立場之客觀，就好像是要他在消滅肺結核病或者是屍體火化的問題上表態一樣。令我驚訝的是，在論及此事的時候，他竟能不帶有絲毫的內在感情。現在他已經瞭解了性交易市場的慣例和規則，他聲稱道，所以他的考察目的已經達到。這一社會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男人想要得到性滿足，而女人只是為了掙錢；女人掙錢又是為了能夠和她們的愛人長相廝守，所以他總是假定這些女人是有愛的。而實際上，這些可憐之人的生命之火早已熄滅。

在此我還要講述另一樁事件。有天晚上，在瑪利亞希勒夫大街和諾伊包大街的拐角處，一個長相俊秀，穿著時髦的男人走過來和我們搭訕，還詢問了我們的情況。當得知我們都是學生的時候（「我朋友是學音樂的，」阿道夫解釋道，「我是學建築的。」），他便邀請我們到庫默酒店共進晚餐。他招呼我們愛吃什麼就點什麼，這是阿道夫頭一回在維也納把甜點和餡餅吃了個夠。他還告訴我們，他是一個來自

弗克拉布魯克的製造商，他說他對女人一點兒都不感興趣，因為她們都是些拜金主義者。隨後他又談論了他最喜愛的室內音樂，這倒是令我興趣倍增。吃完飯後我們向他道了謝，他陪同我們出了餐廳，然後我們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後，阿道夫問我覺得那個人怎麼樣，「很不錯啊！」我回答道，「一個很有內涵，很有藝術鑑賞力的人。」

「其他呢？」阿道夫追問道，臉上還掛著一絲神祕的表情。

「其他指的是什麼？」我疑惑地問道。

「庫斯特爾，很顯然你還被矇在鼓裡，看看這張小卡片你就全都明白了。」

「什麼卡片？」

原來，那個男人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塞給阿道夫一張卡片，上面草草地寫著讓阿道夫到庫默酒店去找他的邀請。

「他是個同性戀。」阿道夫用一種實事求是的語氣解釋道。

我震驚了。以前我還從沒聽說過這個詞，對於這個詞的實際意思我簡直一點兒概念都沒有。於是阿道夫就為我解釋了這種現象。當然，這也是他長久以來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他希望看到這種變態行為受到

嚴厲地打擊，而且他自己也總是儘量小心地不去與這種人接觸。那個弗克拉布魯克製造商留下的卡片則被我們扔進了火爐。

阿道夫憎惡這座大城市裡的所有性倒錯者，對於他這種強烈的反應，我並不感到驚訝。因為他總是在剋制自己的慾望，即便像自慰，這種普遍存在於年輕人當中的行為，他都完全無法接受。但凡涉及性方面的事情，阿道夫都會嚴格遵守他為國家的將來設立的道德準則。儘管他總是對世間人事充滿了興趣，可那時候，他為什麼不去交幾個聰明而有上進心的朋友，一起尋找刺激，從而逃離孤獨呢？他為什麼總是避免與人接觸，甘願成為一個獨行者呢？憑藉他的過人天賦，他能夠輕易地在維也納的社會圈子中獲得一個位置，一個能讓他從總體的頹廢中擺脫出來的顯要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不僅能夠得到新的見識和啟發，還能使他的孤獨生活發生一次徹底的改變。在維也納，除了那種低俗之人以外，仍然還有許多低調的正派人士。因此在道德層面上，他完全沒有理由去避免和其他人接觸。實際上，是他自己的傲慢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產生。因為他相當貧窮，所以他變得極其敏感，這也是導致他在生活中顯得孤僻的主要原因。此外，他還認為，參加任何形式的娛樂聚會都是一種有失身份的表現。自許甚高的阿道夫將調情或者同某個陌生女子發生性關係，看成是一種膚淺而墮落的表現。正因如此，他從不允許我涉足這種事情。任何形式的越界，都將無可挽回地導致我們友誼的終止。拋開這層令阿道夫討厭的關係不談，他

絕對不會容忍我對其他人產生任何一點兒興趣。同往常一樣，我們的友誼必須完全凌駕於各種事物之上。

儘管我知道阿道夫對所有的社會活動都相當的反感，但有一回我還是嘗試著為他安排了一些活動。在我看來，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好機會。

有時候，音樂愛好者們會跑到音樂學院的辦公室，向學校要一些學生，到他們那兒去參加設在晚上的音樂表演。這不僅意味著我們能夠賺取一筆急需的酬勞——我們通常會得到5克朗的報酬，相當於一頓晚飯錢——而且還為我們枯燥的學習生活增添了一些亮點。作為一名優秀的中提琴手，我往往都是很吃香的，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認識了海利根施泰特大街的一個富商——加霍達博士。他們家族的人對藝術和文化品位都有著相當深刻的理解。作為維也納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強化了這座城市的傳統藝術生活。當一個機會出現的時候，我提到了我的朋友，於是他們便請我下次將他一起帶過來。這正是我的目的所在，這下我就滿意了。

後來，阿道夫的確也跟我去參加了聚會，而且他還覺得很享受。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家的藏書館，這是阿道夫衡量這個家族的真正標準。然而令他稍感美中不足的是，整個晚上他都只能當一個沉默的傾聽者。不過，這是他自己選定的角色。在回家的路上他對我說，他本可以和這些人相處得很融洽，但由於他本身不是一個音樂人，所以他

便沒有加入他們的談話。像這類音樂晚會，他還跟我去過兩回，除了不大得體的著裝讓阿道夫顯得有些難為情以外，在其他方面，他並沒感到有任何不適。

在這座墮落的城市中，我的朋友用那些不可撼動的原則在他周圍築起了一堵堵高牆，使他能夠阻斷一切來自外部的危險，構建起屬於他個人的自由天地。正如他經常所說的，他害怕被傳染。現在我終於明白，這句話不僅是指性病傳染，更多的是指代那種大眾的傳染，即最終被當前的趨勢拉進腐敗旋渦的危險，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瞭解他，因為他們都把阿道夫看成是一個怪人，後來有些和他接觸過的人甚至還叫他冒失鬼、自大狂。

但是，他堅定地奉行著自己的原則，在抵禦一切誘惑的同時，他也錯過了一段美好而熾熱的愛情。他依舊獨身一人，像個苦行僧一樣地守護著他那神聖的生命之火。

第二十三章政治覺醒

到目前為止，我所刻畫的阿道夫的形象並不算完整，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敘述他對政治的熱忱。之所以稍顯唐突地把這章安排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並不是因為我對此缺乏瞭解，而是因為我的興趣愛好更多地體現在藝術方面，然而對於政治，我幾乎從不關心。

到了維也納音樂學院以後，我感覺自己簡直就是一名嶄露頭角的藝術家，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要跟政治扯上任何關係。雖說以前在林茨的時候，阿道夫對藝術的興趣要遠遠大於政治，但是到了後來，我朋友的發展方向卻恰恰與之相反。在維也納，這個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心，他對政治的態度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壓倒任何興趣愛好的程度。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他每次遇到問題的時候，幾乎都要從政治領域中去尋根究底，哪怕這個問題本身與政治並沒有多大聯絡。他原本是透過一個藝術家的眼光在看待周圍發生的現象，然而漸漸地，他就習慣了站在一個政治家的立場去審視所有的問題。

他對人類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以至於他開始將自己的專業設計調整為政治考慮。因為，如果他真的想實現自己的計劃，無論是那些僅存於他頭腦中的工程，還是某些已經在圖紙上詳細規劃好的工程——一座由諸多大型建築組成的嶄新林茨，比如像橫跨多瑙河的大橋、新市政大廳等，維也納的貧民窟也將被一大片住宅區所替代。一場革命的風暴必須首先改變目前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政治狀況，只有這樣，阿道夫才有機會去實現他那些野心勃勃的計劃。

政治，逐漸在他的個人價值體系中佔據了重要位置。只要上升到某個政治層面，任何困難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對待所有的現象，他務必都會尋根究底，弄它個水落石出，也正是這份一如既往的堅持，讓他在這座大都市那嘈雜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所有政治事件的聚焦點：國會大廈。

「庫斯特爾，跟我來。」某天他衝我喊道。我問他想帶我去哪裡——我要到大學裡去聽課，還要為我的鋼琴考試做準備。然而我的反對在他看來根本無效。他說我那點兒小事兒簡直無法跟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相提並論，他已為我買好了門票。

我當時猜他可能是想帶我去看一場管風琴音樂會，或者到霍夫博物館去看場圖片展覽。可我的課程和我的考試怎麼辦？要是通不過考試那我可就慘了。

「走吧，別磨蹭了！」他不耐煩地催促道。我很熟悉他臉上的這種表情，一副容不下任何反對的樣子。此外，我平時也很少看到阿道夫在早上8點30分以前起床，因此我感覺這件事情必定非同小可。

於是我便做出了妥協，隨他一同來到了戒指路。9點整，我們準時進入體育場大街，在一處小側門前停了下來，這時候門口已經聚集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明顯，都是些無業遊民。到最後我才弄清了事實的真相。

「這是去國會？」我緊張地問道，「你叫我來這兒做什麼？」

我記得阿道夫曾偶爾跟我談起他造訪國會的經歷——我個人認為這純粹是在浪費時間。但還沒等我講出一個字，他就已經把入場券塞到了我手中，門開了，在專人的指引下，我們來到旁聽席就座。

坐在旁聽席上，朝下面一望，人們能夠很直觀地看見莊重的半圓形議會大廳。它的古典之美適合為任何形式的藝術表演提供舞臺佈景——音樂會、唱詩班合唱，如果稍微調整一下，連歌劇演出都行。

阿道夫試圖給我講解現場發生的事情。「那個坐在正上方，看起來很無助，還不時地搖動手中鈴鐺的人是議長。他後面那排人是各個部長；在他們前面站著的是速記員——他們是這幢房子裡真正幹事的人。這就是我為什麼更喜歡他們的原因，但我也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這些努力工作的人始終都只是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色。所有奧地利議會的議員以及各省代表本應該坐在相對的席位上。但他們大多數都在大廳內穿行遊走。」

我的朋友又繼續向我介紹議會的流程。一名議員提交了一份議案，目前正在呼籲議會的支援。幾乎所有對此項議案不感興趣的議員都紛紛離席退場。但很快議會主席會發起一場辯論，於是整個會場氣氛就變得活躍起來。

阿道夫對議會的流程的確相當諳熟，就好像手裡拿著議程表似的，所有情況的發生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音樂表演中，只要即興演奏一結束，整個交響樂隊就會齊奏樂曲；而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議會中，只要議員發言完畢，整個會場就會立即喧譁起來。在這一環節，他們又全都湧回議會大廳，開始扯著嗓門互相聲討。議長搖響了手中的鈴，示意眾人保持安靜。作為迴應，議員們掀起桌上的蓋子，然後又將其拍下。有的還吹起口哨，各種各樣的語言在空中迴響，有德語、捷克語、義大利語、波蘭語，鬼才曉得還有些什麼其他的語言。

我看著阿道夫，心想，這難道不是開溜的最佳時機嗎？但你猜我朋友如何反應？他一躍而起，雙手緊握，激動得滿臉通紅。若是這樣，我倒寧願老老實實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雖說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吵嚷些什麼。

我的朋友在國會裡待得越來越過癮，而我卻在想著如何溜之大吉。記得另一回，阿道夫又逼我同他去國會——如果我拒絕，那將有可能成為我們友誼的終結——一名捷克議員正在席上做「反對陳述」。阿道夫向我解釋道，這是一種限時演講，在該議員發言期間，其他議員不得打斷。這個捷克人說的什麼並不重要，關鍵是他決不可停下，哪怕他只是不停地重複一句話。我當真覺得這個人似乎從頭到尾都在重複一句話。當然，阿道夫和我一樣，一句捷克語都聽不懂，我心裡很是窩火，因為我覺得這簡直就是在浪費時間。

「我現在有點想走了。」我對阿道夫說。

他氣憤地回答道：「什麼？現在就走？在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你居然跟我說你要走？」

「主要是我聽不懂那個男的在說什麼。」

「你沒必要聽懂他說的是什麼，這是‘反對陳述’，我不是已經跟你解釋過了嗎？」

「那他講完之後我可以走了嗎？」

「不行！」他一面憤怒地駁回我的請求，一面拉住我燕尾服的後襠把我拖回了原位。

因此我只好留下，任由這位即將筋疲力盡的捷克強人做著不知所云的陳述。在那一刻，我對阿道夫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迷惑。阿道夫有著出眾的智力，而且他所有的感官都很正常，但我就搞不懂他怎麼能夠在一句話都聽不懂的情況下，還依然穩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專注地聆聽著演講。但我轉念一想，也許是我錯了，我大概還沒有領悟政治的要義。

那時候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阿道夫非要逼我跟他一起去國會。我總是無法解開這個謎團，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識到，阿道夫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他想找個伴兒來傾訴自己的觀後體會。那時候他會耐心地等著

我晚上回家。不等我開啟家門他就會問道：「這老半天你跑哪兒去了？」還沒等我吃下幾口晚飯他又會問道：「你什麼時候睡覺？」

他這些問題都有著特殊的含義。由於我們的房間非常狹小，所以只要我不蜷縮在鋼琴的長凳上或是睡在床上，他就能夠在房間裡來回踱步。因此他這麼問我的原因就是為他接下來的發言做好準備。

只要我爬上床鋪給他騰出了空間，他就開始來回踱步。單從他激動的聲音中我就能聽出，他早已按捺不住要發表自己的想法。他只想通過一種宣洩來舒緩他極度緊張的情緒。

於是，我躺在床上，而阿道夫亦如往常一樣，在我跟前激動地走來走去，彷彿我並不只是一個學音樂的窮學生，而是一股能夠決定德國人民存亡的政治力量。

另一次夜間談話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談話中，他近乎歇斯底里地談到了那群人的不幸遭遇，他們的命運受到了威脅，他們的未來充滿了危機。說著說著，淚水竟打溼了他的眼眶。

但在做完這番沉痛的描述之後，他又回到了積極樂觀的想法中。他又開始重新構建他的「大德意志帝國」，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賓客國」——這是他對帝國其他民族的稱呼。

在我無法再忍受他那冗長的抨擊與謾罵之時，我就會睡著。只要他注意到我合上了眼，他就會把我搖醒，然後大聲質問我是不是已經對他的發言沒了興趣；如果是，我便可以像那些沒有社會良知和民族精神的人一樣，昏昏睡去。所以我又不得不咬著牙，強迫自己不要閉眼。

後來，阿道夫在處理起這種事情的時候就變得比較和氣了。他會提出幾個他自認為是我感興趣的話題來同我討論，而不是獨自沉浸在他的烏托邦幻想之中。就比如有一回，他猛烈地抨擊了儲蓄團體，它通常由一些工人自發組成，在許多的小客棧都能見到這種現象。成員每星期存入一筆錢，到了聖誕節再將他們這一年的儲蓄全部領走。管錢的人通常就是客棧或酒館的老闆。阿道夫之所以批評這些團體是因為這些工人在所謂的「儲蓄之夜」的花銷要遠大於他們儲蓄的數目，那麼實際上受益的就只有酒店老闆。還有一回，他向我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的理想國中，學生宿舍將會是什麼樣——採光充分的臥室，用來學習和玩音樂，還有畫畫的公共書房；簡單卻有營養的食物，免費的音樂會或歌劇院的門票，免費的旅遊；還有到大學的免費交通運輸。

有天夜裡，他談到了萊特兄弟的飛機。他引用一份報紙上的新聞說道，這些著名的飛行家在他們的飛機上安裝了一支相對輕型的重機槍，並對其效果進行了數次試驗，在不久的將來有望實現空中射擊。這讓當時以和平主義者自居的阿道夫感到相當憤怒。他批評道，但凡人們發明出一樣東西，它就會立即被運用到戰爭當中。「有誰想要戰

爭？」他詰問道，「肯定不是那些‘小人物’——絕不可能。戰爭是掌控在那些無冕之王的手中，他們執掌著軍工廠，在利益的驅使下輪流的發動戰爭。這些有頭有臉的紳士遠離戰火的硝煙，在後方掙著大把的票子，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卻在前線為他們賣命。」

總的說來，「小人物」與「被出賣的勞苦大眾」在他的思想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有一天，我們見到許多工人在戒指路上遊行示威。我們夾在國會大廈旁的觀望人群中，清楚地見證了這一激動人心的場面。我擔憂地朝阿道夫問道：「這種場面是你說的‘革命風暴’嗎？」一些人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高舉著標語牌，牌子上只寫著兩個字：「飢餓」。沒有什麼口號比這兩個字更能打動我的朋友了，因為他自己就經常飽受飢餓的折磨。

當時的他就站在我身旁，熱切地用他的眼睛捕捉著現場的每一幅畫面。儘管他受到了這些人的強烈感染，但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冷漠，他冷靜地審視著整個事件的每一個細節，彷彿他的興趣只在於學習遊行示威的方法。雖然他覺得這些「小人物」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休戚相關，但他決不會想要作為一份子參與到遊行之中。更何況，這實際上是一次反對啤酒漲價的遊行。

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到這裡，戒指路上擠滿了亢奮的市民。他們還帶來了紅旗。但是，遊行者們那一張張苦大仇深的面孔遠比旗子和標語更能展現出局勢的嚴重性。

遊行隊伍來到了國會大廈，試圖衝進去抗議。這時，一路跟隨他們的騎警突然拔出長刀向人群亂打。作為迴應，人群向騎警擲去一陣雹子般的石塊。整個局勢已是劍拔弩張。但最後警察的增援趕到，設法驅散了遊行示威者。

這個壯觀的場面讓阿道夫震撼到了極點。但是在我們回到家以前他是不會表達任何感受的。是的，他站在了底層人民這一邊。但他同時也反對組織這種遊行的人。誰是真正的操縱者？誰在幕後肆意地誘導著這些勞苦大眾？他們中沒有一個走上了前臺，為何？因為他們更想在混亂中處理自己的事情——他們根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誰是這些勞苦大眾的領導者？他們並不是有著同樣不幸遭遇的「小人物」，而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們渴望獲得權力，他們想利用人民的貧窮來為自己謀取利益。最終，在對這些政治壓榨者的強烈聲討中，我的朋友結束了他那激昂憤慨的演說。這就是他個人的示威。

在經歷了這次事件以後，有個問題就一直搞得他相當痛苦，儘管他從不曾對我提起：他自己到底屬於哪一方？從他身處的社會環境以及他的個人情況來看，毫無疑問，他屬於「飢餓標語」下的那個群體。他悲慘地生活在一個臭蟲滿天的偏室；很多時候，他的午飯僅僅由一點兒乾麵包和牛奶組成。也許有些遊行者的生活都比他過得好。那麼他為什麼不加入到這些人的行列中？又是什麼讓他望而卻步？

也許是他覺得自己屬於另一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吧。他是一個奧地利國家公務員的兒子，他父親的級別相當於一個上尉。作為一個頗受尊敬的海關官員，人們向他的父親脫帽致敬，在朋友當中，他父親講的話總是擲地有聲。而街上那些人與他父親絕對扯不上任何干系。

他覺得，比受到政治道德淪喪的統治階級的影響更可怕的是變成無產階級。他無疑活得像無產階級，但他卻不想變為無產階級。也許促使他進行深入學習的是他的一種直覺，即只有通過徹底地學習才不致使他淪為勞苦大眾。

最關鍵的是，任何黨派或者任何社團運動都不能使阿道夫產生興趣。誠然，他經常對我講，他是舍勒的忠實追隨者，但也只是在我們房間裡私下對我談起的。像他這種一文不名的學生是很難在喬治·裡滕·馮·舍勒的隊伍中嶄露頭角的。舍勒運動要有更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才能足夠引起阿道夫的關注。舍勒為戒指路上的遊行隊伍提供了什麼？然而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人對奧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義缺乏理解。在當時的政治領導中，阿道夫最欽佩維也納的市長——卡爾·盧埃格。但與教會的聯絡阻礙了他黨派的發展，使其內部政治問題叢生。所以，那時候阿道夫的政治理想找不到精神歸宿。

雖然他不願意加入任何黨派或組織——有個例外我將在後面提到——但有個人還是得陪著他走上街頭，看他如何對其他人的命運產生強烈的興趣。在這方面，維也納市為他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考察實體。比

如，當下班回家的工人經過我們身旁的時候，阿道夫會抓住我的胳膊對我說：「庫斯特爾，你聽見他們說話沒？他們是捷克人！」還有一次，我們碰到幾個一邊大聲說著義大利語，一邊比劃著手勢的制磚工人。「看吧，這就是你的德國維也納。」他憤怒地調侃道。

「德國維也納」也是他經常重複的短語之一，但阿道夫總是用一種諷刺的低沉腔調把它念出來。這個融入了捷克人、馬扎爾人、克羅埃西亞人、波蘭人、義大利人、斯洛伐克人、羅塞尼亞人，還有加利西亞猶太人的維也納，難道還是座地地道道的德國城市嗎？我的朋友發現，維也納的現狀是德國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努力奮鬥的象徵。他討厭維也納嘈雜的街道，他後來將其稱作「近親結合的產物」。他痛恨這個毀掉了德意志精神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支柱：王朝、教堂、貴族、資本家，還有猶太人。

他覺得這個哈布斯堡王朝必須滅亡，越快越好，因為它存在的每一刻都是對德國人的榮譽、財產，乃至生命的一種損耗。他看到了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鬥爭與廝殺，那是這個國家即將衰落的決定性徵兆。他造訪國會去感受這個「病人」的脈搏，它的早亡已在眾人的預料之中。他耐心地期盼著那一刻的到來，因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崩塌才能夠開闢出通往他理想世界的大道。

他將所有的仇恨都集中投放到了猶太人身上，他認為這些在維也納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猶太人威脅到了德國人的生存。我很快便注意到了這

一點，另外，一件看似瑣碎的小事情也浮現在了我的記憶中。

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朋友的艱苦生活已經無法再過下去了。我想，幫助他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他在文學方面的造詣利用起來。我有個音樂學院的同學在《維也納日報》當記者，我把阿道夫的情況告訴了他。這個年輕人對阿道夫的落魄處境感到相當同情，他建議我叫阿道夫帶些作品到他辦公室，以便商量具體事宜。那天晚上阿道夫創作了一篇短故事，內容我已記不清楚，我只記得題目叫《次日清晨》。真是相當晦氣，因為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找那個記者的時候發生了一次不愉快的爭吵。阿道夫剛一見到那個人，甚至連腳都還沒踏進辦公室，他就轉身要走，下樓的時候他衝我吼道：「你個白痴！你沒看見他是個猶太人嗎？」說實話，我還真沒看出來。但後來我就小心謹慎，再不做這種引火燒身的事兒了。

事情變得越來越糟。有一天，正當我在家為考試做準備的時候，阿道夫滿臉興奮地闖了進來。他說他剛從警察局回來，瑪利亞希勒夫大街上發生了一件事情，當然，同猶太人有關。蓋恩格羅斯商店的門口來了一個「漢德禮」。「漢德禮」這個稱呼過去常用來代指東方猶太人，他們穿著長衣和靴子，站在大街上販賣鞋帶、鈕釦、揹帶，還有其他一些小物件。與那些被同化的猶太人相比，「漢德禮」的社會地位最低，而前者在奧地利的經濟生活中往往佔據著重要地位。按照當時的規定，「漢德禮」是不能夠乞討的，但這個男人居然哀求著伸手

向路人乞討，而且已經討到了不少的錢。一個警察要求他出示證明，他連忙擺手，說自己只是個靠販賣小東西為生的可憐病漢，並堅稱自己不曾乞討。那個警察要把他帶到警察局，於是想請某個旁觀者自願做證人協助調查。儘管阿道夫從不喜歡參與公共事務，但他還是自告奮勇地充當了證人，他說他親眼看見這個「漢德禮」身上揣了3000克朗，證據確鑿。根據「漢德禮」的說法，這筆錢是靠幫助東方猶太人移民到維也納而得來的。

在《我的奮鬥》中他這樣寫道：

「有天當我經過市中心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穿著長衣，披頭散髮的男子。我的第一反應是：難道這是個猶太人？在林茨他們可不像這個樣子。我朝他斜瞟了幾眼，但我越是盯著他那張陌生的臉龐仔細打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越是呈現出另外一方面的考慮：難道這是個德國人？由於我總是碰上這種情況，所以我現在開始靠書籍來解決我的困惑。」

我清楚地記得，在對猶太人問題的研究上，阿道夫表現得多麼的熱切，儘管我對此毫無興趣，但他還是一遍又一遍地對我細心闡述。在音樂學院裡，既有猶太老師，又有猶太學生，我從沒和他們產生過什麼過節，實際上，我還在他們當中結識了幾個朋友。阿道夫自己不是也對古斯塔夫·馬勒抱有極大熱忱嗎？他不是也對門德爾鬆·巴托爾迪的作品著迷嗎？人們不該因為「漢德禮」造成的不良影響，就對整個

猶太人問題做出武斷定論。我試圖小心謹慎地扭轉阿道夫的偏見。然而他的反應卻十分怪異。

「跟我來，庫斯特爾，」他對我說道。為了再次節省車費，我只得同他走路前往布里吉特瑙。當阿道夫領著我來到猶太教堂的時候，我簡直驚訝極了。我們走進教堂。「別摘帽子，」阿道夫衝我耳語道。確實，裡面所有人的頭上都蓋著帽子。此時阿道夫還發現，一場婚禮正在教堂中進行。婚禮現場的景象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儀式開始的時候，人們輪流吟唱，我挺喜歡這種感覺。之後猶太教士用希伯來語佈道，最後將經文護符置於這對新人的額前。

從我們這次奇怪的造訪中我推測出，阿道夫的確是想對猶太人問題進行系統完整的研究，從而能使他相信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我也希望這能夠或多或少地化解他的一些偏見。

但是我錯了，因為有一天阿道夫回到家後對我明確地宣稱道：「今天我加入了反猶聯合會，而且我也把你的名字報了上去。」

儘管我已經習慣了他在我們政治生活中的獨斷專行，但這一次他真的是把事情做絕了。令我更加驚訝的是，平日裡總是避免加入任何社團或組織的他，這回居然加入了反猶聯合會。我雖對此保持沉默，但卻已經暗下決心，今後我自己的事情還是得自己做主。

回望我們在維也納生活的那段日子，以及我們無數次的夜間長談，我敢斷言，當時的阿道夫已經悟出了一套指引他未來道路的人生哲學。它集合了阿道夫在走街串巷之時的見聞和經歷，並通過他的閱讀和學習使其得到了擴充套件和深化。然而我從他那裡接收到的一切，僅僅是他人生哲學的一種初級表現形式，雖說聽上去總是顯得混亂與不成熟，但卻更富有激情。

可那時候，我其實並沒有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為我覺得我朋友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社會人，除了我之外，他再沒交過第二個朋友，所以他那些詳細的計劃和政治抱負自然也就付諸東流了。然而到後來，它們竟然都變成了現實，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第二十四章消失

音樂學院的考試已經結束，我以優異的成績從眾多的學員當中脫穎而出。現在我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到約翰尼斯薩爾去指揮一場由學校舉辦的音樂會，對於那些個怯場的表演者和樂隊指揮來說，這場慣例性的期末音樂會可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但一切進展得還算順利。最令我感到興奮的事情莫過於第二天晚上的演出，因為就在當晚，歌唱家羅西演唱了我創作的三首曲目，另外，我創作的絃樂六重奏曲的其中兩章也是頭一回被搬上了舞臺。這兩樣作品都獲得了巨大

的成功。當麥克斯·耶恩奇教授和我的作曲老師到後臺來向我祝賀的時候，阿道夫也在場。指揮學院院長古斯塔夫·古特海爾也捎來了他的祝賀，尤其是音樂學院的校長還親自來到後臺，同我熱情地握手。這真讓我有些受寵若驚了，想想看，就在一年前，我還待在灰塵滿天的傢俱裝潢店裡幹著粗活兒。阿道夫喜形於色，看上去他為他朋友的成功感到無比的自豪。但我完全能夠想象出他內心深處的實際想法。當然，他從不曾體會到在維也納一無是處的辛酸與痛楚，直到他看見我被包圍在眾人的掌聲與祝賀之中，看見我朝著我的最終目標踏實地步步邁進。

再過幾天這學期就將結束，一想到快要回家，我的心情就無比的激動和喜悅。雖然我在學業上收穫良多，但在維也納，我的思鄉之情從始至終都不曾有絲毫的減退。

阿道夫沒了家，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我們待在房間裡，商量著該如何度過接下來的幾個月。查克雷斯夫人也加入到了我們的討論中，她還頗為躊躇地詢問了我們的計劃和打算。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在一起。」我立刻宣稱道。我不單是指要同阿道夫待在一起——這似乎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還表示我們兩個都會繼續在查克雷斯夫人那裡租房子，因為我覺得大家都還處得不錯。另外，我的計劃也相當之堅決。只要學校一放假，我就會立馬趕回林茨去陪我父母，等到秋天的時候，我還得經受為期8周的預備役訓

練。最遲11月下旬我就能返回維也納。我答應查克雷斯夫人，每月我都會按例繳納房租，以便她能把房間繼續留給我們。

查克雷斯夫人也想到摩拉維亞去拜訪幾個親戚，可能要在當地逗留數日，正苦於空房無人看守。但阿道夫立馬就給這位老太太送上一劑定心丸。他說他會看著房子，直到查克雷斯夫人訪親歸來。然後他也要去瓦爾德維爾特爾待上幾天，去找他母親那邊的親戚。

查克雷斯夫人對我們的解決辦法感到相當滿意，還聲稱我們兩個是最令她滿意的租客：當然了，像我們兩個這種品行端正的年輕人，既按時交租，又從不帶女孩兒回家，她在維也納打著燈籠都沒處找。

後來我和阿道夫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告訴他，下學期我會到維也納交響樂團去應聘中提琴手。到時候我手頭會更寬裕，也就能夠更好地幫助他。當時已變得十分易怒的阿道夫卻沒對我的提議做出任何迴應。他也沒把他以後的打算向我透露半個字，但由於我當時已經沉浸在了自己成功的喜悅中，因而也沒把他的表現當回事兒。而令我感到相當意外的是，他竟然沒有要求我去探聽關於斯蒂芬妮的訊息。可不管怎樣，我還是決定要好人做到底，把所有我能打聽到的，關於斯蒂芬妮的訊息，都寫信告訴他。阿道夫也承諾會與我經常通訊，把我喜歡聽的維也納趣聞統統告訴我。

分別，對我們彼此來說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908年7月初，那天的確是個意義特殊的日子。雖說我天性隨和，甚至有些逆來順受，但和阿道夫相處這麼久以來，並不一直都是順心如意，然而我們的友誼卻總是能夠戰勝任何的個人得失。現如今，我們已經相識了近四年，並且都已經適應了彼此的行事作風和生活方式。無論是在林茨體驗到的寶貴的藝術經歷，還是歡樂的冒險之旅，無疑都使我們在維也納的友誼得到了發展和昇華。在維也納，阿道夫就像我的一個家人；他分享了我在少年時代最美好的時光，他對我的瞭解程度勝過其他任何人。我也應該感謝阿道夫，正是因為他，才有了我和音樂學院的緣分。

這份感激之情在一段能夠產生共鳴的友誼中不斷加深，並將我們彼此的聯絡變得更加緊密。從此以後，我甘願忍受他的怪癖。生活讓我慢慢地變得成熟和理智，而我同阿道夫的情誼卻在不斷加深。儘管我們的住所空間狹小，儘管我們的興趣愛好有時也迥然不同，但是，在維也納，我們比以前相處得更加融洽。為了他，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去國會也好，猶太教堂也罷，哪怕再到施皮特爾貝格街去走一遭我也不會有半句怨言。我已經開始期待我們來年的生活了。

當然，我在阿道夫心中的位置遠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作為一個跟他來到維也納的同鄉，我的作用也許只是讓他極不情願地回憶起自己艱苦的家庭環境，以及少年時代的絕望與無助，雖說我的出現偶爾也能讓他想起斯蒂芬妮。但最重要的是他學會了感激，感激我成為了他

的忠實聽眾。儘管他有著不可戰勝的勸導天賦，但他絕對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像我這樣，即便內心完全反對他的觀點也會在嘴上表示贊同。然而對他個人以及他滿腦子的想法而言，我的觀點毫無價值。他只需要我聽他說話，畢竟，他總不可能一個人坐在美泉宮公園的長椅上，對著自己發表鴻篇大論吧。當他靈感頓生，需要一吐為快之時，他才會想起我；就好比一名即興演奏者需要一樣樂器來詮釋自己的感情一樣。對阿道夫來講，其實是這段友誼中的「幫助性」（如果此種表達不為過的話）讓我變得更有價值，而並非拜我謙遜的本性所賜。

於是我們就此作別。阿道夫一再向我重申，說他極不情願一個人孤零零地過日子。他講，獨自一人待在我們倆住過的房間裡是多麼的枯燥乏味，對此我表示充分理解。當時我還沒寫信告訴我父母我的返程日期，要不是我思鄉心切，或許我會在維也納多待兩個星期。

他陪我來到了火車西站。我安放好行李之後又下車來到月臺同他道別。阿道夫討厭那種傷感的氣氛。越是在傷感的時候，他就越表現得冷酷無情。所以當時，他只是握住我的雙手——這是他極為罕見的行為——紮實地使了一把勁。然後，他頭也不回，甚至略顯草率地轉身離去。我沮喪地踏上了火車，好在火車及時發動，防止了我改變主意。

我父母見到他們的兒子回家簡直高興極了。晚上，我把自己在期末音樂會上的表現講給了他們聽，我母親眼神中的幸福光芒就是對我最好

的回饋。當第二天早上，我父親看見我穿著藍色圍裙，挽起衣袖在作坊裡幹活的時候，他也同樣感到了一陣滿足。

只要我一閒下來，我就開始想念阿道夫。我很願意寫信告訴他斯蒂芬妮的情況，即便他沒有要求我這麼做。但我那段時間一直都沒看到過斯蒂芬妮，我想她可能是跟她母親度假去了。

由於我在維也納還有些待辦事宜，所以我把它們全都交給了阿道夫去處理。他要幫我將一筆會費交給音樂傢俱樂部的財務主管裡德爾。另外我還想麻煩他去幫我領取每一期的會員刊物。

阿道夫十分上心地幫我打理好了這一切，1908年7月15日，他給我寄來一張印有「戰壕街」的彩色明信片，在明信片上，他向我做了這樣的肯定答覆：

親愛的庫斯特爾：

我聯絡了裡德爾3次都沒能找到他，直到星期四的晚上，我才把錢交給了他。十分感謝你的來信，尤其是你寄來的明信片。它看起來顯得相當乏味，我是指明信片上的噴泉。你走之後，我工作得十分努力，有時候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在我走的時候，我會寫信告訴你。如果到時我姐也要去，那我就覺得沒什麼勁了。這兒的天氣已經不再暖和，有時甚至還會下雨。我正準備把你的報紙和期刊全部寄給你。祝願你們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信中描述的那座極其乏味的噴泉修建在人民公園。旁邊那座用來裝飾噴泉的雕塑出自雕塑家哈納克之手，名為「美人的喜悅」，在阿道夫看來，用這種命名來描述這麼一件遲鈍的作品簡直就是一種諷刺。

他提起他姐姐的時候比較有趣。他指的是安吉拉·拉包爾。阿道夫根本不希望他姐姐也到瓦爾德維爾特爾去，因為自從上次同他姐夫大吵一架之後，他便再也不好意思見她了。

沒過幾天，阿道夫又寄來一張卡片，日期為1908年7月19日，圖片上展示的是齊柏林飛艇。上面寫道：

親愛的朋友：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現在你沒必要再給我寄送黃油和乳酪了。但我還是應該好好地感謝你，你想得十分周到。今晚我準備去觀看《羅恩格林》。祝你們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在卡片的邊上他還寫道：「查克雷斯夫人要我感謝你寄來了錢，並叫我代問你父母好。」

我曾告訴過我母親，說我朋友生活很艱難，有時還要捱餓。我母親聽後十分同情。在沒有告訴我的情況下，她於1908年夏天的那段時間裡，給阿道夫寄去了幾個食物包裹。他之所以叫我不再給他寄送食物，是因為他的瓦爾德維爾特爾之行即將到來。這些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觀看《羅恩格林》，真是令我羨煞不已。

我很想知道他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會做些什麼，我經常想他。也許他此時正利用房間的便利，重新開始了他的大型專案設計。他早就想過要重建維也納霍夫堡皇宮。當我們在維也納市中心漫步的時候，他總會聯想到這一巨集偉的工程，他腦海中已經構建好了所有的細節，只待將它們在圖紙上描繪出來。他很見不慣用磚頭修建的舊霍夫堡皇宮和宮廷跑馬場。磚頭，在他看來，根本不適合用來修建紀念性的建築，因為它不夠堅固。所以必須要摧毀它們，然後按照相似風格，用石頭重建。此外，為了同新皇宮的半環形圓柱保持一致，阿道夫想在它的對面修建一座與之相匹配的建築，如此一來，整個英雄廣場便被環抱其中，使之顯得更為壯觀。城堡大門得留下。環城大道上將屹立起兩座巨集偉的凱旋門——問題是它們紀念的是何種「勝利」呢？聰明的阿道夫並沒有解答——它們將把廣場和霍夫博物館完美的融為一體。昔日的宮廷跑馬場將被拆毀，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與霍夫堡皇宮相媲美的紀念性建築，它將由另外兩座凱旋門連線，從而構成一個龐大的建築群。用我朋友的話講，像這樣的英雄廣場才配得上維也納的中心地位。

但我把他想錯了，阿道夫心裡裝的並不是維也納，而是林茨。對他而言，在承受了失去雙親的悲痛以及背井離鄉的無助之後，這也許是平息那份怨恨的最好辦法。林茨，這個讓他飽受命運折磨的地方，如今也該明白，他有多麼地愛它。

阿道夫寄來一封信，真是稀罕，因為他為了節省郵費，通常都只給我寄明信片。儘管他不知道要給我「提供」什麼資訊，但他還是覺得有必要跟我聊聊他的隱士生活。信上的日期為1908年7月21日，內容如下：

親愛的朋友：

也許你會奇怪我為什麼這麼久都沒給你寫信。答案很簡單。因為我不知道能為你提供什麼訊息，也不清楚有什麼事情能讓你特別感興趣。首先一點，我人還在維也納，而且也沒打算要離開。查克雷斯夫人已經到她兄弟家去了，所以我現在是孤身一人。不過我的隱士生活過得還挺不錯。唯獨有一件事情我還不習慣。在此之前，查克雷斯夫人總會一大清早就來敲我的門，把我弄醒，然後我就開始工作，而現在，我只得靠自覺了。林茨有什麼新鮮事兒嗎？劇院重建協會似乎已經偃旗息鼓。等銀行竣工以後，請你給我寄來一張圖畫明信片。現在我想請你幫我兩個忙。第一件事，麻煩你幫我買一份《多瑙河城市——林茨導遊地圖》，不是沃爾勒版，而是由克哈科維澤出版的正宗的林茨版本。封面印有一張林茨姑娘的圖片，背面是一張林茨全貌的特寫，有

多瑙河、大橋，還有城堡。加上郵票一共要花60海勒。請你儘快給我寄來，要麼你先替我支付郵費，要麼選擇上門收費，都行，反正我會還你。但一定要確保汽船公司的時間表和林茨地圖都在其中。因為我忘記了一些確切的數字，但是在沃爾勒版中我又找不到。第二件事，當你下次去坐船的時候，麻煩你幫我搞一張今年的導遊指南。這筆

「任意付費」的花銷我也會還給你。那麼就麻煩你幫個忙，行不行？我這兒沒什麼其他新聞，除了今天早上我消滅了一支臭蟲大軍，因為它們差點就要在我的血液裡快活地徜徉了。現在我的牙齒簡直「熱」得打戰。我估計沒有哪個夏天出現過像這麼冷的天氣。你還是老樣子是吧？好了，祝你們全家幸福，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請求。我依然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對重建林茨的新計劃是如此的熱衷，以至於他從收入中摳出60海勒給我，讓我幫他購買克哈科維澤版本的城鎮導遊地圖。信中提到的「銀行」代指上奧地利州和薩爾茨堡的新銀行大樓。阿道夫唯恐這幢建築會毀壞整個林茨主廣場的嚴密佈局。我知道他已經迫不及待地想打聽到劇院重建協會的確切訊息，因為劇院和多瑙河大橋都是他最熱衷的專案工程。

儘管他窮困潦倒，但阿道夫的確相當勤奮，光從他把導遊地圖的費用給我寄來這一點就能夠看出。並且他提到的那種「任意付費」的導遊

地圖在船上是可以弄到的。

哦，還有臭蟲！真是種老天的捉弄。實際上我自己倒是沒受什麼影響，可阿道夫的確深受其害。以前每當我睡著之後，他便開始夜間捕蟲，通常是在第二天早上，他就會小心翼翼地亮出一枚大頭針，向我展示他的夜間行動成果。在那個時候，維也納的許多住戶都會遭受臭蟲的侵擾。好傢伙，又一支臭蟲軍被處以了極刑。

又過了一陣子我沒有收到他的訊息。但隨後我便收到一封他的親切來信，信上的日期是1908年8月17日，這或許是他寫給我的最直白的一封信了。上面寫道：

好朋友：

首先請你務必原諒我這麼久沒給你寫信。這種情況有它自身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我不知道自己能找點什麼話跟你說。之所以現在給你寫信，僅僅是為了向你表明，在收集到這麼點兒小新聞之前，我的確花費了不少的心思和時間。首先我們的房東太太查克雷斯夫人要感謝你寄來的錢。其次，我衷心的感謝你的來信。也許查克雷斯夫人覺得寫信比較困難（她的德語簡直不敢恭維），所以她叫我向你轉達她的謝意，感謝你們一家人的慷慨。不久前我突發急性支氣管炎，這才剛剛緩過來。你的音樂傢俱樂部似乎正面臨一次危機。上次我寄給你的報紙到底是誰發行的？我早就已經付了錢。你有沒有它的

更多資訊？現在我們這邊的天氣好得不得了，下著傾盆大雨。相比今年我們遭受到的酷暑煎熬，這真的算是上天的恩賜了。但目前看來，這種日子我享受不了幾天了。也許在這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就要離開維也納。到時我會細言相告。最近我搞了大量寫作，絕大多數是在下午和晚上的時候。你最近讀過委員會關於新劇院的決議嗎？在我看來他們是打算再次修補這堆老垃圾。照這麼下去他們就折騰不了多久了，因為他們根本不會得到授權。不管怎樣，通篇的討好言語充分顯示出，這些備受尊敬的權威人士對修建劇院的認知猶如一頭非洲河馬對演奏小提琴的瞭解。要是我的建築師手冊顯得不那麼破舊，我會把它包起來，然後寄給他們，收件地址我會這麼填：「負責執行劇院翻修的劇院重建委員會」，獻給當地出身極高貴，最大公無私並值得稱頌的全體委員，用以最終的建設和必要的裝修……

好了，我就寫到這兒。向你以及你父母致以我最誠摯的問候。我依舊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這絕對是阿道夫的典型風格。即便是常規性的稱呼「好朋友」都顯示出他正處於一種情緒化的狀態之中。隨之而來的冗長介紹也與他的性格特徵相符，以前為了使自己的夜間演講得以繼續，阿道夫總會用到這種「鋪陳」手法。

「愉快的雨天」這個玩笑是在為他後面灑脫而犀利的文筆做熱身準備，類似的一個玩笑也在1908年4月20日，在他寄來的一封信上出現過。一開始，我們的房東老太太就因其悅耳的鄉音，被他說得一無是處。隨後阿道夫又將矛頭指向音樂傢俱樂部。但這些才剛剛拉開戰鬥的序幕，只是小試牛刀而已，因為之後，他便懷著滿腔憤怒，朝著意欲翻修「老垃圾堆」的林茨劇院協會發起了一陣狂轟濫炸。他猛烈地聲討著這群市儈庸人，因為他們玷汙了阿道夫最喜愛的工程，一項讓他傾注了多年心血的工程。讀著這封來信，我彷彿看見阿道夫在房門與鋼琴之間的狹小過道上來回踱步，為這些官僚化的市政議員操碎了心。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將要開始一段旅行，這是事實，8月20日，也就是3天后，他從瓦爾德維爾特爾給我寄來一張印有魏特拉城堡的彩色明信片。好像他並不是很喜歡在他親戚家住，因為沒過多久，我又收到了他從維也納給我寄來的一張卡片，上面是聖徒節的祝福。

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查克雷斯夫人去了摩拉維亞，阿道夫去了瓦爾德維爾特爾。然而斯通帕大街的生活又再次回到了原來的軌跡。而我——苦惱萬分的我——不得不到奧匈帝國第二步兵團去報到。至於這8個星期我做了什麼——或者更準確地說，在訓練期間我完成了什麼——我覺得還是不提為妙。這8個星期可以說是我人生中一段最空虛的時光。但最終，在1908年11月20日，我總算熬出了頭。我終於可以向身在維也納的阿道夫宣告我的到來。

我寫信告訴他，為了節省時間我會乘坐早班車，大約在下午3點鐘的時候我就能抵達火車西站。我想，他一定會在老地方——月臺柵欄邊接我。然後他會幫我分擔沉重的行李，裡面還裝有我母親捎給他的一些東西。他想我嗎？我又回來了，可是我沒在柵欄邊看見他。我又跑到候車室去找他。結果忙活了半天我連他的人影也沒見著；阿道夫不在這兒。可能他生病了。他確實在他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上提到過，他仍舊承受著他的老毛病，支氣管炎的折磨。我把東西全部放到了行李寄存處，然後急急忙忙地趕到了斯通帕街。查克雷斯夫人見到我後非常高興，但她馬上又告訴我房間已經租出去了。「那阿道夫呢？我的朋友呢？」我驚訝地問道。

查克雷斯夫人盯著我，她臉上的皺紋像一道道刻上去的痕，眼睛瞪得老大，「難道你不知道希特勒先生已經搬出去了嗎？」

「我不知道啊。他搬哪兒去了？」我問道。

「希特勒先生沒有告訴我。」

「但他肯定給我留了點東西啊，比如一封信或者一張便條之類的，不然我上哪兒去找他啊？」

房東太太搖了搖頭：「沒有，希特勒先生什麼也沒留下。」

「一句祝福的話都沒說嗎？」

「他什麼都沒說。」

我問查克雷斯夫人房租付清沒有。是的，阿道夫已經付清了他的一半。查克雷斯夫人又把我付的那一半退還給了我，因為我已經把房租交到了十一月份。我們兩個的離開讓她感到非常遺憾，但也於事無補，當晚她給我鋪了張臨時床鋪讓我留宿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只好出去另尋住處，在格拉索爾霍夫我找到一個採光不錯的小房間，然後還租了一架直立式鋼琴。

無論如何，我還是十分想念阿道夫，儘管我也經常安慰自己，總有一天他會找到我的住處。為了方便他找到我，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訴了查克雷斯夫人。現在阿道夫有三種方式能夠聯絡上我——通過查克雷斯夫人，通過音樂學院的辦公室，還有就是通過我的父母。如果他想再見到我，他一定會採取以上三種方式的任意一種。我本可以通過警察總署人口註冊中心的辦公室去找他，只是當時我沒有想到。可日復一日，周復一週——阿道夫還是沒有出現。他究竟出了什麼事兒？難道是我的過錯導致了他的離開？

我又仔細地回想了一下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最後一個星期。確實，我們因為觀點不同發生了一場爭吵，但跟他一起相處，這簡直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他自己也是習以為常嘛。只是我絞盡腦汁也沒想出他當時沉默的原因。但畢竟他自己也說過很多次，等到了秋天我回到維也納

的時候，我們又一起合租。在臨別之時他也沒給過我什麼暗示，即便是在他生氣的時候他也總是不露聲色。在這4年裡，我們的關係之鐵，以至於很多事情都成了理所當然，就比如我們決定以後要一起在維也納生活這件事。

當我回想起我們一起度過的最後一個星期時，我反而只會讓自己確信，我們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我們的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厚，都更有意義。是的，在維也納最後幾個星期的美好時光——無論是歌劇院和城堡劇院裡的美妙經歷，還是拉克斯山的探險之旅——將我們的友誼推向了頂點。

難道這就是阿道夫對我不辭而別的原因嗎？

我越是絞盡腦汁地去想，就越能體會到阿道夫對我的重要性。我感到無助和孤獨，我們度過的友誼歲月在我的腦中不斷湧現，我簡直不知道還能將這份情誼寄放何處。儘管我承認我的學業會因此而進步，但現在，我的整個生活卻已變得稀鬆平常，甚至幾乎到了枯燥無味的地步。去音樂廳或者歌劇院欣賞一些美妙的演出無疑能夠給我帶來些許安慰，但知音難覓，又使我感到沮喪。每次去音樂廳或者歌劇院觀看演出的時候，我都希望能看見阿道夫。也許他會在表演結束後，站在出口等我，然後我會再次聽到他那熟悉而不耐煩的聲音，吼道：

「喂，走了，庫斯特爾！」

但我渴望見到阿道夫的願望再次落空，而與此同時，我也明白了一些事實。他不想再回到我身邊。他的離開絕非偶然，既不是暫時的鬧情緒，也不是因為一連串的小矛盾而產生的不合。要是他想來找我，他早就找到了。

我感到很哀傷，因為他想要的是終止這段為我所珍重的友誼，不帶絲毫感激，也不留一點後路。所以後來我回到林茨，在迂格街找到了拉包爾夫人，向她詢問阿道夫的住址。

當時她一個人在家，帶著一種可以理解的冷漠接待了我。我問她，阿道夫現在住在維也納的什麼地方，她說不知道，而且回答的有些不悅，她說阿道夫再也沒跟她通過信。於是我的嘗試再次遭遇失敗。然後拉包爾夫人開始責怪我，她說正是因為我自己的藝術野心，致使年滿20的阿道夫至今學無所專，也沒有社會地位，我直抒胸臆，為阿道夫做了強力的辯解。畢竟安吉拉也只是在重複她丈夫的觀點。但我後面的反駁卻比不上阿道夫。由於談話的氣氛變得越來越不愉快，所以我便起身，冒失地離開了他們家。

歲末已至，而我還是沒有阿道夫的任何訊息。40年後，我才從林茨，一個研究阿道夫·希特勒的檔案管理員那裡瞭解到，我朋友搬出斯通帕大街的原因是因為他覺得房租太貴，而且他已經在梅德曼街一個所謂的「男士酒店」裡找到了一個更便宜的住處。阿道夫消失在了大都市的暗影深處，開始了他那段不為人知的苦難生活，就這段時期而言，

找不到任何一個可靠的見證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那就是，在他人生中這段最困難的時期裡，他沒再交過一個朋友。現在我能夠理解他當時的行為。他不願意結交朋友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貧窮感到羞恥。他想獨自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獨自去承受命運的安排。那是一條荒草叢生的道路。在與他分別之後，我突然發現，置身於一座大都市的人群之中，竟會如此的孤獨。

就這樣，我們青年時期的一段美好友誼便走到了盡頭，它雖不波瀾壯闊，但卻回味無窮。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心態也開始變得平和。我很慶幸當初阿道夫突然終止了我們的友誼，因為，如果是等到以後，我們分歧加劇或者感情淡化，致使這段友誼走向終點，那麼它就完全失去了意義。當然，相比被迫告別而言，阿道夫的結束方式的確更讓我難以承受，儘管，這一切尚未真正結束。

第二十五章再見希特勒

1912年10月，在維也納音樂學院進行了4年的深造之後，我被馬裡博爾市立音樂劇院聘為樂隊副指揮，並在當地完成了我的首次亮相——指揮洛爾青的《軍械工》。我對我的第一份獨立工作感到相當滿意。儘管這個鎮略小於林茨，但當地人十分熱愛藝術。我指揮了幾部輕歌劇，其中，弗洛託的《瑪莎》尤為成功。春季將罄時，我帶著我的樂

隊前往皮耶什佳尼去作夏季演出。到了秋天，我又返回馬裡博爾繼續工作，我已經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進了這個令人愉快的小鎮。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援使我信心十足，熱情高漲！

一天晚上，當《愛娃》的首演結束後，我被舞臺導演叫到了他的包廂裡，他給我引見了克拉根福市立劇院的老闆——他們劇院當時正差一個歌劇指揮。顯然，我當晚的表現給那位老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當場就跟我簽約了下一個季度的演出合同。因此在1914年的初夏，也就是馬裡博爾的簽約季末，我在返回林茨的途中，專程前往克拉根福去探訪了一下我未來的工作環境。一支由40人組成的優秀樂隊，一座上好的劇院，還有一個現代化舞臺，所有這一切盡在凱爾滕州首府，這座因熱愛音樂而聞名遐邇的城市。在這裡，我能指揮《羅恩格林》，甚至也許《名歌手》，如此條件，夫復何求？我彷彿已經聽見了小提琴奏響的神聖絃音。

然而，我這些即將實現的美夢，卻很快隨著對俄戰爭的爆發而化為灰燼。幾個月後，我以奧匈帝國第二步兵團預備役士兵的身份，奔赴加利西亞前線，接受了戰火的洗禮。戰爭與我朝思暮想的音樂形成了天壤之別。儘管我根本不是塊扛槍打仗的料，但和我所有的戰友一樣，我盡我所能地去履行自己的職責。1915年，在喀爾巴阡山脈挺過了一個恐怖的寒冬之後，我被送到了匈牙利，條件惡劣的易普傑斯野戰醫院。

傷員和病號將從這裡被運往布達佩斯，這是一段為期7天的顛簸路途。每到一處較大的中轉站，就會卸下一批新死的士兵。我萬念俱灰，甚至已經開始盤算他們會在哪個站把我丟下。然而神奇的是，我竟然熬過了途中所有的恐懼與磨難，倖存了下來——但我的活力，已經一去不返。

經過數月的恢復之後，我回到家中，發現一切都已改變。我父親的身體已被工作拖垮，於是他放棄了自己的夙願，不再想讓我這根獨苗，去接管他苦心建立的生意。1916年，他關閉了作坊，在埃費丁附近的法瀚購置了一塊小農場。他本希望通過調養恢復身體健康，但為時已晚，1918年9月，當我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已在病痛的折磨下，絕望離世。我多麼希望能讓他的晚年過得更快活一些。

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還待在維也納的一個運輸隊，1918年11月8日，我們部隊被遣散。現在我該做什麼呢？所有的地方劇院全都已經關門歇業。我只好到維也納東遊西逛，看能否找到一個工作。雖然國立劇院依然在營業，但想在那裡謀份工作簡直難於上青天。多年前，為了維持生計，我曾在一支樂隊裡當過大提琴手，而現今，它已經解散。除了幾家大型咖啡館裡還有幾隻伴舞樂隊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了。不，那種環境不適合我。有一陣，我在一家新開的電影院指揮一支「六件樂隊」，為無聲電影配樂。可是我並不滿足，我試圖找一個大提琴手的工作，但是徒勞無獲，也沒有人需要聘請家教。

在收到我母親的來信前，我已經使出了渾身的解數。她告訴我，埃費丁的鎮議會在公招祕書。母親知道如何對我進行誘導，她將這份毫無吸引力的工作形容得妙趣橫生。她已經向市長介紹了我的音樂才華，另外還補充道，他們希望未來的鎮議會書記官重組音樂社——戰爭導致了老音樂社的解散——並負責具體的安排。

回到家裡，我仔細考慮了一番；工資少，藝術機遇有限，但與此同時，我已經放棄了成為職業指揮的希望，為了討好母親，我填寫了申請表。然後我返回維也納，仍舊一心想要進入樂隊。1920年1月，我收到一封來自鎮長的通知書，上面寫道，地方委員會從38位申請人中，挑選了我來擔任書記官一職。於是，我就成為了公務員。

我漸漸地熟悉了工作，幾年後我又通過了上奧地利州政府僱員考試。雖然我級別低微，但我因此獲得很多自由時間去從事我的音樂。我建立了一支不錯的樂隊，很快，我在鎮上的音樂生活就開展得有滋有味。無論是音樂會所的絃樂重奏，或是戶外的管樂表演，還是唱詩社的節慶演出，我都在這些工作上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整段時期內，我沒有找到哪怕是一丁點兒與我老朋友相關的訊息，他就用這麼一種如此怪異的方式拋下了我，而我，最終也放棄了所有的嘗試，因為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同他取得聯絡的辦法。他的姐夫拉包爾老早就去世了，他的姐姐安吉拉也已不在林茨居住。時隔這麼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我朋友身上發生。較我而言，他的確是個更優秀的

士兵，這點我敢肯定；抑或，他像我們這一代其他許多的年輕人一樣，已戰死疆場。

我偶爾會聽到人們談及一位德國政治家，名叫阿道夫·希特勒。但我想他們指的肯定是某個與他名字相同的人，畢竟希特勒這個名字也不是那麼罕見。想必再次聽到我老朋友的訊息時，他已經成為了一位舉足輕重的建築師，或者至少是一名藝術家，絕不會是某個尸位素餐的政客，而且還待在慕尼黑。

之後的一個傍晚，當我穿過靜謐的市集廣場之時，我漫不經心地在一家人書店前停下了腳步。書店的展覽櫥窗內擺放著《慕尼黑畫報》。畫報的頭頁印有一張年齡在35歲上下，面容消瘦蒼白的男子頭像——我立馬就認出了是他。那正是阿道夫；他幾乎沒怎麼變化。我仔細地算了一下，從我們一起住進斯通帕街到現在，一共過了多少年——整整15年啊！他的臉看上去顯得更嚴肅，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但幾乎未見衰老。

圖片下打出的標註是「著名的國家社會主義演說家，阿道夫·希特勒」。原來我的朋友真的就是眾人口中所談論的那個政客。我非常遺憾他沒能像我那樣，走上一條藝術家的道路，並且我深知這對一個人來說，意味著葬送自己的所有願望和夢想。如今，他不得不靠在各種會議上發表演說為生。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儘管他的確是一個頗具說服力的演講者——像這樣的例證不勝列舉。我當然也能夠理解他對

政治的興趣，但政治是一項費力不討好，甚至幾近危險的任務。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工作職責能夠使我置身本地的政治事件之外，因為作為鎮上的書記官，我必須對所有鎮民一視同仁。而我朋友才是真正的一頭扎進了政治，當我從報紙上得知他因過激的行為被關進蘭德斯堡監獄的時候，我絲毫沒感到驚訝。

然而他又東山再起，輿論界向他投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他的政治理念也正在逐漸被許多奧地利人所接受，對此我更是不以為奇，因為這些人基本上都像阿道夫當年在維也納跟我形容的那樣，困惑而盲從。當我讀到他的演講時，我腦中閃爍的記憶畫面又真實再現：斯通帕街29號那間昏暗的陋室，侃侃而談的阿道夫在鋼琴與房門之間來回地踱著步子。那時候，我是他唯一的傾聽者；而現如今，他的聽眾數以萬計。他的名字已傳遍街頭巷尾，很快人們就會問道：「這個希特勒究竟是何方神聖？」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比大多數人都更有資格回答。我不是還有他寄來的信件和畫作嗎？我幾乎都快把這茬給忘了，於是我來到我父母親位於法瀚的房子，我爬上閣樓，還好，那個老舊的木櫃依然靜靜地擺放在那裡，當初，我母親賣掉了小農場之後，這個櫃子就跟著我們一起搬到了這裡。我找到了鑰匙，開啟了櫃子，裡面放著一個藍色的大封袋，上面有我親手寫下的幾個字：阿道夫·希特勒。對於這個封袋，我已回想不起，在對戰爭的恐懼和隨之而來的痛苦折磨之下，我已完

全將它遺忘。就像我的朋友一樣，要不是他以一名政客的身份又重新出現在我的視線前，想必我也會漸漸地將他忘記。

我開啟了封袋，裡面裝著我朋友寄來的明信片、信件和圖畫。儘管我承認，這袋子裡儲存下來的東西，只是我從他那裡收到的一部分，但其中大多數都是比較重要的物件。我把這些卡片和信件又重新瀏覽了一遍。怎麼處理呢？我該不該把這些函件又給他寄去？但這樣做又有什麼意義呢？他肯定正忙著處理其他的事情，哪會有這麼多的閒工夫來懷舊。說不定他早已忘記了那個在劇院認識的、痴迷音樂的「瘦子木匠」。那我該不該給他寫信呢？也不行，這樣做在我看來更是毫無意義，因為當初他就一直在鄙視我，說我對政治缺乏興趣，而現如今，我只會讓他感到更加失望。

所以，能通過報紙來了解他，關注他，我就已經相當滿足了。現在他的支持者大概有上百萬之多。憑藉激進的構想與理念，他足不出戶就能給我們畏縮的奧地利帶來興奮與動盪，這更是讓我選擇沉默的直接原因。

在阿道夫為自己贏得了一個政治家的名銜以後，我卻沒有立馬設法與他取得聯絡，也許這看上去似乎有些難以理解。其實不然，回想過去，我們青年時期的友誼建立在一樣我們共同的愛好之上，那就是藝術；而政治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因此阿道夫在我眼裡也失去了他的魅力，同樣的，我也不能期望他對我再抱有任何的興趣。

後來，在1933年1月30號那天，我聽新聞上說，阿道夫·希特勒成為了德國的總理。我立刻回想起那晚在弗萊堡的山上，阿道夫對我說過的話，他說有朝一日，他將成為像黎恩濟那樣的人民領袖。這番在他16歲時看到的幻景如今真的變為了現實。於是我伏案寫下一篇簡訊，寄給了身在柏林的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並沒有期望能夠收到任何回覆。畢竟，身為一個總理，處理國家大事肯定要比給小半個世紀前結識的老朋友寫回信重要得多。然而在我看來，拋開政治因素不談，向一個久違老友獲得的成就和地位致以祝賀，總該不是件錯事吧。

但令我倍感驚訝的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來信，信上寫著：

上奧地利州，埃費丁，鎮書記官，奧古斯特·庫比席克先生（收）

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8月4日，慕尼黑，「棕宮」

我親愛的庫比席克：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你於2月2日給我的來信。自從今年1月份以來，我已收到了成千上萬封信件，因此請你不要見怪。我很高興能在分別多年之後得知你的訊息和住址。我十分願意——以前我那段艱苦的奮鬥經歷已成往事——與你一起，重溫我人生中那段最美妙的歲月。有機會

你可以來見我。願你和你的母親諸事順心，我記憶中仍然珍藏著我們過去的友誼。

你的，阿道夫·希特勒

看來他並沒有將我忘記。在百忙之中他還能想起我，讓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將我們一起度過的日子稱作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歲月」。說明他已經忘卻那些痛苦的經歷，留下的都是些愉快的回憶。但信的結尾處讓我感到有點侷促不安。他寫道：「有機會你可以來見我。」說來容易做來難。我總不可能就這麼直愣愣地跑到他在上薩爾茨堡的別墅，然後笑著對他說：「我來了。」這樣的重逢只會讓他感到厭惡。再說我又能跟他談點啥呢？同他相比，我的人生經歷顯得既無意義又無趣；要是跟他談論埃費丁，只會讓整個氣氛變得更加沉悶。而與我們相關的話題也就僅限於此，再無其他可言。因此我打消了去拜訪他的念頭，並勸慰自己，這樣的善意邀請就像信尾的常規祝願一樣，不過是出於一種禮節上的考慮而已；25年前，這份祝願是帶給我的雙親，如今只對我的母親。

當然，如果一個朋友能夠像這樣，始終如一地對待自己，那的確是件好事，但我認為，這段再續的友誼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平等性，因為很明顯，命運已讓我們產生了天壤之別。

然而，1938年3月12日，就在萊茵河畔布勞瑙，這片他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土地上，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軍開過邊境，進駐奧地利。當天傍晚，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市政大廳的陽臺上（還是跟以前一樣破舊），向聚集的民眾發表了演講。我本來也打算去聽他的演講，但我當時正忙著給德國軍隊安排住宿，根本無法從埃費丁抽身。但同年4月8日，當希特勒再次來到林茨的時候，我曾試圖拜會他。當天，他在克勞斯火車製造廠的車間裡參加完一場政治集會之後，下榻於維辛格爾酒店。酒店門前的廣場上人群簇擁，難以靠近，我繞到了衝鋒隊設定的警戒線前，並告訴他們我想面見元首。起初他們用懷疑的眼光對我上下打量，可能以為我已經瘋了。只有在我把希特勒的親筆書信拿給他們看過之後，他們對我才變得肅然起敬。這些衝鋒隊員隨即叫來一名軍官，當他也親自看過信件之後，我便立馬得到了放行的許可。在他的指引下，我來到酒店的大廳，這裡簡直就像一個蜂巢；有三五成群站在一起熱議國事的將帥，有在報紙的插圖上見到過的各部部長，還有納粹黨內的高層領導和一些身著制服的高階軍官。許多忙碌的副官在大廳內各方奔走，閃亮的肩章清晰可辨。所有這一切都在圍繞著那個我想要見到的男人而進行。被弄得頭暈目眩的我，一下子意識到了這次貿然來訪的愚蠢。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我的老朋友已成為了德意志帝國元首，而他那位高權重的身份卻在我們的友誼之間築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昔日那段肝膽相照的歲月，那段親密無間的時光，定然已為過往。

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悄悄地離去，免得攪擾了這些正在執行重要任務的達官顯貴。

負責呈遞我信件的是一名高階副官，名叫阿爾伯特·鮑曼，很快他找到了我，並告訴我說，總理今天狀態不佳，恐怕不能接見任何人了；問我是否願意於次日中午再來。之後鮑曼邀我小坐了一會兒，因為他還想問我點別的事情。「元首年輕時總是很晚才睡覺嗎？」他哀怨地問道。因為不過午夜他是絕不會睡覺的，但是陪他熬夜的隨從人員又不得不在第二天早起。鮑曼繼續抱怨說，希特勒脾氣暴躁，沒人能與他相處得來，還有他古怪的飲食習慣，每餐只吃些素食，布丁和果汁。

「元首一向就吃這些東西嗎？」

我說是的，然後補充道，他年輕時還是喜歡吃肉的。而後我便告辭。這個阿爾伯特·鮑曼是眾所周知的馬丁·鮑曼的弟弟。

第二天我又來到林茨，整個城市的居民都活動在大街上。越往維辛格爾酒店靠近，就越是感到擁擠。最終，我好不容易才從人堆中拼殺出一條路，來到了酒店大廳。興奮與躁動似乎比昨晚更甚，因為今天是奧地利全民選舉的前夕。

可以想象，所有的重大決定都必須由希特勒親自作出。我簡直找不出比這都更倒黴的重逢時刻。我回想了一下，當初我們在火車西站相互告別的時候是在1908年的7月初；今天是1938年4月9日。也就是說從我

們突然的分離到今天的重聚，中間過了將近30年。30年啊，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這30年給世界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

我無法想象要是希特勒看見我會有什麼反應。也許他會跟我簡單地握個手，或者友好地拍拍我的肩；把我領出門之前再說上幾句溫暖人心的客套話——這已足以讓我滿足。我呢，雖說是準備了一些比較得體的發言，但我對稱呼形式還是感到有點擔心。我總不可能還用「阿道夫」來稱呼帝國元首吧，況且我也知道他是個講究形式的人。所以還是用正常形式的稱呼為好。但我甚至都不清楚到時候有沒有那個發言的機會。

現實中發生的一切，自然也受到了我內心情感的影響。

當希特勒從酒店裡的一個房間突然走出來的時候，他一眼便認出了我，高興的他衝我喊道：「庫斯特爾！」他撇下身邊的隨從人員，走過來抓住了我的手臂。我依然記得他用雙手緊緊地握住我伸出的右手，他凝視著我的眼睛，明亮的目光仍舊顯得那麼的犀利。我能從他的聲音中聽出，他明顯也跟我一樣，已被此情此景所深深打動。

大廳內的眾位名紳面面相覷，沒有人知道這個被元首熱情接待的奇怪公務員究竟是誰。

我儘量讓自己保持鎮靜，然後發表了一通事先準備好的講話。他專心地聆聽著我的發言，臉上還掛著一絲微笑。在我講完之後他朝我輕輕

地點了點頭，似乎在對我說，不錯啊，庫斯特爾！抑或在想，如今就連我少時的朋友說起話來都與其他人無異了。但在我看來，任何親密的言行舉止在這個地方都會顯得不合時宜。

他想了幾秒之後對我說道：「您跟我來。」用的是很正式的稱呼「您」，不像他在1933年寫給我的信中，用的是「你」這個尋常稱呼，也許是因為我的講話中也全都是用「您」來稱呼他的緣故吧。但說句實話，聽到他在眾人面前對我用「您」這個敬稱，反倒讓我感覺相當欣慰。

元首走在前面把我領至電梯處。我們登上二樓，來到了他的房間門前。他的副官為我們開啟房門後便自動離開，留下我們兩人單獨相處。希特勒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久久地注視著我，然後他開口說道：

「你還是那個以前的你，庫斯特爾，無論在什麼地方我一眼就能把你辨認出來，你簡直一點都沒變，只不過老了一些。」

隨後他領我來到桌前，邀我就座。他向我一再強調他與我久別重逢的喜悅之情。對我的祝賀他更是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今日的成功是多麼的來之不易。而目前並不是個推心置腹的好時機，但他希望將來會有這麼個機會。到時候他會通知我，他建議我最好不要直接給他寫信，因為這些信件很有可能永遠到不了他手上，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設法地為他節約時間。

「我再也沒有像以前那樣的私生活了，我根本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講完這番話後，他起身走到窗前，望向窗外的多瑙河。那座以前經常惹他莫名生氣的老鐵橋依舊靜靜地佇立在那裡。果不其然，他又立馬開始抱怨道：「那個醜陋的東西居然還在！不過它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你等著瞧吧，庫比席克。」

然後他又轉過身微笑著對我說：「我真想和你再到那座橋上去走走，就跟以前一樣。可是這已經不大現實了，我所到之處，身邊必定圍滿了人。但相信我，庫比席克，我已為林茨規劃了一幅巨集偉藍圖。」

對此我的確深信不疑。他曾穿遍了林茨的大街小巷，就只為發現有待改變的地方。如今他又開始跟我從每一個計劃慢慢談起。新的多瑙河大橋被稱作尼伯龍根大橋，是現代橋樑建築史上的一座典範。他向我詳細描述了這座大橋的兩個橋頭堡的形狀。之後是劇院——其實所談之物的順序我早已諳熟——所有裝置都必須更新，要打造出一個現代化的舞臺。當新歌劇院在火車站的舊址建立起之後，劇院將專門被用來演出戲劇和輕歌劇。此外，要想讓林茨成為名副其實的「布魯克納之城」，還必須為這座城市建造一座現代音樂廳。「我要把林茨打造成一個文化中心，並且我要親眼目睹所有的一切變為現實。」

我本以為這次會面即將結束，但希特勒接著又開始設想要在林茨組建一支大型交響樂團，這時，我們的談話便突然切入到了一個私人話題。

「告訴我，庫比席克，你現在從事的是什麼職業？」

我告訴他，自從1920年成為一名政府僱員之後，我一直在從事書記官這個工作。

「書記官？」他問道，「書記官是幹什麼的？」

我有些尷尬，這個問題叫我一時半會兒如何解釋得清呢？當我還在苦苦思索合適的回答時，他又打斷道，「這麼說來你成為了一個公務員，一個文書！這不適合你幹啊，你的音樂呢？」

我誠實地回答說，那場我們輸掉的戰爭毀了我的前程，要是不換別的工作我就只能捱餓。

他冷酷地點了點頭，說道：「是啊，我們輸掉的戰爭。」然後看著我對我說：「你不會一輩子都當一個文書的，庫比席克。」此外，他還想再到我提起的埃費丁去看一看。

我問他是否當真。

「當然，我會來看你的，庫比席克。」他聲稱道，「但我只會專程為你而來，然後我們可以沿著多瑙河散步。在這裡，我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他們從不讓我一個人出去。」

他想知道我是否還熱衷於音樂。

這下終於談到了我喜歡的話題。可最後我只是簡單地說了一下我在鎮上參加的一些音樂活動。因為同他平日裡處理的那些重大國際事務相比，我的小型音樂會表演簡直顯得微不足道，所以我擔心講多了反而會讓他感到厭煩，但我想錯了。為了節約時間，像這種事情我只好一筆帶過，然而他卻不依不饒地打斷道：

「什麼，庫比席克，你竟然會在這麼一個小小的埃費丁演奏交響！簡直不可思議。你演奏過哪些曲目？」

我重新數了一遍，有舒伯特的《未成交響曲》，有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還有莫扎特的《朱庇特交響曲》。

接著他又詢問我那支樂隊的實力如何，以及什麼編制；他對我的回答充滿了驚奇，同時也對我的成功表示了祝賀。

「這正是我必須要幫你的地方，庫比席克，」他大聲說道，「給我列份清單，告訴我你需要什麼。還有，你的個人狀況如何，日子過得不算拮据吧？」

我回答道，雖然我的收入只能算湊合，但對我而言，夠用就行，因此我沒有什麼個人要求。

他側過頭看著我，表情有些驚訝；顯然，他還沒見過像我這樣無慾無求的人。

「你有子女嗎，庫比席克？」

「有，我有3個兒子。」

「3個兒子！」他欽佩地叫道。他表情鄭重地重複叨唸了幾次。「你都有3個兒子了，庫比席克，而我還沒成家，我現在是孤身一人。但我願意照顧你的兒子。」

於是我又跟他談起了我們家那幾個小子——希特勒想要了解他們成長的每一個細節。我跟他講，我這3個兒子都頗具音樂天賦，而且其中兩個還是優秀的製圖員，他聽後相當高興。

「庫比席克，我應該承擔起這3個孩子的教育義務，」他對我說，「我不想讓這幾個頗具才華的年輕人重蹈我們的覆轍，你最清楚我們在維也納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但在我們分別之後，我還體驗過更糟糕的日子。不能讓年輕人的聰慧天資遭到貧窮與苦難的扼殺。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盡心竭力，尤其是對你的孩子們，庫比席克！」

我忙不迭地要補充幾句，元首後來確實在林茨的布魯克納音樂學院為我的3個兒子安排了音樂學習，學費均由他辦公室支付，另外，在元首的囑咐下，一名來自慕尼黑藝術學院的教授還給我兒子魯道夫指點了一些繪畫技巧。

我期望在最後還能跟他短暫的握個手，為這次愉快的交談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希特勒起身站立，我以為這次會面到此結束，於是我也站了起來。但他只是叫來了他的副官，然後將我兒子的事情跟他做了些吩咐和交代；那位副官趁機提醒他我手裡還保留著一些他年輕時寫的信。

於是我便把他的信件、明信片還有一些畫作攤放在了桌子上。看著我一下子拿出這麼多的紀念品，他感到相當驚訝，還問我是如何將這些紙質物件儲存至今的。我告訴他，我把這些東西全都裝在一個寫著

「阿道夫·希特勒」的封袋裡，然後把這個封袋放進了我們家閣樓上的一個黑漆衣箱裡。他對那幅珀斯特靈堡風景水彩格外感興趣。他給我解釋說，有些特別聰明的畫家能夠臨摹他的水彩，其技術之精湛，甚至可以使人難辨真假。這些人的生意做得紅紅火火，總不乏有些愚蠢的買主任其宰割，最保險的辦法就是絕不要將原作出手。

由於已經有人向我索要過這些資料，所以我只得詢問元首的意見。

「這些史料是你的私人財產，庫比席克，」他回答道，「沒人敢向你

索取。」

由此他又談到了拉比齊的書。拉比齊也曾就讀於林茨實科中學，入學時間比希特勒晚兩年，出於討好的目的，他寫了一本關於希特勒學生時代的書。但希特勒卻感到非常生氣，因為他同拉比齊根本不曾有過任何私交。「庫比席克你瞧，我對這本書從頭到尾就沒有一點好感；只有那些真正瞭解我的人才有資格寫我。如果說非要指定一個人，那麼就是你，庫比席克，」說著他轉身對旁邊的副官補充道，「馬上記下來。」

然後他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你瞧，庫比席克，我們真是應該經常見面啊。以後只要一有機會我便會派人來請你。」

會面結束了，還處於一種茫然狀態的我，離開了酒店。在接下來的數日裡，躁動與不安闖進了我那平靜而清閒的生活，我突然發現，要當這麼一位名人的少時夥伴也不盡然是件美事。儘管此事我以前從沒跟任何人說起，而且後來也很少在別人面前提及，但我很快就看到了這段青年友誼的陰暗面。其實，早在1938年3月以前，我就已經對之後將要應付的一切做好了心理準備。那時候，奧地利還沒有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有一天，一輛汽車停在了我埃費丁的家門前。車裡走出3名穿著黨衛軍制服的人，他們從柏林一路而來就是為了找我，並自稱是受元首委派前來收集所有與希特勒年輕時期相關的檔案資料，然後將它們帶到元首官邸，以便妥善儲存。幸好我當時並沒犯傻。因為很

明顯，希特勒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材料的存在，他又怎會派人前來索取呢？這必定是某些黨務辦公室的單方面行動，因為他們已經得知，有我這麼一個人的存在。總之，我拒絕把這些資料交給那3名黨衛軍人員，我聲稱自己對此毫不知情。我猜想他們可能都以為奧地利人很好騙，以為自己穿上這麼一身警察般的裝束就能夠解決問題，但他們失敗了，因為他們粗魯的舉止根本不是那種渴望獲得材料的表現。更糟糕的是，這幾個難纏的老百姓甚至連黨員都不是！在他們鎩羽而歸之時，必定也會作此想法：元首年輕的時候怎麼會找這種老頑固當朋友啊。

還好，我頑強而出色地抵住了第一輪進攻。之後的類似事件我更是應對自如，因為我有希特勒對我的保證，這些材料屬於我的私人財產。

在接下來的數月裡，黨內各個辦公室都爭先恐後地想要把我爭取到手。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每當希特勒同他的親信談及他的童年生活時，他就會經常提起我的名字。人們只要一問起他年輕時的經歷，就總會得到一個恆定的答覆，「去問庫斯特爾吧。」因此，他那些內部圈子的人，在收穫甚少的情況下便開始意識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有這麼一個奧地利人，他對青年時期的希特勒相當瞭解。而恰令他們感到幸運的是，自從1938年3月奧地利被合併以後，這個看似難以觸及的「庫斯特爾」突然就成為了德國公民，如今，已處於所有政府部門掌控之下的他，顯得唾手可得。

帝國部長戈培爾派了一名非常可愛的人來見我，我已記不清他的軍銜和職位，只記得他名叫卡爾·瑟夫。瑟夫為我講解道，他們正準備出版一部關於元首的大型傳記，其中1904年到1908年這一段，他們想交予我來撰寫。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們會把我接到柏林，以便讓這方面的權威專家配合我展開工作。與此同時，他們還想讓我現在就開始把當年的每個事件再仔細地回憶和整理一遍。我跟這個年輕人解釋說，恐怕到時候我騰不出任何的時間來接手這項任務，因為自打德奧合併以後，我們這種地方政府僱員每天都被浸泡在工作裡。他可能也意識到我是在找藉口迴避，只不過沒想到我的表述方式如此滑稽。但他還是奉勸我不要低估了「我對歷史那份獨有的責任」，這是他的原話。他講如果我有興趣同他們合作，他能夠輕易地幫我擺脫現狀。但我明確地回絕了他。在離開的時候，他向我承諾，說他會再擇「一個更好的時機」登門造訪。由於越往後面，「時機只會變得越糟」，所以我再也沒見到過卡爾·瑟夫。儘管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說，他用大度而得體的方式為宣傳部完成了一項棘手的任務。

然而同馬丁·鮑曼打交道就不是那麼的愜意了。他顯然已經把自己當成了整個事件的唯一負責人。他把我看得很緊，決不允許任何人搶在他之前拿走我的資料。他的來信和便箋讀起來給人的感覺就好像他是《希特勒傳》的總編纂一樣，任何人在未經他檢驗和許可的情況下，都不得與我進行隻言片語的交流。他的目的是將我儲存下來的材料移交到中央黨務辦公室——所謂的原本歸屬地。當他的企圖遭受挫敗之

後，我接到了他的一條嚴格指令，他命令我不準將這些資料轉手，更不準在未經他授權的情況下拿給別人看。就這一點，馬丁·鮑曼根本犯不著用這麼嚴峻的方式來對我進行告誡，因為我一直就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但後來我又接到了他的另一條指令，他要我立刻著手，把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年輕時的友誼和經歷寫成一本回憶錄，然後把初稿呈遞給他過目。當時我回復他說，這件事情我必須要先跟希特勒本人商量之後再做決定。這一招著實相當管用。從此以後，但凡遇到某些咄咄逼人的權勢人物對我施加壓力，我就只好這樣說：「很抱歉，我必須先將您的建議同元首進行私下商量以後才能給您答覆，敢問閣下尊姓大名？」此法一用，立竿見影，收效甚奇。從而我也會受到他們的溫和對待。

相反，與魯道夫·赫斯的會面則是一段美妙而令人愉快的回憶。他造訪林茨的時候邀我前去做客。他派了輛汽車把我接到了珀斯特靈堡的貝格邦酒店。帝國部長赫斯在那裡熱情地接待了我。「您就是庫比席克吧！」他面帶喜色的招呼道。「元首跟我談了很多關於你的事情啊。」我立馬就感受到了一種真誠的友好。

也正是通過與赫斯的這次會面，才使我確信了自己以前的一種想法：越是跟希特勒關係密切的人，就越瞭解我的故事。魯道夫·赫斯和溫妮弗雷德·瓦格納夫人是對希特勒的青年時期瞭解得最多的人，因此他們知道我也不足為奇。

部長還邀請我到酒店的一處露天平臺上同他一起用餐。之後他讓我詳細地講述了我以前所有的生活經歷，而且他還不時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屢屢向我提問。就人性的角度來講，我個人覺得魯道夫·赫斯比其他人都更近似希特勒，而我對此也感到十分高興。就連在座的其他來賓也積極地參與到了我們的談話中，整個氣氛顯得相當的活躍，明顯比跟中央黨務辦公室那些官員談事情要有趣得多。

尤其令我感到高興的是，處在這麼一個能夠俯覽整個林茨城的制高點，我可以把我談到的所有地點，指給這位帝國部長看。在矗立著兵工廠的那座山後面就是萊翁丁的城郊，希特勒讀實科中學的時候每天都要從那裡經過；洪堡大街，自從克拉拉夫人的丈夫去世後，她就一直住在那裡；在我們下方不遠處是烏爾法爾的布呂騰大街；反正還有好多與我朋友相關的重要地點。

魯道夫·赫斯以其樸素和率直的作風給我留下了一個相當不錯的印象，他與那些次要政治人物的處事方式截然不同。唯一讓我感到有點遺憾的是，他當時可能是抱恙在身，氣色有點反常。

與此同時，我也開始漸漸地被奧地利人所熟悉。而在此之前，人們根本就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在上奧地利州還有一個朋友，在這種幸運的狀況持續了數年之後，我最終還是被人們給挖掘了出來。當然，我並不是一名納粹黨員。這在很多人看來似乎無法理解，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希特勒的少時夥伴必定是黨內的二號人物。但即便當年，我在

政治上都一直是他的一個搖擺不定的支持者。這倒不是因為我們之間存在著什麼政治分歧，而是因為我對政治根本就不感興趣；或者更確切地說，我根本就不懂政治。

當然，我很快就被淹沒在了人們的各種請求之中，他們不是想得到我的支援就是想讓我在元首面前為他們美言幾句，更有身陷是非者希望我出面去幫他們調解，反正各懷目的，理由不一。雖然我對將要擔負的重大責任完全沒有任何概念，但我還是很樂意地答應了他們。直到我的嘗試失敗之後，我才恍然意識到，成為「阿道夫·希特勒青年時期的朋友」並不意味著我就有干涉政事的權力。人家禮貌而堅決地給我指明到，這些事情不在我的許可權範圍之內。

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希特勒視察埃費丁的計劃並沒有實現。突然有一天，我十分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來自帝國總理府的掛號信，它的到來，打破了我那墨守成規的無聊生活。拆開信封的一剎那，我的心彷彿就快要從嗓子眼兒裡蹦出。那些印在牛皮紙上的內容成了我這輩子最欣喜的回憶。根據帝國元首的指示，我受邀出席今年在拜羅伊特舉辦的瓦格納音樂節：我須於1939年7月25日，星期二，前往萬弗雷德莊園，屆時，希特勒的管家卡倫貝格先生會為我打理一切。

我長久以來的人生夢想即將變為現實。我的喜悅簡直無法用言語來表達。自打我記事以來，遊訪拜羅伊特就成為了我心中的最大願望，我一直期盼著自己能夠在那片神聖的土地上，傾聽大師的不朽傑作。但

我一直苦於囊中羞澀，無法展開這段奇妙的旅程。而如今突然之間，我便獲得了這個寶貴的機會。

火車經過帕紹、累根斯堡、紐倫堡並最終抵達拜羅伊特，當我走出車廂，第一眼看到建在山上的歌劇院時，我興奮得差點昏死過去。卡倫貝格先生非常熱情地迎接了我，還為我引見了住在林茨大街10號的莫申巴赫一家——當地一處環境優美的寓所——並請我在他們家入住。

我來得正是時候；1939年的音樂節隨著《漂泊的荷蘭人》的上演而正式拉開序幕，一支由132人組成的交響樂團震撼登場，讓我醉心不已。

次日上演的是《崔斯坦和伊索德》，一場令人難以忘懷的表演。7月27日，星期四，《帕西法爾》上演。為了欣賞這出歌劇，我在家裡特意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我不僅鑽研了鋼琴樂譜，而且還讀遍了與之相關的各種文學資料。隨著柔美的旋律奏出「聖餐」的主題，我周圍的世界也開始發生轉移。在我平庸的一生中，我從未感到自己如此享受，如此痴迷。

8月2號，星期三，在最後一部歌劇，《諸神的黃昏》拉下帷幕的同時，我的拜羅伊特之旅也宣告結束。我收拾完行李之後，便準備去向卡倫貝格先生辭行，並感謝他這麼些天來對我的細心關照。「你非得直接回家嗎？」他微笑著問道，「如果你肯多待一天那將會是個明智的選擇。」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暗示，於是我就採納了他的建議。

8月3日下午兩點鐘左右的時候，一名黨衛軍軍官來到我的房間，並把我接到了萬弗雷德莊園。在莊園的入口處，我見到了等候我的朱利葉斯·肖布上將，他把我帶到了一個大廳，我發現之前我在林茨見到過的好多名人都聚集於此。溫妮弗雷德·瓦格納夫人同帝國部長赫斯談笑風生，布魯克納上將等軍中高層與馮·諾伊拉特男爵站在一起相互交流。我突然發現在場人員半數以上都是軍人，而令我更為驚訝的是，這些將軍一個個表情冷峻，他們熱議的話題多與波蘭有關，大致內容是一場即將到來的武裝較量。在這種緊張壓抑的氣氛之下，我頗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一種類似「怯場」的下沉感油然而生，就跟之前我在維辛格爾酒店的感受一樣。

也許希特勒是想在返回柏林之前跟我做個友好的告別。我忐忑不安地準備了一些感激之詞，盼望著能派上用場。大廳的深處有一扇雙開的摺疊大門。

忽然，大門洞開，一名副官立於門側，示意肖布上將帶我入內，於是我們便穿過大門來到了裡廳。「我的元首，庫比席克先生已到！」報告完之後，肖布上將轉身退出併合上了大門，留下我跟元首獨處。

這是兩個老朋友的一次愉快重逢。他雙目放光，神色喜悅地走到我跟前，絲毫沒讓我察覺到他肩負的重任與承受的巨大壓力；此時此刻，他僅是瓦格納夫人請來的一位座上賓，也同其他人一樣，感受著拜羅伊特的美妙氛圍。他雙手握住我的右手向我表示歡迎。我呆站在這一

神聖的場所，聆聽著他的問候，竟感動得語塞。只有當我聽見他說，「我們坐下談，好嗎？」，我才從一片茫然的情緒中回過神來。

我向他講述了我這些天在拜羅伊特的各種體驗，告訴了他我探訪過哪些與瓦格納相關的地方，當然，還有我對節日演出的具體看法和評價。一講到這些話題我便恢復了自控力，現在我們談話的方式就跟年輕時一模一樣。希特勒似乎也想起了當年我們在林茨觀看瓦格納歌劇時的情景，於是他向我透露道，他準備讓儘可能多的德國人去感受瓦格納的作品。呵，我對這些計劃簡直太瞭解了！早在我們35年前的談話中，這些計劃的初步設想就已經被確立。但如今，這不再只是一個幻想。他告訴我說，今年有6000名付不起錢的老百姓，在官方的精心組織下，同其他客人一道，參加了本次拜羅伊特音樂節。我說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啊。他聽完笑著講到——這番話我記得很清楚——「庫比席克，現在你終於見證了我在拜羅伊特的成就，因為曾經，當窮困潦倒又名不見經傳的我，第一次發表這些想法的時候，你是在場的唯一聽眾。那時你總愛問我，怎麼把這些計劃付諸實現。而如今你看，它們就出色的擺在你面前。」然後他開始跟我介紹他對拜羅伊特做過的貢獻，以及會在將來實施的計劃，就好像非得要給我列出個清單似的。

但此時我還肩負著一項具體的任務。我的口袋裡揣著一大包印有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要知道在埃費丁和林茨，許多人不惜一切代價，就

為了能獲得一張由元首親筆簽名的明信片。我在拿出卡片之前猶豫了好一會兒，因為我這種請求看上去似乎顯得相當庸俗，然而此時的希特勒又正好坐在桌子旁，如果我錯失了這次機會，恐怕我允諾別人的事情就得黃了。一想到家鄉那幫虔誠的老百姓，我便鼓起勇氣拿出了明信片。

他接過了所有的卡片，不緊不慢地掏出了眼鏡，這時我遞給他一支自來水筆。他一邊簽名，我一邊用吸墨紙將墨痕拭乾。簽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抬起頭，看著站在一旁手託吸墨紙的我，微笑著說道：

「看得出來你確實是個文書，庫比席克。但我只是沒搞懂你是如何堅持下來的。換做是我的話，早就走人了。對了，你之前為何不來找我？」

我被問得相當尷尬，於是馬上找了一個合適的理由。

「我看見你在1933年8月4號給我的回信上說，只有等你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時期，我們才有機會一起敘舊，所以我就想等你忙完了我再來找你。況且在1938年之前我還是奧地利人，想去德國就必須要申請護照，如果我挑明瞭我的真實意圖，他們肯定不會把護照發給我。」

希特勒開懷大笑。「是啊，在政治上你永遠都是個小孩兒。」我聽完也樂了，因為我還以為他會用另一個詞來形容我。當年斯通帕大街的「白痴」被換成了「小孩兒」。

元首將捆好的卡片全部遞給我，然後起身站立。我對他感謝再三並小心地把卡片放進了我的外套口袋。我本以為會面到此結束，可他馬上又嚴肅地說道：「過來！」

他開啟了通向庭院的落地長窗，我跟著他走下青石臺階，一條幽雅的小徑將我們引向了一道高大的雕花鐵門，他緩緩推開鐵門，一座靜謐的花園呈現在我們面前。鮮花與灌木生長得異常茂盛，參天大樹在我們頭上織成了一座穹頂，讓整個花園處在半明半暗之中。又走了幾小步，我們便來到了瓦格納的墓前。

希特勒雙手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激動。

蔥鬱的常青藤覆蓋在這位大師的花崗岩墓板四周，一切寂靜無聲，沒有人來攪擾這份神聖的寧靜。

希特勒打破了沉默，「我很高興能與你在此重聚，因為這裡一直都是我們兩人最崇敬的聖地。」

命運總像謎一樣令人琢磨不透。

對我們過去在維也納的生活比較瞭解的人，肯定都清楚，當時我的未來儼然已成定局。在完成音樂學院的學業之後，我就準備展開我的歌劇指揮生涯——畢竟以前我還是獲得過一些成就。同樣，阿道夫的未來看似也毫無懸念，漫無目的地學習加上對專業訓練的鄙夷，最終只

能換來失敗的結局。如今，命運已作出了裁定。此時此刻，當年那兩個從斯通帕街的陋室裡走出的窮學生，又攜手站在了理查德·瓦格納的墳前。如今他們分別成為了什麼樣的人呢？那個至今依然涉足音樂的「定局者」在奧地利的一個小鎮上當文書，而另一個所謂未來堪憂的自負青年成了德意志帝國的元首。他們各自又將面對怎樣的未來呢？只有一點可以清晰預見：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前者會一直默默無聞，而後者將被載入史冊。

瞻仰完瓦格納的墳墓之後，我們一起返回了別墅。溫妮弗雷德夫人的兒子，即大師的孫子，維蘭德·瓦格納，在花園的入口處等候我們。他為我們開啟了別墅裡的所有房間，因為元首準備帶我參觀瓦格納的所有遺產。於是我們的旅程便圍繞著這幢古老的建築而展開。其實我早已在圖片上領略過瓦格納故居的風采，只不過一直無緣拜臨。

在音樂室裡陳列著一架大師用過的三角鋼琴。琴蓋依然敞開著，令我為之動容。另外我還參觀了巨集大的圖書館。維蘭德離開後，希特勒把我引見給了瓦格納夫人，她明顯很樂意與我相識。當我們談到對大師作品的崇拜之情時，我突然便想起了以前在林茨觀賞的那場頗具紀念意義的演出——《黎恩濟》。這時，希特勒也開始向瓦格納夫人描述起他那晚的獨特感受，其中還包括那句令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感嘆：「蛻變就從那一刻開始。」

分別之際，希特勒給了我一些建議。他建議我回去的時候可以在慕尼黑逗留幾日，感受一下帝國交響樂團（想當年我們為這事可沒少費心）的演奏水平，還可以參觀一下氣勢恢巨集的德國藝術展覽館。他覺得要是我們以後在上薩爾茨堡的伯格霍夫別墅見面肯定會不太方便，所以他特別叮囑，只要他人在拜羅伊特，我就可以隨時來找他。

「我真想讓你永遠都留在我身邊。」他握著我的手說道。我離開的時候他站在花園門口向我揮手告別。不久，我在理查德·瓦格納大街便聽到了人群的高聲敬呼——元首正搭乘專機從拜羅伊特飛往柏林。

1940年7月8日，元首辦公室給我寄來了一份瓦格納音樂節的首輪邀請函，我頓時陷入了左右兩難的窘境。戰爭的到來也改變了我們的工作職能和義務；丟下繁重的任務而跑到拜羅伊特去偷閒會不會顯得很不負責任？雖說元首也曾表達過希望與我再次見面的想法，但現如今，一場戰爭正在進行，全國最忙碌的人莫過於希特勒自己。因此他能否出席還是一個問題。為了減輕我的負罪感，也為了使這次出行顯得合情合理，我只好告訴自己，這是元首的叮囑。

與1939年不同的是，今年除去《漂泊的荷蘭人》以外，就只上演了一部《尼伯龍根的指環》。瓦格納夫人邀我共享一個包廂，她告訴我說，她已經跟元首通了電話，元首說他會趕在《諸神的黃昏》上演之前，從總部乘飛機過來，但演出一結束就必須立即返回。「庫比席克

先生，元首還問我你來了沒有，」她補充道，「他想在幕間休息時見你一面。」

1940年7月23日，星期二，下午3點整，小號手——當時由國防軍擔任——吹響了齊格弗裡德的主題曲，宣示歌劇正式開演。我剛坐下不久，希特勒就進入了他的包廂。莊嚴而嘹亮的聲音凸顯出覺醒的主題。我忘乎所以地沉醉在了這部驚世傑作裡。

在第一次幕間休息的時候，瓦格納夫人的二兒子，沃爾夫岡·瓦格納，匆匆地跑來叫我跟他走，說是元首想見我。於是我們來到了休息廳，有二十來人聚集在此相互交流，他們言語之間顯得甚是激動。我差點沒認出希特勒，因為他穿的是一件田野灰的制服，而不是1939年那身便服。但他的私人副官已經向他通報了我的到來；跟以前一樣，他走過來握住我的手，向我致以親切的問候。他看上去氣色相當不錯，心情似乎也更加爽朗，甚至比前幾次見到我都還要高興。也許這場戰爭已讓他的心情變得越發的沉重，因而看到我這個少時朋友便倍感親切。

他把我拉到一邊同我單獨相處，其他客人則繼續進行他們的私人交流。

「這是我今年唯一能夠觀看的演出。」他說，「但是沒辦法，我們正在打仗。」然後他又略顯憤懣地補充到，「這場戰爭會導致我們的重

建計劃推遲數年，真是恥辱，我當大德意志帝國的元首又不是為了天天打仗。」

在波蘭和法國取得了重大軍事勝利的元首，居然會用這種口吻跟我講話，讓我感到相當震驚。也許我的出現提醒了他這樣一個事實：光陰似箭催人老；畢竟我們相識之初，恰值風華正茂。儘管他現在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壯，但當他發現我這個少時夥伴已年華垂暮之時，他必定也意識到，無情的歲月同樣在他身上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

「這場戰爭奪去了我的大好時光，」他繼續道，「你是瞭解我的，庫比席克，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建設好這個國家，這才是我一輩子的願望，你懂我意思嗎？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年輕時做過多少的設計和構想。到目前為止，才僅僅實現了幾樣，仍有大量的計劃有待完成。但還有誰能擔此重任？現在我只能眼睜睜看著戰爭奪走我的大好時光。恥辱，悲哀！時間不等人啊，庫比席克，我們只會越來越老。再過幾年，想做都來不及了。」

帶著年輕時那種激動而急不可耐的顫音，他開始向我描述他對國家未來的規劃：高速公路的擴建延伸，商業運河的現代化以及鐵路網建設等等。簡直令我應接不暇。我再次產生了這樣的感受，他是想讓我這個少時夥伴見證他所有計劃的實現。也許在別人眼裡，我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公務員，但對他而言，我是他青年時期唯一的朋友。因而他可

能會覺得，把這些想法向一個連黨員都不是的同胞傾吐，總比講給成天圍在他身旁的軍人或政客聽要好得多。

當我試著將談話轉向我們的往事之時，他立馬接住我的話茬繼續講道：「兩個窮學生，這就是我們過去的身份。沒人知道我們還捱過餓。爬山時兜裡就揣一塊麵包。而如今世道不同了。去年，一群青年坐著我們的船抵達了馬德拉島。瞧，那邊就是雷博士，還有他年輕的妻子。他就是這個組織的建立者。」接著他又開始談起了國家的文化建設專案。節日劇院門口聚集的民眾正在熱切地期盼著元首的出現，但此時的他，話匣子已開啟，想收也收不住了。就像過去他在查克雷斯夫人的房子裡發表長篇大論時的狀態，而且他也知道，只要他談及的問題與藝術有關，我就會特別感興趣。

「這場戰爭已經把我拉下了水。但我希望這種局面不會持續太久，等仗一打完，我就能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國內建設上來，然後開始實施我餘下的所有計劃。庫比席克，到那時我會派人來請你，我要讓你永遠留在我的身邊。」

劇場內的國防軍樂隊奏響小號，表示演出繼續進行。我感謝元首對我以誠相待，並祝願他諸事順利，馬到成功。他陪我走到門口，然後駐足目送我離開。

《諸神的黃昏》落下帷幕，這的確是一場感人肺腑的表演。我緩緩地走出劇院，發現阿道夫·希特勒大街已被隔離管制。於是我站在元首將要路過的地方，希望能再看他一眼。幾分鐘後，元首的車隊抵達劇院門前。希特勒站在他的座駕上接受民眾的夾道歡迎。他的護衛隊貼靠著警戒線，分駛於街道兩側。接下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我永生難忘。音樂總指揮埃爾門多夫、蘭格女士、蘇希妹妹還有一位老夫人——她的名字我已經忘了，只記得她住在萬弗雷德莊園——他們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我一直沒搞懂是什麼原因。但現在，車隊朝著我們的方向緩緩駛來，我站在繩子拉成的警戒線旁抬臂行禮。就在那時，元首認出了我，他示意司機讓整個車隊停止前行，而他的座駕卻向我這邊靠了過來。他探出身子拉住我的手，衝我微笑著說道：「再見。」

元首的座駕又回到了護衛隊中間，他調正身姿，與眾人揮手作別。然後車隊便徑直向機場駛去。

突然之間，我成了在場輿論的焦點。所有的旁觀者都想知道，我這個奇怪的老百姓憑什麼能在大庭廣眾之下獲得元首的青睞。我自己有口難言。叫喊聲與人群的擁擠已變得越來越可怕。在此之前，元首同我的會面一直都是私下進行，最多也就當著一小群人的面，因此我們之間的友誼始終保持著一種私密性。但如今，隨著我們的關係被公諸於眾，我才真正地體會到了這段青年友誼的重要性。所有人都爭著跟我

握手。我那幾個朋友還想幫我解釋幾句——可完全是徒勞！激動的民眾根本聽不進去。我被人群推來撞去，每個人都想看我到底長什麼樣。鬼才知道他們究竟把我想成了什麼人。也許以為我是一個別國派來講和的外交官——若是如此，被推兩下也算值了。最後，我好不容易才鑽到了一個可以順暢呼吸的地方。「女士們先生們，」我喊道，「讓我走——我只是他的一個少時朋友。」

1940年7月23號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戰爭局勢正在劇烈擴大，根本說不清到何時才能到頭。

我廢寢忘食地投入到了地方機關的工作中。戰爭導致人口銳減，因而我的任務變得更加繁重，幾乎都快壓得我喘不過氣了。除此之外我的生活裡還增添了另一份擔憂：我的幾個兒子全都應徵到了軍隊。

1942年我加入了納粹黨。並不是因為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產生了改變，而是因為我向我的上司們做出了妥協，他們認為這場艱苦的鬥爭關係著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每個人都必須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當然，我的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名追隨者，但並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擁護者，我還有一個更深更廣的名義——少時夥伴。我本可以很輕易地拒絕入黨，只要我用平時那套話來搪塞他們：「這件事情我想先跟希特勒私下談談。」可是國家正在打仗，我不想搞特殊化。

我們鎮長曾經問我：「元首從沒要求過你入黨嗎？」當然沒有——我是他的朋友，僅此而已。希特勒不是也清楚地表明過我是他朋友嗎，他不是還覺得我在政治上是個「小孩兒」嗎？所以我告訴鎮長說，希特勒從沒問過我為何不入黨的事。

但我記得有一回，好像希特勒就此事給我做了一點暗示。1939年我去拜會他的時候，他把我介紹給了溫妮弗雷德·瓦格納夫人，他還笑著指出我身上沒有佩戴任何黨徽或勳章，當得知我此行的身份是「理查德·瓦格納」德國婦女聯合會，林茨分會的代表時，他對瓦格納夫人說道：「這就是庫比席克先生。他是你那個德國婦女聯合會的一名成員，簡直是太好了！」他言下之意是：我朋友加入的唯一組織竟然是一個婦女組織，這下你知道他是哪類人了吧。

曠日持久的戰爭投射出一道長長的陰影，使身處災難中的每個人又增添了一份失望和一份痛苦。在此局勢之下，我尤其想到了布洛赫醫生。這位在林茨被稱作「窮人的醫生」的老好人，通過希特勒以前的年級主任，休謨教授，給我捎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懇請我幫他在元首面前求情，希望希特勒念在他給克拉拉夫人看過病的份上，不要派人來騷擾他。我認為這種要求顯然毫不過分。回想當初在維也納的時候，我和阿道夫就經常針對猶太人問題發生爭執，因為在這件事情上，我不敢苟同他的一些基本觀點。我記得有一次，我很無辜地給他引見了一名猶太記者，他當時就跟我翻了臉。然而我相信對於布洛赫

醫生，希特勒還是會講點情面的。雖然我與這位老先生素未謀面，但我還是立馬給帝國總理府寫了一封陳情書，其中還附上了布洛赫醫生給我的來信。幾星期後，我從馬丁·鮑曼那裡收到了答覆，他嚴令禁止我以後再為他人求情；至於布洛赫，他同樣會按照對待其他猶太人的方法去處理；他還聲稱這是元首的明確指示。我並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沒有親自看到我的請求，至少布洛赫醫生還是繼續過上了相安無事的生活。然而我的擔憂並未因此而減輕。令我最受打擊的是，我已然失去了和希特勒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並且隨著戰爭的持續，這種可能性只會變得越來越渺茫。

一切塵埃落定，我們輸掉了戰爭。1945年5月，在那段令人惶恐不安的日子裡，我驚愕地聽見收音機裡傳出的訊息，德意志帝國戰敗，一場燒遍整個歐洲大陸的戰火終於被撲滅。《黎恩濟》的結束場景立時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護民官葬身於宮殿的大火中。

……人民還是拋棄了我，

儘管他們成就了我的美名，

每一個朋友都拋棄了我，

雖然他們曾帶給了我幸運。

即使在1945年戰爭結束以後，我也一直沒有參與任何政治事務，因為從本質上說，我只能算一個非政治人士。但無論面對多大的外界壓力，我都從來沒否認過我與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關係。

我在這方面的最大擔憂是以前我儲存的那些關於希特勒的紙質物件。我無論如何也要把他們儲存起來，留給子孫後代。幾年前，我就已經將這些信件、明信片，還有素描用玻璃紙封裝了起來。現在我又把它們裝進了一個堅固的小皮箱裡。我把箱子提到埃費丁住所的拱形地下室，然後撬開了地上的幾塊磚頭，挖了個深坑把它埋了進去。整件事情我做得極其謹慎，生怕留下任何痕跡。幸好我的行動採取得及時，因為第二天我就被美國人逮捕，隨後在臭名昭著的格拉森巴赫拘留營吃了16個月的牢飯。當然，在我離開這段時間，他們在我家裡進行了徹底地搜查，但始終徒勞無獲。最後，我於1947年4月8日被釋放。

起初我經常被他們叫去審問，先是在埃費丁，之後又是在格蒙登。其審問內容都幾乎無異，比如：

「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個朋友，是吧？」

「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1904年。」

「你這是什麼意思？當時他還只是個無名小卒。」

「是啊，但我的確是他朋友。」

「他還什麼都不是，你怎麼會跟他交朋友？」

一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曾經這樣問我：「你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你從他那兒撈到了什麼好處？」

「什麼也沒有。」

「但你自己承認過你是他的朋友啊，他給過你錢嗎？」

「沒有。」

「食物呢？」

「沒有。」

「他給你介紹過美女嗎？」

「也沒有。」

「他後來接見過你嗎？」

「接見過。」

「你經常見他嗎？」

「只是偶爾。」

「你用什麼辦法見到他的？」

「我就是直接去找他。」

「這麼說當時你跟他走得很近，是嗎？」

「是，很近。」

「單獨的嗎？」

「是。」

「沒有任何警衛在場嗎？」

「沒有。」

「那你本來可以殺了他，是吧？」

「確實。」

「那你為什麼沒有殺他？」

「因為他是我的朋友。」